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美] 大卫·科兹 (David M. Kotz) 著
弗雷德·威尔 (Fred Weir)

曹荣湘 孟鸣歧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苏联解体的阐述, 观点新颖, 见解独到……
适合每一个对当代俄罗斯感兴趣的人细加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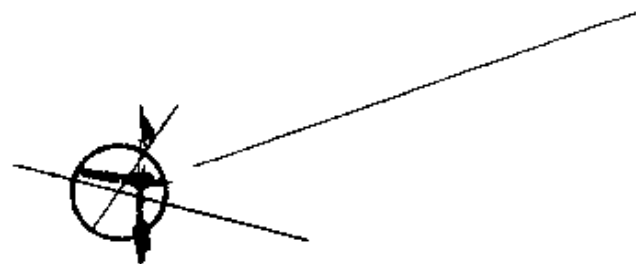
——托马斯·E·韦斯科夫(Thomas E. Wickham)

任何一个厌倦于时下流行的有关今日俄罗斯的作品的人读了这本书, 都会觉得大开眼界……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文笔流畅, 沁人心脾。

——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库(Stanislav Manshukov)

不管你是否赞同本书的观点, 它都是一本论证有力、资料翔实的好书。有关苏联解体的教训的争论很激烈, 本书对那种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终结的所谓流行观点, 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



ISBN 7-300-04101-9



9 787300 041018 >

ISBN 7-300-04101-9/D · 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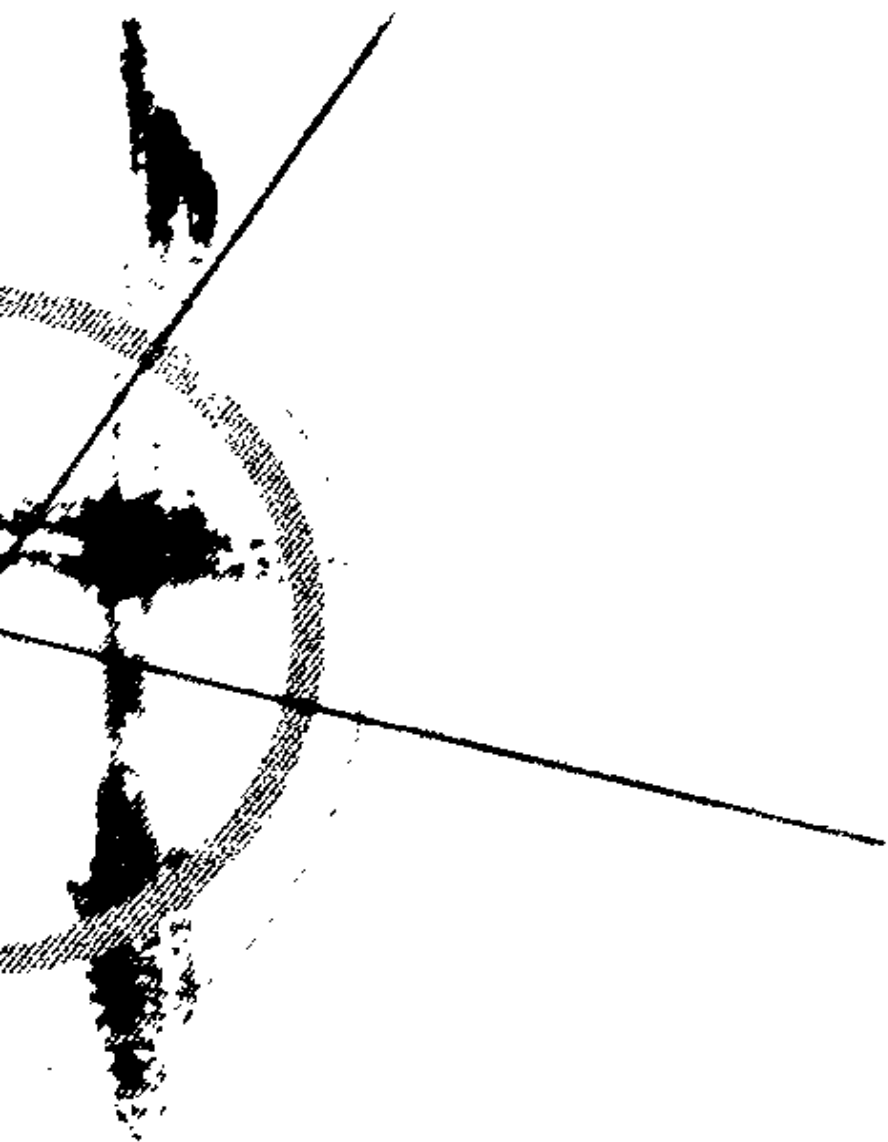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美] 大卫·科兹 (David M. Kotz) 著
弗雷德·威尔 (Fred Weir)

曹荣湘 孟鸣歧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美]科兹,[美]威尔著;
曹荣湘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0-04101-9/D·643

I. 来…

II. ①科… ②威… ③曹…

III. 政治事件—苏联

IV. 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6595号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美]大卫·科兹(David M. Kotz) 著
弗雷德·威尔(Fred Weir)
曹荣湘 孟鸣歧 等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编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ress.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本:890×1240毫米1/32 印张:11 插页2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2 000

定价:25.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Revolution from above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部 苏联体制	(13)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 体制	(15)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 缘起	(44)
第二部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 终结	(81)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识 分子	(85)
第五章 经济改革	(98)



第六章 民主化·····	(127)
第七章 党—国精英与亲 资本主义联盟·····	(144)
第八章 权力斗争·····	(174)
第三部 苏联解体之后 ·····	(209)
第九章 休克疗法·····	(214)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231)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267)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300)
参考文献 ·····	(314)
译后记 ·····	(332)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一章 导 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



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 2.65 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都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太空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3]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所有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着经济的运行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称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



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4]

1990—1991年期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惟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惟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5]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



计划经济无法运行。^[6]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造成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7]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8]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9]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10]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票数。^[11]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政治解体。^[12]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13]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



体制刚刚建立时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它们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14]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为联盟的完整也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是，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15]，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的最高层领导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势力。^[16]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夏的政变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提倡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惟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

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了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一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 and 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17]

党一国精英的成员们在抛弃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年就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资源，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了。其他人则成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捍卫社会主义到赞成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变需要某种戏剧性的世界观转变。面对无数的前苏共官员突然转变立场，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抱着些许的怀疑。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的领导层就经常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遇到尖锐的反对意见。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虽然确实也有一些苏联精英真正信仰某种社会主义，但他们毕竟只占极少数。

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进苏联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与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观念相反的。^[18]西方分析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历数苏联体制的罪恶，并把苏联共产党精英看成是这些罪恶的魁首。当苏联体制突然走到尽头时，西方分析家们自然就倾向



于把它解释成对苏联精英的胜利。按照西方主流观点的解释，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时，苏联精英为此使尽招数，但最终没有得逞。在苏联人民开始游行、开始投票赞成民主和资本主义时，苏联精英还想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样是这些为了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在导致苏联垮台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苏联精英，在许多西方分析家眼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19]

一些原共产党官员在新俄罗斯变成了资本家，这没有逃出西方分析家们的视线。然而，它被解释成这些精英们对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原共产党精英占了资本主义群众革命的便宜。在我们看来，精英们没有必要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他们正是首先发动这场革命的人。

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场得到苏联党一国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并不是说这是几个高层官员秘密操纵的一场阴谋。在苏联，发生过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许多团体都被牵扯了进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除了党一国精英，还来自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是有意识地拥护资本主义的，而且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新目标。^[20]其他许多赞成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人则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说法已经过时了，因而他们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新体制。然而，由于私营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的结合体传统上一直被称作“资本主义”，因而社会分析家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些人的姿态称作“亲资本主义”，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全都主张这些观点。^[2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见的物质私利在推动人们越来越拥护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这种变革路线的新的拥护者还是相信，不管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

尽管我们的观点有悖当前西方的主流观点，但我们还是相信，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支持。和其他的解释不同，我们对该过程的迅猛的、相对和平的特征也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苏联垮台的这种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独立后的俄罗

斯引进资本主义的计划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也有助于理清 1992 年独立后主导俄罗斯政坛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

本书记述了苏联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垮台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第一部为分析苏联垮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以便表明其根源、特征和运行机制；并且分析了 70 年代从快速增长到经济停滞的转变，表明了这一转变是如何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及其改革方案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第二部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最终导致苏联体制终结的过程。改革包含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性或者公开化、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本书分别考察了这三个方面。让苏联领导层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改革努力的失败。该部分还考察了党一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是如何在 1991 年采取了支持亲资本主义者立场的，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还追溯了 1989—1991 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以便了解为什么它会以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苏联国家的解体而告终。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夺权斗争与民族运动的兴起之间的关联，也在本部分考察之列。

第三部关注苏联垮台的后果。它分析了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继承国家从 1992 年到 1995 年的发展过程^[22]，审视了俄罗斯为了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而采用的“休克疗法”或叫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并且深入考察了随后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成因，还描述了 1991 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包括叶利钦政府日益增强的独裁倾向、共产党令人惊奇的死而复生。说当前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尝试将会成功，无论如何都缺乏根据。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体制仍然前途未卜。

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平等的体制能否取代资本主义？第三部的结尾考察了苏联事件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主流解释认为，该事件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



据说，社会主义的失败就连那些长期为此奋斗的人士都承认：未来属于资本主义，除此别无选择。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太幼稚了。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苏联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并不表明后一种体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下面各章提供的分析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也许最重要的省略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中欧等其他地区的终结。后者与苏联垮台均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除了几次有限的考察，我们没有考虑其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由于时间和相关知识的局限。我们在此也未能判断出，与苏联走过的路程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路是属于同一类，还是有所区别。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全部过程仍有待详述。但这种体制发源于苏联，它的根在那里扎得最深，时间也最久。探讨导致苏联垮台的内部力量，看来确实很有价值。

[注释]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实际上在1922年之前并没有形成，而是在革命发生五年之后才形成的（利阿撒诺夫斯基，1977，p.540）。1922年之前的新政权往往被称作“苏维埃俄国”。

[2] 《苏联国民经济》（1988，p.7；1982，p.41；1987，p.409）。《社会统计概要和指南》（1988，pp.395~398）。《苏联统计摘要》（1985，pp.843, 845）。

[3] 参看下述第三章。

[4] 第一个使用“国家社会主义”一词的是 David Lane。参看 Lane（1970，p.273）。

[5] Malia (1994) 对这一观点持强烈的肯定态度，他写道：“‘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内部的矛盾必然导致该体制突然瓦解，这只是迟早的问题。”(p.496) Ticktin (1922) 同样认为苏联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崩溃，虽然他没有把这种体制当成是一种社会主义体制。伊尔曼与科托罗维奇 (1992b)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认为，尽管苏联计划经济并没有崩溃，但它“也许不能够长期运行”，“也许怎么改都不行”(pp.13, 27)。

[6] 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可参看 Mises (1935 [1920])。

[7] 有关苏联经济的记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将在第三章对此进行集中讨论。

[8] 在本书第十二章，我们同样批评了这种蹩脚的解释，它其实不过指的是苏联混乱的经济状况和改革的不可能性，而并没有切中主旨，即经济为什么会崩溃。

[9] Karklins (1994, p.42) 总结道：“旧体制的坍塌是由来自下层的日益高涨的革命所引发的。” Reddaway (1993, p.57) 的分析更深刻些，他的结论也更为谨慎：苏联的群众革命“对帝国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又接着补充道：“在我看来，它们并不代表着一种真正的革命。”

[10] 参看本书第八章。

[11] 第八章将要详述的全民公决曾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九个共和国同时举行。这九个参加公决的共和国占了苏联总人口的 93%。

[12] 各种学术著作提出了其他许多有关苏联崩溃的解释，但它们并没有渗透到普通人的意识中。其中有些观点把苏联崩溃多多少少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些著作也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Dallin (1992) 曾对苏联历史事件列了个时间表，其中也包括后斯大林时代逐渐消蚀现行体制的中央控制的松懈和腐败的盛行，但他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体制还是有效的。福山 (1993) 认为，苏联体制合法性在公民眼中的丧失，导致了它的崩溃，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位分析家科托罗维奇与福山一样也持这种态度 (1993)。Miller (1993) 把苏联崩溃描绘成日益强大的职业和技术阶级反对现行体制的结果。Lewin (1995) 提供了一种更为微妙和敏锐的分析，其结论是：苏联体制致命的弱点是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

[13] 1990年12月，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警告说，外国知识分子队伍正在从事着一场破坏苏联的“秘密战争”(《真理报》，1990-12-13, 1版)。



[14] 最高苏维埃最后一个发言人、戈尔巴乔夫的长期助手、越来越对戈氏政策不满的阿纳托利·卢卡诺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背叛了党”（1994年1月15日访谈录）。

[15] 苏联之内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它是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我们将简称它为“俄罗斯共和国”。

[16] 第二章对苏联“党—国精英”作了界定，它指的是苏联共产党、政府和其他重要官方组织中的高级官员。据估计，这一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万人。

[17] “来自上层的革命”一语曾在许多文献中使用过，其中包括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对苏联社会的急剧重组，以及之前的俄国沙皇改革俄国社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术语指的是由某个社会中的统治精英集团发动的而不是单独某个领导人发动的革命。

[18] 这种观点在俄罗斯是更能接受的。一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卡格尔利茨基（1992）认为：“为了保持和加强他们的地位……统治集团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模式和新的所有制结构。”（p.26）然而，与我们这本书所提出的观点相比，卡格尔利茨基显然相信苏联体制正在崩溃，而党—国精英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

[19] 这就解释了西方媒体早期通行的把俄罗斯政治人物当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前共产主义者”的看法为什么会可笑之极。这些偏爱迅速向资本主义转轨的人（例如，鲍里斯·叶利钦本人），从来就够不上这一称号，尽管他们中有人担任过多年的共产党高级领导。

[20] 叶戈尔·盖达尔，这位1991年成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的苏联精英，曾公开地谈到过俄国的“资本主义革命”（OMRI《读者文摘》，1995-05-22，第98卷，第一部）。

[21] 资本主义同时还具有少数富裕阶级个人垄断企业所有权的特征。苏联私有化的鼓吹者常常把私有化称作是一种将会导致全体人民更广泛地享有资本所有权的过程，因而当然和资本主义有所区别。然而，在任何一个私有财产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国家里，企业所有权都是高度集中的，要想苏联的个人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转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显然缺乏事实根据。

[22] 关于独立后俄罗斯的研究时限大致到1995年末，尽管1995年的某些数据在本书写作时还无法得到。

第一部
苏联体制





导 言

苏联体制的终结是该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本书第一部探讨苏联体制的起源及其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的演变。第二章考察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苏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他们关于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的观点。从这次革命到新社会成型，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20年代末在苏联建立起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决定，以及随后出现的苏联体制的主要特征，该章都作了追述，并且分析了在苏联出现的新精英阶层的性质。

几十年来，尽管苏联的经济问题长期严重存在，但苏联体制一直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第三章分析了苏联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同时反驳了在这一问题上的通行看法。该章介绍了1975年后苏联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景，同时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作出了一定的解释。我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既是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对1975年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反应。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1991年8月苏联未遂政变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未能成功地挽救苏联，此时，他反复地提到了1917年的“社会主义选择”。这指的是20世纪最重大的革命之一，即苏联的诞生。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之后，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宣告：“现在，我们必须在俄国建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1]

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早在70年前就已兴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的首次胜利。



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并预言一场工人起义将会用一种全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及北美的所有主要国家里，许多工人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均为这种预言所吸引，相继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那么，这种使他们谴责现存秩序并呼唤某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观点，这种在70年后激发起俄国革命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社会主义观

让那些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该书中居然包含了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赞语，例如：

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其阴暗面——它们以剥削工人为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工人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这些巨大成就。工人阶级作为这些成就的创造者所得到的，却是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掠夺了所有的利润。中世纪的世袭贵族被金钱贵族所代替。

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并不止于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平等特征。他们还谴责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此时，虽然商品需要持续增长，生产



却停滞了下来。他们还声讨失业对新工人阶级所造成的浪费和痛苦，这些新工人对昔日小农或城镇工匠的安定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厌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生产财富的商品。^[4]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未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必然来临，它不是来自向富人和当权者宣传社会变革有多么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以这种社会变革观点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或说工人阶级注定要走的一条道路，乃是从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自我组织起来转到为政权而斗争。最后，工人阶级将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预见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图景。他们一直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坚信，建立新社会的秘方就蕴藏其中。只有少许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评论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新社会可能有几个阶段，一开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及其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仍然相对强大的时期，可是终将发展而成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最后阶段称为“共产主义”^[5]。

俄国革命前，社会主义者对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展开了争论。但他们普遍同意，社会主义制度应具备三种基本经济特征：

第一，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机器、能源和大规模运输系统等，都应成为公共财产，而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这将终止资本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此后，谁也不能仅凭财产所有权就获得收益。

第二，应该由经济计划而不是市场力量来指导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计划与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秩序，他们把后者看作混乱的市场交换关系。^[6]正如单个资本家对其企业内部活动加以计划一样，作为总体的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权力，也会采纳计划体制对全社会的经济过程进行指导。他们相信，经济计划将会消除资本主义的



顽症——失业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

第三，社会主义将取消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资本家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是以他们预期什么能带来最大利润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极力追求利润的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它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方式。社会主义将用“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是为了造福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由于没必要保守商业秘密，知识将会在企业中广泛传播，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将超过资本主义业已证明的惊人成就。

早期社会主义者更多地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其政治结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府总是一个阶级统治和控制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共和制，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多数人的统治也是无法实现的。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经济力量阻止了劳动阶级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7]

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将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去保证被打倒的资本家阶级不致复辟或干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来表达工人成为新的统治集团这一观点，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相对应。可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期望，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主将会盛行。毕竟，除了通过能够让工人阶级的成员们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并达到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统治阶级？由于能够推翻民主原则的富裕阶级不存在了，因而这种“工人的民主”有望成为一种比以往任何民主更为名副其实的民主。

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而生产、民主的劳动者国家，被认为体现并发扬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种社会价值——平等、经济安全、合作和民主。人们相信，由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与更快速的发展、更充分地使用社会生产力相伴随，因此，社会主义将很快消除贫困。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现象，将通过经



济计划而得以消除。合作将取代资本主义狗咬狗的竞争。

经过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旧制度残骸逐步消除之后，人类社会将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自原始集体狩猎时代以来的阶级将从人类历史上彻底消失。在阶级斗争的废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逐渐消失。作为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将会消失。一旦新社会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里建成，一旦资本家为控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世界范围内的对立趋于终结，战争将成为历史。

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对工人阶级造成压迫。即使是资本家，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所支配，虽然这一制度由他们所主导，但在不自由这一点上，他们和工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资本家必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他们必须积累资本。那些未能有效地这样做的人，总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并结束其资本家的身份。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制度。它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首次达到了对社会运行原则的自觉控制，而不是受控于它。^[9]

俄国革命

人类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能像社会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及其对替代性社会的想象的信仰那样，能够推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掌握俄罗斯政权——不是为了追求名誉、财富，也不是以权力本身为追求目标。^[10]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他们的著作作过长篇笔记，认为其中包含了能够指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存在着一种陈旧的争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追随者，还是受权力的驱使而制造了一种对其进行歪曲的观点？不管哪一方是事实，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列宁增加了一种关于如何开展工人革命的新理论，而这在马克

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列宁提倡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按军事原则建立起的党组织，他们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中央领导层就政策进行讨论，并根据多数票原则作出决定。但是，一旦作出决定，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列宁认为，在把社会主义知识传播到城市工人阶级当中的时候，要想在沙皇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这样的党就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开展革命，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and 领路人。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先锋队关系，被证明是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组织的有效办法，也是在1917年沙皇政体崩溃之后的混乱局势中夺取政权的有效途径。但它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类型显然也有重大的关联。

没有人曾料到，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某个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例如英国或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西部的主要城市里已有了大工厂和相当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中有大约250万工人从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然而，城市工人阶级周围是大批的农民。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75%的人从事着传统的耕作业。^[11]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苦，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对沙皇政权，怨恨重重，因此，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他们有可能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同盟军。不过，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吸引这些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却不是件轻易的事，因为他们从古至今的愿望就是变成自己那块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

1917年，世界大战造成的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危及沙皇政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们和他们更温和一些的社会主义兄弟——孟什维克一起，在城市工人中寻找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观众。另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却在农民中组织起来。这一年



的3月^[12]在严寒的首都——彼得格勒，一系列罢工终于导致了一场自发的工人起义。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缴了自己的械并跑到工人一边时，沙皇政权就宣告倒台了。

在随后的八个月里，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和从整个俄国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共同分享政权。苏维埃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组织。^[13]在苏维埃内部，最有影响的团体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临时政府决定不让俄国退出战争，从而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工人、农民的极端情绪。农民从地主那里夺过土地，工人要求返回工厂的权利。

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最激进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不懈地呼吁俄国退出战争，要求工人控制工厂、农民掌握土地，总之要掌握一切有助于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利。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整个俄国，几百个苏维埃都通过了要求把全部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决议。^[14]机不可失，布尔什维克在11月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夺权运动。随后不久，莫斯科的政权也被苏维埃夺取。在彼得格勒，来自全俄的苏维埃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并被命名为“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新政府”^[15]。

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件不同的事。由于一开始只掌握主要城市，布尔什维克面临着追随旧政权的武装势力的反扑，后者从西方主要国家得到了武力支持和装备。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支持率有限，但他们能够建立一支“红军”，限制敌人的活动范围，并终于在1920年末控制了前沙皇俄国的大部分地区。1922年，新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6]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形成

从开始起，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理论上，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



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共产党之手^[17]。苏维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图章。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之后也被取缔了。1921年，一度在共产党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18]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的专制形式？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接威胁之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走向民主。^[19]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解释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传统不会永远延续。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当代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民主都是在这方面存在打破历史先例的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迅雷不及掩耳地夺取了政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在领导一支武装对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有用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权者，但它并不利于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布尔什维克，以及随后各国的共产党，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成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许多场合

都曾抱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20]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令人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21]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支持率。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大多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体倒闭的厄运。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机构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个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副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欧洲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人们往往称之为“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垮台。

20年代的经济政治过渡

俄国从革命到形成一种稳固的新经济制度，花了十多年时间。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极一时。工业被国家化了，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按照战争需要来调控。交通阻塞、兵荒马乱使大城市的供应捉襟见肘，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



俄国人发明了一种十分集中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尤其在战时条件下是如此。

内战胜利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崩溃。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出台了一项突然改变方向的经济政策，即所谓“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到1928年。外国资本家被邀请到俄罗斯投资，私人经济在贸易、服务甚至工业领域都得到鼓励。在农村，农民可以随意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并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到了1927年和1928年期间，俄国经济大体上从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复苏过来了。此时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关于下一步经济政策该如何走的问题，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开始时以列夫·托洛茨基为首，后来以G.季诺维也夫以及L.加米涅夫为首，提倡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促使个体农民走向农业合作。他们担心，自由的农村会成为农业资本家阶级的滋生地，因此有必要通过把农业转化为一种集体形式的做法避免这种危险。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人则鼓吹，应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渐进推行工业化，同时更为渐进地开展农民合作化的组织工作。

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和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完全不同。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党的总书记大权在握。在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斯大林通过支持布哈林的渐进发展策略，首先击败了快速工业化的鼓吹者，而后又击败了布哈林及其渐进步骤的鼓吹者。^[22]大约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大权独揽之后，斯大林开始强令推行一种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和彻底消除私人经济的新路线。斯大林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新路线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正式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其工业化的目标雄心勃勃，却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端变化。^[23]一年之后即1929年，新模式开始推行，由斯大林个人决定，发动了一场强行把苏联千千万万的农民集中起来的运动。

2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许已成型也许还在建设，但总之已成为“苏联体制”了。这一制度的经济特征在随后的55年里很少发生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告终结。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也比较稳定，尽管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权力几易其手，其运行方式也几经变更。

苏联体制的经济结构

苏联新体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惟一的例外是集体农庄，它们被认为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公共财产。^[24]

调控这一制度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形式。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为整个国家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表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年度计划则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操作性文件。它们分别规定了每一种重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计划体制的最上层，是所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机构，在为这个庞大国家制定一项内部协调一致的经济计划方面，它的任务极为艰巨。国家计划委员会采用了一种叫做“物资平衡”的方法来预算生产性投入——钢铁、水泥、工厂设备等等，后者的生产要与终极产品生产的目标水平相一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级，计划替相对较广的产品种类分别制定了产量指标。^[25]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是各经济主管部门，它们在各自所主管的领域里把计划分割成范围稍窄的生产指标。各个企业具体从事生产，它们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门的控制。在企业这一级，计划具体规定了各种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而作为供应部门的国家物资局，则负责管理各企业之间的供应关系。^[26]

货币与财政在苏联体制中起着次要的，但又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业接到生产指令，国有银行系统就会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使它能够支付在经济计划中已明确规定的劳动力和物资投入费用。是计划的生产指令，而不是信用或获利，引发了经济活动。



国有企业倾向于无限制地壮大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强烈地相信，大型企业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中央计划部门指挥少量的大型企业总比指挥许多小型企业容易。在企业这一级，个人全权管理是主要的原则。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负责人，他有权控制企业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党的书记和贸易组织领导人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总负责人才是最高的权威。

苏联共产党也有与国家计划组织平行的机构。它的中央委员会下属各种专门的生产部门，参与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共和国、省、地方各级，党的书记与同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一道，在其权限范围内负责计划的实施。在所有的城市里，党委书记都与地方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大企业的总负责人一起，保证该城市的计划得以完成。

如果说，苏联体制完全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那也有失准确。市场起着第二位的作用。消费品主要通过零售商店来分配，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到上架的东西，其价格由国家统一调整。不过，消费品分配的非市场形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给，在工作场所按特殊价格分配给工人、管理人员和官员的商品，以及在专门商店里分配给高级官员的优质产品。工人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找到工作，在那里，工人根据报酬的高低和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的工作。^[27]不管是在生产物资上，还是在消费物资上，同样存在着黑市，此外，企业也在官方计划之外交易商品，这一灰色市场虽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发和调整经济活动方面，中央计划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苏联体制还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而这大多数直接靠政府来完成。然而，这一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则是直接依据工作场所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许多大型企业出资兴办了托儿所、门诊部、学校、疗养院、休闲胜地，以及其他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娱乐设施。在苏联许多由单个公司构成的城镇里，主体企业直接出资提供本地大多数的公共服务。^[28]



苏联体制的政治结构

在苏联，政治权力由两个平行的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另一个是共产党机关。^[29]在名义上，党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党员选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党的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委员会由几百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再依次选举一个由一二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各项事务。^[30]

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不定期举行，也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31]，而个别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举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32]最高党组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贸易联合会、专家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研究苏联政治的专家们就苏联体制的高层机构内政治权力的准确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论。^[33]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34]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没必要非搞清楚党和政府机构之间到底如何分配决策权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35]

虽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化，但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却有所不同。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末，斯大林亲手发动了迫使1.25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1933年期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1935—1939年里，近100万党员被害身亡。^[36]即使到了后期的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成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死刑的处罚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

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 200 万人非自然死亡。^[37]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工人、妇女和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决定性地转变为这一观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而在列宁时代，这种对领导人崇拜是完全不存在的。^[38]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逝世的 1953 年。几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谢尔盖·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迫害、流放或监禁的待遇。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而是给予降级处分。^[39]

什么是苏联体制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产生了无数的文献。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⁴⁰ 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



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41]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一样，工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也挣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但正如上述，这在苏联体制中只是一个更为消极的因素。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而非竞争的压力。^[42]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的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43]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质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在苏联体制中，合法的收入只来自工作。^[44]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十分迅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探究）。由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在诸如技术信息共享和管理方法共享之类的合作方面，其范围之广泛，是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45]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

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大量的失业了。^[46]相反，却全面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在苏联体制中，不仅找工作很容易，而且一旦工作，就会有高度的保障。工人很少被解雇或开除。这不仅意味着工人有很高的个人收入保障，而且意味着一旦斯大林恐怖时代结束，工人对工作就会享有极高的非正式选择权。在名义上，企业管理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历来就几乎没有解雇过工人，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为轻松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47]、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48]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



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49]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 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 1967 年的十分位率是 4.5。^[50]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 4.5 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 15.9，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51]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52]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相伴随并交织在一起的，同样还有一些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一些是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另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一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位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甚至地方社团也包括在内。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外迁是被禁止的。^[53]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



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权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厂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这种观念却烟消云散了，苏联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个人全权管理制度，却是直接从该时代的资本主义管理手册里抄袭过来的。

不过，苏联工厂里的内部关系在形式上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的。由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权利，促成了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在大型的苏联企业里，职工的队伍稳定、岗位稳定，也不能随意迁往其他地方；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食堂，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幼儿园，为其休假提供了闲居地，甚至还分发特殊消费品，所有这些都和家长式的封建庄园毫无二致。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业和职工的代表和保护人——在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后，这一模式导致与人们期待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标准大相径庭。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前面所说的相对平均的金钱收入分配，并不包括精英成员们所拥有的获得消费品的特殊门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54]。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这种特权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它与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显相冲突。但是，有谁会不知道呢？

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

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55]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56]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57]这种结论根源于一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



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58]

党—国精英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 2 000 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59]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60]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6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 10 万人^[62]，占苏联总人口的千分之一^[63]。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 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 2.4 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 30 万，

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64]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一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了。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人党并上升到党一国精英阶层。随着党一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65]对于那些要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66]个人关系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经济管理之路步步高升的事业方面。最后，要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

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67]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68]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一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69]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还是发现，绝大多数高级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识界工作，“并不一定跨进精英大门”。^[70]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它们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发挥）。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71]

苏联党一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72]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注释]

[1] Nove (1989, p.36).

[2] Tucker (1978, p.473)

[3] Tucker (1978, pp.476-477). 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275~277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 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共产党宣言》谴责了狭隘的自私自利,集中谈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拜物教:“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Tucker, 1978, p.475)。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1995。

[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实际上既指新社会的早期阶段,也指其晚期阶段(Tucker, 1978, pp.527~532)。随着马克思对该词的用法的改变,“共产主义”就被用来专指最后的、无阶级的阶段。

[6]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市场关系,因此他们把市场力量看成是强加给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的、混乱的交换秩序。与有意识的计划经济活动相比,由市场力量所引导的秩序,从社会观点看来,是自发的、本质上非理性的。

[7] 工人可以给立法部门施加影响,可是,在一个往往被后人错误引用的《共产党宣言》的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Tucker, 1978, p.475; 中文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4页。)这就是说,资本家能够利用政府部门来保护他们的重大利益。常见的错误引用是这样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错误在无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论文和演讲中出现过,有时也在其支持者中见到。这一错误引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归结为一种粗制滥造的理论,似乎他们简单地把现代国家看作资本家阶级的工具,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8] Tucker (1978, p.491).

[9] Tucker (1978, pp.715~716).

[10]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斯大林也许是个例外。Meivedev (1989, pp.581~601) 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不同,他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机,只是无止境的权力欲。

[11] Davies (1994, pp.17, 1~2).

[12] 人们往往把这一年3月发生的革命称为:“二月革命”,这实际上是根据那时的俄历计算的。同样,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也是发生于公历的11月。

[13] 最早的苏维埃出现于更早一些的1905年革命期间。在俄文中,“苏维埃”的意思是“委员会”。

[14] Chamberlin (1965, p.278). 1917年7月和10月两度在莫斯科举行的预备会议选举,显示了激进情绪的程度。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参加预备会议选举,并不是只有工人和农民可以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0月的选举中获得了51%的选票,相比之下,早先的7月选举只获得了11%。其他的社会主义党派获得了10月选举的另外18%的选票 (Chamberlin, 1965, p.279)。

[15] 其他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谴责了夺权行为并离开了大会,虽然部分社会革命党成员留了下来。

[16] 苏联在法律上是各共和国的联盟,开始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诸共和国(后者由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组成)。之后在20年代末,三个中亚共和国接受了“加盟共和国”的称号。新的国家并没有包括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就获得了独立,而前帝国的其他部分地区则转到了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手里(雷萨罗夫斯基,1977, p.540)。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后来在1941年加盟到苏联当中。

[17] 布尔什维克曾几次改变其名称,但我们将简单地称之为共产党,或CPSU(苏联共产党)。该党的后一个名称直到1952年还未曾正式使用过(Schapiro, 1960, p.605)。

[18] Lewin (1985, p.192)。取缔共产党内派别的法令被认为只是暂时的,但这个法令之后再也没有被废除过。虽然党内派别已正式取缔,但在斯大林于20年代后期大权独揽之前,相对自由的内部争论仍然在高层领导人讨论重大问题时存在。

[19] 某些批判社会主义的人认为,苏联专制制度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必然产物,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以及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国家对个人的专制。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哈耶克(Hayek, 1944)。

[20] Medvedev (1989, chs.1, 2)。

[21] Lewin (1985, pp.258-266)。

[22] Medvedev (1989, ch.2)。

[23] 斯大林新政策的极端性和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提倡的早期发展策略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尤其是,后者没有一个提倡农业强制集中化的措施(Cohen, 1985, p.61)。科亨(Cohen)认为,在斯大林发动他的强制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的激进运动时,他“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流认识”。

[24] 集体中的农民允许出售他们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里出产的产品。同样，在不同的时候，某种类型的私人小生意也是允许的，但它们在经济上只起微小的作用。

[2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的计划里预算了大约 2 000 种产品的物资平衡。

[26] 这里的描述是极为简化的。除了负责特殊工业部门的部门外，还有一系列涉及多个部门的部委，这包括财政部、内外贸部、国家价格委员会、劳动和工资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等。计划也有地方的，计划组织也有共和国和地方各级。此外，不同的时期组织内容也有变更。对苏联计划过程的详细记述，见于 Nove (1986)、Gregory 和 Stuart (1990)。

[27] 不过，某些非市场力量也在劳动力安置中起作用，例如党所发动的劝说工人迁往新开辟地区的运动，以及加于城市居民头上，迫使他们在收割季节“自愿”参加农业劳动的社会压力。

[28] 当这些安排在资本主义国家鲜为人知的时候，它们却在苏联体制中盛极一时。

[29] Hough 与 Fainsod (1979, chs. 10 ~ 12) 对苏联政治制度中的中央机关曾作过详细讨论。

[30] 中央委员会选举总书记的办法直到 1966 年才在实际上写进党的章程 (Miller, 1993, p. 23)。

[31] 在 1925 年之前，党代会每年举行一次，在此期间，它是领导层就重大问题展开争论的阵地，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党代会只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并且不允许争论。

[32] Rigby (1988, pp. 523 ~ 537) 曾讨论过“任命制”的起源。

[33] 例如，参看 Hough 与 Fainsod (1979, ch. 14)、Rigby (1992)、Lane 与 Ross (1944 b)。

[34] Hough 与 Fainsod (1979, p. 362)。

[35] 权力集中于上层，并不完全排除其他方面的影响，斯大林时期之后，公众舆论对于千百万党员的观点影响颇深，并沿着整个结构向上渗透。正如在任何极权形式的政府中，高层领导如果希望长期把持权力，就必须关心公众舆论。

[36] Cohen (1985, p. 55)。

[37] Cohen (1985, p. 95)。关于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重要著作，还包括



Medvedev (1989) 和 Conquest (1968)

[38] Cohen (1985, p. 52).

[39] 变化的标志就是赫鲁晓夫在 1964 年由于其“错误”而在严厉的官方声讨中被他的对手赶回到他的郊区别墅从事回忆录的写作。

[40] 后来，这一公式变成了下述主张：苏联官方认识到三大阶级——工人、农民和白领雇员——之间的区别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于是，苏联就成了一个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国家。

[41] 一些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把该制度看作社会主义，则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把社会主义仅仅解释为基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这就把“社会主义”一词的意义变得比那些鼓吹者所表述的意义狭窄了。社会主义者总是认为，群众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支配，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42] 虽然两种制度之间差异重重，一些分析家仍然认为，苏联体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此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是 Cliff (1988 [1948])。这一传统中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 Bettelheim (1976)。

[43] Lane (1988) 提供了多多少少与此类似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解释。

[44] 这没有包括退休金、抚恤金和学生生活补贴，以及其他类似的非劳动收入。但这些都来自财产权。在苏联体制中惟一合法的财产收入是在个体所有的家庭中出租空闲房间的租金。

[45] 然而，苏联计划制度中存在着各种机构争夺资源的现象，这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46] 在苏联一些中亚共和国地区，战后一段时期内失业率有所上升，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与极高的出生率。而在苏联其他地区，除了少数工人时工休息之外，失业率几乎为零。Hewett (1988, p. 39) 评论说，苏联达到了“任何工业化经济可望达到的充分就业率”，他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失业人数低于全部劳动力的 2%。

[47] 城市居民一般情况下所付的租金，只占其收入的 5%~10%。

[48] 1974 年，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工人占 18.1%，农民占 17.6% (Hough and Fainsod, 1979, p. 364)。

[49] 有证据显示，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工资收入分配是十分不均的，但 1956 年工资改革之后，它变得更为平均 (McAuley, 1977, pp. 222ff)。

[50] McAuley (1979, p. 57)。

[51] 这些数据来自：Vinokur and Ofer (1986, Table 10)。而他们两人所使



用的原始数据则来自被广泛引用的 Sawyer (1976, p.17) 的研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十分位率均指的是税前的家庭收入。Vinokur 和 Ofer 所列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挪威的税前收入十分位率是最低的,只有 6.7,比苏联的比率还高 49%。

[52] 在苏联,收入最高的人当中有 20% 是高级蓝领工人,而英国 (2.8%) 和荷兰 (2.8%) 的这一比例明显比苏联低。参见 Vinokur, ofer, 1986

[53] 有观察家报告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某些农村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和封建主义极为相似,有城堡,有私人警卫,也有私人监狱,参看 Miller (1993, p.33)。

[54] 与西方“别墅”一词所普遍包含的奢华含义相比,俄语“dacha”一词则指普通家庭建在乡间的用来休闲的房屋,它可以是一座时尚的小棚屋。许多城市家庭都有别墅,他们在这里避暑度假。然而,分配给党一国精英高级成员的公家别墅,是又大又舒服的。

[55] 有许多例外。高收入和特权同样光顾一些非精英者,例如杰出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和运动员。

[56] 这里,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一种也许可行的制度,即企业职工拥有和支配单个企业,而企业之间的关系则留给市场。这一可能性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论述。

[57] Ticktin (1992) 就持这种态度。在对苏联经验作了深邃的思考之后, Daniels (1993, p.175) 否认在苏联体制和马克思的原始概念之间有任何联系,他指责苏联领导人“打着偷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Miller (1993, p.8) 把苏联体制看作是首先受一种回到沙皇时代的、把其独裁传统现代化的动力所驱使。

[58] 对苏联体制持批评态度的许多西方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它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在 Paul M. Sweezy (1980) 那里看到这种观点的充分论述。其早期的论述则可以在 Djilas (1957) 那里找到。这种观点的某些提法与他所提出的观点的某些方面并无重大差别。不过,我们并不认为统治苏联体制的党一国精英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本问题的讨论可参看 Nove (1975, pp.615~638)。

[59] 1989 年,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到 1 950 万的最高峰 (Izvestia TsK KPSS, 1989, No.3, p.138)。

[60] 这里所列举的机构有所重叠。中央委员会也包括其他部门的成员。

[61] 这些人中有少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62] Farmer (1992, p.84) 引用了许多有关苏联统治精英规模的估计, 其中包括斯大林在 1937 年的统计: 苏联“高层领导人”, 3 000 ~ 4 000; “中层领导人”, 3 万 ~ 4 万; “基层党组织成员”, 10 万 ~ 15 万。在对许多估计作了考察之后, Farmer 总结说, 战后其统治精英大约有 10 万人 (p.85)。Zimbalist et al. (1989, p.258) 则认为苏联统治精英“不超过 10 万人”。

[63] 相比之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 资本家阶级——即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并据此为生的人——往往只占其总人口的 1% ~ 2%。苏联党一国精英实际上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分子。

[64] 《苏共党史》(1977, p.77), Lewin (1985, p.200)。

[65] 一项研究显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92.6% 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和 100% 的高级政府官员都受过高等教育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 1994 b)。

[66] 关于苏联精英们的教育背景的详细记录, 可参看 Farmer (1992, ch.2)。Kryshchanovskay (1994 b) 发现,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72.3% 的高级党政干部和 80.7% 的高级政府官员接受过技术、工程、农业或军事技术方面的教育。

[67] 在某些前资本主义制度中, 统治集团身份的遗传, 既包括名号, 也包括财产, 例如, 一个封建领主的儿子既继承其领主身份, 也继承其领地。在资本主义下, 资本家阶级的成员资格仅仅是通过财产而继承的。当然, 这并不排除资本主义下攀升的可能性, 正如某些出身卑微的人依靠其事业成功或辛勤劳作而爬到资本家阶级的地位。

[68] 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 但东窗事发并受到惩处的风险也不假。

[69] 参看 Nove (1975), Matthews (1978), Farmer (1992)。

[70] Matthews (1978, p.159)。

[71] 一项研究显示,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70% 的部长和国家委员会领导人, 50% 多的大型国营企业负责人, 参加工作时都是工人或农民 (Matthews, 1978, p.158)。

[7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把苏联党一国精英叫做“精英”或“集团”, 而不称之为“阶级”。缺乏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常见形式, 无法保证将其统治集团的身份传给后代, 这使他们看起来是一种松散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占有财产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苏联体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诞生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运行方面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问题。它们困扰着苏联官员，也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且被该体制的批判者一再当作口实。不过，从 1928 年开始，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模式在许多方面照它自己的标准看来仍然是十分成功的。该体制的经济成就，是其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观察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

但是，苏联经济状况在 1975 年之后急



剧地衰退了。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减慢。我们将力求表明，1985年新的改革派上台，既是人们对苏联体制下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满的结果，也是这次经济减速所引发的危机意识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所推动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既源于他们对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理解，也源于他们对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的分析。

1928—1975年苏联经济状况

20世纪初，当社会主义观念还鲜为人知时，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对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可行展开了争论。1928年后的苏联经验解决了这场争论。不管苏联体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毕竟没有显示出不可行性。相反，在西方于1929年后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萧条时，苏联经济却开始了一轮快速工业化的时期。

苏联领导层首先集中精力建立重工业基地，这些基地有一部分是革命前的，但大部分是新建的。^[1]国内机器设备工业发展的步伐，足以说明30年代工业化速度之快。实际上在所有的工业活动中，机器设备都是一种关键的投入。1932年，苏联安装的机器设备78%依赖进口。大略到1936—1937年，就只进口了不到10%，其他全是国内生产的。^[2]

一本通行的关于苏联经济的美国教科书总结说，“大致在1937年……苏联已经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3]。工业化的标志，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增长长波理论的创始人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写道：

这一转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速度，在苏联远比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快得多……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他国家需要30



年至50年。^[4]

西蒙·库兹涅茨补充道：“看来只有日本（以国内产品为基础）的工业化速度与苏联较为接近。”^[5]

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建成的工业基础已能够生产当时的所有武器了，包括坦克、大炮和战斗机。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45年，苏联疆域之内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其工业产值只大致相当于战前的30%。然而，战后经济复苏也很快，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6]随后几十年，苏联经济一直增势迅猛。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在达到传统社会主义目标方面，确实取得了某些进展，包括充分就业、个人经济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可是，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目标，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总是占有重要的分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判断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合理，最终要看它是否能够有效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盛赞资本主义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又相信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够达到更快的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最终目标，不是消费品产量的无止境提高，而是最终达到全面富裕，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比物质消费更高级的活动。

因而，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经济的增长。只有通过快速的增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表现出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才能实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强化了对快速增长的强调，因为强劲而不断增长的经济是现代世界中军事实力的必要基础。快速增长既保证了国家的生存，也保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否则两者都会受到威胁。

苏联官方统计使用了“物质生产净值（NMP）”这一概念，而不是西方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来衡量经济总产值的增长。NMP和GNP的区别，首先在于NMP排除了大多数服务项目，

除了和实物商品的生产直接相关的服务（例如铁路货运）之外，西方专家认为，苏联官方的 NMP 数据包含了严重的歪曲，夸大了经济增长的速度。^[7]因此，西方专家设计了自己的标准，来估算苏联经济的增长。以 GNP 概念为基础的西方估算，能够用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进行直接对比。^[8]大学研究人员首先设计了这种标准。1950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经济学家，成了西方估算苏联 GNP 的主要队伍。^[9]

图 3—1 提供了苏联经济年度实际产量的增长率数据，同时列出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数据以资比较。^[10]苏联官方统计表明，其 NMP 在 1928—1975 年间一直迅猛增长。这种高速的增长率如果按复利计算，得出的增加额将会越来越大。1928—1940 年间 14.9% 的年度 NMP 增长率，换算出来，12 年里增加额达 5 倍多。1950—1975 年 8% 的年增长率，其增加额近 7 倍。纵观整个 1928—1975 年间，苏联官方统计的 NMP 增加额达 60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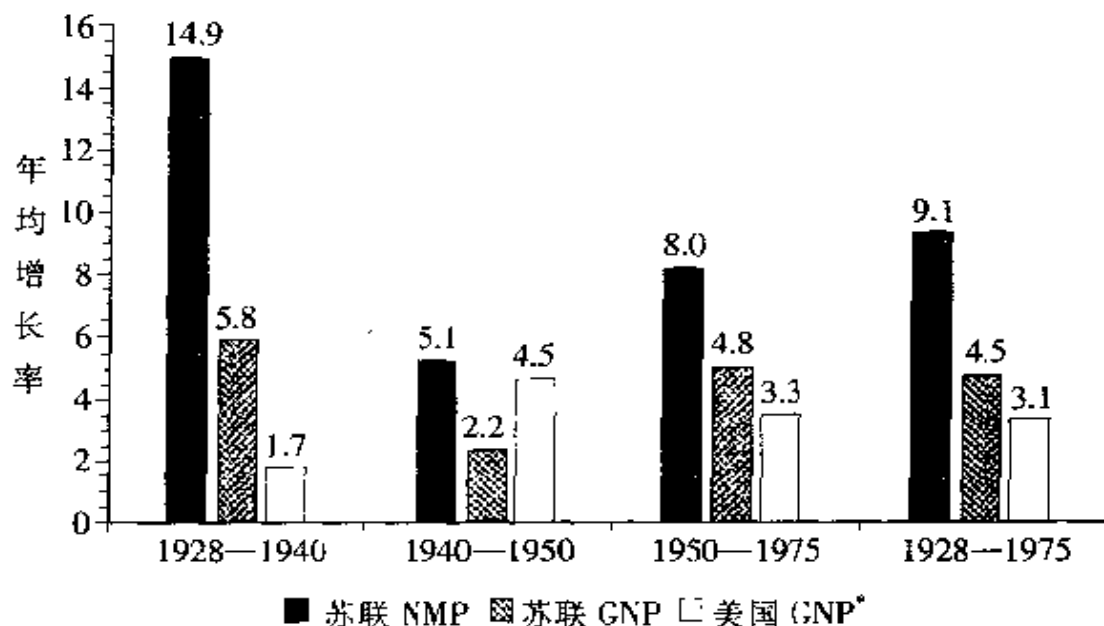


图 3—1 苏联和美国经济增长 (1928—1975 年)

资料来源：Bergson 1961：180、210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82：25、52—53；1900；46、55—56。1961：139.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5：234；1988：25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 NMP 为物质生产净值；GNP 为国民生产总值。

如此巨大的产量增加额在许多外部观察家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不过，即便使用西方 GNP 的标准，其增长也是迅猛的。撇开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时和战后复苏期不谈，苏联 GNP 的增长确实很快，比同期美国的 GNP 增长也确实快得多。比较苏联和美国的同期增长率是有欠妥当的。美国于更早的 19 世纪就实现了工业化，而经济增长速度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倾向于减缓。然而，图 3—1 GNP 的增长比较确实表明，苏联在 1928—1975 年间的 GNP 超过了美国。在外行人眼里，苏联 1928—1975 年间 GNP 平均每年 4.5% 的增长，似乎并不比美国平均 3.1% 的速度快多少。可是苏联的速度意味着近 8 倍的 GNP 增加额，相比之下，美国的增加额只有 4 倍多。倘若这一势头不减，苏联的 GNP 将最终赶上并超过美国。^[11]两国之间的 GNP 比较，同其增长速度相比较，产生的问题更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大约在 1975 年，苏联的 GNP 就接近了美国 GNP 水平的 60%。^[12]

苏联体制拥有达到这一快速增长的许多手段。在当前消费和新产品投资上，中央计划控制了国内产量的分配，并据此把绝大部分产值用于投资。^[13]这意味着开始时是低消费，但最终带来的快速增长将会推动消费。时间一长，新机器的大部分配件就越来越包含现代技术了。苏联经济不曾遭受周期性商业萧条的冲击，而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可谓司空见惯，它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停滞不前。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经济还达到了极高的就业率，这和它鼓励每一个成年人参加劳动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14]人民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也对劳动力效率日益增长功不可没。^[15]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的快速转移，推动了 GNP 的增长，因为单个工人的产值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高得多。

虽然消费占全国产出量的份额相对较低，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消费开始急剧增长。据西方专家估计，从 1950 年到 1975 年，苏联人均实际消费以年均 3.8% 的速度递增，其结果就是该时期消费增加了 2.5 倍。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实际消费的年均增

速只有 2.0%，增加了 1.6 倍。^[16]一位研究苏联经济的西方专家认为，1950 年后苏联消费快速增长的结果称得上是——

苏联生活水平的一次真正的革命，其意义远非量的增加可比。西方的估算并没有看到消费环境的改善，也没有看到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优质性，恰恰是它们，给苏联的生活质量带来了根本的改善。^[17]

在 1960 年，苏联大约每两个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每十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 25 个家庭拥有一个冰箱。到 1985 年，平均每个家庭都拥有了这些消费品。^[18]

苏联的计划者重视工业品的生产超过消费品的生产。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成功。1975 年，苏联在粗钢、轧钢、水泥、金属切割和金属制模机械、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方面的产量已超过美国。在某些农产品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小麦、鱼、猪、牛奶和棉花。^[19]

苏联社会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根本的转变。往日成片成片的农村现在变成了城市。^[20]农民的孩子可以首选非农业的工作。^[21]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口以及遍地都是的文盲，现在都成了教养良好的人。^[22]到 80 年代，苏联人均拥有的医生和病床比美国更多。^[23]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功，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是它在 1957 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其工业和技术上的成就，是它作为和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不相上下的对手而崛起的基础。苏联体制把一部落后的、半发达的国家机器发动起来，使之成了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

有关苏联经济状况的争论

上面对苏联经济成就的描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相对来讲没有什么



争论。^[24]但到了 90 年代，许多西方观察家开始在有关过去苏联成就的问题上保持低调。这并不是由于从昔日密封的档案中暴露出了什么新的材料。毋宁说，它是部分观察家如下的自然反应：既然苏联体制这么快就终结了，那么它一定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经济上也不例外。^[25]

在 1985—1991 年的改革年代里，公开的批评从 20 年代以来首次在苏联成为可能。一些持不同政见的苏联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对苏联以往经济状况的贬低言论。这些说法很快就被西方各大保守基金会所接受，这些新的苏联批评家们被邀请参加各种会议，他们的言论广泛传播。随着苏联经济问题在 80 年代末日趋尖锐，苏联体制在 1991 年终结，这些刻意贬低苏联往日经济状况的评价，在西方舆论中占了上风。

例如 80 年代，一位苏联经济学家，格里戈里·哈宁，不仅对苏联官方有关过去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提出挑战，而且矛头直指西方的估算。^[26]他对增长率的估算低于苏联官方的结果，在某些时期也低于西方。^[27]哈宁的著作被大量出版，保守的华盛顿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of Washington, DC）为之助了一臂之力。^[28]

虽然哈宁的估算采用的是 NMP，并不能和 CIA 的 GNP 数据直接相比较，但他的著作激起了对 CIA 估算的广泛批评。批评者暗示，CIA 故意加大了苏联增长的数据，让人们以为苏联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以便为自己继续获得庞大的活动资金寻找借口。但只要细想一下就会明白，虽然 CIA 有可能故意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但要说政治因素左右了 CIA 对苏联经济的估算，道理显然说不通。夸大苏联 GNP 增长率，将会使苏联体制看起来比事实上更有成就，比美国绝对地和相对地更为成功，这恐怕不是 CIA 所愿意推广的形象。再说，更快的增长、更大的 GNP，将会使苏联军费开支占其产值的比例看起来更小，使苏联看起来更不像是个军国主义者。

事实是，政治考虑在 CIA 对苏联增长的估算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为了回应所有的批评，1991 年，一个由詹姆斯·R·米勒（James R. Miller）牵头，由美国五位杰出经济学家组成的专题调研小组，被邀对



CIA 的估算作一次最权威的评估。^[29]米勒小组发现，CIA 对苏联的分析“是内行的、大体上合理的、谨慎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系统造假的迹象”^[30]，他们发现，CIA 对苏联增长的估算是以众所周知的方法论为基础的，一些无法避免的出入也在 CIA 的报告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31]相反，米勒小组批评了哈宁所作的增长估算，结论是“从方法论上说，哈宁的方法太幼稚，其他人无法再次算出他的结果”^[32]。

也许是因为许多观察家已经乐意相信苏联经济成就被过分高估，米勒小组的发现并没能在公众中造成多大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在米勒小组完成其估算任务之后的几年里所注意到的，“大众的印象显然是 CIA 简单地高估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解释极不相同，这种印象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以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为基础的”^[33]。《新闻周刊》1994 年的一个专栏也提到了“对苏联经济规模的惊人的误算，CIA 所得的结果居然比实际大了 3 倍多”^[34]。一年之后，即使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说：“CIA 简单地高估了苏联经济的规模。”^[35]因而，尽管持之无据，CIA 过分高估苏联经济状况这一信条仍然通行无阻。

一些专家则从相反的角度对 CIA 有关苏联增长的估算提出了批评——他们低估了真正的增长率。商业部经济学家米歇尔·玻瑞茨基 (Michael Boretsky) 所作的一项研究，采用了 CIA 的方法来估算苏联的 GNP 增长，并将之应用于联邦德国和美国 GNP 的估算。他算出的结果比联邦德国官方的 GNP 增长率低 32%，比美国官方的增长率低 13%。^[36]玻瑞茨基的批评在各种学术调查报告的脚注中找到了面世的机遇。但由于它和主流政治思潮相对立，因而没能在广大的有关这一话题的公众舆论中留下多少痕迹。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产值是由各种商品和服务构成的。单单依靠某一种数据，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这一概念及其增长率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只能是粗略的估算。但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可以看出，CIA 的经济学家在作出这样的估算时，其态度是诚恳的，其努力是全面的，他们对西方 GNP 概念的把握再好不过。

苏联官方 NMP 统计家们也足以配得上这一荣誉，因为他们体现了苏联体制的优先权和重要性，是苏联领导人判断其体制是否运转良好的指路人。西方和苏联官方的统计最后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个故事——苏联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一直狂飞猛进，之后就陷入严重的困境。

苏联经济的问题

产值的快速增长只是苏联经济状况的一个方面。它还被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所困扰，一再进行的小范围改革一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试图重组计划体制，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的初期，1965 年柯西金的经济改革以未能兑现其承诺而告终。

苏联生产的商品，其质量尽管提高很快，却很不一致。某些产品质量很高，例如武器、航行器、金属制品、太空船、燃料电池、化学制品，以及某些类型的机械制品。^[37]但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其质量很低。而且，不管是生产原料，还是消费品，其中某些产品往往是既不能达到顾客的质量要求，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苏联经济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一定的供不应求，其结果是允许生产者任意决定他们生产什么，而从不考虑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

购物者面对着一个零售分配体系，该体系似乎是专门用来折磨他们的，而不是迎合他们的需要的。顾客为了买东西，常常需要排三个长队——一个是挂号，一个是付款，一个是取货。商品什么时候有，从来说不定，人们只好带着“轻便”包到商店去，以防想要的商品突然就有售了。消费性服务少之又少，而且往往质量低劣。

企业根本就无法有效地使用其投入。由于害怕某些重要的原材料或元器件短缺，企业往往囤积了大量的、无用的库存。为了应付这种短缺局面，或者为了保证它们的投入达到特定的目标，一些企业干脆就自己生产这些元器件或零配件，虽然这些东西让专门厂家生产也许更有效益。苏联计划体制的这种死板，迫使许多企业在程序上为非法



的灰色市场上相互交换它们的产品。投资方案的实行期远比拟订计划时所设想的长得多，结果使苏联产值的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未完成的工程上。^[38]虽然苏联体制在发展技术方面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对于新产品和新生产工艺，通常却引进得很慢，很不均衡。针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措施，往往使他们在尝试新事物时谨小慎微、瞻前顾后。^[39]

出于对扩大生产的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几乎没有多少地位。虽然苏联的环境保护法看起来不错，但强大的工业部门往往把它们抛在脑后，而只关心推进生产。环境的代价在攀升，但即使是那些看到了这一点的人，也缺乏发起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自由。^[40]

农业还是个老问题。这部分要归咎于苏联境内糟糕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但自然并非唯一的原因。虽然战后苏联在农业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但它就是没法为其国民提供优质的、可口的食物。

苏联经济的许多问题根源于它的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莫斯科的上级机关发布的决定也太多、太详细了。它们无力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便使其详细的决定原原本本地贯彻下去。这种体制，几乎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生产者，而消费者的权力则微乎其微。当然，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时候不同，角色也不同。老百姓从其作为工人的权力关系中获益，企业管理者也以他们的商品供应者的身份而获益。但工人买东西总是要付钱的，企业管理者需要投资时也是如此。

不过，在该体制造就着快速增长的时候，上述问题并不构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充其量只是抱怨抱怨，作一些小的调整而已。但在70年代中期之后增长戏剧般地突然减慢，这些长期的问题也就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停滞

苏联在战前所取得的迅猛增长，日了一长就必然放慢速度。所有



的国家，在实现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时，最后都经历了一个增长减缓期。一个成功的后工业化国家，可能借助技术和劳动力向工业的迅速转移来实现快速增长，但到了最后，这些可能性也就耗尽了。^[41]然而，与这种后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日渐增长缓慢相比，苏联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所走的路似乎更富戏剧性。此时，苏联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突然变得停滞不前。这种停滞在西方和苏联的统计数据中都可以见到。经济不仅增长变慢，而且掉到极低的水平。不管是与此前的苏联记录相比，还是与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种停滞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图 3—2 表明了依据三个指标——NMP、GNP，以及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所测定的苏联产值增长的情况，同时把它们和美国同期 GNP 增长数据相比较。^[42]增长率每五年计一次，以与同时进行的五年计划相一致。由于苏联农业产值的起伏较大（这首先是气候变量造成的），因而各时期的 NMP 和 GNP 增长曲线都容易被扭曲。1970 年的农业收成出奇地好（比前一年上升 14.2%），而 1975 年的收成却出奇地糟糕（比前一年下降 12.5%）。^[43]由于这一原因，1970 年的 NMP 和 GNP 水平有所抬高，而 1975 年的水平则有所压低，这导致 1970—1975 年期间的 NMP 和 GNP 增长率与这五年经济的实际长期增长趋势相比，大打折扣。其结果就是，1975 年所发生的突然的增长停滞，在图 3—2 有关 NMP 的 (a) 部分、有关 GNP 的 (c) 部分里，反而一点都不明了。因为根据这两个指标，增长似乎减速于 1970—1975 年，而不是 1975—1980 年。

图 3—2 (b) 部分中的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由于排除了农业的影响，因而为我们估算苏联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指标。这一指标清楚地表明了 1975 年后的突然停滞。^[44]但 GNP 数据也包含着有用的信息。尽管 1970—1975 年的 GNP 增长率由于农业因素向下扭曲了，但这五年所达到的 3% 的增长率，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比同期美国的 GNP 增长率还是要高。不过，正如图 3—2 (c) 部分所表明的，1975 年后苏联的 GNP 增长从战时以来首次落后于美国，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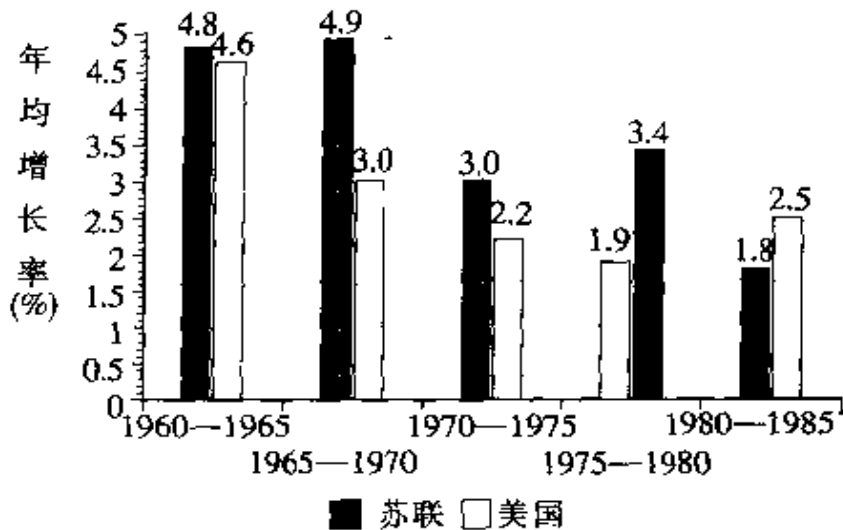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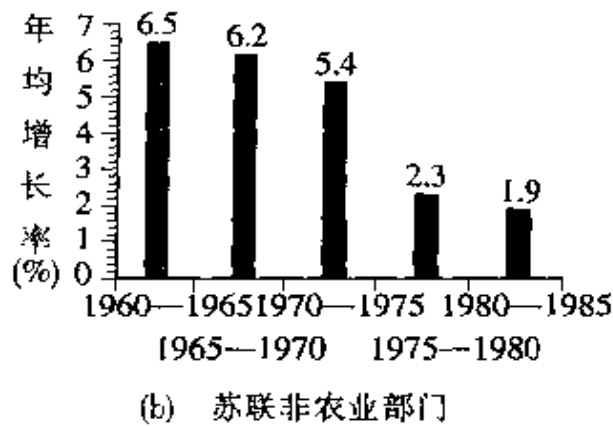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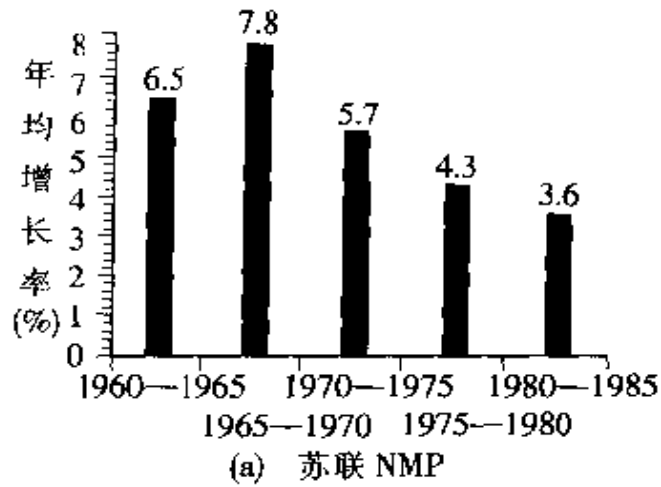


图 3—2 总产值增长的减速情况

资料来源: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90: 46, 58; Pitzer and Baukol 1991: 5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8:250.

1985年时仍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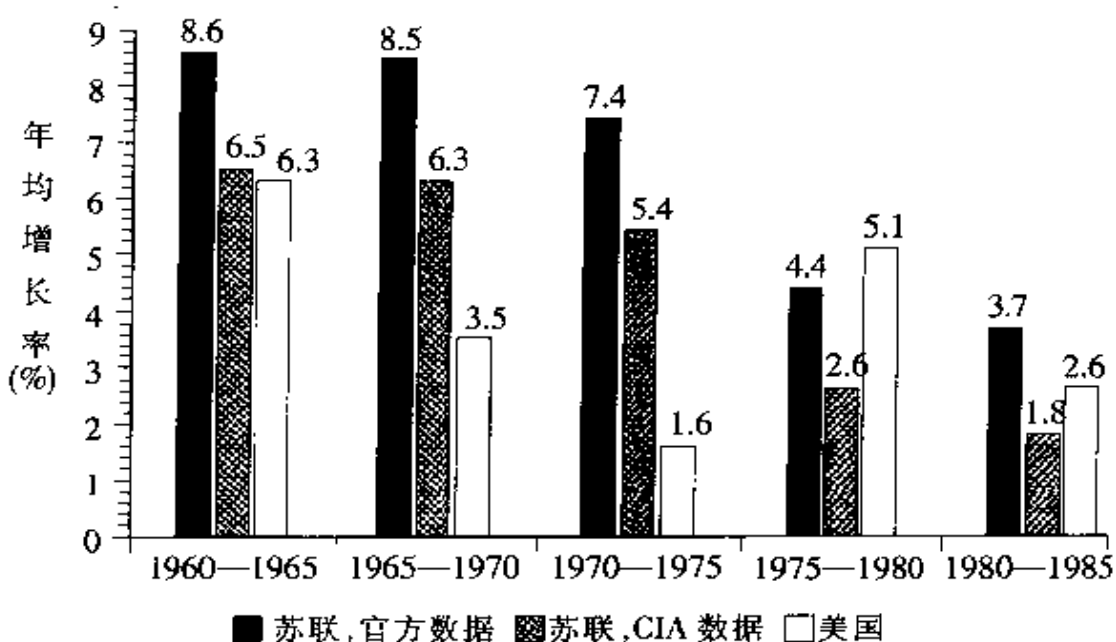


图 3—3 工业产值增长的减速

资料来源: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8b: 9;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8: 302.

图 3—3 更加清楚地表明了 1975 年后的突然停滞。苏联工业产值的增长, 不管是苏联官方的统计, 还是西方的估算, 在 1975 年后都戏剧性地慢了下来。按照西方的估算, 1975—1980 年间, 其速度已经慢于美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

快速增长可以通过一个国家长期内提高每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产值来维持。^[45] 正如图 3—4 所表明的, 1975 年, 苏联经济就是在单位劳动小时产值方面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增长率, 且在 1970—1975 年间一直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即使是图 3—4 中 (a) 部分的相对较低的西方估算也表明, 1960—1975 年间苏联的单位劳动小时工业产值也增长了 3~4%。1975 年后, 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急剧降低——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 降低近 50%; 根据西方的计算, 降低了 2/3。然而, 依据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一指标, 苏联经济的运行虽然失去了往日相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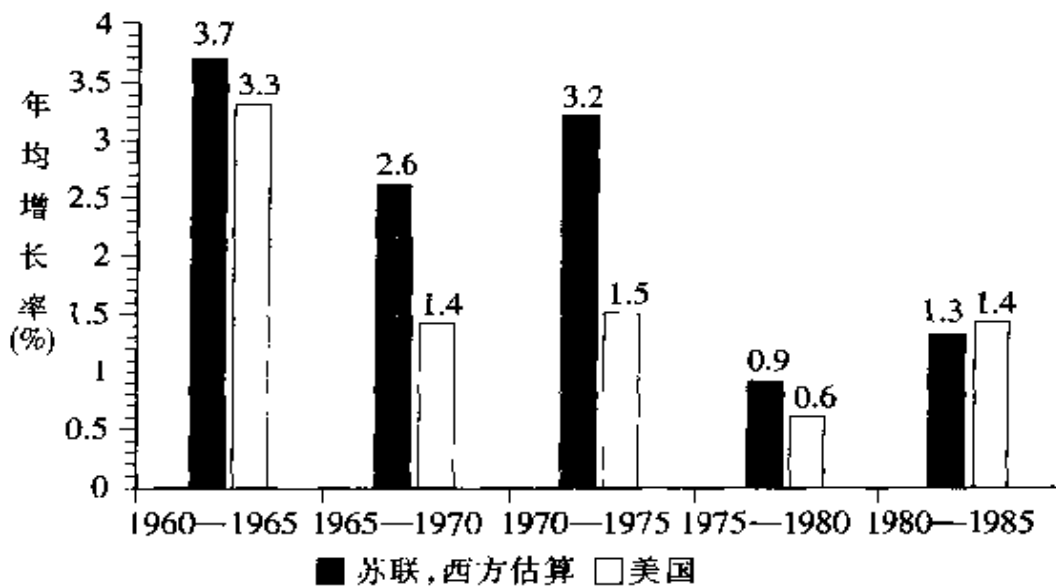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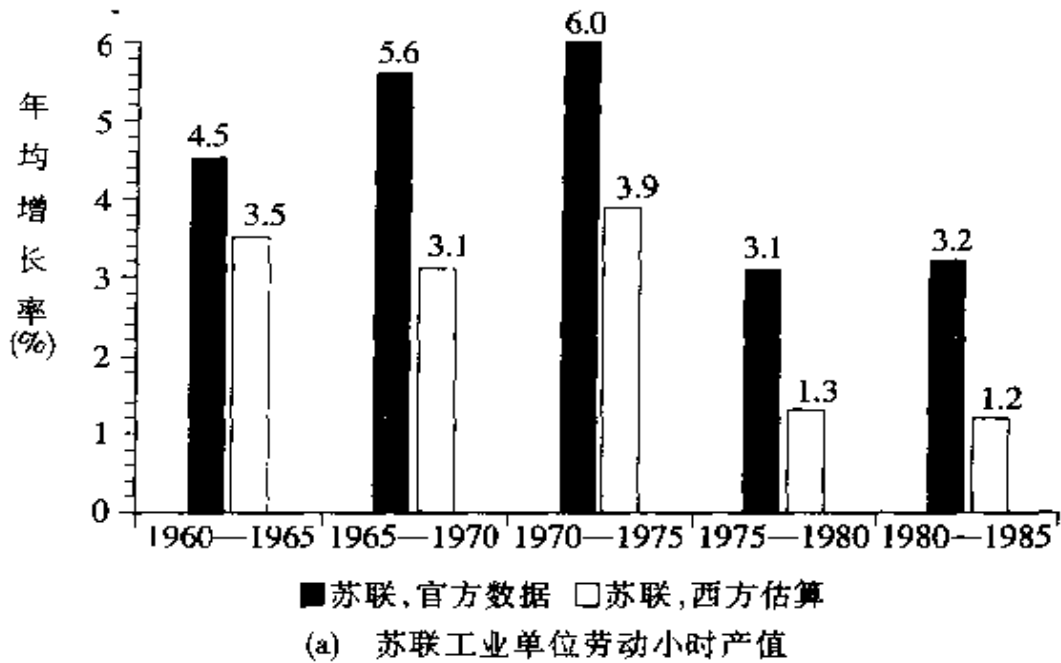


图 3—4 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减速

资料来源: Hewett 1988: 52;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8b: 63; Pitzer and Baukol 1991: 5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8: 300.

美国的光彩,但也并没有急剧降低到 1975—1985 年间(同样在降低



的)美国的水平之下。图 3—4 (b) 部分比较了这两个国家非农业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它们在 1975—1985 年期间的情况并无多大区别。

因而,1975 年后,苏联的增长突然慢了下来,并掉入到极低的水平,不论是与以往的状况相比,还是与其主要对手美国相比,都是如此。^[46]从这个角度说,称 1975—1985 年这一时期为“停滞期”,不无道理。不过不要忘记,根据这些数据,苏联经济并没有在这一时期真的停了下来。事实上,停滞不仅在西方估算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苏联官方统计中也反映了出来,这说明苏联领导层对此也是很清楚的。想想快速增长曾在苏联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缓慢对苏联领导层来说就无疑预示着潜在的危机。突然间,社会主义就无力带来快速增长了!苏联与美国经济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现在则是越来越大了。

苏联经济状况在 70 年代的突然恶化,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同样有证据表明,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在此期间慢了下来。^[47]虽然技术进步的速度一直没能满足苏联体制奠基人的高期望值,但从 1928 年以来,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显然在缩小,在少数领域,苏联甚至达到或超过了西方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也反映在苏联技术的进步上。然而,到了 70 年代,技术差距和 GNP 差距一样,也开始扩大。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很大程度上未能吸收到由电子和计算机所带来的通讯和信息处理方面的革命成果,而恰恰是后者,在 70 年代之后迅速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很难测算某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苏联 70 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下降,也许可以视为革新速度下降的一个表证,但围绕着革新的许多其他因素,同样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48]弗拉基米尔·科托罗维奇曾对取自苏联经济的直接的革新数据作过研究,结果证实了 70 年代苏联技术状况日趋恶化这一直观印象。他发现,该时期革新速度在许多方面都急剧下降了。^[49]科托罗维奇的研究充分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的下降,70 年代的技术进步速度也极大地放慢了,



虽然放慢的具体时间用任何指标都难以确定。

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一样，这些数据也没有表明技术进步就停止了，或者技术退化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极大地减慢了。有一点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经济产值和技术水平的差距日益缩小的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同样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停滞的同时，苏联体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它们是否和经济萧条存在着联系，不是那么容易断定。但在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的疏远感和失落感越来越强，腐败和牢骚遍及苏联社会的各种机构。^[50]酗酒率攀升，而且小型的、但不可小视的非主流政治运动开始抬头。

为什么会发生停滞

是什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导致苏联停滞？西方专家对此意见各异。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美国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在对美国 30 年代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争论，而且一致的看法仍然遥遥无期。要用某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一次重大经济事件无疑是很困难的，苏联 70 年代的停滞也不例外。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许多人就注意到了苏联的停滞，相关的大量文献也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这些文献提到的原因主要有：（1）中央计划越来越难以有效执行；（2）劳动纪律松弛；（3）计划机构在 1975 年后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率；（4）经济的关键部位出现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5）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变化的趋向；（6）糟糕的气候条件；（7）西方 1973 年后增长减速的消极影响；（8）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51]以上所列包括了四个不同方面的潜在原因。第一项和第二项涉及苏联体制的结构问题。第三项和第四项主要是政策错误。第五项和第六项涉及苏联历史中的不可控因素。最后两项牵涉到的，都是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我们将讨论这四个方面的潜在因素，而不是像上面所引的那样，仅限于作表面的讨论。



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显然不是 70 年代中期停滞的相关原因。确实，为了与美国竞争，虽然苏联的 GNP 巨大，但它花在军事上的 GNP 比例仍比美国大许多。根据西方的估算，1950 年，苏联大约有 17% 的 GNP 被用于国防，约为同期美国的 3 倍。不过，1950—1980 年期间，苏联的国防开支有所削减，其比例下降到 16%。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国防开支急剧上升，但它的经济反而增长得更快些。^[52]既然军事负担在 1950—1970 年间没有妨碍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什么到了 1975 年后，在没有加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它反而破坏了增长，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53]

有趣的是，差不多就在苏联经济发生停滞的同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走入了经济增长急剧衰退的低谷。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西方萧条的时间定在 1973 年，虽然也有人发现问题早在 1966 年就初露端倪。^[54]对于 70 年代初这段时期的美国、西欧和日本来说，它们的经济比以前的年代增长缓慢，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更加缓慢。

苏联在 70 年代开始依赖从西方进口新技术，以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进口谷物。随着西方经济在 70 年代中期步入严重萧条，许多非西方国家已很难向西方国家出口商品以赚取进口所需的硬通货了。然而，苏联向西方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石油，该商品在 1973—1974 年期间，其后又在 1979 年，数度经历价格攀升。因此，苏联在 70 年代的后半期并没少赚硬通货。显然，西方经济萧条对 70 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55]

要解释苏联的停滞，必须把目光转向苏联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变化的趋向，糟糕的气候状况，在 1975 年后确实给苏联带来了问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速度在 1975 年后略微有所下降。1980 年后，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在总体上也下降了。而且，70 年代末又多年遭遇不同寻常的坏气候。但这些因素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减速的问题。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够对坏气候应付自如，也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劳动率增长的减速问题。^[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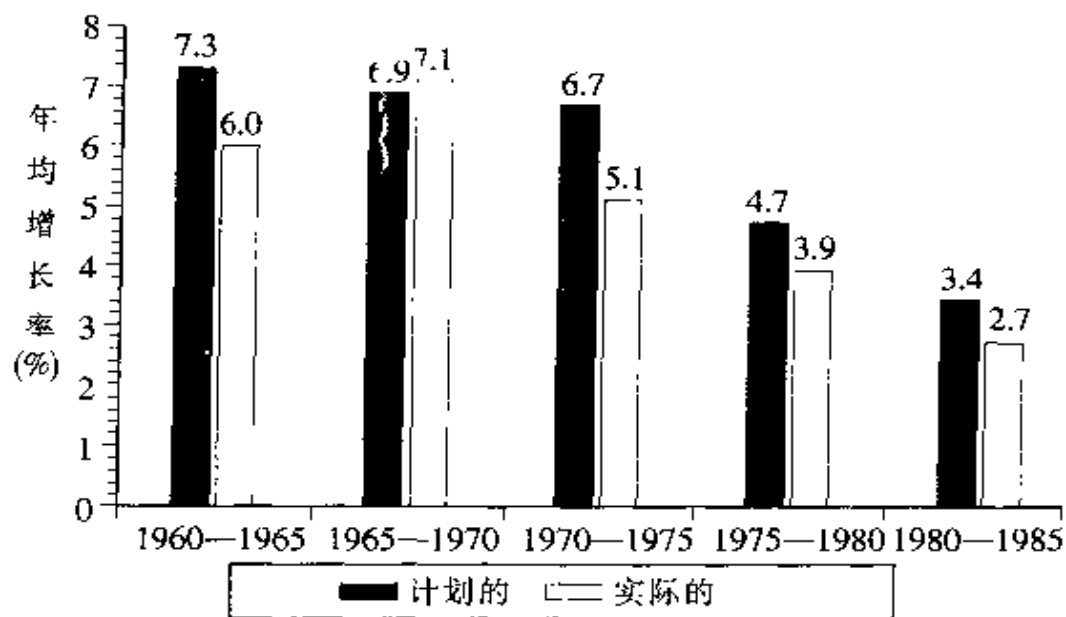


上述第三项和第四项——有意降低增长目标，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出现瓶颈——指的是苏联计划者的政策失误。第十个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0，1981—1985），具体体现了计划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放慢的情况。图 3—5 表明了 1960—1980 年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实际收入”（这是个和物质生产净值类似的概念）和工业品生产的计划的和实际的增长率。^[57]不管是国民实际收入，还是工业品生产，首先是在 1976—1980 年里，接着又在 1981—1985 年里，其计划的增长率都有所降低。^[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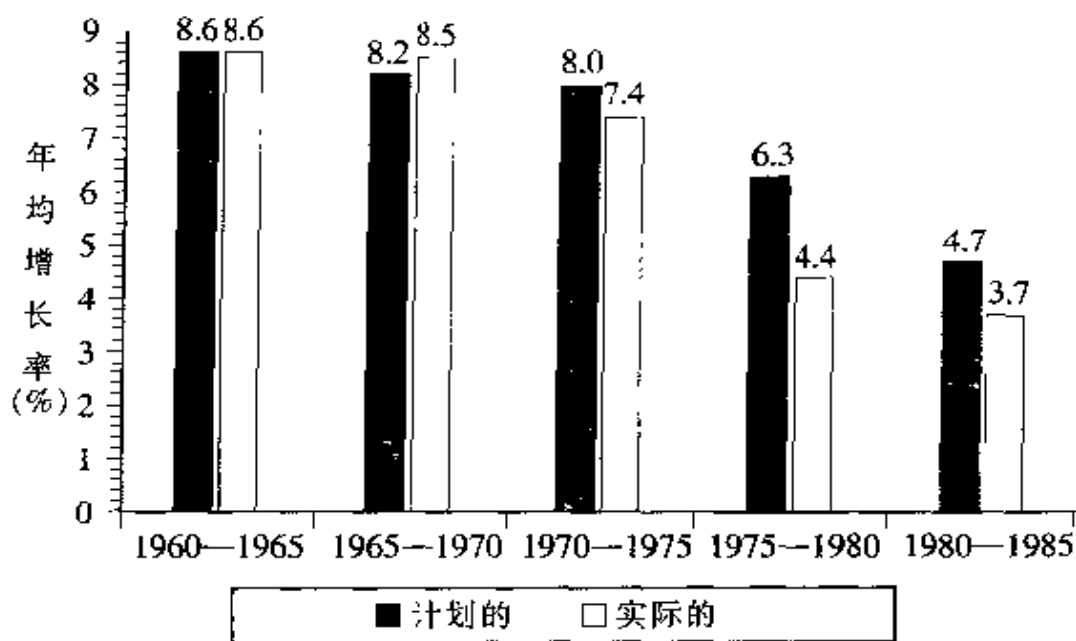
之所以在增长率上作出这些降低的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减轻管理者集中全力迅速增加产品数量的压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59]然而，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工业品生产的增长率，正如图 3—5 所表明的，却比降低了的目标水平还要低。削减投资增长，必然伴随着更低的产值增长，这就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体制的瓶颈，同时，还会引起革新率的下降，因为许多革新是体现在新的资金设备上的。原想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更糟的是，增长目标的降低，显然直接加强了低速增长的趋势。^[60]

计划的失误同样体现在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等关键部门。苏联计划者曾经指导建造了一个十分优秀的铁路系统，在长距离货运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50 年代初以后，新的投资相对有所削减，但该系统在铁道部的严格直接调度下，仍然得以高效运行。与其他那些滥用重要产品的经济部门相比，铁路系统的资金使用要有效得多，其设备的利用率也要高得多。^[61]但是到了 70 年代中期，苏联的铁路系统在里程上已达到极限，拥塞开始减慢运输速度。未能及时投资以扩大铁路里程，增加新的旁轨，形成了对苏联经济的严重瓶颈。^[62]另一个严重的瓶颈出现在关键的石油工业。苏联计划者把投资全集中于开发现有油田，而不是开采新的油田。由于这一原因，石油生产到了 80 年代初终于停滞，因为现有的油田不再能够出产更多的产品。^[63]铁路和石油瓶颈无疑对增长减速起了作用。

倘若政策失误是停滞的首要原因，那么医治起来应该不是难事。



(a) 国民实际收入



(b) 工业品生产

图3—5 计划的和实际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苏联官方数据来自于 Hewett 1988: 52;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8b: 9。



但停滞被证明是很难扭转的。其中的缘由就是，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苏联增长状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把它的减速放到工业化经济长期增长的普遍历史模式中去看看，也许不无益处。历史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个长时期，最后都得迎来一个停滞的时期，之后又是另一个焕然一新的快速增长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英国、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里找到这种模式。^[6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这些停滞期，只有在对国家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之后，才得以克服。^[65]

在这些内部经济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里，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似乎最终都要衰退。看来，正是快速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在时刻破坏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对停滞期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到这条路上去寻找，即：成功可能孕育着失败。

苏联 1975 年后发生的停滞，很大程度上不是起因于它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近 5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已经改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了曾经催生快速增长的各种独特的制度框架的持续有效性。前面所引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苏联计划的效率降低，劳动纪律松弛——均和这里的分析相符合。

苏联 20 年代末所采用的独特的经济计划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这种计划方式在动员资源把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方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它达到了很高的投资率，从而有可能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工业体系。它能够迅速教育和培养出适合工业劳动的人口，能够把这些人口迅速转变为收入较高、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业劳动力。

有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计划体制只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才有效。然而，1950—1975 年间的持续的快速增长，却是在工业化已经完成之后实现的，这表明该体制的有效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限于初始阶段。在建设一个现代城市社会的起始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



体制同样被证明是有效的，人们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样达到了合理的、较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同样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主要目标，苏联的中央计划被证明是能够迅速地建立起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电力等）、营造新的家居、生产新的消费品的。对于在 1950 年前一度生活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设施大部分质量低劣，但它们在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6]

但是到了 70 年代，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基础所达到的前 50 年的快速增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苏联经济的规模更大，生产的产品也更多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需要更多种类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比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复杂，少数几个中央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地、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67]

虽然很难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但 70 年代的苏联显然遭受了一次劳动纪律松弛的冲击。^[68]这也许是 50 年快速经济转型对苏联人民性格加以根本改造的结果。发展过程以城市劳动力为基础而开始，但这些人却由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所组成。苏联管理劳动过程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由个人说了算、内部等级森严的体制，它在管理这样的劳动力时还算过得去。严格的纪律措施、一定的物质奖励、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承诺，共同担负起了把这些工人身上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的使命。

到了 70 年代，苏联人民就不一样了。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教育良好、成熟老练、生活达到中等水平的城市居民。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惟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往管理劳



动过程的有效体制，现在也失去了效用。^[69]

高度集权的、僵硬老化的计划经济形式，等级森严的、管理劳动过程的权威主义模式，均已失去了有效性。曾经在 20 年代创立了苏联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独特形式，显然已经招数使尽，也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随着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都走向深重。显然，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缘起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重大的革新了。勃列日涅夫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从 1964 年直到 1982 年，他一直呆在总书记的位置上直到去世。在 60 年代中期微小的经济改革之后，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渐走入政治停滞、放任自流的死胡同。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哪怕是在他们并不干事的时候。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继承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试图向该体制注入新的生命。和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以前的首脑一样，安德罗波夫也对苏联体制所积累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发动了一场清除腐败、增强纪律、提高效率的运动，主持了多次经济管理新方法的实验，试图提高工作激励，促进技术革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他鼓励对苏联体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进行相对公开的讨论。^[70]但是，执政伊始他的肝病就已无药可救，15 个月后，只得在任何重大的变革都没来得及开始之前抱憾而终。

1984 年 2 月，中央委员会任命老态龙钟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作为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显然，他只能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人物。虽然契尔年科看起来更像是勃列日涅夫的同路人，但他也没有终止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实验，也没有取缔关于经济的讨论。契尔年科的执政期甚至比安德罗波夫更短。在他于 1985 年 3 月去世的时候，米哈伊尔·戈



尔巴乔夫就接替他成了新的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善于交际，因而在苏联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中飞速攀升。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他回到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省，这是北高加索一个富庶的农村地区。在当地的团组织和党组织中，他层层爬升，于1970年成了该省党委会第一书记。1978年，他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47岁时，他是当时苏联领导层里最年轻的一员。^[71]两年后，他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员。

同样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可谓是格外赏识。因此在他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层里的地位急剧上升。当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之时，戈尔巴乔夫就成了有确定继承权的人。虽然他是按照传统方式在党的机构内一步步爬上来的，但在党内人士看来，他倒是改革派的主心骨。在政治局里，许多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希望有朝一日把他排挤出去。^[72]他们之所以没有得逞，很可能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党的领导层内，改革的呼声压倒一切。人们相信，虽然大多数资深政治局委员不太信任戈尔巴乔夫，但来自各省党委和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迫使政治局在1985年任命了戈尔巴乔夫为新的领导人。^[73]

戈尔巴乔夫随身带了一大批新人进入领导层。他任命叶戈尔·利加乔夫——一位曾在西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党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呆了多年的老人——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第二号人物。在人们眼里，利加乔夫诚实、清廉、勤奋，他这种传统的党风和处事谨慎的作风，有助于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党内获取广泛的支持。^[74]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已升至主管工业和经济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尼古拉·雷日科夫，成了新的部长会议主席。^[75]新外交部长E·谢瓦尔德纳泽，则是一位讲求实效、处事灵活的人物。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许是戈尔巴乔夫班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76]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意识形态事务，其中包括任命大众传媒首脑的工作。^[77]雅科夫列夫本身就是搞意识形态出身的，



早在 70 年代初就担任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他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和别人不同的是，雅科夫列夫是一位知识分子，老想着修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78]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而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但在开始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成为彻底地、全面地重塑苏联体制的鼓吹者。在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背景和早期讲话中，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依此判断出他会如此惊人的背离。西方专家们开始时只是希望他能够走一条和赫鲁晓夫以及早期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经济改革同样的道路，对苏联体制加以小范围的修修补补。^[79]

但 1985 年的条件和 1955 年已经完全不同，那时赫鲁晓夫已经牢牢控制了权力；它也和 1965 年不同，那时勃列日涅夫是同意柯西金改革的。以往的改革针对的都是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本身，还能够继续带来快速增长和技术腾飞。相反，在 1985 年，苏联经济已经历了十年的停滞，况且前景未卜。停滞给领导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教育良好、身居都市的大众所要求的是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需要更多更好的住房、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同时，领导层还面临着来自里根政府的军事挑衅。他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因为二者都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但眼前只有停滞着的经济。要想避免真正的危机，成功的经济改革必不可少。

斯大林之后，就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了。但与西方任何一位总统或总理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十分有权势的。虽然机构内各种利益集团可以违抗、曲解上级的命令，但并不存在制衡的立法机构，也没有反对党，更没有不合作的媒体敢于对抗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有人说服了总书记需要推行重大的改革，总书记就有着巨大的权力把改革推行下去。

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详述的，开始时，戈尔巴乔夫也只是想对苏联经济加以相对较小的修补。但是在执政后的短短一年内，他就相信需要对经济实行更深入的改革。在 1986 年 2 月的一次党的大会上，

戈尔巴乔夫宣布：“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再把我们的措施束缚在局部的发展上了——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80]

在戈尔巴乔夫 1987 年的讲话和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苏联体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到他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的阐述，以及提出的解决措施。^[81]他描述了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不足，消费性服务的缺乏，资金的巨大浪费，等等。但他特别强调了扭转当前停滞的重要性。他写到：“70 年代的后半段……国家开始失去动力。”经济增长率掉落到“近乎停滞的水平”。他注意到苏联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工艺技术与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事实上，他还警告说：“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是，我们开始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落后了……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基础，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对革新无动于衷。”他抱怨“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多”，因此“需要未雨绸缪地考虑问题”^[82]。

戈尔巴乔夫把这些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独特的、斯大林时代首次采用的经济制度框架。他批评传统的苏联模式，声称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不总是相一致的……各种方法和形式”。虽然他也说，这种模式一度在经济方面是有效的，但他又认为，现在它已经开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条件相冲突。它的积极作用已经失去了”。戈尔巴乔夫总结说：“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保证停滞趋势不再出现和加重，更不能避免重大的社会——政治危机。”^[83]

戈尔巴乔夫强调，传统苏联模式有两个缺点，正是它们使这种模式过时了。第一个缺点涉及经济体制各个部分的联结方式，即该体制的“僵化的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指令”高于一切。许多不合理的经济后果就是由它造成的。^[84]第二个缺点是缺乏有效的工作激励——从而带来劳动纪律松弛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结构问题引起了停滞，这和我们前面的分析不谋而合。

以这种对苏联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为基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从他 1987 年的各类文稿中可以看出，他提的建议反映了苏联经济从而解



决国家面临的困境的两个改革主题。第一个是苏联经济制度的民主化；第二个是引进市场经济成分。

第一个主题要求用一种更加分散化和民主化的计划形式取代指令性计划，以便更加有效地调控经济；它还要求用工人自我管理取代权威主义的、个人说了算的劳动管理，创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例如，戈尔巴乔夫主张，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从过分集中的依靠命令的管理体制，转向民主体制”。在作出“我们正在思考如何把计划民主化”的承诺之后，他道破了个中的细节：

这意味着计划的制定——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将自企业内部和工人集体开始。正是他们，将为他们的产品制定生产计划，这种计划以国家指标和政府合同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需求为基础，以与消费者签定的直接经济合同为枢纽。^[85]

作为解决劳动纪律松弛问题的方案，自我管理和工人参与也有方方面面的表现。例如，戈尔巴乔夫写到：

工人在他的岗位上、集体中和社会上，都必须是真正的主人翁。这是激发更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之一……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过程主人翁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推动社会、经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86]

在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中，民主化是中心主题。他认为，复兴苏联社会的关键基础，是“民主的广泛发展……民主的，也只有民主的形式，才能给我们以应得的加速度”。因此有必要实行“社会所有方面的广泛民主”^[87]。

第二个主题贯穿于戈尔巴乔夫 1987 年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解决苏联体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途径，在于强化市场力量，或者用



苏联的话来说，强化“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企业置于“全面的盈利—亏损会计账目和自行筹资”的基础上。生产原料应该通过基于企业合同的“批发贸易”来配置，而不是通过经济计划来直接配置。他说“竞争对于激发社会主义动力来说是关键”，“必须把企业放到这样的环境中，鼓励经济竞争，以便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些言论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希望运用市场竞争机制让企业表现出更富有效率，同时更加注意消费者的需求。但这并不是用市场取代经济计划，而是“计划的优势将日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的激励因素结合在一起”^[88]。

戈尔巴乔夫同时主张，应通过确保把收入建立在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来强化劳动纪律。他批评“(工资)平均化的趋势”，认为它“对工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是消极的”。因此反过来说，“劳动人民的收入应与他们的工作绩效联系在一起”^[89]。

一方面是民主参与和工人自我管理，另一方面是利益激励、竞争和基于绩效的报酬制度，这两者在推动经济有效运行的手段方面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团结、合作和目的一致，而后者强调个人得失的取舍。戈尔巴乔夫相信，重建后的苏联经济应该可以把这两种原则——民主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

戈尔巴乔夫一再清楚地表示，他的目的是彻底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他写到：

我们正在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推行我们的一切改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把社会主义的潜能发挥出来，如果我们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全面地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并真正利用好计划经济的好处，社会主义就可以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

他补充说：“社会主义及其基础——公有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本质上具有无限的能力。”^[90]1987年，彻底重建苏联体制的计划包括

了市场成分，甚至允许扩大私人和集体所有制，但这个计划显然旨在建立一种改良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在戈尔巴乔夫的思路中，既没有包含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的内容，也找不到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体制的倾向。

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对苏联社会的彻底改造，并没有局限于经济领域。甚至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思路提出以前，戈尔巴乔夫就着手制定了一项被称作“公开性”或公开化的政策。它欢迎公众和大众传媒对苏联社会和领导层展开公开的批评。1988年，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实施一年之后，领导层就同意了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三方面的因素——公开性、经济的彻底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构成了震撼世界的俄语所谓的“Perestroika”，意即“改革、重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他的革新苏联社会主义并最终激发其全部潜力的计划，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释放出不久后就会拆散苏联体制的力量，并替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注释]

[1] 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在那时还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乌拉尔山脉南端，建起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周围是原始铁矿。

[2] Nove (1989, p.220).

[3] Gregory and Stuart (1990, p.12).

[4] Kuznets (1963, p.345).

[5] Kuznets (1963, p.247). 后工业化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有机会从其他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里借用到技术。而另一方面，后工业化国家也面临着与先发展起来的强国竞争的严重问题，这使得许多国家很难开始其工业化的进程。

[6] Nove (1989, pp.280~286).

[7] 苏联官方对NMP增长速度的估算之所以被认为是夸大了，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低估了价格的涨幅，从而高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因素和在编制增长数列的价格指标时选择的基准年度有关。基准年度的选择是迟还



是早，这会影响到增长速度的计算——常见的情况是，基本年度选得越早，计算出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对于增长快速但主体结构正处于转变之中的经济来说，这种影响尤为突出。关于到底选择何种基准年度才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所有长期增长的数列都面临这一问题。苏联官方统计采用的是很早的基准年度，因此对长期增长作了过高的估计。

[8]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采用西方 GNP 概念来比较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偏向。苏联采用 NMP，反映了苏联规划者优先考虑实物商品，而更少关注服务的偏好。以 GNP 为基础来对两个体制作比较，反映的则是西方资本家的偏好，它对商品和服务从来就不加区分。同样，采用 NMP 也会偏向苏联体制。比较这两个体制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存在客观的、不偏不倚的标准，这两个体制的价值观不同，对经济绩效的优先考虑也不同。

[9] CIA 对苏联 GNP 的估算，可见于情报协会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每年出版的《经济统计手册》，也很容易在联合经济委员会 (1982、1990) 里找到。CIA 这些估算是否可信的问题，下面将予以讨论。

[10] 在绘制图 3—1 时，为了尽量避免因采用单一基准年度价格去估算真正的 GNP 长期增长所导致的扭曲，基准年度价格指标有所变动。计算苏联的 GNP 增长时，1928—1950 年的数据以 1937 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1950—1960 年的数据以 1970 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1960—1975 年则以 1982 年的要素成本为基础。计算美国的 GNP 增长时，1928—1950 年的数据以 1929 年的价格为基础，1950—1960 年的数据以 1972 年为基础，1960—1975 年则以 1982 年为基础。(出于不得已而) 使用更早的基准年度来估算 1928—1940 年的增长，相对于苏联来说，美国也许更有相对拔高的嫌疑。

[11] 苏联的快速增长是在很小的价格膨胀之下达到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40—1986 年期间，其零售价格以每年 0.9% 的速度递增 (Gregory 与 Stuart, 1990, p.388)。更准确的估计是在 1%~2% 之间，但它仍比西方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低得多。

[12] Becker (1994, p.309)。Becker 认真研究了 CIA 对苏联和美国 GNP 比率加以估算的大量资料。CIA 对 1975 年比率的大多数估算是在 58%~62% 之间。

[13] 根据 CIA 的估计，1970 年苏联总投资占其 GNP 的 28.2%，而在美国，它只占 14.5% (联合经济委员会 1982, p.67; 《总统经济报告》1985,

p.232)。

[14] 1980年，苏联15岁至64岁的人口中有86.6%参加了工作，相比之下，美国为66.5%，经合组织(OECD)欧洲成员国为70.9% (Ofer, 1987, p.1983)。这种高就业人口比例的直接影响，就是人均产值的提高比增长更快速。然而，这也通过极大地降低投资成本(按照过去的消费水平)，推动了产值的快速和持续增长。

[15] 苏联的教育支出在1928—1950年期间按照195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6倍多(Bergson, 1961, p.85)。1926年，15岁以上人口中只有6%读过七年级。到195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9% (Gregory and Stuart, 1990, p.360)。

[16] 联合经济委员会(1990, pp.89~91)所报告的苏联消费增长数据以1982年的价格指数为准。美国的数据也以该年价格为准，参看 *Economic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1988, pp.250, 283)。

[17] Ofer (1987, p.1790)。但他也警告说：“应该牢记，这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起步的。”

[18]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72 (1922—1972), p.373; 1986, p.446]。

[19] 情报协会(1988a, pp.67~72)。

[20] 苏联城镇人口的比例从1922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63%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81, p.7; 1982 (1922—1982), p.9]。

[21] 农业岗位的比例从1926年的71%落到了1980年的26% (Ofer, 1987, p.1792)。

[22] 1981年，9600万苏联公民拥有高中毕业证，2000万拥有大学学位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81, p.27)。

[23] 1980年，每百人中，苏联有37.4个医生、125张病床，而美国只有18.2个医生、58.5张病床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81, p.8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5, p.844)。

[24] 1987年一份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的调查报告声称，“研究人员的意见普遍一致”，西方对苏联经济增长的估算，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数据基础” (Ofer, 1987, p.1775)。

[25] 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虽然苏联体制的终结是由一系列不足造成的，但并不能从中就得出结论说，苏联体制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们现在所估计的水平低。这种对苏联终结的反应，不管在逻辑上如何混乱，都会在心理上造成一

种先入之见，认为所有对苏联以往成就的估算都应该往低处修正。

[26] 哈宁第一次对苏联官方数据的批评发表于他与瑟鲁乌林 1987 年合写的著作。英语读者可以在 Harrison 1993 年的著作中接触到哈宁的著作。

[27] 哈宁对苏联 1928—1940 年间的 NMP 增长的估计，只有年均 3.2%，而官方的估计是年均 14.9%。不过，两者对战后的估计相差很小。哈宁估计，苏联 50 年代的 NMP 增长势头强劲（7.2%），在 1960—1975 年期间则要平缓些，为年均 3%~4.5%（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90, p.46）。

[28] Millar et al (1993, p.38)。一场看谁能够把苏联经济成就估计得最低的比赛，就此开场了。看来，这次比赛的胜利者非“苏联学者”维克多·贝尔金莫属。他在由美国企业家协会发起的 1990 年年会中，认为苏联 GNP 只有美国的 14%——大约相当于墨西哥的水平（Becker, 1994, p.312）。这种修正以往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评估的良苦用心，可以在一位主流的西方苏联经济批评家——Anders Aslund 1990 年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看出：“苏联国民收入是怎样的少？”

[29] 这一研究是受众议院情报问题常设特委会的委托。

[30] Millar et al. (1993, p.34)。

[31] 该小组赞同 CIA 对苏联 GNP 卢布值和苏联 GNP 增长率的估算，但同时也批评了某些机构的比较数据。他们总结说，这些机构在估算苏联和美国的 GNP 之比时，也许高估了苏联 GNP 的相对规模。他们指出，CIA 已经对这种比较所天生具有的偏见的主要来源有所察觉，而且这种偏见是不可量化的。不过他们认为，发布结果，哪怕是发布像《CIA 报告》这样量化程度很高的结果，都是一种失策。参看 Millar et al. (1993, pp.39~41)。

[32] Millar et al. (1993, p.39)。

[33] Becker (1994, p.293)。

[34] Alter (1994)，曾被 Becker (1994, p.294) 所引用。

[35] 《纽约时报》，1995-02-01，18 版。

[36] Boretsky (1987, p.521)。同时可参看 CIA 对 Boretsky 的批评的评论 (Pitzer, 1990) 和 Boretsky 的回应 (1990)。CIA 运用了许多零散的有关苏联经济的数据，来建构其对 GNP 增长的估算。Boretsky 也采用了零散的有关联邦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同一工业及其部门的数据，并仿效了 CIA 的方法，来建构其 GNP 估算。他声称，CIA 之所以低估苏联的 GNP 增长，是由于 CIA 的实物产值数列未能考虑到同时期的产品进步因素，而且，CIA 采集数据的生产线，其革新比其他生产线的革新要慢许多。

[37] 例如，在现代的、高效的华盛顿地铁系统中奔跑的火车，其轨道就是采用苏联的无缝铁轨铺设机铺就的。同样，美国的军火商们也曾从苏联购买过一项生产灌模铝制品的技术（Hewett, 1988, p.33）。

[38] 20世纪60年代，苏联投资方案的平均完工期为7年至8年，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多出两倍多。

[39]（Berliner, 1976）曾经深入探究过苏联工业革新既慢又不均衡的问题。快速的革新主要发生在诸如防卫和空间这样的部门，它们受人重视，上面给的资源也多，要求是生产出技术前沿的产品。但对于大多数苏联企业管理者来说，打算引进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就得冒阻碍企业完成其预定目标的风险，因而常被打断或常出问题，同时，成功革新的企业所得的回报也常受限制。

[40] 1980年，苏联人均热量摄入量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差不多，但其食品主要是马铃薯，而很少是肉类、家禽和水果。参看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za 70 let*, 1987, p.47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5, p.846。

[41] 日本1954—1984年间的GNP长期增长率降低了一半（Ellman, 1986, pp.532~553）。

[42] Pitzer 和 Baukol 编制了苏联非农业商业部门产值的数据。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计算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政府服务部门之外的商业部门的产值增长。这两人将之应用于苏联经济。他们的计算包括了所有为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收取报酬的非农业单位的产值，但排除了那些主要靠国家补贴开展活动的部门（所谓的“预算内部门”）。参看 Pitzer and Baukol (1991, p.49)。

[4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90, pp.55~56)。

[44] 这一数据确实表明1971—1975年间增长出现了轻度的减速，但它仍然相对强劲，且高于同期美国的速度。

[45]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后完成，将会导致劳动率增长的急剧减速，甚至是停滞。进一步的快速产值增长，有赖于投入更多的资本品、引进更加发达的技术，或者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所有这些，都表现为提高单位劳动小时的产出量。

[46] 西方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们对苏联增长减速的时间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强调从1928年到1985年以来（除了战时）的渐进的、持续的减速。但大部分专家把急剧下降的时间定在1975年，这包括 Hewett (1988)、Schroeder (1985)、Pitzer and Baukol (1991)。

[47] 技术进步并不仅仅是一件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从而促进现有产品产出的

事情。它还有着-一个重要的质的维度，这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引进新的和更好的产品。由于这一原因，苏联70年代的技术进步步伐放慢，可谓是经济状况恶化的副产品，而不仅仅是增长减速的原因。

[48]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试图采用一种叫做“总因素生产力”(TFP)的集合标准，来测度技术进步。这一标准指的是单位劳动、资本品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总和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值。TEP的提高就表示着技术发展的效果。但是，这一方法存在着一些致命的概念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把它用于苏联经济的时候。在评估苏联经济时，所设的前提不同，对其TEP增长状况的估算就会大异其趣。结果自然是，TEP估算并不能为判断一定时期内苏联技术进步的状况提供出坚实的基础。参看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8a, p.63), Gregory and Stuart (1990, p.365), Ofer (1987, p.1778)、Whitesell (1985)。

[49] 科托罗维奇采用的指标，包括创新、发明、合理化的数量及其经济后果，新产品在机器制造部门产出中的比例，新开发机器设备的原型数量(科托罗维奇，1992b, pp.220-233)。对于某些指标来说，创新的减速开始于60年代末。

[50] Hauslohner (1991, p.37)。

[51] 苏联停滞的原因在下面的著作中均有过讨论：Hewett (1988, pp.51-78)、Levine (1983, pp.155-168)、Ofer (1987, pp.1814-1819)、Pitzer and Baukol (1991, pp.74-80)、Schroeder (1985, pp.47-67)。此处所引的这些原因全部都是直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减慢的。技术革新减速这一原因，显得更为隐蔽。参看科托罗维奇(1992b)。

[52] Ofer (1987, pp.1788-1789)。根据该书所引的数据，苏联的军事负担在1950—1960年间有所减轻，在1960—1980年间又逐年加重。但是，1960年后GNP中国防预算比例的轻微上升，并没有引起用于投资或研发的GNP比例有所降低，二者反而在1960—1980年间均有所上升。Ofer (1987, p.1788)。

[53]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层决定减轻苏联经济的军事负担。减轻军事负担，当然对苏联经济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所助益。但是，我们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军事负担曾在1975年开始的停滞中起过什么作用。

[54] 参看 Bowles *et al.* (1990, ch.4)。

[55] 不过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降下来了，这对以后的苏联倒是造成了问题。

[56] 参看 Levine (1983, pp.156-157)。

[57] 苏联的惯例是把五年计划的时期定为从第一年开始到第五年结束——例如，1981—1985年。在引用增长数据时，我们遵循的是西方的惯例，而该惯例是把五年计划定为从该时期的前一年开始。仍以上面的例子为例，我们把该五年计划定为1980—1985年，而不是1981—1985年。这种标记方法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即该时期的第一年——1981年——的增长是相对于1980年的标准测度的。

[58] 投资计划在此期间也被大幅度削减了 (Hewett, 1988, p.52)。

[59] 第十个五年计划 (1976—1980) 是以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帕巴科夫的这些话开场的：“1976年的目标整个儿说来就是：提高所有工作效率和质量。” [《真理报》，1975-12-03, Schroeder (1985, p.50) 曾引用过这一报道]。

[60] 如果降低增长目标能够同时采取一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其他措施，那么这种政策也许可行。否则，削减增长计划只会把事情搞糟。

[61] 1975年，苏联铁路系统的平均业务量密度是每千米2340万吨。相比之下，同期美国为每千米470万吨 (科托罗维奇，1992a, pp.174-175)。

[62] 至于这方面的详情，可参看 (科托罗维奇，1992a)。

[63] Gustafson (1985)。他把这种投资失误归因于计划者的不负责任的短视。

[64] 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一模式的具体说明，可参看 Gordon *et al.* (1982, pp.41-47)。

[65] 对长期经济增长这一模式的解释，被称作“社会积累结构分析”。可参看 Kotz *et al.* (1994)。该书的各篇论文具体解释了各个不同国家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最后是如何走向停滞，以前曾经推动快速经济增长的特殊制度框架是如何不再起作用的。

[66] 苏联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为强大的军事建立经济基础。计划体制非常适合于完成这一目标。

[67] Hewett (1988, pp.85-86) 同样持这种观点。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后工业化的经济必然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不仅表现在消费品需求方面，也表现在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种类方面。

[68] 苏联主流社会学家、前戈尔巴乔夫顾问塔塔纳·扎斯拉夫斯卡娅声称，早在80年代初，“在许多管理者眼里，人民就变得更难管理了” (扎斯拉夫斯卡娅，1990, p.49)。1975年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下降，也许部分反映了劳动



纪律的松弛，虽然别的许多因素同样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投资率和技术进步。

[69] 同样的分析可参看扎斯拉夫斯卡娅，(1990, pp.49~57)。

[70] Hewett (1988, pp.258~273)。

[71] Miller (1993, pp.60~61)。

[72] 第一手材料，请参看利加乔夫 (1993, ch.1)。

[73] 已经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叶戈尔·利加乔夫，曾在随后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谈到了这种影响（《真理报》，1988-07-02，引自 Hough, 1991, p.248）。利加乔夫说，他可以劝说资深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葛罗米柯通过强调各地区党委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绝对支持，为戈氏的当选讲话（利加乔夫，1993, pp.72~75）。

[74] 和某些观察家的印象相反，利加乔夫并不是旧体制改革的反对者。不过，他更加偏向于缓慢的、稳健的改革，总是提倡说，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复兴和加强社会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参看 Stephen Cohen 为利加乔夫回忆录写的导言：利加乔夫 (1993, pp.7~36)，或者也可参看 Surovell (1991)。

[75] Hewett (1988, p.261)。

[76] “据内部人士透露，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是 1985 年夏以来戈尔巴乔夫国内国际政策的设计师。” (Hough, 1987, p.34)

[77] 利加乔夫 (1993, pp.95~96)。

[78] 参看 Miller (1993, p.42)。

[79] 已故的 Ed Hewett 是苏联经济政策的潜心的研究者，他在 1985 年写道：“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打算要向苏联经济引进激进变革，至少在最近十年里是如此。” (Hewett, 1991a, p.16)。

[80] 见于 Hewett (1988, p.288)。

[81] 特别参看戈尔巴乔夫于 1987 年 6 月 25 日给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 (戈尔巴乔夫，1987)，以及他的著作《改革》 (戈尔巴乔夫，1988，首次发表于 1987 年 11 月)。

[82] 戈尔巴乔夫 (1987, pp.4, 36, 37; 1988, pp.4~5)。

[83] 戈尔巴乔夫 (1988, pp.23, 32, 37)。

[84] 戈尔巴乔夫 (1987, p.39)。

[85] 戈尔巴乔夫 (1988, pp.20, 76)。

[86] 戈尔巴乔夫 (1987, p.41)。

[87] 戈尔巴乔夫 (1987, p.7; 1988, p.18)。

[88] 戈尔巴乔夫 (1987, pp.42, 43; 1988, pp.71 ~72, 76)。

[89] 戈尔巴乔夫 (1987, pp.9, 41)。

[90] 戈尔巴乔夫 (1988, pp.23, 69, 72)。

第二部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Revolutions from above



导 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僚们试图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为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最终激发出社会主义体制久被压抑的潜力。但将一种非民主的体制民主化，必然意味着政治斗争。它要求放松对被长期严密控制的民众的管制。由此导致的政治变化也许和推行改革的领导层的意图背道而驰。

从1985年至1991年，苏联一直被越来越尖锐的政治斗争所困扰。结果，共产党被击败后垮台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终结，苏联国家本身也支离破碎。对这一斗争过程的理解——谁是主要的角色，双方力量的强弱如何——被一党制的苏联国家搞复杂了。我们根本描述不出各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此起彼落。

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发生在新闻媒体中，因为不同的观点都争着为自己造声势；斗争发生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因为知识分子们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争执不休；斗争也还发生在选举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竞选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少有人有一个清晰的竞选纲领；斗争发生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以及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斗争也还发生在大街小巷里，因为群众游行和罢工已是苏联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里，反对派运动逐渐在苏联发展起来，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就成了这种运动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人。这种反对派运动开始时阵线很模糊，1989年饱受重大争议的首次立法选举进行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该运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组织，例如地区间代表团（the 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和民主俄罗斯，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这场反对派运动。



准确地说，在政治斗争的早期阶段，叶利钦所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其立场很难确定。它提出的主要纲领是民主、个人自由和经济改革。人们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求民主运动。但这又无法把它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变革方向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1990年10月，苏联创立了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产党专政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给予一切党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结束了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正式垄断。反对派运动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还是和戈尔巴乔夫继续作对。

促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和戈尔巴乔夫作对到底的，是他们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纲领：改革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掌权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举措了，除了苏联后期取得的成就，一切还是老样子。^[1]1991年12月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以及他所倡导的运动，推行了一项旨在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案。叶利钦政府试图尽快消除社会主义体制的残余，为资本主义体制打下基础。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政治斗争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突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联盟”，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无意中为“亲资本主义联盟”

的滋生壮大提供了方便，后者最终成了有关苏联未来之战的胜利者。它之所以赢得这场斗争，是因为它能够在苏联体制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制度之内，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凝聚最强大的力量。其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在本部分，我们将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改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开性，即放宽意识形态控制，公开讨论和辩论文化生活。第二个是经济改革，即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高度集权的、死板僵化的、无效率的旧经济机制。第三个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追溯了这些改革主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将看到改革的每一方面是如何改变了苏联社会，结果使得“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发展深受鼓舞，其政治实力猛增。第七章详细地考察了党—国精英中的部分关键人物为什么和如何不再给“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支持。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八章，考察了最后几年苏联社会中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展开过程。在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在经济极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的局势下，是如何能够击败其对手的。我们还将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注释〕

〔1〕独立后的俄罗斯确实有一个普选的总统，这和苏联是不一样的。然而1991年后，民主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限制。第十一章讨论了这一问题。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



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

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1]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两个月之后，禁放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在莫斯科人看来，这是新自由来临的钟声。1986年2月，著名的政治犯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2]而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突然于1986年12月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被释放出来时，全世界都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创举所震惊。

释放政治犯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以新的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3]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4]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联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5]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6]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如何之富有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



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新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就像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7]例如，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太组织帕米亚特公然问世，并于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纵了一起群众游行事件。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对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面前曝光。苏联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习惯于如此一种公开的和无所不及的争论。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得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

在这场新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激烈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一些普通的苏联百姓看到他们昔日曾经衷心信赖的媒体受到攻击，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以前，媒体是官方路线值得信赖的宣传工具。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曾是党内二把手。他抱怨说，媒体正在“丑化苏联历史”。他时不时地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



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在回忆录中，利加乔夫抱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期间，任命了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人担任各大媒体编辑。^[8]他对胡乱调换媒体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利加乔夫虽未明说，但他的意思显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任命反共产党的人担任关键的编辑职务，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这项计划，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雅科夫列夫最终于1991年辞去了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职务，开始批判社会主义。^[9]不过，就算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间的目的所说的话是对的（当然也不无疑问），他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媒体越来越宣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问题上，仍然犯有错误。

利加乔夫的解释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错，这在无意中被他自己关于1986年一项最重要的编辑任命的记述所证明——此即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大型周刊《星火》杂志的领导。在科罗季奇任职期间，《星火》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罗季奇并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乔夫自己作出了这个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乔夫读到了科罗季奇刚刚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乔夫发现该书尚属正统，他惟一的抱怨是：科罗季奇“写到美国时太极端了”，表达的观点“太反美”。不过，科罗季奇不久就把《星火》转到赞扬美国、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10]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但绝大部分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倡导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



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科学家理论概括、艺术家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就还得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11]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整个改革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



特别鲜明，此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在30年代，虽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但属于大资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一直把他们拒之门外。激进的作家们必须求助于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记者们只能在诸如《工人日报》之类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激进的剧作家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细心删改过的形式面世，其进步主题深藏不露，这和改革前的苏联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检查制度边缘躲来躲去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报纸都支持共和党人阿尔夫·伦敦当总统，在它们看来，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进。

但1986—1987年间苏联任命的新编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阻力。开始时他们并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确实给了这些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自由，允许他们随意运用大众媒体作为工具。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实际上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却赋予它们以实质性的独立。

1988年3月，似乎这一曲田园牧歌就要终结了，《苏维埃俄国》发表了“新斯大林主义者”尼娜·安德雷耶娃攻击媒体“太过分”的来信。^[12]人们担心这封信代表了官方政策，是公开性即将完结的信号。但在一次漫长的、激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条件地支持安德雷耶娃来信而与雅科夫列夫针锋相对的利加乔夫落败，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会报《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安德雷耶娃来信，重申支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该社论在4月5日发表，三周后安德雷耶娃的来信被发表，这表明中央给独立写作和思考大开绿灯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13]

几个月后再次发生了同样的情节。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



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14]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15]

1989—1990年间，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们认为她在推动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一开始，她还把改革看作是改造社会主义。但到了1990年，她的看法就改变了。她曾描绘过科学学会1989—199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大会由学会副会长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采夫主持。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16]。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苏联学者对于苏联未来的共同期盼：“它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17]

因此，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8]1987—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了这种激进化的历程，因而胆子越来越大，公然为各种反现存观念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19]

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



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不。许许多多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还是相对的意义，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者人一点都不多。几十年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例如，在二战结束不久那段时间里，苏联科学家的收入与体力劳动工人相比要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相对收入越来越低了。^[20]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21]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

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

不管物质的考虑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转变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它确实助长了而不是阻碍了他们向这一方向发展。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在改革年代里，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也经历了这一激进化的历程，但他们激进化的影响要更加深远。改革包括许多方面，但如何改革经济是中心主题。作为研究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展的专家，经济学家在重建社会的争论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其他的苏



联知识分子一样，经济学家也曾被要求支持官方意识形态，这包括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央计划优越于“无序的市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财产等等。在官方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最大的禁忌，因为它意味着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卖命。

过去，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重复着这些观点，但对它们并不那么全信，甚至一点都不相信。即使在改革之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是构建经济体制的惟一合理的方式。苏联经济学家教着他们应该教的，发表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文章，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怀疑起了自己的所教和所写。

在苏联体制下，职业经济学家以往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党的政治局手中，其次是各经济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很少有人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改革之前对他们也很少有什么影响。主管经济的官员们绝大部分具有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背景。就像在西方那样，拥有这些背景的人很少看得起理论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后者都是些脱离现实、和现实不相干的人。

但随着公开性引发的争论越来越自由，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积极地、有效地推销他们的观点。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公开性启动了和在其他知识分子当中一样的激进化历程，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了。戈尔巴乔夫似乎特别重视他们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最高政治领导层不断转向经济学家，要求他们为经济改革制定新的计划。现在，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已经举足轻重了。

这些苏联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和一切鼓吹西方经济思想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在西方的新古典同仁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羞于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们鼓吹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用私有制取代国家或工人所有制，无疑就是在鼓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



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在19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导致理想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它被一种更加中庸的理论所取代，后者认为，虽然市场力量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政府也必须提供出一个调控框架，以便防止出现诸如严重萧条、收入过分不公、垄断势力发展、环境破坏、工作条件不安全等社会病患。70年代，这种古典的自由市场学说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当中开始复辟，并从此和干预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争高低。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认为西方的贫穷和失业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22]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全部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23]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部分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权威的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24]但在整个改革期间，占压倒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惟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



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25]。

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26]。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在担任政府顾问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这里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定义和传统苏联用法不同，后者的涵义更广，包括了一切受过正式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

[2]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11-12, 27).

[3] Hewett and Winston (1991a, p.502).

[4] Brudny (1991, p.162).

[5] “非正式协会”在公开性政策下出现在苏联的每个角落。据估计，1987年末组成了3万个这类团体，1989年猛增到6万多个。其中部分是关注诸如环境之类主题的非政治团体，另一些则是体育性或音乐性的团体 (Miller, 1993, p.102)。

[6] 参看 Lewin (1991, chs 5, 6)。

[7] 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观点在改革之前就已吸引了一大批地下追随者，其中不仅有知识分子，也有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Bilenkin, 1995, p.25)。

[8] 利加乔夫 (1993, pp.95~97)。

[9] 1990年至1991年间,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出现了急剧转变,他不再和原来一样支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了。在1990年的一次党代会上,雅科夫列夫对一个代表团说:“我已经作出了选择。我喜欢股份资本。”(Daniels, 1993, p.168) 1991年夏,他辞去戈尔巴乔夫高级顾问之职,公开谴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请参看题为“我为什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雅科夫列夫访谈录(《苏维埃俄国》, 1991-08-03, 1页)。也可参看《苏联报刊最新文摘》的相关报道(1991年, 31期, 总第43卷, 11页)。

[10] 利加乔夫(1993, pp.96~97)。1994年,在一次与作家的谈话中,科罗第奇证实了利加乔夫所言不虚。

[11] 每种社会体制都有其获得知识分子拥护的途径。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也不例外。然而,后者鼓励知识分子拥护其社会体制所用的手段要更加隐蔽。它们主要表现在那些正统的观点和方法更容易获得资助、发表、学术地位和受人仰慕的荣誉,而不像苏联那样,采取赤裸裸的检查和镇压的方式。

[12] 尼娜·安德雷耶娃说:“我不能置原则于不顾”(《苏维埃俄国》, 1988-03-13)。

[13] 公开性在1989—1990年间从政策变成了法律。1989年7月,《刑法》中禁止“反苏维埃鼓动和宣传”的条文被删除,1990年的《新闻和其他大众信息媒体法》宣布取消检查制度(Miller, 1993, p.99)。

[14] 瓦西里·谢柳宁:《源泉》,载《新世界》1988(5)。该文的英译参见Tarasulo(1989)。

[15] 参看Steele(1994, pp.41~42)。

[16] 对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的访谈录(1992-10-19)。

[17] White(1992, p.232)。

[18] 在一项新的媒体法于1990年8月1日正式生效后,许多大报和重要刊物脱离了与国家或党政机关原有的正式隶属关系,转变成了独立的公司(Miller, 1993, pp.99~100)。

[19]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大众媒体都成了“自由派”的喉舌,都把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看作是未来苏联的新模式。有些媒体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即俄罗斯民族主义。

[20] 从1960年到1985年,科学研究的平均收入在相对的意义上升低了,从比工厂工人多23%,变得少4%(《苏联国民经济70年》,1987, 431页)。在

此期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员收入，同样相对于体力劳动工人有所降低（Miller, 1993, p.31）。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宣称，这种相对收入下降的趋势同样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大学教授（对亚历山大·布兹加宁的访谈，1994年5月）。

[21] 一位苏联朋友曾这样讲给弗雷德·维尔听。

[22] 美国和英国一些保守的思想界人士确曾极力对苏联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施加影响。典型的例子是遗产基金会和英国的经济研究所。这些组织通过举办会议，把西方的自由市场思想家和苏联的知识分子拉到一起，他们还邀请苏联经济学家到他们那里观光旅游。当然，不管如何，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都是乐意接受自由市场观点的，并不需要有多人的推动。

[23] Barnett (1991, pp.1087~1098).

[24] 阿巴尔金的观点，以及他在改革后期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本书第五章将予以讨论。

[25] 参见1992年10月27日对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访谈录。

[26] 《亚历山大·苏维茨基采访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日报》，1994-06-07。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五章 经济改革

苏联改革三年后，全世界各大媒体对苏联经济的困难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从1988年到1989年，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照片上空空如也的柜台似乎描绘了这个体制正挣扎在死亡痛苦线上。

这些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难以运转的事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试图改革苏联这种日渐衰败的经济，但是他们改革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寻求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拒绝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公有制，势必阻碍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的努力，苏联经济状况依然日渐恶化，经济“崩溃”或“爆炸”了，消费品的短缺证明了这一切。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拖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最终被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所抛弃。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知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惟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常识性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个经济体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乃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整个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它的内部产生问题时，不会突然变得不可运转。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体制以它特有的方式运作良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某个时期，它也有可能运作得不是很好，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一种经济体制还能够实行大幅度紧缩政策的时候，用“崩溃”一词来形容它就会产生误导，例如，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面临的就只是大萧条，而不是崩溃。到 1933 年为止，大萧条使 1/3 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停止运行，更没有绝对的需要迫使它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强大的机制在经济低潮时期保护自己,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导致改革还是导致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资本主义激烈的批判使人们热忱地相信这种体制的“不可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引发革命。大萧条虽然严重,但并没有导致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在美国,改革的进程开始于1933年,即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改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年完成,持续了15年时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并趋于平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扩张最快、最广的25年。

纯粹推测性的分析并不能预先告诉我们一种经济体制能或不能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50年代赫鲁晓夫和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了较小的改革。但是在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如我们下面所主张的,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苏联崩溃的通常性解释并不符合苏联改革期间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证据表明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因为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依然存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变化相对温和。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仍然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标志经济变化第三阶段的是1990年到1991年。在这个阶段,亲资本主义联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经济体制的变化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苏联经济直到第三阶段,当政治的手段被用来拆除体制的障碍时经济才开始走向紧缩。因此,那种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体制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的观点,是和这一前后因果次序不符的。

表 5—1 提供了苏联经济总产品和总消费增长率的资料，包括西方国家估算的结果（第一项和第二项）和苏联官方统计的结果（第三项和第四项）。

图 5—1 数据比较了大改革前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情况。第一阶段实施温和改革政策的结果从 1985 年到 1987 年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阶段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调整政策生效于 1988 年初，其结果影响了 1987 年到 1989 年间的增长率。1989 年到 1991 年的增长率记录了苏联经济运行在改革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垮台时的情况。图 5—1 不但把社会主义改革第一、二阶段的结果——1985 年到 1989 年和改革前五年的增长情况作了比较，而且表明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调整的增长率。

表 5—1 1980—1991 年苏联经济增长率（年百分比）

	西方国家估计		苏联官方材料	
	(1) GNP	(2) 消费品	(3) NMP	(4) 消费品
1980—1985	1.8	1.9	3.2	3.2
1986	4.1	1.5	2.3	3.5
1987	1.3	2.2	1.6	3.5
1988	2.1	3.5	4.4	4.2
1989	1.5	2.3	2.5	5.1
1990	-2.4	1.5	-3.9	2
1991	-12.8 ^{a,b}	[N.A.]	[-15 ^b]	[-13 ^b]

资料来源：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90, p.58),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93, pp.14, 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p.41, 43, 49)。第二项是总的商品和服务不动产消费的增长。第四项是苏联经常性会计账目中的私人 and 公共的不动产消费。

a 1991 年的 GNP 是两个不同估算（-8.5%和 -17%）的平均值。

b 除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估算值。

从表 5—1 和图 5—1 可以看出重要的两点。第一，它们表明了苏联经济在 1985 年至 1989 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 1990—1991 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影响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图 5—1 表明整个苏联的经济在 1985 年至 1989 年的每年都出现了正增长。1990 年的总产品，不管是用 GNP



(见图 5—1 的第一栏) 还是用 NMP (图 5—1 的第三栏) 来衡量,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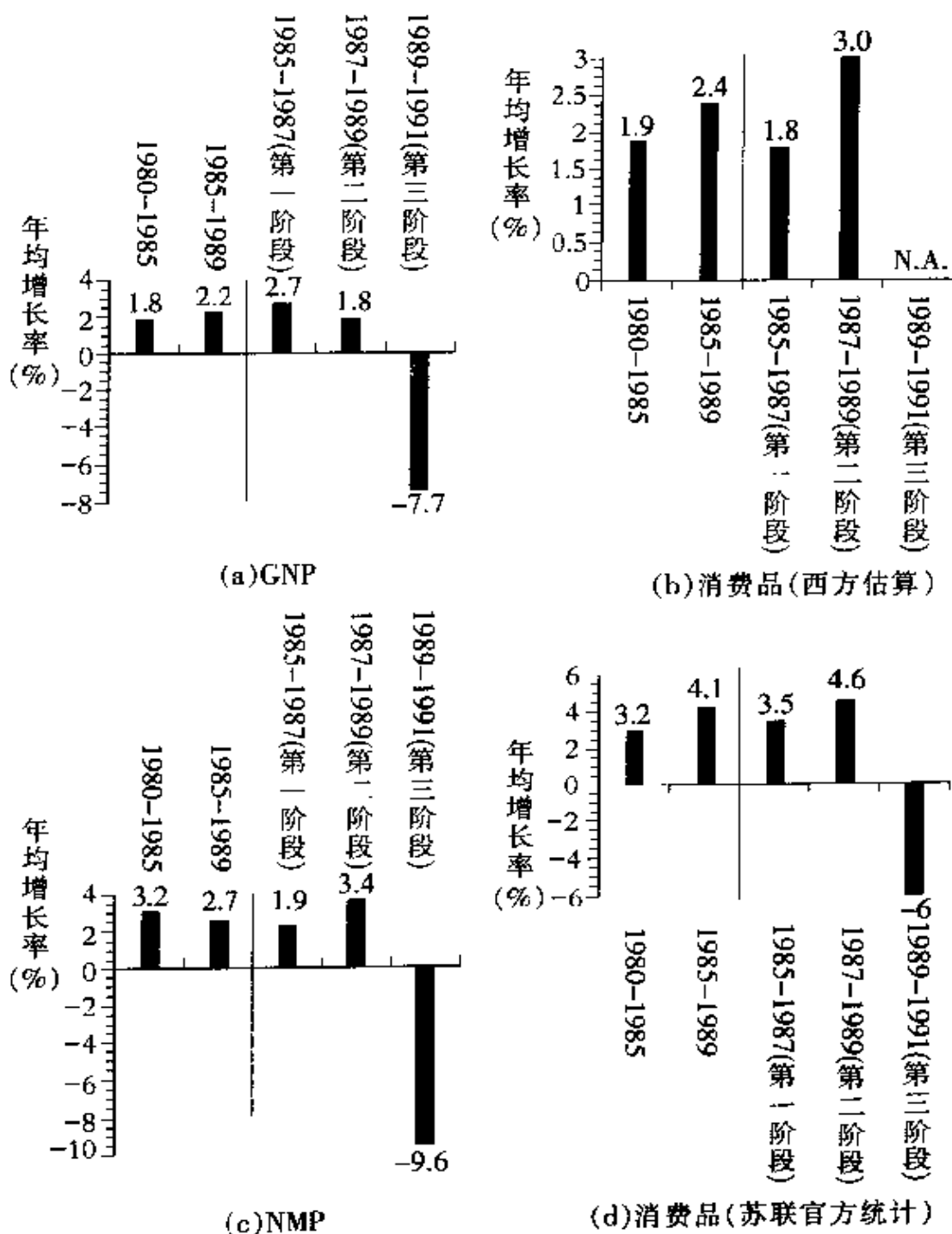


图 5—1 1980—1991 年苏联经济产品和消费品增长率

资料来源: 见表 5—1。

有轻微的紧缩。在 1991 年，经济进入了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严重萧条的时期。如图 5—1 (a) 所表明的，用西方的 GNP 衡量，苏联经济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85—1989）实际上比改革前五年的 GNP 增长更快。用苏联的物质生产净产值来衡量，如图 5—1 (c) 所示，苏联经济在 1985 年至 1989 年间依然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比 80 年代的前五年要慢。

第二，图 5—1 (b) 和 (d) 清楚地表明，总消费品这一为市民最为直接地体验到的变量，不管是根据西方还是苏联官方的估计，在 1985 年至 1989 年间比 1980 年至 1985 年间都有了显著的迅速的增长。此外，无论从西方的还是苏联官方的统计看，消费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比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1]表 5—1 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表明，消费品直到 1991 年即改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紧缩。

这些材料看来和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在这种观点看来，苏联改革走过了一段经济运行日渐恶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消费品的供给上。一般的苏联市民确实经受了从 1988 年开始的经济变化产生的问题。人们感受到了消费品的恶化，但资料却显示 1991 年前不动产消费品仍处于增长水平。要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终结。

经济的改革，除了与之伴随的迟至 1989 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经济的混乱，而混乱以显著的速度加重了试图超出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的政治派系斗争。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增长，到 1990 年已足以分解苏联体制中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力量对 1990 年和 1991 年的经济紧缩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它不是解释紧缩的惟一因素。在经济紧缩持续几年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被一场更剧烈的运动付之流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改革及其对事情发展造成的影响。



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1985—1989年)的政策演变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N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醉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量缩减了。当对酒的节制的可能性略微增加时，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生产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糖更严重的短缺。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200亿卢布流失了。^[2]这两种结果是某种预兆，而后者更为严峻。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十年前（1975—1985）翻了一番。^[3]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如图5—1所示，GN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4%的新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1.7%，相当于改革之前（1975—1985）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相对正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其改革，但他同时也怂恿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4]

这些措施是第三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他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他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5]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



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6]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行为。企业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的相对自主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必须给予支持新的制度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7]

消费市场的危机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8]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



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地增加——1988年增长了3.9%，1989年增长了5.3%。^[9]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10]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11]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12]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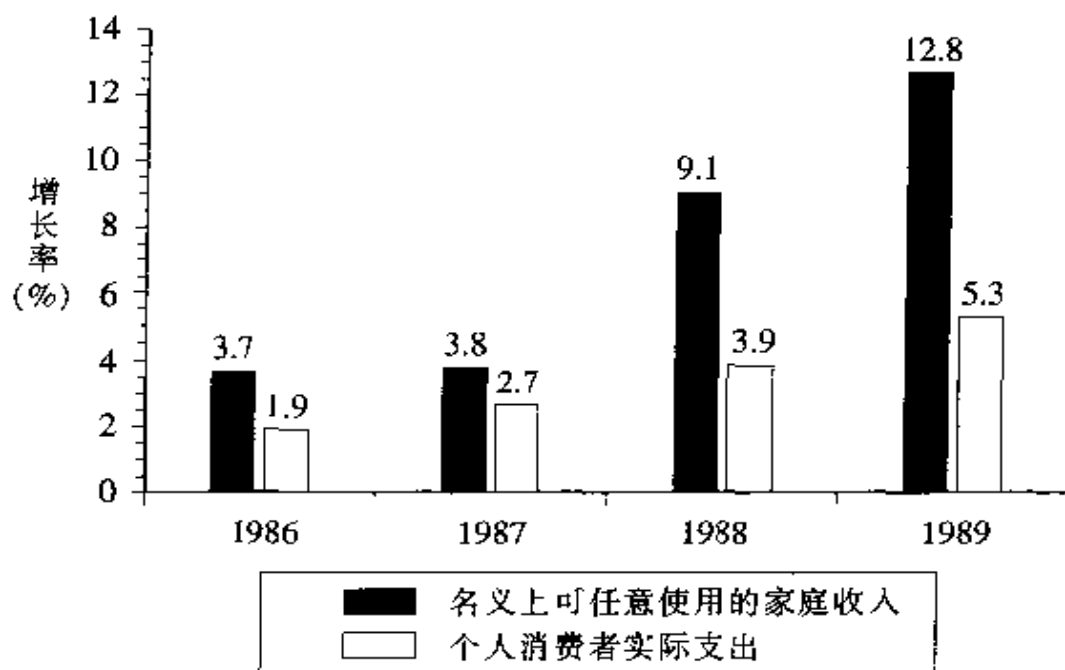


图 5—2 家庭收入和消费品的增长

资料来源：苏联官方资料。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49, 56. 扣税之后的家庭收入未考虑通胀因素。消费者实际支出包括公共消费。

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13]在 1985 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 1986—1987 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的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 年和 1989 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14]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加复杂了。^[15]

1987 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需求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 1988 年仅上涨了 0.6%,1989 年上涨了 2%。^[16]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17]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他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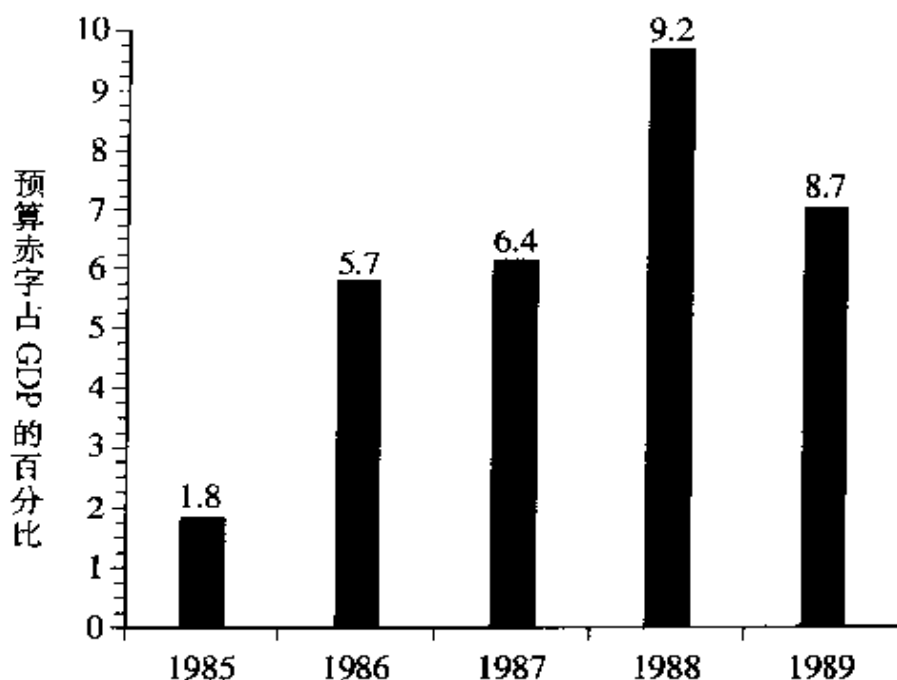


图 5—3 苏联预算赤字占 GD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Joint Economic-Committee 1993：47。

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18]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 1988—1989 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 1988 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 7.4%，1989 年再降到 6.7%。^[19]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 1987 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 1988—1989 年继续扩张，1988 年 GNP 增长 2.1%，1989



年增长了 1.5%，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 80 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争论的激进化

1989 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 GNP 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 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20]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 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 1989 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 1987 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 1989 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个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 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



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21]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22]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23]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24]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四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和极其高度发展的为

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25]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

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26]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

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段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27]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接受“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28]。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新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29]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30]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



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31〕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32〕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33〕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34〕。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35〕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



“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 500 天内，至少 70% 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36]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 500 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 500 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37]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 500 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 500 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 500 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 500 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38]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

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39]。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40]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41]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42]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43]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44]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45]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原因，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巨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

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46]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56.2%，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47]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另一方面，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八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惟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48]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



行。这种状况是 1990 年至 1991 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49]

私人企业的出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另一方面，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 1985 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 1986 年 11 月的《私人劳动法》和 1988 年 5 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能够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 1989 年估计有 290 万人在 13.3 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50]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佣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

更高的价格卖出去。^[51]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 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

到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

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紧缩导致的损失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援助并不是就大得诱人。

然而，在1991年底，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权力，击败先前专政的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和试图恢复旧体制的力量推向一边。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必须考察改革时期发生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显著变化。

[注释]

[1] 消费品开始比总产品（GNP或者NMP）都增长得更快，这表明了总投资增长的急剧减少，这将在下面讨论。

[2] Noren (1990).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52).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 交叉固定投资 (以不变价格计算), 相比 1975 年至 1985 年的年均增长率 3.4%, 1985 年至 1987 年间每年增长达到 7%。

[4] 国有企业的重要法律其正式名称是《国有企业法》, 当其翻译成英语时, 显得有点笨拙, 这里将使用缩写的名称。

[5] Schroeder (1987). 某些确定的部分被排除在批发贸易之外, 依然由中央分配。这部分包括电力、原油、天然气、金属矿和某些特别的装备。

[6] Schroeder (1987). 职工选举经理的权利在 1990 年被废除。

[7] 在 1997 年 1 月 17 日作者的采访中, 苏联经济学家和前副总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断言, 当国有企业法律“是一个进步的法律”时, 它的作用被税收立法的失败冰消瓦解了。他声称, 所需要的是基于企业和人口上的新税收, 包括过度利润税。在列昂尼德·阿巴尔金 1989 年成为副总理后, 他在同年 11 月促进了新税收的立法, 然而, 阿巴尔金说, 到那时候, 为时已晚, 难有成效了。

[8] 对苏联各地的配给研究发现, 到 1989 年底, 糖在 97% 的地区实行配给, 黄油在 62% 的地区实行配给, 牛肉几乎在 40% 的地区实行配给。见 Noren (1990)。

[9] 引证的数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2a, p.49) 上的苏联官方数据。这些数据和表 5—1 的苏联官方消费品数据有点微小的不同, 它们还包括公共消费品, 而这里引证的图 5—1 的数据仅仅是家庭消费品的。1989 年消费水平有了巨大的增长, 这是由于 1988 年中期苏联领导层决定削减军用物资, 与此同时增加消费品进口来增加消费品的总量。1989 年, 消费品的进口约增长 8 亿至 9 亿卢布, 这相当于前一年总消费品的大约 2% (Schroeder, 199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57)。

[10] 如果一年又一年的储存未卖出的消费品没有多大变化的话, 二者数量将十分接近。

[11] 图 5—2 的数据可能低估了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差距的增加。从下列现象可以看出这点: 当消费品储备在仓库中开始减少时 (如 1987 年至 1989 年那样), 而消费者个人实际支出增长就有点超过消费者可得到的商品的增长了。

[12] 平均实际工资, 在 1980 年至 1987 年间每年以 1.4% 的速度适度增长, 在 1988 年至 1989 年却突然以 7.5% 的速度增长。国有企业的非工资报酬甚至增长得更快。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p.56, 62)。



[13]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对总产品的一项衡量标准, 和 GNP 非常相似, 对苏联尤其如此。两种标准的区别涉及本国公民在国外的收入和外国公民在本国的收入问题。

[14] 国家在 1985 年至 1988 年的支出与它在 1981 年至 1985 年相比有缓慢的增长, 增长的赤字是由于国家税收方面的问题 (Noren, 1990)。

[15] 苏联预算的赤字不仅通过发行公债, 而且通过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得到补充。在 1987 年到 1989 年间货币的发行量以年均 14.8% 的增长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70)。

[1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58)。

[17] 在 1988 年到 1989 年, 商品零售总量相对于它们的销售额来说达到了自 195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8] 调查发现, 在 1989 年早期, 90% 的苏联家庭都会把货物储藏在家里, 与此相比, 一年以前是 25% (Schroeder, 1992, p.99)。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a, p.49)。

[20] 这篇文章署名为 Larisa Popkova (Popkova, 1987)。

[21] 这一观点是苏联私有化鼓吹者提出的, 其提出动机通常是很单纯的, 似乎是要把 19 世纪的小型商业资本主义作为他们的参照物。如果只有私人所有者能够有效地管理企业和生产消费者需要的高质量产品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美国、西欧、日本经济中占优势的巨型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就是十分令人不解的, 因为这样的公司是典型地由雇佣经理经营, 而不是由其主要的股票持有者经营。

[22] Aslund (1991, pp.343~344)。

[23] 1992 年 10 月 26 日会见弗拉基米尔·法明斯基的谈话。法明斯基是莫斯科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分部的负责人和《经济问题》期刊的编辑。他在 80 年代和沙塔林很熟, 他从自己的角度对改革的演变作了考察。

[24] 根据一个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的说法, 到 1989 年秋, 沙塔林“明白地赞同苏联经济渐进地转变成混合的市场经济, 其中资本主义成分占主导地位” (Davies, 1991, p.126)。在一次谈话中, 沙塔林“联想到保守党”, 对“英国的进步”表示赞赏 (Literaturnaya gazeta, 1989-10-11, 引自 Davies, 1991, p.126)。

[25] 阿巴尔金 (1991, pp.61~62)。阿巴尔金的论文最初发表在 1989 年苏联刊物上。

[26] 到 1989 年, 苏联经济在近 15 年被西方资本主义超过。这个连续不断



的胜利也许在劝说苏联政策争论的参与者们，主张资本主义相对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是更好的选择上起了作用。

[27] 《纽约时报》，1989-11-17，16版。

[28] 《纽约时报》，1990-02-14，2版。

[29] 《纽约时报》，1990-03-16，6版。在经济改革领域，改革为何应当激进化，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含糊不清的，他只知道“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

[30] 《纽约时报》，1990-05-14，A1版、A8版。

[31] 这些评论是在乌拉尔地区作的一个讲话，载《纽约时报》，1990-05-14，1版。

[32] 《纽约时报》，1990-05-23，A1版。

[33] 《纽约时报》，1990-05-14，A8版。

[34] 引自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苏联塔斯通讯社出版，转载于《纽约时报》，1990-06-03，A10版。

[35] 在和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苏联经济学家斯塔尼斯拉夫·曼希科夫断言，500天计划实际上提出得更早。据曼希科夫所说，亚夫林斯基几月以前就起草了一个实质内容相同的建议，当他在副总理阿巴尔金手下工作时。阿巴尔金不支持这个计划，于是亚夫林斯基把报告递交给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同意他的计划。在曼希科夫看来，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命令这个小组在1990年8月提交一份新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制定的这个计划和亚夫林斯基早些时候的计划实质上是相同的，除了时间表从400天扩展到500天外。

[36] 亚夫林斯基等（1991，pp.7, 14, 15, 44, 62）。

[37] 《纽约时报》，1990-09-18，A6版。

[38] 《纽约时报》，1990-10-17，A1版。这个立法的官方标题是《国民经济稳定的基本纲领和市场经济的转换》。

[39] 《纽约时报》，1990-10-17，A8版。

[40] Noren (1990)。

[41] 某西方观察员评论道：“在1990年中，集权化的供应体制已经逐渐分解，企业不得不通过‘直接联系’来供养自己。”（Rutand, 1991, p.302）

[42] 许多非正式的私有化事例发生在苏联改革的早期，作为企业的主管利用政府下放的权力把他们的企业非正式地私有化了。类似地，某些私人金融机构在他们获得官方批准前，在80年代末就开始运行了。如第七章讨论的



Menatep 银行事件。

[43] 在整个 1988 年至 1990 年，由于共产党从以前的经济管理的地位撤退下来，局势更加混乱了。这将在第六章讨论。

[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2a, p.49)。

[45]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部解体仅仅发生在俄罗斯，在 1992 年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2a, p.78)。这些比例是以苏联官方汇率按照卢布计算的。

[47]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在 1991 年也下降了，占苏联整个进口降低数的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2a, p.78)]。

[48] 亚夫林斯基等 (1991, p.66)。

[49] 我们已经分析了一系列加速 1990 年至 1991 年经济紧缩的内在的特殊原因。然而，在大部分特殊的原因背后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若隐若现，即苏联政府领导阶层及苏联政府本身权力的快速衰落。经济制度的解体、国有企业未来所有权的不明确性、苏联各共和国日渐增长的自给自足——甚至共和国内部各地区的——都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政府权力衰落的表现。在第八章，我们将考察正在破坏苏联国家和苏联经济及戈尔巴乔夫改革努力的政治活动。

[50] Jones and Moskoff (1989, p.29)。

[51] 到 1989 年 9 月，大约 400 家独立的合作的、商业银行开始营业。到 1991 年 9 月，这个数字增加到 1 535 (Kozlov, forthcoming)。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六章 民主化

我们知道，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尽管在1987年之初，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强调民主化，但是，直到1988年中，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举措才开始实施，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到1989年才开始出现。

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



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性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的缺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通过自治的扩大，我们才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中取得成功。^[1]

其次，在1988年，领导层推进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和拦路虎，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所以，每一个公民都将会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民主化会使劳动群众行动起来，清除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化也是使目前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的最根本的保证。”^[2]

第三，或许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他们似乎注意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戈尔巴乔夫写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斜体部分为原文）^[3]”，最好的社会应该既是社会主义又有民主。很快，他们就面临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因为民主化开辟了一条通向亲资本主义联盟和为权力而斗争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在自己的讲话和施政纲领中谈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尽管在他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经常讲类似的话，但是，由于集权形式的政治制度，这些讲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在1987年1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苏联社会的“高度的民主”，并把这一目标当作是党的“最紧迫的任务”^[4]。为了能在这次会议上集中领导层的智慧推进民主化进程，这次会议曾经被三次延期。

在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如何使苏联体制民主化问题上，大家进行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对选举政治团体成员的办法加以改革的必要性。领导层提议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进行竞选，改变过去那种由上面直接任命和只有一个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做法。第二个议题是主要权力机构角色的变换，政府部门，特别是苏维埃政府，在行使权力方面要更加积极和独立，而共产党则要从日常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和一种“监督和平衡的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新颖的民主化的理念，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一种新奇的策略。他提议共产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就苏联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问题做出计划。他的这一提议在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获得同意，专门会议计划在1988年夏天举行。^[5]已经有将近五年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了。召开全苏联的党的代表会议，似乎是为国家决定这一新的政治结构的最好办法。正是在1988年6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走上了形势严峻的民主化道路。

共产党内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程序包括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化问题。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工厂、乡镇、城市的党组织领导要经过选举产生。而且，享有很大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要由同级的党委通过无记名投票产



生。^[6]

由戈尔巴乔夫提议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呼吁党内的民主化问题。党的领导除了要通过竞选外，任期也规定为不得超过两任，任期五年，其中也包括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的连任，不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而是由下面的选民决定的。因此，权力来自于下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来自于上面。

当然，这种试图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民主化机构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有效地付诸实施。在党代会之后，党的领导通过竞选的例子只有几个。例如，在1989年1月，在土库曼斯坦，由于对一项安全饮用水的批评，使一位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没有当选。^[7]同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创办了一本杂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讯》，编入了能够得到的政府文件、群众的来信、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自传。1990年1月，乌克兰共和国的哈尔科夫市（苏联乌克兰东北部城市）新一届的省级党委书记，就是从五个候选人中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在这次竞选中，原哈尔科夫航空制造厂的领导取胜，据说，这位技术统治论者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党内的职务。^[8]

但是，这种在党内的民主和开放只是一种例外。只有极少数的党委书记是通过无记名方式竞选产生的。在1987年1月为了呼吁党内民主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后两年多，也就是在1989年7月，苏联《真理报》承认，省一级的党委书记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不到1%。^[9]在共产党内权力还是来自于上级的任命。^[10]

或许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认为，党外的民主化即政府机关的民主化更适宜于优先进行。他们甚至担心，按照许多党员、党的中层和低层领导的传统观点，真正的党内民主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随着苏联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加，随着1989年和1990年苏联共产党所面临的反对派的增多，如果在党内真正实行民主化，那些主张改革的领导者很可能会落选。事实上，还存在一个组织管理严密的机构，使得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能够阻止那些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下层党的领导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剥夺



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试图利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推动全国范围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对共产党进行改革，虽然苏联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领导在党内的不容置疑的权力，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有利条件，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可以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的民主化计划，接下来，他也可以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赞同。惟一的障碍在于，如果这一计划获得成功，那么，民主化了的政府和仍然没有改革的共产党相互争夺社会领导权的紧张局势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国家的民主化

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发动了苏联政府机构民主化的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在苏联进行选举方式的改革。在实践中，苏联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选民都可以在“赞成”或“反对”之间作出抉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代表会议上由多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的新体制。几个月以后，颁布了一条在一些地方进行竞选试点的法令。1987年6月，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在一些地方代表大会的竞选中，在200多万候选人中选出了94184名代表，占总数的4%。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当选了，而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反而落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受到侮辱的痛苦。^[11]

不断增长的民主化的热情，甚至感染了冷静沉着而且以前很是温驯听话的最高苏维埃。以前，不管党的领导颁布什么样的法令，苏联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总是很快就通过了。但是，在1987年夏天，最高立法机关的代表却对一项法令提出了批评和修改，这在最近的苏联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2]

不管怎样，传统的最高苏维埃已经到了梦醒时分。1988年夏天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意深化对苏联政府的改革，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对宪法的修改案和新的选举法。最高苏维埃被议会制



所代替。人们选出了一个拥有 2 250 人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选举最高苏维埃，这是一个由大约 500 人至 550 人组成的立法机构。新人民代表大会中的 750 人是从“社会团体”包括共产党所列出的名单中选举出来的，而其他的 1 500 人是由公众从潜在的竞选者中选举出来。^[13]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一名最高苏维埃主席，作为国家的领袖。

在谈到即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它“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机构”^[14]。这确实是事实。1989 年 3 月，89.8% 的苏联选民到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在 3/4 的竞选中，往往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名额。

由于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所以这种选举和西方的选举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 80% 的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是，许多席位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15]鲍里斯·叶利钦在 1987 年的角逐中，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在莫斯科地区获得了 89% 的选票而当选。在一场本来只是象征性的竞选中，叶利钦虽然遭到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打败了由共产党确定的候选人——一位生产苏联高级领导人所喜爱的豪华轿车的工厂厂长。其他许多拥护快速和激进改革的人也在竞选中击败了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而获胜。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那些非官方民族运动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获胜而进入了人民代表大会。

在选举过程中，对民主还有许多的制约因素，这包括在击败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之后当选人的任命程序。但是，人们对民主的热情，至少在苏联几个欧洲加盟共和国中，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同意任命他们所不喜欢的候选人。与一般的民主最大的不同是，苏联的人民代表大会为社会团体保留了 750 个席位，保留的这些席位被人视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但是，即使这一做法也在公众的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科学院的领导宣布社会团体的候选人是一些早已确定了的人时，在科学家中立即引起了骚动。领导层不得不修改候选人名单，最后，科学院的一些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被选进了人民代表



大会，这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16]作家协会也选了几个自由派的代表进了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中为社会团体留出 750 个席位，这可以被理解为对民主的最异乎寻常的破坏。在 1989 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未来的选举中取消这一做法。然而，许多家喻户晓的、很有影响的、赞成民主的代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地理区域来进行选举，不知道他们能有多少人能当选。

许多想维护原有社会体制的人都在竞选中失败了。几个军队高级将领也落选了。摩尔曼斯克的北方舰队指挥官、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官和列宁格勒的军事指挥官，都被一般的竞争对手击败了。而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总司令却被一个中校给击败了。^[17]许多共产党的官员也落选了，包括一些没有竞争对手而大多数选民投反对票的人。列宁格勒地区党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余日·索洛维耶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命运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最为凄惨。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夸大共产党领导在这种选举中的困难。80% 的共和国和省级的党委书记还是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党的领导尤其是在中亚，没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在竞选中失败的。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87%）也大大超过原来的最高苏维埃（71.5%）。^[18]但是，由于这场在苏联各地展开的争论和选举已经进入到共产党党内，因此，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苏联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党和政府的管理并不很好。在俄罗斯共和国有 232 人参与竞选（俄罗斯的选举代表总数是 645 人），结果有 78% 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 47% 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72% 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19]

新型的、有较大自由的选举为苏联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在这场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参与，人们都是作为个体平等地参与



竞选。知识分子，因为能说会道而且学识渊博，因而在这样的选举中往往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谈到的，到1989年，大多数的电子和印刷媒体，都被赞成激进改革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编辑和记者占领。党和政府的官员都受到媒体的怀疑，而那些赞成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赢得了媒体的好感并被媒体所接受。

对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645名代表的研究（只有社会团体所选举的代表除外）表明，知识分子在这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确实非常有利，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研究表明，在俄罗斯的645名选举代表中，知识分子占了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选举代表的37%。²⁰¹

人民代表大会在1989年5月举行会议。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选举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得票率超过了95%），或者像媒体所说的“总统”。选出了542名代表作为新的最高苏维埃成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直播了13天，吸引了近2亿苏联观众。人们对这次会议的兴趣非常大，以至于他们停止工作而来看电视——一名政府官员说电视直播所覆盖的地区的工业产值下降了20%——收视率大大提高了。²¹¹以前人们看到的是最高苏维埃的舞台监票，而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发生在苏联社会知名人物之间的争论。争论中没有哪一个议题是被禁止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斯大林的罪行、军工企业对经济发展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改革的失败、贪污腐败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代表们畅所欲言和激烈争论的话题。波罗的海诸国要求独立。一些代表指责共产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持会议的主席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发表讲话和作出劝告，但还是允许在争论中有较大的自由。

新成立的苏联议会有通过法律的权力，它也确实通过了一些法律。但是，它的重要性远远不及以前的立法机构。覆盖范围极大的电视直播，议会的争论，在苏联社会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几乎



是在突然之间，政治公开化了，人们可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广泛展开讨论，其中无疑会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观点。当时，或许还不是很明显，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权力转移的开始，它不再是共产党的工具。曾经因为被选为党的领导而享有巨大权力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现在被半民主化的政府选为总统，这种选举与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了。

新的最高苏维埃开始严肃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了。1989年6月，当尼古拉·雷日科夫经最高苏维埃同意出任总理时，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再也不是一枚橡皮图章了。他所提名的70位部长，有11位不是被委员会否决，就是被新的提名所取代。雷日科夫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一些猛烈的抨击，^[22]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苏联在全国举行了一些民主化程度更高的选举。接着1991年，苏联又通过直接的全民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包括新的共和国总统和主要城市的市长。这种在最终的苏联权力角逐中起到了决定作用的发展过程，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进行讨论。

共产党角色的转换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谈到的，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共产党和国家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体制中，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是最大的。党的领导人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伴主宰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最高苏维埃只是党的政策的赞成和执行部门。这种关系在下面各共和国、省以及地方党委与同级政府之间也是一样的。党中央领导给下级党的领导下达指示，党以直接干预的方式、以自己的凝聚力来管理国家事务。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管理部门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自治权力。一项政策规定不可能对实施这一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出来，这就给下面的行政管理部门留有一定的余地。任何监督也不可能是毫无漏洞的，执行政策的人的有些行为是注意不到的。党作为公共机构，把人



民称为国家的主体，它在国家中的作用应当是一种杠杆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并不必然就是决定性的。正如英国的亨利八世曾经发现的，当托马斯·伯克特（Thomas Becket）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时，他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这确实让亨利八世大吃了一惊。一旦一个政府官员在一个具有自己特殊使命的巨大的组织中担任了很高的职务，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很可能就会成为自己这个组织的利益的维护者，从而损害党的利益。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为了使党真正拥有权力，它就不得不卷入，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卷入政策的实施过程，而不仅仅是只制定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机制上就必须把政治局成员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局成员往往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议会主席、俄罗斯共和国主席、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说明的，党暗中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也具有经济管理的职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很多，他们把持了国家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监督一个庞大的、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的管理机构。书记处成员定期开会，采取措施，以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在实际中按照预定的计划实行。在传统的国家体制中，党的地方书记在地方同级领导中拥有绝对权威，能够解决争端，统筹安排，从上级领导那里寻求额外的资源。

民主化运动，使得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并且在1989年达到了顶峰，共产党员的数量为1950万，还不到总人口的7%。^[23]真正的民主化，就意味着党对社会的直接控制的减少。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应该是要求党集中精力解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是要党在社会中从事管理工作。“控制管理权力”这一术语是针对过去的实践的，因为过去在苏联发出最高命令和指示的是党，而不是政府。1988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发表社论，呼吁党不要干预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24]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召开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设想以后

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很大的调整、重组。在1988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部级单位就由原来的20个减少到9个，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都被取消了，但农业部除外。中央委员会的部委机构曾经是党对苏联社会进行有限管理和干预的基础，现在被新的“委任制”所代替。像意识形态、组织、经济和国际事务这样的部门，都委托给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领导。同时，书记处也不再总是举行会议。

中央委员会的重组，对共产党本身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中央和地方党支部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使党脱离了对苏联社会生活的管理。一位意大利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口塔·狄·利奥，在描述这一变化时指出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地震，这进一步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彻底放弃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放弃了对国家的命运的操纵”^[25]。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利加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这种中央委员会的重组“自动埋葬了中央书记处……党已经剥夺了它的领导人的权杖”^[26]。在这之后的一年里，书记处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只有到1990年6月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重新设置书记处以后，才又零星召开过几次会议。

党的地方领导发现中央再也不给他们下达指示。按照利加乔夫的说法，地方党组织只能自作主张，因为中央不给他们任何明确的政策。他指出：“中央似乎已经消失了。”即使在像1989年3月怎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上，党的地方组织也只能自行决定。^[27]与此同时，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传出的消息——党不应该再干预社会的行政事务——地方党的领导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中，党曾经是统筹一切的核心力量。严厉的中央计划出台以后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地方党的领导来解决的。如果在某一地区突然出现了经济资源的短缺，地方党组织会与在莫斯科的相关领导联系，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推进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突然放弃了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领导权。但是在这一过程



中，他也改变了党这一重要的统筹力量的作用。而且，这一步骤是在《国有企业法》实施九个月、莫斯科的部长们减少了在苏联管理和统筹个体企业的范围以后采取的。

新的苏联体制要求政府立即担当起过去 70 年党所担当的角色。但是，在短时间内，政府能否有效地担当起这一职责，还不很明确。新当选的苏联领导人之间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在社会生活中要发挥统筹作用还有很大的困难。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在 1990 年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如下评论：

在我看来，过去两年造成我们的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委放弃了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而苏联政府又没有能力担当起管理的职能……同志们，这里出现了权力真空。^[28]

虽然苏联宪法中的第六条仍然保证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指挥权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党迅速放弃了这一职能。^[29]正因为党对社会的指挥权越来越弱，因此社会要求党从形式上放弃这一权力。在 1990 年 2 月，大约有 10 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放弃它在宪法上对社会的统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的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在 3 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其中大约 87% 的代表是共产党员，投票以 1 771 票赞成，264 票反对，74 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30]

也正是在 1990 年 2 月和 3 月正式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权力的两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总统享有权力的行政制度。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曾经被非正式地成为“总统”。现在，国会同意实行总统负责制，赋予总统很大的行政权力。这项制度中还包括了监督和平衡机制——总统可以否决立法机构的提案，而立法机关可以以 2/3 的得票率通过某一法令。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法律管理委员会，可以驳回违法的和违宪的国家法案，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劾。新的总统应每



五年由公众选举一次。当然，国会也同意了第一任总统人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31]

新上任的还包括 16 名“总统顾问班子”，和内阁差不多，是由总统任命的。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它完全独立于共产党之外。总统顾问班子看起来类似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在 1990 年 7 月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这种相似性得到了确证，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离开政治局而进入了总统顾问班子。^[32]和以前的政治局不同，由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中，除了《真理报》的主编外，其余全是党的专职领导而不是国家领导。它包括 15 个共和国的党的领导和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书记。^[33]确凿无疑的消息说，从此以后，政治局只领导党而不领导国家，领导国家的职能由新的国家议会和总统代替。

戈尔巴乔夫对于他的党的问僚，是怎样证明这种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和党的地位的变化，特别是从宪法上取消党对苏联社会的统治权力是正当的呢？他不承认这些变化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相反，他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发扬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是必需的。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面对由于党的权力的旁落而导致的代表们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呼吁“复兴共产党”，认为它可以“确证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可以“从总体上代表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理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说：“党应当正式放弃它代替政府组织去从事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仍然应该寻求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但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

我们相信 [党的] 先锋队作用不能强加于社会；这种作用只能通过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积极奋斗……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将实现它的政策，努力保持它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和要求，并通过选举而进入立法委员会的中心或外围。^[34]



民主化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的同仁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人民渴望民主和社会主义^[35]。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制度的民主化决不会给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带来危害。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戈尔巴乔夫得到民众支持的基础来自于党—国精英，因为是他们于1985年使他成为了党的领导。正因为党的等级结构和传统体制使得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所以，一旦他成为党的领导，他就可以得到党—国精英的支持。以这些精英的支持为基础，再加上党的强有力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就拥有了用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组织工具。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到1990年，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基础的党—国精英的支持，而且，他也破坏了在苏联保证他的强有力的权力的原有组织机构。由于党的原有的十分严格的纪律已经十分涣散，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党—国精英再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所推行的改革计划。由于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混乱，国家面临艰难的状况，要重新建立作为基础的民众的支持，也决非易事。而且，也不可能产生一种可以取代党来行使权力的新的工具。^[36]作为总统，戈尔巴乔夫可以拥有许多权力，包括对军队的领导，但是，他不打算通过军队来统治国家。他似乎是想把由党所正式行使的权力移交给苏联政府，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最高苏维埃，不久，他还将面对具有完全独立性质的苏联政府，包括越来越具有独立倾向的主要城市、俄



罗斯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

现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作为其基础的民众的支持而作出努力。同时，由于他所推行的改革，民主化了的各机构的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去想方设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在这种新的不稳定的局势下，那些亲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也可能联合起来，伺机夺权。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果，鲍里斯·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长，首先是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议会的投票，然后通过公众的投票。到1991年年底，从他被选举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开始，叶利钦就把戈尔巴乔夫抛到了一边，苏联垮台了，俄罗斯以全速向资本主义方向挺进。由戈尔巴乔夫所鼓动和领导的苏联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在他个人离开政治舞台和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失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中所起的作用，很容易遭人误解。叶利钦从作为苏联的一个部分的俄罗斯的领导人，到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领导人，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选举的直接结果。新的自由的选举在最后的权力争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们毕竟只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

任何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都不是通过选举实现的。1990—1991年出现的苏联社会革命也不例外。为了争夺到国家权力，叶利钦和他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除了要在新的民主化的苏联制度下赢得选举外，还必须做其他许多工作。就像保守派力图回到从前一样，他们也必须从政治上击败戈尔巴乔夫和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级别比叶利钦高，但是，保守派的代表们在苏联国家中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在1990—1991年间的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及其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所赢得的至关重要的最后胜利，是他们赢得了党—国精英的支持，这些精英分子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建设一个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由苏联精英分子所引起的惊人的权力变更过程。



[注释]

[1] 戈尔巴乔夫 (1988, p.18)。

[2] 戈尔巴乔夫 (1988, p.18)。

[3] 戈尔巴乔夫 (1988, p.22)。

[4] White (1990, p.3)。

[5] White (1990, p.3)。

[6] Robinson (1992, p.426)。

[7] Tolz and Newton (1990, p.48)。引自莫斯科广播电台 1989 年 1 月 26 日的新闻报道。

[8] Moses (1992, pp.485--486)。

[9] White (1990, pp.18, 24, 注释 177)。

[10] 例如, 1988 年 6 月进行的十分重要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 就是按照传统的方法由上面选派的。他们由地方的、省级的党委指派; 在较小的联邦共和国中, 则由联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选派 (Unger, 1991)。两年以后, 也就是在 1990 年 7 月的党的代表大会上, 这些成员都是全职的党的干部, 占了选举代表的 40% 以上。党代会的 49% 以上的代表都是在 1970 年以前入党的 (Chiesa, 1990, p.26)。

[11] White (1990, p.5)。

[12] White (1990, p.6)。

[13] 相互牵制的共产党和工会享有选出 100 名社会团体代表的权力。(Miller, 1993, p.113)

[14] 《真理报》, 1988 11-29, 1 版。

[15] Tolz and Newton (1990, p.123)。

[16] 从科学院被选进的激进改革派人物还有院士罗纳德·撒吉夫、经济学家尼科莱·切门里夫、尼古拉·帕阔科夫和帕维尔·本尼克 (Tolz and Newton, 1990, p.213)。

[17]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169-170)。

[18] Hough (1991, pp.257, 260)。

[19] Hough (1991, p.263)。研究范围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俄罗斯最大的 6 个省和它的 16 个自治共和国。“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包括受教育者、科学界、医学界、法律界和新闻媒体。



[20] Embree (1991, p.1069, 表1) 引用数字中的知识分子只包括以下职业: 教师、新闻记者、律师和法官、科学家和学者、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医生。除了以上职业外, Embree 也把工业和农业中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21] 这一发布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作出的, 接着, 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也作了证实。参见 Tolz and Newton (1990, p.329)。引自苏联塔斯通讯社, 1989年6月26日。

[22] Tolz and Newton (1990, p.348) 以及霍克 (Hough1991, pp.269 - 271)。

[23] Izvestiia TsK KPSS, 1989年, 第3期, 138页。

[24] 《共产党人》, 1988年, 第1期, 6页。

[25] Di Leo (1991, p.436)。Di Leo 写道: “矛盾正是在于: 造成这一状况的正是消失了的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pp.436 - 437)

[26] 利加乔夫 (1993, p.110)。

[27] 利加乔夫 (1993, p.110)。

[28] 《真理报》, 1990-07-06。

[29] 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有下面一段文字: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 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为人民存在, 为人民服务。”

[30]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232 - 234, 249 - 250)。

[31]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249 - 250)。第一任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 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感觉到有这种需要, 是为了避免在当时不稳定和混乱时期导致国家的分裂。

[32] Lane and ross (1994年, 上卷, 37页, 注22)。

[33] Lane and ross (1994年, 下卷, 54页, 表F)。

[34] 引自 Chiesa (1990, p.29)。

[35] 参看第八章中的民意调查。

[36] 参看 Miller (1993, pp.87 - 88)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七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众所周知，在 1989—1991 年期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 1991 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1]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左右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

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一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一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党一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一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在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2]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一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一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一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

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虽然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3]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4]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



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一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一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5]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200卢布~1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6]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7]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



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专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8]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临时补贴外，还拥有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领导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以做生意为职业的）。

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



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日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一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类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一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9]。

当然，既然党一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10]

改变自己信仰的惟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他们因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11]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一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



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惟命是从。

在 1991 年 6 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 7—1 就是研究的结果。^[12]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13]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 12.3% 的人被划分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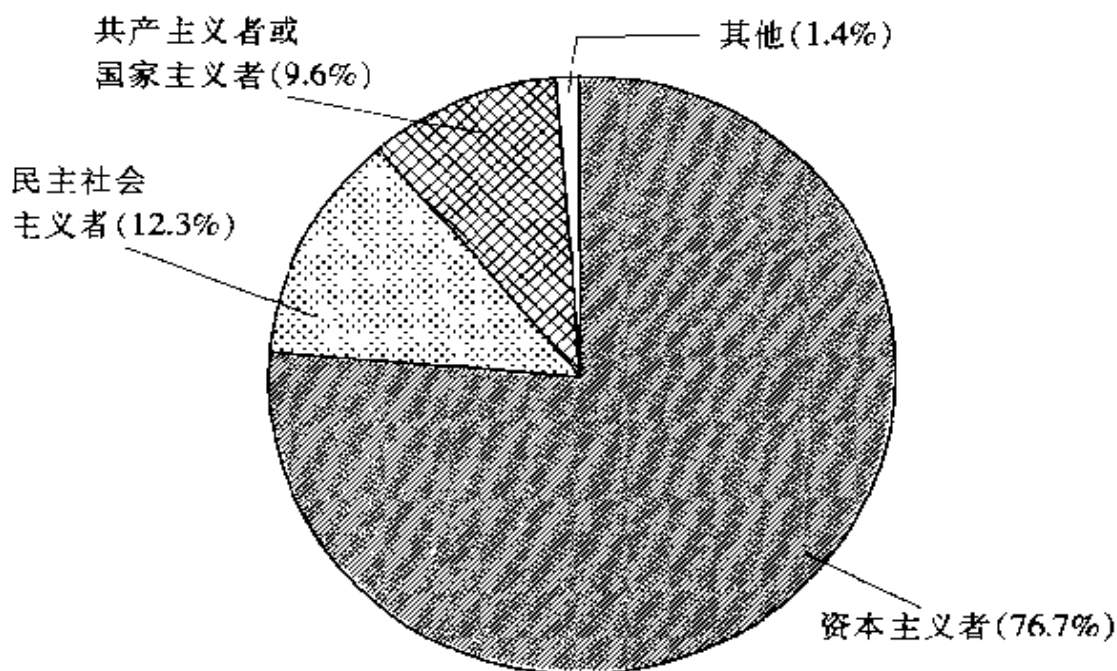


图 7—1 莫斯科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1991 年 6 月)

资料来源：Kullberg, 1994, pp.940 - 946.



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14]不到 10% 的人被划分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15]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 1987 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 1989 年到 1991 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1988 年关于合作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的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 1990 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在 1991 年末，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16]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维勒利·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



的典型代表。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冶金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后，来到了石油丰富的秋明地区（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的秋明大学当了一名物理学讲师。他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包括新的测量方法和监控装置。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到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赫尔默斯公司，资产达到5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了股票并进行日用品交易。^[17]

米克海尔·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通讯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的声学研究部门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开国家部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8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没有阻止他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些物品在国内被看作是民间药材，即使药用价值不高，但它给从事这一贸易的人带来的利润却是很高的。几年时间里，他就把这家小的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国际财团，变成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信用卡以及从事其他一些活动。^[18]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则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仅要求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求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



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惟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购买商品，然后再在苏联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可以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方面市场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开始通过在苏联的金或铂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

一个莫斯科研究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25.8%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2/3——也就是68.1%——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19]当然，由于这一研究是在莫斯科的所有私有企业中随机抽样的，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比较小或者说只是中型企业。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研究组对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企业进行了

调查。他们根据每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本的大小汇编了 100 家大企业的名单。研究者在进行文件研究的同时，对这 100 家企业都进行了走访。

图 7—2 是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 100 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图 7—2 中的四个方面——（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 100 家大企业的 62%。科学家只占了 15%，另外 5% 的企业创办者则被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为“天之骄子”^[20]——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为自己而工作。另外的 18% 是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混杂而成的（包括犯罪分子、失业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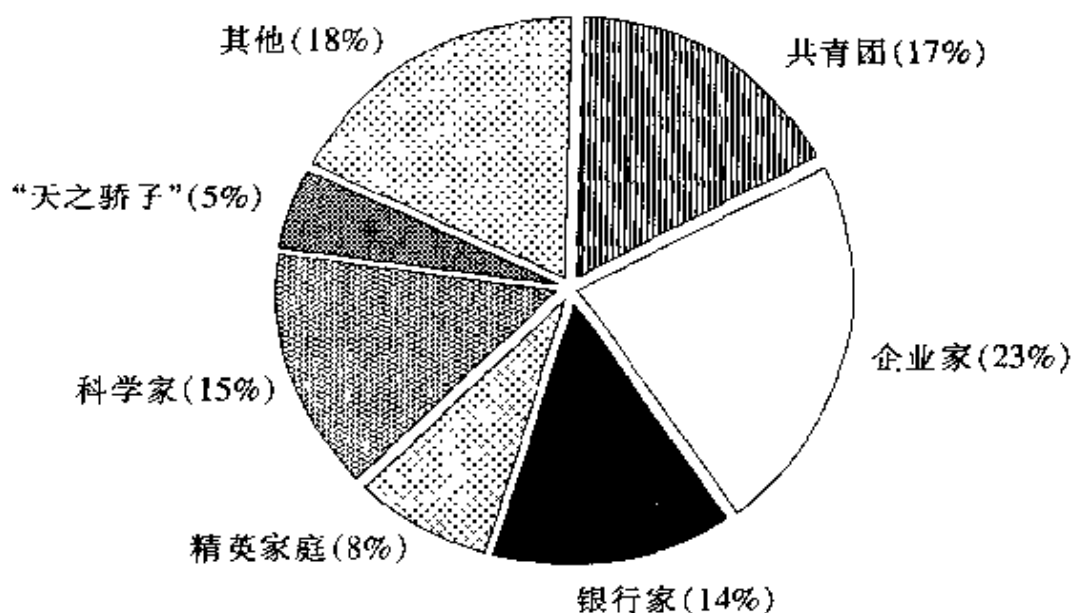


图 7—2 1992—1993 年俄罗斯 100 家最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

资料来源：Kryshtanovskaya, 1994b.



共产党的青年先锋队组织共青团，也是新的企业生长的温床。在苏联社会中，每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都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友谊，是一个人进入苏联官僚阶层的阶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青年”这一术语不应该作严格的限制——活跃分子可以在共青团组织中呆到40岁左右。共青团的许多活动，是由基于自愿劳动为基础的许多民间企业组织的。在共青团组织中，一个人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组织才能。

“理想主义”一词前面往往要加上修饰语“年轻的”，的确，年轻人的组织往往是要注入理想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共青团也不例外。在年纪较大的党—国精英以追求名利来代替理想主义时，这一过程在共青团中也同样发生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每月出版的杂志《特尔斐·柳笛》(Delovie Lyudi) (主要面向生意人)的出版者维狄姆·比雷科夫指出，共青团活动家“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乐意干任何事情”^[21]。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维克多·米罗连科是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可以从米罗连科身上略见一斑。共青团的书记，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他可以参加一些政治局的会议。1992年米罗连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后来“经济的观念”这一术语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关于十月革命的说法，把它看作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轮，它最终必然燃烧干净而且熄灭。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它完全燃烧干净。他给予英国前首相、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出自于年轻共和国的某一所大学，可是它却出自于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之口！^[22]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她还发现他们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在1987—1989年间，



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第一拨”，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其中一半以上的生意人是从被称之为科学技术中心的共青团中走出来，开始其人生生涯的。^[23]

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一部分人，是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一部分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56%）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90年。

大型私营企业中，有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原国有银行中的成员要么建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要么想方设法使原国有银行中受自己管辖的一部分私有化。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营企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占了总数的51%，那是在1990年。

新兴大型私营企业中，与精英分子有关的最后一类，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创办的企业，约占总数的8%。他们是由高于子弟建立的，一般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例如，与外交部的官员有关。这些人毕业于最有声望的教育机构，通过家庭旅游和国外的熟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他们进入商界很早，大多是在1987年。

从原来的党—国精英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共青团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外交部官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甚至苏联的内阁成员——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简单历程。

共青团员

梅纳特普银行是从共青团中冒出来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它的总部坐落在前共青团办公楼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间的人行道旁，这和它的身份再相称不过了。威武的警卫沿着走廊每十码远一字



排开。人们有时把它叫做“共青团银行”，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它的渊源。在一次访谈中，梅纳特普银行总裁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追溯了该银行从一个共青团企业到俄罗斯十大私有银行之一的演变。^[24]

1986年，哈多尔科夫斯基毕业于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次年成为一名共青团组织委员。他参加了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的创建，据他说，这是一个投资公司。1988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一个银行，由三个官方机构共同投资组建：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的一部分）、日索茨银行（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25]哈多尔科夫斯基没有个人资本，资金全部来自这三个注资机构。因而是党和国家的钱兴办了 this 银行。

一开始时，梅纳特普银行是市属财产，由莫斯科的一个区所有，利润归于银行的劳动集体。由于利润很高，三大注资机构的所有权很快就被银行买走了。1990年，银行重组为一个股份公司，1994年，其资产达到10亿美元。

梅纳特普的主要活动是金融交易，即在参与资本盈利的同时买卖金融资产。它还从事信贷和投资，虽然在俄罗斯动荡的经济局面下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梅纳特普还有第三个业务——私人融资，通过这一渠道，银行管理着大约2000名个体客户的资金。个体融资客户往往是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人声称，梅纳特普的许多有钱客户是有组织犯罪分子，尽管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无法证实。

当被问及俄罗斯新银行家和商人的出身时，哈多尔科夫斯基说：“90%的生意上成功的人都来自旧的特权机关，或者是那些与这些机关关系密切的人。”他认为，旧的干部选拔机制“还不错”，因为它允许那些有天分和精力的人步步高升。在他看来，共青团中这些天分突出、精力充沛的人成为成功的商人是很自然的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反常的事情上，他只顾追求资金盈利，那些比他更优秀的同事们，反而去给颠覆苏联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煽风点火。

这些年里共青团中还冒出了另一些私营企业。其中之一是莫斯特



银行，它是俄罗斯另一家大型的私有银行，除了共青团的背景，还得到了莫斯科市市长和市委的支持。^[26]费尼斯特银行是共青团投资7亿卢布创建的；它的董事长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以前曾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掌管着一家1987年从共青团中独立出来的私人职业介绍所，共青团曾给他提供了2万卢布的风险投资。恰如其分的是，青年企业家协会这个试图代表年轻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就是前共青团书记谢尔盖·坡塔彭科为首的。^[27]

实业家

尤里·阿德尔曼来自旧精英中的另一个群体。^[28]从机械工程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阿德尔曼在一座在苏联体制下十分受宠的机械制造厂迅速崛起。1975年，他从克拉斯诺达尔机械制造厂一名技工开始，逐渐升为第一工程师、副总经理，到1984年升任为该厂的总经理。1987年，工业部交给他克拉斯诺达尔机械设备建筑协会助理总经理的工作，他曾把这项工作形容成可以和某个部的副部长相媲美的好差使。他说，虽然他的职位已很高了，但每个月400卢布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克拉斯诺达尔远离莫斯科。当阿德尔曼听说莫斯科一座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即将退休，他便四处活动，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阿德尔曼自信心很强，对于如何管理一座工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990年，他利用苏联体制日渐松散的大好时机，把他的企业变成了雇员集体所有，并和上级部门脱了勾。两年后，他把这座成功的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自己拥有了31%的股权。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本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尽管到1993年俄罗斯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得任何制造业企业都很难盈利。

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石油和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基特·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



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按照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说法，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門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民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1985年期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尼古拉·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嘎兹普罗姆的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的第八名。^[29]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30]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名，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31]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7.5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32]

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



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33]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34]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35]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座次。^[36]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37]

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38]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39]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弗拉基米尔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40]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41]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42]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43]，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44]

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政客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一开始是以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



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有持不同政见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格雷柏·亚库宁神父。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反对派人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律教授和律师，而不是苏联党一国精英成员。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来自党一国精英。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研究队伍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均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在叶利钦的政府中，74%的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这和叶利钦的总统机构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45]在新的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内，格雷柏·亚库宁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过是典型的少数派而已。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少数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助益。除了众所周知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例子外，许多出身党一国精英的人也在改革最后几年走向了这一条道路，例如尤里·阿法纳瑟夫。

阿法纳瑟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题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逐步升迁到共青团高等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70年代中期，他任中央委员会文化部代部长。1985—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里负责。1987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46]

80年代后期，阿法纳瑟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要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鲍里斯·叶利钦、安德烈·萨哈罗夫一道，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机构内部开展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作斗争。1990年，阿法纳瑟夫成了创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物，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和个人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



夫从航空工业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的领导之后，1974年，他被调往设在莫斯科的航空部，1981年升任部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90年。

西拉耶夫突然加入反对派是在1990年6月。鲍里斯·叶利钦刚刚战胜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新议会主席，这实际上使叶利钦成了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脑。在安排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理职位时，叶利钦没有选择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而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人伊万·西拉耶夫。西拉耶夫在1991年初脱离了共产党，同年7月他就成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民主改革运动——的共同创办者之一。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已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实权的叶利钦任命西拉耶夫为管理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新委员会的领导人。

在回忆起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补充道：“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47]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经济管理者，而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 Volskiy）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中央委员会的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工业专业之外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种族冲突。^[48]

在1991年政变爆发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白宫（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所在地）给叶利钦。^[49]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机关头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讯设备”。^[50]

从此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51]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是一位内战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叶戈尔·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52]1987—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报纸《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他正在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它。^[53]1991年秋，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共和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国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对此我们将在第九章再作详细讨论。

结论

1987年左右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一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一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



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一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54]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别。它认为，苏联官员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替自己在新秩序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件在时序上不符。党—国精英抛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起始时间，要比通常的解释所说的时间早得多。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总理



尼古拉·雷日科夫在改革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帮助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甚至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他仍然接受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55]但是，党一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一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的惟一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时，他们给了这一联盟争夺政权的能力，但他们不是这一联盟的惟一支持者，也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地、最活跃地支持这一联盟的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足以构成单独一个团体。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转向亲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情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经济改革把个体经济合法化了，某些一度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买卖商品、过着各种非法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灰色经济从业者，一公开露面就成了富有的商人。他们自然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拥护者。^[56]那些有合法出身，但不是出身精英阶层的新业主——科学家、技术员、医生、牙医、甚至包括少数工人和农民——同样希望扩大自己私人商业活动的领域。整个新的私人业主团体，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给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资金渠道。

因而，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一国精英。^[57]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一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58]

[注释]

[1] 与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会谈（1992年10月19日）。



[2] 苏联政府官员尼古拉·雷日科夫对作者之一讲了这番话。雷日科夫曾经在许多有麻烦的地方工作过多年，如古巴和埃塞俄比亚。1991年7月，他在兹南尼亚担任共产党的一个教育机构的领导。几年以后，在叶利钦总统的政府中他是一个高级行政长官，而他的妻子在私人银行中工作。

[3] 与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会谈（1992年10月27日）。

[4] 《纽约时报书评》中有关《利加乔夫回忆录》（1993）的评论认为，利加乔夫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利加乔夫被认为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对者，对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不作任何改革的拥护者。一些人甚至把他当作一个脑筋转不过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在阅读了他的《回忆录》，包括史蒂芬·科亨（Stephen Cohen）为该书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序言”（利加乔夫，1993）之后，我们很难对利加乔夫还有这种看法。也可参见 Surovell, 1991。利加乔夫似乎赞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想法，但是他反对改革进行的速度，担心这样会摧毁整个制度，认为这样社会主义有被资本主义取代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1991年，虽然利加乔夫对事情发展的方向不满意，但他对1991年8月所出现的出乎意料的行动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支持。

[5] Folbre (1995, 表 1.6)。在 1993 年的美国，执行总裁的平均收入是 377.2 万美元，而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 25 317 美元，两者的比例是 149: 1。

[6] 科若梯奇（Korotich）的估算载于 Tolz and Newton (1990, p.58)。该估算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在 1989 年 1 月 31 日的一个报告。

[7] 这种收入的比较关系没有考虑苏联精英分子的特殊工作津贴。但是，这种特殊的津贴也不足以填平苏联精英分子和西方官员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

[8] Hough (1991, pp.276~277)。

[9] Hough (1991, pp.277, 276)。但是，该书又总结说，结果表明那是错误的，那种形式的革命似乎不可能发生。

[10] 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向支持资本主义，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物质上的私人利益。从 1975 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接下来 15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会使一些党—国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要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苏联党—国精英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转向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作过公正的比较。

[11] 当苏联及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即将终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首席军事顾问谢尔盖·F·阿赫罗梅耶夫于 1991 年 8 月 25 日自杀。在得知这一消息



后，熟悉阿赫罗梅耶夫的海军上将、苏联参谋部主席威廉·J·卡罗威评论说：“他想缓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紧张局势，但是他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纽约时报》，1991-08-26，13版）。钢铁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苏联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一面旗帜，它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亚力山大·萨维斯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被取消的时候，由于失望，萨维斯基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访亚力山大·萨维斯基，1994年6月7日）。萨维斯基指出车里雅宾斯克的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由于思想压力太大而死亡”。

[12] Kullberg, 1994. 图7-1中的“资本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包括卡尔伯格(Kullberg)称之为“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的两类人。她把西化论者描述为信仰“西方体制适用于全世界”的人。这一群体的成员表示“相信市场和私有财产在解决苏联经济危机中的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猛烈抨击”，并且“试图销毁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颠覆社会主义”。温和改革论者“也强调西方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制度，把它作为苏联社会未来的发展蓝图”。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一样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p.942）。温和改革论者和西化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张向资本主义作渐进的转变，更多地注意苏联社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性。卡尔伯格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所使用的西化论者和温和改革论者这两个词语都是指那些主张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来代替社会主义的人。在抽样调查中，西化论者占19.2%，温和改革论者占57.5%（p.941）。

[13] 这次抽样调查涵盖了中上层政府官员73人。包括军队官员、企业领导、莫斯科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外交官、经济学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独立党派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党—国精英，因为它包括一些我们本应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成员。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是科学部门的领导或项目经理”，也就是说，他们处于知识分子和党—国精英的边界线上（Kullberg, 1994, p.950, note 11）。在抽样中，63%的人是当前或以往的共产党员（p.930）。因为样本不是随机抽样产生的，卡尔伯格承认结果不具有统计意义，不能精确地说明莫斯科精英分子的各种观点（p.950, note 6）。

[14] 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坚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理念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社会哲学”（Kullberg, 1994, p.944）。

[15] 卡尔伯格（Kullberg, 1994）写道：“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过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除了带来伴随着经济的衰退的军事的衰退外，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任何好处”（p.945）。



[16] 约翰逊和科鲁尔 (Johnson and Kroll, 1991, pp.289~291) 对 1989—1991 年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向私有企业的转化, 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

[17] Androshin (1992, pp.28~30).

[18] Bastanova (1992, pp.82~83).

[19] Radaev (1993, p.8, 表 5)。其余 6% 的企业是由以前的白领阶层、工人、农场主或以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的人管理的。

[20]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 (1994b) 使用的是俄语 “samorodki”, 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就是 “天然金块”, 这里是指具有特别禀赋的人。

[21] 与维狄姆·比雷科夫的会谈 (1994 年 1 月 17 日)。

[22] 与维克多·米罗连科的会谈 (1992 年 10 月 23 日)。

[23] 克日斯坦诺夫斯基 (1994b)。

[24] 这里提供的有关梅纳特普银行演变史的材料, 来自于对我们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的访谈 (1994 年 6 月 14 日)。

[25] 哈多尔科夫斯基不只是帮助创建了梅纳特普银行。该银行在莫斯科的分部莫斯比兹列斯银行, 后来直接变成了俄罗斯最大的私有银行之一 (Kozlov, forthcoming)。

[26] 对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 (1994 年 6 月 15 日)。

[27] 有关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谢尔盖·坡塔彭科和费尼斯特银行的材料来自于: *Wall street Journal* 1992, P.A6. 有关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的材料得自莫斯科 “俄罗斯数据库”。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同时是青年企业家协会的理事会成员, 就像前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伊瓦罗夫那样。在俄罗斯的新兴私有银行和其他企业中, 到处都可以找到前共青团的核心骨干。

[28] 有关尤里·阿德尔曼的材料取自我们对他的访谈 (1994 年 1 月 19 日)。

[29] 对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 (1994 年 6 月 15 日); 《商业世界周刊》, 1994-08-08。嘎兹普罗姆以前曾是苏联国家天然气专营企业。1992 年后担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 就曾是它的负责人。

[30] 对根纳季·阿欣的访谈 (1994 年 1 月 20 日)。阿欣是一位研究俄罗斯精英的俄罗斯政治学家。苏联另一家最大的汽车制造厂 KAMAZ, 同样在此时的总经理的掌管下私有化了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 1994a)。

[31] 对帕维尔·M 的访谈 (1994 年 8 月 7 日), 帕维尔·M 是弗拉基米尔的高级助手。

[32] 《华尔街时报》, 1993-03-01, 9 版。



[33] 对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 (1994年6月15日)。

[34] 莫斯科俄罗斯数据库。

[35] Batsanova (1994, pp.28--30)。

[36] 《商业世界周刊》，1994-07-27, 5页。

[37] 对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访谈 (1994年6月15日); 《商业世界周刊》，1994-08-08。

[38] 《读者文摘》俄文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有关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该文试图消除这一印象：美国存在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

[39] 对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的访谈 (1994年1月15日)。

[40] 本书的一位作者——弗雷德·威尔和这两个人很熟。

[41] *Kto est' kto v Rossii* (1993, p.752)。

[42] *Delovie Lyudi*, May 1994, p.88。

[43] 这一趋势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苏联军队系统中没有出现过资本家，虽然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中腐败盛行并饱受非议。在所有的旧精英中，军队也许是受社会主义信仰浸染最深的，而军队生活的特征又易于淘汰掉那些受资本主义金钱腐蚀的人。

[44] McAuley (1992)。

[45]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 (1994a, table 9)。我们所用的“党—国精英” (party-state elite) 一词，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作“特权阶层” (nomenklatura)。她这一俄语的“nomenklatura”概念和我们所用的“party-state elite”概念，其含义是一致的。

[46] *Kto est' kto v Rossii* (1993, p.56); Hewett (1991b, p.248)。

[47] 关于伊万·西拉耶夫的资料，来自于 *Kto est' kto v Rossii* (1993, p.593); *New York Times*, 25 August 1994, p.14; McFaul and Markov (1993, p.303, note 6)。

[48] 有关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的资料，来自 *Kto est' kto v Rossii* (1993, p.147); Tolz and Newton (1990, p.51。该书引用的是塔斯社1989年1月28日的一篇报道)。

[49] 本书作者与伦敦《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翰·利奥德一道进行的访谈 (1994年1月28日)。

[50] Lohr (1993, p.828, note 13)。

[51]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426) 在独立后的俄罗斯，沃尔斯



基成了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是中间派政治势力“公民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52] 对弗拉基米尔·法米斯基的访谈（1992年10月26日）。法米斯基是莫斯科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他是盖达尔的学生，曾亲眼目睹过盖达尔在80年代的思想变化。

[53] 这里对盖达尔思想变化的记录，来自于本书作者与伦敦《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翰·利奥德一道进行的对盖达尔的访谈（1994年1月18日）。

[54] 例如，在1991年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或者调往该市主导企业钢铁厂，或者调往市政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钢铁厂以前的党委书记A. I. 斯塔利科夫，则担任了企业的厂长（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前党委书记亚历山大·萨维茨基的访谈，1994年6月7日）。新闻界对这种遍及整个俄罗斯的现象有过广泛报道。

[55] *Delovye Lyudi*, May, 1994, p.88. 不过，他后来辞职并重新进入了政界。

[56] 尽管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势力在改革年代里有所增长，但它仍然是有限的。所谓的“黑手党”在苏联体制的终结方面似乎也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不过，一旦该体制走到尽头，“黑手党”的经济影响力就大大增强，它们成了苏联之后的强大势力。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

[57] 这四个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是党—国精英的一部分。最重要的私人业主也来自精英阶层。然而，认为该联盟拥有这四个单独的支持团体还是不无益处的。

[58] 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同样赢得了普通工人的强大支持。然而，由于这一部分支持者很少希望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不应当把他们算在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支持者之内，和上述所言的四大团体并驾齐驱。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八章 权力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公开性、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人意料地在苏联引起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公开性把那些正在走向激进化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掌管苏联大众媒体的位置。经济改革在1988—1989年间开始引发严重的错位，此时请来出谋划策的主流苏联经济学家推荐的却是市场化和经济私有化，他们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经济改革同时使非国有商业企业合法化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富裕的个体业主阶级。苏联体制的大部分党—国精英，也开始放弃其社会



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出现了一场反对派运动，亲资本主义联盟得到了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个体业主以及越来越多的党—国精英的一致拥护。

苏联体制的政治民主化把权力从共产党手中转交给了新兴的国家机构，这些机构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主选举选拔出来的。这为反对派公开参与权力竞争创造了机遇。然而，亲资本主义联盟并不是轻轻松松就掌握了权力的。在它于1989—1991年间形成、其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初露锋芒时，它还必须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谋求其目标的实现。为了掌权，它不但要打败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派，还必须打败企图回到改革前的苏联体制的保守派鼓吹者。本章将历数这场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表明亲资本主义联盟是如何击败其对手并最终走上权力顶峰的。

要描述这场政治斗争的所有细节，恐怕写一本书都不够。在此，我们只能考察在我们看来对最后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最核心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叶利钦于1990—1991年间在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的崛起。第二个是1989—1991年间的矿工罢工浪潮，它大大增强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第三个是在最后几年席卷苏联的民族主义飓风，叶利钦及其盟友由此获得了不少的优势。最后，我们将考察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此次政变的失败迅速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那里转到15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15个新的国家（它们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所从事的，就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在追溯这些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楚：苏联体制迅速的、相对来说和平的终结，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国家的解体，都能通过亲资本主义联盟在政权斗争中获胜的过程得到解释。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

在多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之后，1985年4

月，鲍里斯·叶利钦被调往莫斯科，领导中央建设部的工作。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首都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他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眼里失宠是从1987年10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的，他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谴责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不久，他就被赶出了莫斯科市委的领导岗位和苏共政治局。^[1]在1988年举行的第十九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在电视镜头面前发表了一份不太体面的声明，要求苏共领导层为他恢复名誉，结果遭到拒绝。虽然未能再次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他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和国家高级干部。

要是在改革前，这样一种降级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但到了1989年，苏联民主改革的进展给了叶利钦一次重返政坛的机遇，虽然这是违反党中央意愿的。1989年3月，他当选为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那里，他成了迅速兴起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次年，他当选为刚刚改组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就戏剧般地退出了苏共。1991年6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

在俄罗斯人民眼里，叶利钦是具有相当魅力的。^[2]他是一位平民政治家，敢于挑战党内精英不公正的特权。在1986年早期的西方报纸中，叶利钦的名字也是铺天盖地，因为在那年的一次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对“给领导干部特殊津贴”和“乌兹别克斯坦集体腐败事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3]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经常喜欢遛遛街，见一见普通老百姓。叶利钦对特权的攻击在莫斯科家喻户晓，也招致了苏联精英们的嫉恨。

叶利钦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化。毕竟，这是他在政治生涯就要终结时得以再次崛起的最好机遇。1989年2月，亦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月之前，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选举一定要公开和民主。^[4]民主化对苏联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那些城市居民中。

叶利钦怀有某种程度的俄罗斯民族感情。许多俄罗斯人瞧不起苏联内部那些非斯拉夫民族，把它们看作是落后的、外来的民族。有人



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俄罗斯的负担，是各种援助的受益者，是苏联体制内部的特权产物。叶利钦呼吁给俄罗斯以更多的独立和自主，从而获得了这些具有民族情绪的人的衷心拥护。^[5]

然而，使叶利钦闻名遐迩的，还是他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鼓动。他埋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保守势力阻挠经济改革。开始时，叶利钦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经济学家们开始在1989—1990年间提出自由市场观念，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经济方案定位在市场改革上了。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鼓动，是他能够同时吸引住普通老百姓和党一国精英的关键一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极大地依赖市场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进行社会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市场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含义也不同。经济学家承诺说，市场改革将会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改革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他们讨厌特供品商店，讨厌精英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殊分配制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市场改革”一词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商店购买到同样的商品的体制。“市场改革”将会允许群众买到最好的商品。因此，这在普通苏联市民听起来，确实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所本该具有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最佳道路。

对于党一国精英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曾被迫去排让普通老百姓恨之入骨的长队，但他们有幸购买特殊消费品的代价也很高——这得靠不停地讨好上级才行。在党一国精英们看来，市场改革意味着摆脱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特权完全依赖于你所处的级别高低。一旦摆脱党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他们就有望更加放心地购买最好的消费品，只要有钱就行。

叶利钦的平民出身、民主倾向、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市场改革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有着广泛吸引力的。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另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则是叶利钦的反叛角色，他是摇摇欲坠的苏共领导层的最有名的反对派。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在

一开始时广受欢迎，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1988—1989年间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最高领导层的声望一泻千里。鲍里斯·叶利钦曾在党中央呆过，后来又被赶出来，如今正在想方设法重返权力高峰。这种反叛形象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

在第六章，我们曾经描述过叶利钦在1989年3月的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过程。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确实能够扮演一名重要的角色，但他的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但它的人口只占全苏联的一半。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很少支持叶利钦，他们支持的是那些忠于党中央的人。戈尔巴乔夫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组成常设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时，叶利钦在代表大会里的支持率有限就说明了一切。他并没有跻身于代表们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人当中。他在代表大会和莫斯科自由媒体中的支持者为他大鸣不平，于是戈尔巴乔夫同意为他在最高苏维埃中安排一个席位。^[6]

可见，叶利钦还必须仰赖他的主要对手——戈尔巴乔夫的垂怜，才能在全国性的最高苏维埃中获得一席之地。看来，要想通过苏联议会这条路走向权力顶峰是不行的。叶利钦认识到，捷径是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而不是联盟水平上的政府机构。1990年3月，俄罗斯共和国开始选举。选民将要选出改组后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代表，^[7]同时选出俄境内各城市的苏维埃代表。与前几年全苏性的选举相比，1990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要民主得多。在新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并没有给共产党或其他“群众组织”保留席位。所有的代表都必须通过竞选选出。叶利钦决定以他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为基地，参加此次选举。

在1990年的俄罗斯，叶利钦已是一位十分著名、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就能赢得选举成功。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个席位，而是当上大会的主席，这将使他成为苏境内最大共和国的主要首脑。^[8]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在选民中赢得比个人声誉更多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所有的苏联政治参与者（包括叶利钦），都是共产党员。但从这时期开始，却在党外兴起了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在选举和推动叶利钦步步高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月，民主俄罗斯选举联盟在莫斯科的早期选举团体中形成。^[9]它为莫斯科市苏维埃1990年3月的选举拟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同时支持这些候选人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以及俄罗斯其他市级苏维埃的选举。

“民主俄罗斯”是一场真正从基层起来的运动，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叶利钦相雷同，例如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和叶利钦一样，它也把共产党看作敌人，虽然开始时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支持者仍然呆在党内。比叶利钦更激进的是，它甚至公然强调俄罗斯的独立。^[10]

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选举运动中，民主俄罗斯可谓是风云一时。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中赢得了57%的席位，在列宁格勒1990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60%。但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角逐中，它的候选人却只赢得了20%~30%的席位。^[11]

叶利钦没有加入民主俄罗斯，甚至在一开始还反对它的建立。^[12]它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而叶利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曾把大部分黄金时间花在了当一名省委一把手上。叶利钦虽然反对党的领导层，但他也来自党一国精英。因此，他一直对民主俄罗斯持谨慎态度，这反映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中的两股主要势力——知识分子和原属党一国精英现在正走向彻底拒绝现行体制之路的那帮人——之间的松散关系。民主俄罗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能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工作者之外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本民族的人物。叶利钦则需要坚强的组织支持，而这恰恰是民主俄罗斯所能够提供的。

民主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只是选举。它还擅长在莫斯科组织群众游行。1990年2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就保证共产党政治垄断权的《苏维埃宪法》第六章的命运展开辩论，民主俄罗斯就在克里姆林

宫墙外组织了一次有 10 万人参加的游行，要求民主。^[13]这种发动大量莫斯科市民的能力，对于俄罗斯未来之战的胜败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新选出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成立后，叶利钦就开始向主席一职发起了冲击。民主俄罗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它也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能够一锤定音。不过，叶利钦还获得了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党一国精英的支持。投票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代表们发出警告说，叶利钦正在抛弃社会主义，但他的话并没能动摇大多数人。^[14]投票进行了四次，叶利钦最后还是于 1990 年 5 月 29 日以 4 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15]

叶利钦仍然和民主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任命任何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在俄罗斯部长会议里任职，也没有聘请他们中任何一个进他的私人顾问班子。^[16]作为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主席以及最大的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叶利钦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阵地，来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体制的领导层。两个月后，即 1990 年 7 月，叶利钦戏剧般地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和 1917 年俄国革命时相比，现在的苏联出现了两大权力相互对抗的格局，尽管俄罗斯共和国首脑的法定权力仍受掣肘。

1991 年 2 月，叶利钦成功地迫使苏联领导层给他提供一次在电视上表达意见的机遇。在电视讲话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抱有专制野心，要求他立即辞职。^[17]作为回应，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几百名被激怒的代表纷纷要求召开代表大会^[18]，撤销叶利钦的主席之职。

随着 1991 年 3 月的会议日益临近，戈尔巴乔夫禁止了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群众游行。为了对抗该禁令，民主俄罗斯组织了一次有近 10 万莫斯科市民参加的游行活动，以声援叶利钦。^[19]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形势显然对叶利钦有利。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与会共产党员突然变卦，把票投给了叶利钦。^[20]结果，大会与其说取消了叶利钦的主席一职，倒不如



说给了他额外的权力。会议决定在1991年6月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俄罗斯共和国的首任总统。^[21]

在竞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时，叶利钦强调的还是他以前一再依此获胜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快市场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因为1991年间苏联经济更加混乱，更加萧条了。叶利钦承诺要保护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运用他那俄罗斯议会主席的身份表明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态度，从而得以在政治斗争中扎稳脚跟。^[22]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的角逐，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军方人物，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由此不难看出叶利钦的竞选与共产党之间的暧昧关系，因为他这位竞选伙伴的身份是一个名叫“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23]

叶利钦必须依靠民主俄罗斯来组织他的竞选。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们承担了收集信息、组建竞选司令部、在全俄罗斯散发传单的大部分工作。^[24]叶利钦赢得了57%的选票，剩下的被其他五位候选人所瓜分，他们均强调更为渐进的经济改革、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等主题。^[25]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赢得了市长之位。

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不能解释为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不久将带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认可。叶利钦是在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这种意向时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事实上，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地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曾经在1985—1990年间担任过苏联总理、在1991年6月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叶利钦主要对手的尼古拉·雷日科夫事后抱怨说，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对他们所计划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只字不提”。^[26]尽管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公开鼓吹资本主义，但叶利钦和他的同僚并没有公开这样表示过。^[27]

怎样解释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改革现行体制何以会失败？没有一个好的说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虽然党—国精英和城市知识分子在1991年6月已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偏好，但各位参选人在总体上



所持的观点显然不同。民意调查显示，那时的俄罗斯民众大体上还不太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美国为基地的“时代测评中心”（The Time Mirror Centel）于1991年5月——即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调查者采访了1 123人，要求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个人看法的问题。其中最富启迪性的，是他们对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图8—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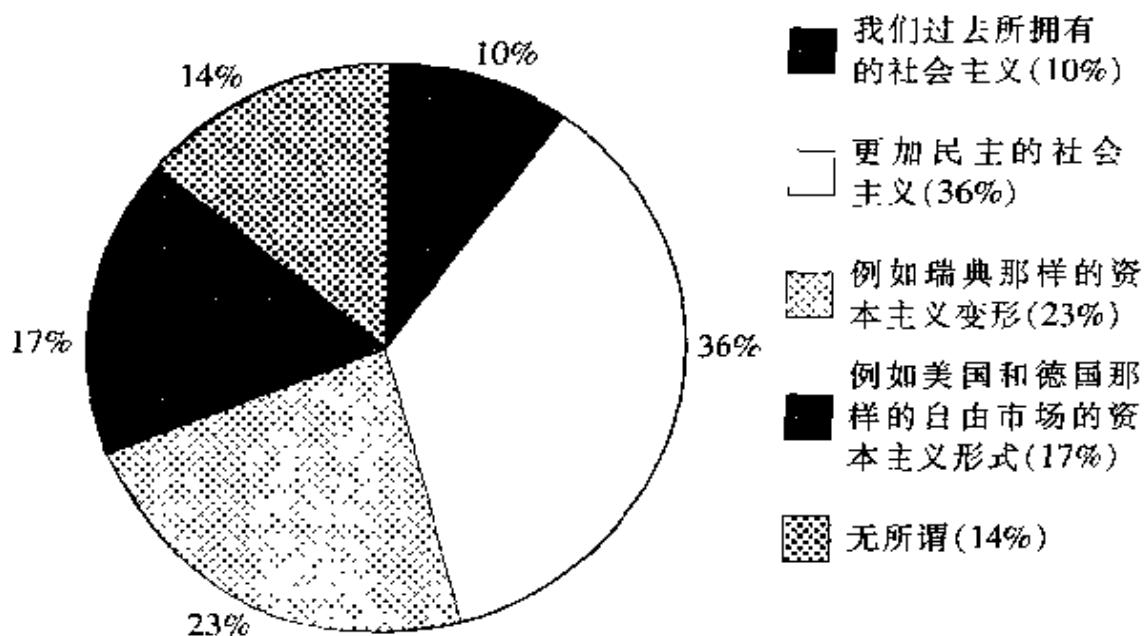


图8—1 俄罗斯属欧地区社会形式取向民意调查(1991年5月)

资料来源：The Pulse of Europe: A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Values and Attitudes, 1991: 50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共有46%的被调查者喜欢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把那些回答“无所谓”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人中就有多达54%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另有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瑞典模式，这是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工人权利、社会福利和个人经济保障的水平是其他西方国家望

尘莫及的。只有不到 1/5 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得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假如此次调查并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的意愿^[28]，那么其结果肯定也不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多大好处。^[29]1991 年开展的另一些民意调查甚至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更低的支持率。^[30]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 3% 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 喜欢银行私有化，20% 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足足 81% 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所。而与此同时，只有 30% 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却有 60% 的人表示不满意。^[31]这次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联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32]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某些俄罗斯地区，叶利钦所得的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33]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则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一国精英。正如第七章引述的精英们的意见所表明的，虽然一般的公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一国精英恰恰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坚强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带来这一切。俄罗斯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

济体系，他的权力和一位想在州内取消资本主义的加州州长是一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矿工罢工

在苏联，由于罢工不合法，因此当局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实际的罢工。但从1989年开始，苏联也出现了自1920年以来的首次工人集体闹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参加了1989—1991年的罢工和游行，但只有煤矿工人才屡屡举行声势浩大的类似活动，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首次矿工罢工浪潮起于1989年的7月，之后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第二次大型的矿工罢工发生于1991年的3月至4月。

苏联的煤矿工业拥有大约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量需求。^[34]虽然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也面临重重困境，包括住宿条件简陋、社会基础薄弱。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新的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1988—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罄。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10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35]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一些参与罢工的矿工组织要求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从而有权自行决定煤炭价格。^[36]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章。

苏维埃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1989年7月的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因



为官方的工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他们了。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37]

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秩序正日益混乱，局势正日益失控。罢工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轻易地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武装的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着这个阶级。

1990—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俄罗斯走到一起。^[38]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很少代表矿工的利益。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矿工罢工的领导人把苏联政府及其各部门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39]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3月至4月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共产党派别的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共产党施加了压力，却给叶

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继续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民族主义^[40]

苏联是 15 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 8—1 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 15 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 72.6%。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 17.6%。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 90.2%，在上地面积上更占了 97.6%。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 5.5%，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 2.8%，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 1.5%。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 14 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41]

表 8—1 苏联各共和国人口排名 (1991)

共和国	人口 (百万)	共和国	人口 (百万)
俄罗斯	148.5	吉尔吉斯斯坦	4.4
乌克兰	51.9	摩尔多瓦	4.4
乌兹别克斯坦	20.7	立陶宛	3.7
哈萨克斯坦	16.8	土库曼斯坦	3.7
白俄罗斯	10.3	亚美尼亚	3.4
阿塞拜疆	7.1	拉脱维亚	2.7
格鲁吉亚	5.5	爱沙尼亚	1.6
塔吉克斯坦	5.4	苏联总人口	290.1

资料来源: *Narodnoe Khoziaistvo SSSR* (1991, p.67).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 80 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 1991 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



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42]。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43]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44]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45]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46]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



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47]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48]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內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这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

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症”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49]——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50]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51]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52]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损害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53]——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家机关中占有不应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国的党和政府机构中，俄罗斯人也是高级职位的占有者。苏联周边共和国所发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



他们认为是俄罗斯人掌管的一切。

虽然俄罗斯人拥有这种种控制苏联的途径，然而在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受苏联体制的压制。列宁就老是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会威胁到苏联的完整，苏联体制的组织方式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心。与其他 14 个共和国不同，俄罗斯共和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它也是惟一个没有独立的科学院、工会组织、共青团和克格勃的共和国。为了替苏联人民建立一种全联盟的认同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压制。

随着苏联周边共和国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俄罗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这给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机遇。叶利钦给俄罗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浇油，一再重弹下述调子：在苏联，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商品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54]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刚刚一个月，民主俄罗斯就提交了一个法律议案，要求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实体，拥有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其自行通过的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55]叶利钦认识到了这个提议是他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的绝佳方式。尽管在苏联宪法中找不到这一法律议案的任何根据，叶利钦还是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在 1990 年 6 月 8 日以 544 票对 271 票通过了《主权宣言》。^[56]

虽然俄罗斯共和国缺乏支持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据，但它的《主权宣言》的通过对其他共和国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不管苏联体制被抹上了多么浓重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联盟的框架至少为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提供了安全和实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俄罗斯丰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应整个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共和国居然声称要掌握对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以前相对平静的共和国的领导层，现在也立刻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决定。到 1990 年 8 月，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过了主权决定。10 月，甚至一贯忠诚的哈萨



克斯坦也效法了这些榜样。在有些共和国，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眼看叶利钦已有能力取消苏联，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为，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走向独立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为乌克兰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曾专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作过斗争，倡导过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1989年末，乌克兰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其大本营是该共和国的西部地区。^[57]随着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随着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这位在1990年7月高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共产党人，现在为保住自己在乌克兰政权机构中的显赫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支持。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导，将自己打扮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而在苏联垮台后的乌克兰继续做他的领导人。^[58]

为追求俄罗斯主权并实现自己把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的诺言，叶利钦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举措。1990年9月，一个经济顾问小组提出了加快市场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计划”，对此我们已在第五章作过讨论。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叶利钦却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批准。^[59]叶利钦是无权在俄罗斯推行“500天计划”的，因此这种批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进一步造成了经济混乱，可谓是给苏联雪上加霜。现在，苏联和它最大的共和国通过了相互冲突的法律，这既牵涉到经济重建，也关乎所有权关系的未来。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叶利钦向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次仍属大胆的攻击。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共和国征取的税收约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60]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长，通货

膨胀进一步加剧，苏联 1991 年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

俄罗斯《主权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国类似的决定发布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保住苏联，就必须在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治的基础上重建苏联。他开始启动一项新的联盟条约谈判进程。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计划了一次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他相信解体过程并没有反映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决于 1991 年 3 月 17 日举行，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1.47 亿，76.4% 的票数赞成保留苏联。^[61] 九个参加投票的共和国中，同意该法案的人都占了压倒性的多数。^[62] 戈尔巴乔夫因此可以大声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联盟国家是民众鼎力支持的。苏联经济内部依赖程度极高，谁都知道解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在那些贫穷的共和国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从联盟关系中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好处。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缩小成原来的一半大，抛开 2 500 万俄罗斯同胞（几乎占了全部俄罗斯人的 1/5）不管，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而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63] 许多人确实希望自己的共和国有更多的自治，但 1991 年 3 月的全民公决却发现，在九个参与投票的共和国中，只有极少数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国成为独立之国。

然而，尽管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势力在作祟。戈尔巴乔夫和革新后的联盟国家不只是代表了联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留。戈尔巴乔夫是把各个共和国拉到一起的关键人物，他拒绝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不允许它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叶利钦及其同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64]，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成了拦路石。虽然在许多共和国里掀起的民族运动确实反映了民众的感受，但如果没有亲资本主义联盟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并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决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



的，是俄罗斯自己 1990 年 6 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

1991 年 8 月政变及其后果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和联盟政权的最后失败，是由 1991 年 8 月末遂政变划上句号的。末遂政变进一步增强了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它促使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其中大多数早就在谋求独立了——走向了独立之路。

这一年的 8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苏联政府八位最高领导人组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他们偷偷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他的别墅里，宣布苏联处于紧急状态。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议会领导层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变。几天之后，政变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然而，权力现在已完全从戈尔巴乔夫和联盟政府手里转到了叶利钦之手。四个月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他 14 个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1990 年春夏和初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已走人死胡同。鲍里斯·叶利钦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要求苏联采纳“500 天计划”，而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盟政府权力消蚀息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阻止这些相反趋势的发展，1990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更换了他的政治盟友。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于该月站出来反对“500 天计划”。他公然抛弃了他那些更富自由色彩的顾问，例如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而转向那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

成保留联盟、主张维持社会秩序的显然更为传统的人。^[65]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鲍里斯·普戈为内务部长，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在总理雷日科夫1990年12月得心脏病之后，戈尔巴乔夫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接替他的位置。这三个刚刚被任命的人都是所谓的“强硬派”。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用辞职和提出专制的危险正在来临的警告来作出回应。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议会，他将行使总统权力指责立陶宛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秩序”^[66]。不久之后，苏联内务部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各种政府建筑，而这些行动，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表示过支持，也没有加以谴责。

1991年3月初，戈尔巴乔夫突然向赞成资本主义的大股势力发动进攻。他攻击“民主派”是“典型的右翼反动派”，指责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社会道路”^[67]。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在1991年3月这个月，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再一次发生的矿工罢工，破坏了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撤消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主席职务的企图给自己惹火上身，反而使叶利钦的地位更巩固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惟一的亮点是该月的全民公决得以通过。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看到自己斗不过叶利钦，便再次改变策略，但这次更让叶利钦得势了。

现在，叶利钦优势在握，或者也许是考虑到3月全民公决对联盟的认可，他提议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举行谈判。戈尔巴乔夫接受提议，于是“9+1”谈判开始了。^[68]1991年4月23日，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它将在保留某种联盟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各个共和国以实质性的权力。^[69]叶利钦因此放下了原来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现在，戈尔巴乔夫又把进攻的矛头从“民主派”指向了“强硬派”。1991年7月，他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党章程》草案，从而激怒了保守派。^[70]这个月之后，联盟条约谈判在新条约的具体细节上达成一致。没有参加谈判的六个共和



国之一的亚美尼亚，宣布它也希望重新参加谈判。新条约的签订准备于1991年8月20日举行。

1991年8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即将到来的联盟条约的签订。看来，政变策划者只是在宣布政变的前两天才开始聚会的。^[71]他们把联盟条约看作是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政变领导人除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之外，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有：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秘书博尔金。

为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变领导人同时指出，他们将制止向资本主义下滑的趋势。他们谴责“奸商越来越多”，认为“人民应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当存在，但他们的这种权利正在受到剥夺”。他们呼吁保护劳动人民工作、教育、保健和居住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共产党。^[72]他们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党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的。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

在政变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正如他们在政变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们将尽力向苏联人民保证奉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支持经济多样性，包括“私营企业”的作用。政变领导人之一、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政策是不可扭转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向报道者保证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政策将会继续下去。”^[73]

然而，不管政变领导人试图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如何，政变在苏联还是被理解成复辟旧的、改革前的体制的图谋。由于他们已经把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第一鼓吹人戈尔巴乔夫总统撇在一边，他们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护伞了。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高级官员参与政变，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一次企图回到旧体制的阴谋。

紧随政变领导人企图掌权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1991年8月时三大阵营的力量平衡，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上，它们所



持的观点各不相同。鼓吹回到旧体制的那班人，他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发现应者寥寥，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还是在党—国精英中。虽然在苏联的大多数地方，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外，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但也没得到什么积极的拥护。苏联第二和第四大共和国的领导人——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坦·纳扎尔巴耶夫——采取了观望态度。一旦强烈的、决定性的反抗在莫斯科出现，政变领导人在采取坚决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定就暴露无遗，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在号召党—国精英复辟旧体制这件事情上，政变彻底失败了，而这正是群众不再需要这种体制的最终表现。

尽管有证据表明，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变革方向在大多数老百姓那里十分走俏，但它的积极支持者还是发现自己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一样不受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虽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但它从来就没有激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一直坐视不理。即使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也没有掀起过一丝丝反对政变策划者的波澜。

然而，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立刻就从他们位于首都的大本营里站出来反对政变。叶利钦站在装甲车里，宣布政变是一次非法的行动，威胁说政变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74]他呼吁举行一次反对政变的大罢工。^[75]在“白宫”即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少数武装部队也抵达这里，受命保卫俄罗斯议会。保卫“白宫”的人数一开始据说只有2万，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大游行。^[76]这似乎是鼓吹即将在该国实行的体制的最核心的力量了。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告诉群众：“我们或者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活着，或者我们继续让自己做着‘社会主义选择’、盼望着‘共产主义前景’，活着却像猪。”^[77]已经离开戈尔巴乔夫阵营的、曾任其高级助手的雅科夫列夫和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加入了白宫前的集会。^[78]一位俄罗斯商人说，一些俄罗斯新资本家参加了这次冲突，他们雇用保安人员帮助维护了8月19日白宫外的游

行。^[79]从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主席以来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阵营，现在终于公开决裂了。保守派掌握了联盟国家的舵，而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则以俄罗斯共和国为营相抗衡。实质上，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倒成了旁观者。

面对叶利钦及其盟友的挑衅，政变领导人未能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政变开始时，他们没有逮捕叶利钦，也没有向他的大本营所在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发动进攻。他们甚至没有控制国内的一切通讯工具，让反对者组织起来为所欲为。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失误归结为无能。然而，很难相信一个由苏联政府、部队、安全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组成的一帮人，居然无力完成相对简单的、关乎政变成功与否的组织工作。

显然，政变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在党一国精英内部孤掌难鸣。甚至在行动前，他们就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下定决心：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体制垮台的趋势，否则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显然希望戈尔巴乔夫参加进来，赋予他们的行动以合法性，也希望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开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圈外人的任何有力的支持。一旦认识到他们有多么孤立，他们就只有放弃了。普戈选择了自杀，其他的人则坐以待毙。

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处释放出来并回到莫斯科继续掌权——或许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他谴责了政变组织者，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代表们帮助他镇压了政变。他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誓要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势力”^[80]。

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一国精英中所受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不管的时机已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他降下苏联国旗，升起了传统的俄罗斯国旗；暂



停了共产党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81]几天之内，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共产党领导人职务，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之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82]实际上，联盟政府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83]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了俄罗斯的后尘，在各自的权辖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简单地换成大众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84]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接着和另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旧



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85]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86]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的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



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大国，例如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87]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到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



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共产党 70 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 1991 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一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本主义联盟现在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而，狂喜的俄罗斯新领导层根本就没想到，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坎坎坷坷。

[注释]

[1] 围绕叶利钦离开最高领导层事件，曾发生了一些争论。在 1987 年 10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式上，叶利钦作了一次事先并未安排的讲话，并引起了一阵混乱。据说，叶利钦的讲话批评了改革进行的方式，同时点名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叶戈尔·利加乔夫。接下来的一个月，叶利钦被赶出了领导层。关于这次事件的两个主题都有争论。一个是他所抱怨的有关改革进程的问题。那时有报道说，叶利钦反对改革的步伐太慢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75~76, 79)。随后的几年这也确实成了叶利钦关注的重大问题。但约纳坦·斯蒂勒 (Jonathan Steele)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却宣称，叶利钦在那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呼吁放慢改革步伐” (Steele, 1994, p.237)。官方关于叶利钦讲话的文件发表于叶利钦自己的著作中 (Yeltsin, 1990, pp.144--147)，对上述两种解释都认可。关于叶利钦是自愿辞职，还是被迫辞职，也有各种争论。常见的观点是，

叶利钦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就已经递交了辞去莫斯科党委一把手的申请，而在会议期间，他又递交了辞去政治局委员的报告。但讲话之后，他既在中央委员会，又在莫斯科党委会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大家都以为他是被赶出领导层的。

[2] 这里使用“俄罗斯”一词，而不使用“苏联”一词，其原因是叶利钦已变成一个特殊的俄罗斯政治人物，他的形象和受欢迎度，在俄罗斯之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和在俄罗斯完全不同。

[3]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31~22)。后来，当叶利钦成为独立后的俄罗斯总统时，他的批判者就拿他这些早期讲话和他此时众所周知的爱好享受、容忍腐败相比较。

[4] 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一章所看到的，当上独立后的俄罗斯总统两年后，叶利钦这些冠冕堂皇的民主言论就彻底失去了光泽。

[5] 在1990年3月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拉选票时，他说：“我们必须使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更加独立。”(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245)

[6] 一位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为了给叶利钦腾出位置而辞职，戈尔巴乔夫的安排才得以进行。鄂木斯克市一所大学的法律系讲师阿里克西·卡扎尼科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叶利钦。大会主席戈尔巴乔夫迅速安排了一次投票，同意这种替换，叶利钦才得以增补进最高苏维埃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182~183)。

[7] 和新选出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改组后的俄罗斯议会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是常设的立法机构即最高苏维埃。除了有必要特意区分开这两个机构的情况外，本书一般笼统地使用“议会”一词。

[8]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224~246)。

[9] Brudny (1993, pp.143~144)。

[10] 1991年初，民主俄罗斯公然要求解散苏联。它曾（并未成功地）极力劝说叶利钦在该年举行的就是否保存苏联的全民投票中投反对票 (Brudny, 1993, pp.151~152)。

[11] 布鲁德尼 (Brudny) 估计，在1990年3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民主派”最多只占30%的席位 (Brudny, 1993, p.145)。也有人估计，和民主俄罗斯有关的候选人赢得了“20%多的席位” (White et al., 1994, p.285)。由于民主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拥有党员名单的正式党派，因此很难准确地判断出到底有多少议会代表和它联系在一起。



[12] Brudny (1993, p.146).

[13]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232 ~ 233)。随后有统计认为,这次游行的人数超过了 30 万 (Hewett and Winston, 1991b, p.518)。

[14] Miller (1993, p.152).

[15] Sakwa (1993, p.6).

[16] Brudny (1993, p.146).

[17]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343 ~ 354)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戈尔巴乔夫似乎要从他的随从和助手中赶走那些持快速改革观点的人,而转向与倡导缓慢变革和采取有力步骤保存苏联的人合作。

[18] 这是俄罗斯议会中的高级机构,即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它有权改换最高苏维埃的现任主席。

[19]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351 ~ 352)。民主俄罗斯能够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里组织起拥护叶利钦的游行,但它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的实力有限则被这些地方的参加人数所证实。在雅罗斯拉夫尔和伏尔加格勒,参加游行人数估计有 1 万人,在图拉只有 6 000 人,斯摩棱斯克只有 1 500 人 (Brudny, 1993, p.151)。

[20]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354)。

[21] 设立俄罗斯共和国直选总统的计划,开始时没有争论,在 1990 年 6 月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在 1991 年 3 月全民投票的初期,俄罗斯共和国的选民中也有近 70% 的人赞同这一计划。

[22] Urban (1992, p.192)。

[23] White *et al.* (1994, p.288)。在俄罗斯议会 1991 年 3 月会议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带领一帮人脱离了反对叶利钦的俄罗斯共产党,加入了议会中拥护叶利钦的阵营 (Urban, 1992, p.189)。

[24] 1991 年 4 月,民主俄罗斯声称自己在全俄罗斯拥有 130 万党员 (Urban, 1992, p.191)。

[25] Brudny (1993, p.152), White *et al.* (1994, pp.288 ~ 290)。

[26] 参见尼古拉·雷日科夫访谈录,1992 年 10 月 27 日。著名的苏联评论员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曾电视采访过叶利钦的竞选主席、也许是他最亲密的顾问和最重要的战略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按照雷日科夫的说法,当波兹涅尔问布尔布利斯,叶利钦是否真的喜欢资本主义时,布尔布利斯没有直接回答。

[27] 叶利钦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自己的整个方案持谨慎态度的革命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时向古巴人民许诺的，也是一场民族的、渐进的革命。成功的革命者往往只有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民众对整个方案的支持。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讨论叶利钦在这方面是否做得成功。

[28] 苏联第二大城市，1991年后更名为圣彼得堡。

[29] 此次民意调查超出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居民的范围。回收问卷清楚地表明，这两大城市的居民比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加偏爱自由市场和私有化。此次民意调查也没有包括俄罗斯属亚洲的地区在内，这些地区的居民一般来说更为保守。

[30] White (1992, pp.249~250). 该书引用了1991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只有3%的人希望俄罗斯共和国变成“原原本本的资本主义”。民意调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随着提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从来就没有人报导过某项遍及整个俄罗斯的、发现那时大多数人拥护资本主义的调查。

[31] 《欧洲潮》(1991, pp.88~90, 120, 139)。

[32] 假如人民已经认识到了叶利钦最终要把俄罗斯带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他们在1991年6月的选举中投的票就会完全不同。选举结束18个月后，即1992年12月，一项针对俄罗斯选民的研究发现，那些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中投了赞成票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愿意再次投他的票。到1992年12月，俄罗斯人民已经走过向资本主义转变的12月了。研究发现，那些不再支持叶利钦的人的特征之一，是对一种允许个人财富过度积聚的体制持反对态度 (White *et al.*, 1994, pp.294~295)。

[33] White *et al.* (1994, p.290)。

[34] Rutland (1991, p.291)。

[35]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190)。

[36] 一位来自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罢工领导人声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一种合理的煤炭批发价格。因此，我们把自己的绝大部分利润拱手送给了国家”，这使得矿工们“一直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他补充说：“当我们能够撇开国家机构获得一种合理的煤炭批发价格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谈论真正的独立性了。”（《加拿大论坛》，1989-09-04，12页）

[37] 几天之后，苏联政府同意了这种移交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p.360~361)。

[38] Rutland (1991, p.311), Filtzer (1994, pp.101~108), Clarke *et al.* (1993, ch.7)。虽然许多矿工领导人和叶利钦结成了联盟，但并不是所有的矿工

都是叶利钦的支持者。1991年5月，科勒莫夫的矿工们举行了一次集会，口号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穿同一条裤子的两个人”(Urban, 1992, pp.203--204)。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在库兹巴斯的得票数少于另一位候选人A.图列夫，后者是本地苏维埃和矿工自己的领导人 (Clarke *et al.*, 1993, p.167; White *et al.*, 1994, p.290)。

[39] Clarke *et al.* (1993, p.163);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361)。

[40] 罗纳德·桑尼 (Ronald Suny) 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 (Suny, 1993)，给本部分的分析提供了极富教益的启示。

[41] 1989年，俄罗斯人占了哈萨克斯坦人口的38%，而哈萨克人占的比例也只有40%。在拉脱维亚，俄罗斯人占34%，拉脱维亚人占52%。

[42] Lewin (1995, p.271)。

[43] Hobsbawm (1990, ch.1), Suny (1993), Gellner (1983)。

[44] Suny (1993, ch.3)。

[45] 此外，俄罗斯共和国本身也具备联邦的形式，内部拥有16个依种族划分的“自治共和国”。桑尼 (Suny, 1993) 认为，苏联的联邦形式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克早期民族思想的违背，这种思想主张，虽然少数民族应当有权脱离国家，但对于那些自愿留下来的民族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只应当具备统一的、而不是联邦的特征。

[46] 甚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1917年以前也没有独立过。

[47] 1897年时，讲白俄罗斯语言的人只占后来成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明斯克的人口的9%。大多数人讲意第绪语。在毗邻的立陶宛，那时有40%的维尔纽斯人口是犹太人，31%是波兰人 (Suny, 1993, pp.31, 36)。

[48] Suny (1993, pp.40, 43)。

[49] 许多亚美尼亚人对苏联当局无力处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归属问题而深感怨恨。

[50] 要求主权就意味着在仍然留在苏维埃联盟中的前提下要求把重大的国家权力转交给共和国一级。

[51] 除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1990年4月的共和国选举也产生了由赞成独立的多数派组成的议会 (Miller, 1993, p.157)。

[52] 苏联最高苏维埃1990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在投票决定共和国是否脱离苏联时，必须有2/3的赞成票数 (Miller, 1993, pp.157, 235, note

36)。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用投票的办法决定共和国立法是不够的。

[53] 在这点上倾向于独立的其他三个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拥有苏联 4.6% 的总人口。

[54] 参见 1992 年 10 月 27 日对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访谈录。

[55] Brudny (1993, p.145)

[56]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274-276).

[57] 乌克兰西部地区已经非常俄罗斯化了，虽然东部地区程度稍轻。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以前曾是波兰的一部分。

[58] 《纽约时报》，1991 年 08 月 30 日，1 版、11 版。

[59]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299).

[60]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332).

[61] 提问的话是这样的：“你是否支持保留革新过的联盟，它由各主权共和国组成，在其中，每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都将得到充分保证？”（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348; Suny, 1993, p.150）由于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积极反对全民公决，这两个地方的赞成票数分别只有 50% 和 50.6%（Brudny, 1993, p.152）。

[62] Karasik (1992, p.400)。在乌克兰，“同意”票数为 70.2%；在俄罗斯，“同意”票数为 71.3%；在白俄罗斯，“同意”票数为 82.7%；在阿塞拜疆和所有的中亚共和国，“同意”票数均超过了 90%。

[63] (Miller, 1993, p.186).

[64] 在其他一些共和国的领导层中，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民族运动不仅谋求独立，而且谋求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65] Surovell (1994) 曾对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期“向右转”作过有趣的分析。

[66] Miller (1993, p.173).

[67] 《真理报》，1991-03-01，2 版。

[68] “9+1”是指愿意参加新联盟条约谈判的九位共和国领导人，加上一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剩下的六个共和国——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没有参加。

[69] Hewett and Winston (1991b, p.531)。条约同时也暗示，六个没有参加谈判的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

[70] 在向党代会提交这份章程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试图靠这些话平息保守派的愤怒，他说“党应该表达和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他向代表们保证“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在社会生活方面和社会主义结构保持一致”。但他又进一步抛弃了许多使改革进程得以延续的传统共产主义立场。例如，他承认在章程草案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共产主义，因为他否认共产主义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确实是能够实现的”

[71] 不过，有些分析家认为他们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密谋政变了 (Miller, 1993, pp.176-177)。

[72] 《纽约时报》，1991-08-20，A13版。虽然他们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但该声明是十分谨慎的，实际上并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一词。

[73] 《纽约时报》，1991-08-20，12版、13版。

[74] 最初的新闻报道证实，叶利钦在上面发表他措辞激烈的反政变演说的交通工具是装甲车。但随后的报道为了造成戏剧性的效果而把它换成了坦克。请对照随后的报道与《纽约时报》，1991-8-20，A1版。

[75] 然而，叶利钦此时还无力唤起工人阶级，也得不到社会主义改革支持者的拥护。大罢工没有举行。在此关头，俄罗斯的大部分工人仍然坐视不理。

[76] 《纽约时报》，1991-08-20，10版。至于1989—1991年间莫斯科的其他游行，人数在随后的报道中均有所夸大。

[77] 《纽约时报》，1991-08-22，A14版。

[78] Miller (1993, p.181)。

[79] 参见1994年2月12日对俄罗斯贸易委员会主席坎斯坦廷·波罗沃伊的采访录。按照美国苏联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 (Marshall Goldman) 的说法，在白宫之外的人群中出现的“新企业主人数量令人惊奇” (Goldman, 1994, p.27)。

[80] 《纽约时报》，1991-08-23，A1版、12版。

[81] 其间富有讽刺意味：政变是苏联国家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发动的。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用一项永久取缔共产党的法令取代了他前面的暂停其活动的法令。

[82] Gwertzman and Kaufman (1992, p.446)。

[83] 1991年12月1日，几乎有90%的乌克兰投票者在全民公决中赞成独立 (《纽约时报》1991-12-03，A1版)。没有乌克兰这个人口第二、苏联谷物产品主要产地的共和国参加，联盟就是不可能的。

[84] 《纽约时报》，1991-09-18，1版。

[85] 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十章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为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的新体制下也过得并不好。

[86] Garraty and Gay (1985, pp.1028--1031).

[87] 在我们看来，虽然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图谋是导致苏联终结的首要因素，但其他的离心力也曾在这一时期的东欧和苏联起过作用。一个现代的大型民族国家要想稳定，似乎需要某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凝结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被证明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东欧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垮台，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不能立刻发展起来，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内聚力强的经济体制的缺乏，助长了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分崩离析的趋势。

第三部

苏联解体之后





导 言

苏联 1991 年 12 月 31 日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继承者。^[1]俄罗斯大致拥有苏联国土的 3/4，其人口的一半。在继承苏联之后，它仍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比世界上第二大国家多 70% 的疆土。俄罗斯拥有苏联绝大部分宝贵的原材料、大部分工业基地。根据条约，它将是苏联后继国家当中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毫无疑问，俄罗斯也将占有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其他 14 个苏联后继国家并不重要。乌克兰有 5 200 万人，有些地方是苏联最好的农业地区和重要的工业基地。哈萨克斯坦在国土面积上是第二大后继国家。它是美国德克萨斯州面积的四倍，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俄罗斯在苏联地区占有绝对优势。该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发生了什么。本书关于苏联垮台的最后一章，将在俄罗斯上面多着笔墨。

纵观俄罗斯独立以来的这些年，经济陷入极度困难，政治冲突加剧，对抗此起彼伏。叶利钦总统 1993 年 10 月下令炮轰议会，从而使政治冲突达到高峰。随后的平静转瞬即逝。1993 年 12 月的选举标志着共产党从其两年前的奄奄一息重新复活。在经历两年多的经济萧条以及与车臣的野蛮战争之后，1995 年 12 月，共产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成了主导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在俄罗斯的重新掌权似乎也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几年的政治冲突逐渐地淡化了俄罗斯人民 1991 年末开始独立时普遍具有的相对平静的心境。俄罗斯刚刚独立时，最突出的事实就是精英们在政治上的普遍一致。叶利钦及其追随者控制了国家的所有重要机构，一开始时他们也确实没有遇到强劲的政治对手。叶利钦是一



位民选总统。议会，特别是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在俄罗斯从其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特殊地位中继承过来的制度下，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权力。但它的主席是叶利钦精心挑选出来的继承人——鲁斯兰·哈斯拉托夫。1991年8月政变时，哈斯拉托夫站在叶利钦这一边，保卫白宫，反对政变。这个议会也正是在1991年选举叶利钦为主席的同一个议会。俄罗斯独立两个月前，即1991年11月1日，该议会以绝对多数票授予了叶利钦总统执行经济改革的立法权。^[2]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第三个部门，即宪法法院，同样操纵在叶利钦一派人的手中。

此时俄罗斯权力结构中的一致性，是它的精英们在有关经济和政治变革路线的问题上取得广泛一致的产物。他们想扫除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骸，并用一种多多少少是西方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取而代之。^[3]这也正是叶利钦孜孜以求的。作为一个组织的共产党已被取缔，它以前的大多数干部现在也在新的秩序下谋取职位。企业主管们为他们的私营企业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能否成功忧心忡忡，但也禁不住被即将成为私营企业主而搞得神魂颠倒——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看到的，有人早已经通过“自发的”私有化获得了这一称号。

国内的反对确实也存在，但直到1991年末，这种反对还是零星的、无关紧要的。个别的共产党人反对新的政治路线，但他们孤掌难鸣，稀稀落落的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为新国家的疆域缩小，为强劲的亲西方趋势而坐立不安，但他们成不了气候。在1992年之后的议会中，尽管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加在一起也只占极少数。

然而，到了1992年中期，日益尖锐的冲突开始影响着俄罗斯政治。冲突首先源自于叶利钦政府为建设市场经济所采用的特殊政策，这种政策就是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或叫“新自由主义”。^[4]它不久就在俄罗斯产生了影响，激起了尖锐的、日益扩大的社会分歧。过去息息相关的联盟现在成了敌意重重的对手。叶利钦总统陷入议会的冲突中无法脱身，而议会以前是他的主要根据地。1993年10月，冲突发展成暴力，叶利钦只好动用武力解散议会。但这并未能化解冲



突，1993年10月起，冲突采取了新的形式，反对派变得越来越激进。

除了休克疗法，叶利钦的独裁作风是俄罗斯政治冲突的第二个原因。他的一些朋友最后成了敌人，不是因为在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上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而是因为新的体制中对于权力的分割感到寒心。然而，叶利钦最后越来越反对民主，这种作风从他早年担任共产党省委一把手的个人经历来看，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可以说，这是他所采用的经济变革战略的逻辑衍生物。

在第三部，我们将考察苏联解体、俄罗斯获得独立后所发生的经济政治演变过程。第九章解释了什么是休克疗法，以及它是如何被应用于俄罗斯。第十章考察了俄罗斯经济和人民在休克疗法之下的种种遭遇，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政策没有像它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发挥作用。第十一章表明了休克疗法是如何在俄罗斯导致尖锐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冲突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导致叶利钦总统日益倾向于独裁统治，如何导致共产党复兴的。同时，该章还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向作了估计。俄罗斯领导层用来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独特战略——休克疗法——不仅引起了尖锐的政治冲突，而且威胁到该战略试图达到的目标的完成。因此，俄罗斯能否成功地建立一个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民主的体制，本身还值得怀疑。最后，第十二章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未来能够从苏联经验中、从苏联体制的终结中、从其随后的发展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注释]

[1] 俄罗斯的正式名字是俄罗斯联邦，但为了简化，我们将把它称为俄罗斯。

[2] 特定情况下，任何有关经济改革事务的总统法令都是自动生效的，除非议会在七天内投票反对。如果这样，就有必要和议会展开谈判了。这种特殊的立法权，议会给了叶利钦总统13个月的有效期，即到1992年12月1日为止。



后来，它成了总统和议会争论的焦点。

[3] 参看第七章，特别是图 7—1。它表明，在 1991 年 6 月时，绝大多数莫斯科精英都赞成搞资本主义。

[4] 虽然“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有时被解释成不同的含义，但在本书中，这两个词是可以被交互使用的。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九章 休克疗法

俄罗斯独立后采用的经济转型战略——休克疗法，往往被当作是某种特殊经济政策的三部曲：价格的自由化，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经济，^[1]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但它的含义实际上比这宽泛得多。休克疗法的名字部分源自于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要求很快的经济转型。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这一巨大工程要尽快地落实——在几年之内。同时，要引进一整套激进的新政策，不能循规蹈矩。^[2]

这种方法的鼓吹者们运用生动的形象去



推进它，例如“不能跳过两峡谷”之类的谚语。^[3]除了谚语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尽快转变经济的倡议。步伐慢的话，时间就要很长，这样一来，新体制就会是旧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和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混合物。据说，这种混合物根本行不通。再者，还有人声称，历史表明渐进的转变是不行的，例如1985—1991年间渐进改革苏联经济的尝试就失败了。还有，为了尽可能地使转变过程不可逆转，也有必要加快速度。这种说法不过是担心，旧体制的鼓吹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久就会采取实际行动，拨转历史时钟。

除了强调快速转变之外，休克疗法战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实际地创建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求政府只起非常有限的作用。政府的根本职能，是取消旧的中央计划体制，私有化它的资产，起草一个与市场 and 私有制相配套的新的法律框架。主要依靠个人活动去建立新的市场关系，重组现有的产业，政府在其中只起很少的指导和调控作用。休克疗法的这一特征，是以那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信仰为基础的，这种信仰认为，如果国家只是撒手不管，市场经济就能多多少少自动地产生。市场经济被看成是经济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的”或者“正常的”状态，一旦国家行为妨碍它的运行，它就不再存在。而且，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对市场的指导和调控往往弊大于利。

在呼唤快速转变和有限政府管理时，休克疗法还提倡在转型时期制定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虽然上面所说的自由化、稳定性和私有化三部曲构成了这个政策系列的主体部分，但全部的系列比这长得多。休克疗法提倡的主要特殊措施如下^[4]：

1. 价格自由化。
2. 宏观经济稳定。
 - (a) 减少政府支出以达到预算平衡。
 - (b) 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
3. 国营企业私有化。
4. 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
5. 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



上述第一项，价格自由化，意味着摆脱国家对零售和批发价格的控制，让它们任由市场供需关系来决定。这同样被认为包含一种特殊的、重要的价格——卢布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率。国家应该放弃控制卢布兑换值，允许它“浮动”，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应取决于自由货币市场的供需状况。^[5]

上述第二项，宏观经济稳定，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它包含两部分，一个涉及政府预算，另一个涉及中央银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苏联垮台前几年，联邦预算出现了巨额赤字，要尽快取消这种做法。实际上，所有的公共支出项目都要大量削减，包括军事开支、国营企业补贴、社会工程、教育和公共投资。稳定政策的第二部分要求中央银行急剧降低货币和信贷的增长。银行系统从中央银行获得资金后借贷出去，因此中央银行通过削减它给各银行的资金，就能直接限制企业可获得的信贷额。

第三项，私有化方案，要求立即把小型企业转变成私营企业。虽然已认识到中型和大型企业不能太快地私有化，但休克疗法还是要求立即把这些企业“非国有化”和“商业化”。这就意味着它们要从国有资产变成股份公司，要从旧体制下的完成计划式转向追求利润式。开始时国家可以是主要持股人，但只有到了国家的股份有可能转变成私人股份的时候，私有化的过程才算完成。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私有化应包括整个银行系统和所有非金融部门在内。

第四项是消除经济中的中央计划残余因素。虽然中央计划体制在1991年末已大体上瓦解了，但还有少许政府调节经济的残余。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指令，要求企业为国家生产既定质量的产品。中央计划的这些残余是不能继续下去的，要让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惟一机制。

第五项要求制定一项自由贸易和资本运动的政策，以取代苏联的国家调控体制。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都应该摆脱数量的限制和过高的关税。外国投资应得到鼓励，俄罗斯企业和个体者只要愿意就应该可以在境外自由投资。为方便自由贸易和投资，应实现卢布完全可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拥有卢布，不管他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



人，都可以按市场决定的比率自由地把它们兑换成外币。

休克疗法在所有的方面都和改革时期的经济方法截然不同。改革的目的是革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它的推行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是由国家去管理改革的。尽管人们老用“经济改革”一词来描述独立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战略，但在该词通常的意义上，休克疗法战略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它是一个革命的战略，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在目的方面，休克疗法是用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来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是革命的。同时，在手段方面它也是革命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要从速从快，要立刻消除旧体制、马上创建新体制。丝毫不允许旧体制一刻存活，丝毫不允许利用旧体制来帮助建设新体制。

休克疗法该如何推行

价格自由化的基本原理是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按照这种理论，自由价格——也就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对于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来说是最关键的。市场体制中的价格起着信号的作用，既指示消费者给某一产品的定价如何，也指示生产该产品需要多少的社会稀缺资源。

俄罗斯的价格自由化被认为是克服无效率和缺乏对消费者意愿的关注的手段，后两者曾令旧的国营经济苦恼万分。随着价格摆脱国家控制，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会急剧上升，从而使企业的产品更有利可图，刺激企业生产更多的同类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对价格上升的“供给反应”。那些没人要的产品将会经历价格下降的遭遇，它们的产量会下降，或者直至为零。同时，随着生产性投入的价格放开，企业就能够计算用另一种方式生产某种产品将真正需要多少成本，他们将有动力去选择最便宜的方式。

然而，按照这种理论，自由价格缺乏另两个变化就不能发挥作用。其一，中央资源配置，限制了企业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自由，因此要使市场运行良好，就必须把它彻底消除。其二，国有企业无力



对价格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样一来，企业主管者关注自己的工作津贴就会甚于关注企业的利润。他们将会满足于依例行事，而不喜欢冒随市场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的风险。为了把企业的控制权交给那些惟一的动机就是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业主之手，私有化注定是必要的。由于以前的国有企业已失去了它们唾手可得的国家津贴，那些不愿意或没办法对消费者意愿作出反应的企业将会破产，而那些意会消费者指示的企业将会得以生存。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要求阻止一旦价格控制解除就会释放出来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在国家控制价格的情况下，苏联居民的货币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获得的消费品。由于这一原因，消费者到1991年末已积累了太多的储蓄。^[6]政府这几年的预算赤字同样也把货币滚滚送入居民之手。这种所谓的“货币闲置”与居民的时下收入一起，必定在它们突然摆脱国家控制时引起价格的大幅上涨。

稳定计划包含两部分，预算平衡和银根紧缩，但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迅速遏制货币和信贷的扩张。俄罗斯预算赤字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弥补，因此削减公共支出以消除赤字，就会消除货币扩张的根源。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因此抗拒来自各银行和企业要求过度信贷的压力，按照这种观点，通货膨胀就能很快被抑制住。

相信通货膨胀应该和能够被货币手段所战胜，这种信仰大体上是“货币主义”这种有影响的经济理论所主张的。^[7]在俄罗斯的最有影响的西方顾问，例如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受过货币主义的强烈影响。货币主义者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惟一途径就是依靠紧缩银根政策。他们还声称，这样一种政策要是执行得正确，只会对经济生产水平产生短暂的、有限的消极影响。

拆除自由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壁垒，旨在进一步提高俄罗斯经济的效率。自由进口商品据说能够给俄罗斯企业施加竞争性压力，迫使它们变得更加富有效率。^[8]拆除资本流动壁垒将会鼓励外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带来迫切需要的专家、技术和资金。使卢布成为一种完全可兑



换货币，将会保证进口者和外国投资者在俄罗斯挣得的收入能够自由地从卢布兑换成外币，从而鼓励商品和资本的进口。

因而，休克疗法的全部措施，除了稳定政策之外，其目标都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开始运行。它们旨在提高效率，增加有市场前景的商品的生产，满足俄罗斯消费者的需求。预算削减和银根紧缩旨在控制通货膨胀。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保证把俄罗斯从苏联时代继承过来的经济体制迅速转变成一种繁荣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

俄罗斯是如何采用休克疗法的

1989—1991年间在苏联发展起来的亲资本主义联盟决心向国家注入资本主义。但如何这样做，谁也不是十分清楚。是一步一步地走，还是快速转变更好些？

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渐进战略的失败，给渐进方法的提倡者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至少在经济重建受到人们普遍关注时是如此。叶利钦及其亲信并没有公开谈论过要建立资本主义，反而声称更快的改革是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区别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已看到的，1991年，由于中央计划的解除，各共和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减少，苏联经济已迅速衰退。在这种局面下，必须迅速采取某些激进措施的观念在苏联完全占了上风。

但应该如何正确地采取激进措施，仍然是个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思想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已于1989年开始替波兰后共产主义新政府担任顾问。早在几年前，萨克斯就曾提出过一系列政策建议，解决了玻利维亚通货膨胀和外国债务危机问题。他把这些同样的政策用于波兰。于是休克疗法产生了。1990年，休克疗法被波兰采用，并被广泛地宣传为把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最佳途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把休克疗法提升为解决东欧问题的正确方案。尽管匈牙利此时正在走一条更加渐进的转变战略，但对叶利钦身边的经济学家影响最大的还是波兰的试验。



休克疗法本质上是一种旨在解决由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资本主义体制所带来的问题的、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第四章已注意到，许多苏联经济学家在 80 年代末感兴趣的，不仅包括西方经济学观念，而且包括其中的保守的、自由市场的观点。因而一点都不奇怪，与叶利钦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自然就发现休克疗法颇有魅力。

随着 1991 年 8 月政变未遂之后苏联中央政府日益式微，叶利钦开始遇到机遇，这不仅指他可以批评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了，而且指他有机会为俄罗斯制定一条新的路线。1991 年秋，叶利钦的助手根纳第·布尔布利斯向他引荐了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在转到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之前，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都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布尔布利斯曾是一位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盖达尔曾是《共产主义者》和《真理报》的一名编辑，虽然他并不在莫斯科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列。

尽管苏联其他的自由派主流经济学家，例如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希望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但盖达尔更喜欢一种俄罗斯自行行事的战略。他向叶利钦指出，即使在独立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下，他相信俄罗斯也能够、也应该推行它自己的经济转型计划。这令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特别感兴趣。叶利钦任命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做他的主要经济顾问。^[9]可以相信，叶利钦在 1991 年 10 月 28 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说，就是由盖达尔执笔的。^[10]

在那次演说中，叶利钦强调了两点。第一，他认为俄罗斯应当走一条独立的经济转型路线，这就暗示着他不会为保留联盟作出任何努力。第二，他勾画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它们足以称得上是对在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认可。他要求到年底放开一切价格，把工厂和土地私有化，大量削减政府支出，实行强硬的货币政策。他强调了尽快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11]

叶利钦许诺，这些大胆的新政策很快就能见效。为了替自己在代表大会演说中的立刻解除价格管制的要求作辩护，他说：

向市场价格作一次性转变，是一项严峻的、强制性的、必要的措施……在最近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谁都会发现生活更艰难些。到1992年秋，正如我早就（在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许诺过的，经济将趋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将逐步好转。^[12]

如果这个演说确实是盖达尔写的，那他显然接受了西方休克疗法鼓吹者的乐观看法，即来自紧缩银根和预算政策的消极影响只是短暂的。

叶利钦的一些支持者也许对休克疗法如何才能有效运行抱有怀疑，但它却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和权威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人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家最了解资本主义，也最了解如何去建设它。因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抛开了原有的一切疑虑，以876票对16票这种一边倒的票数通过了叶利钦的经济计划，同时投票赞成他享有执行经济改革的立法权。^[13]这样的票数和后来由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占多数的俄罗斯议会在1992—1993年间的普遍观点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毫不妥协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不仅投票赞成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且投票赞成了旨在尽快实现这种未来的、受西方鼓动的计划？

有些民族主义者后来抱怨说，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旗号的西方势力把休克疗法强加给了俄罗斯。虽然由西方经济学家组成的源源不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团确实支持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但他们显然没必要强迫行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方案是在叶利钦自己的经济顾问——叶戈尔·盖达尔的指导下制定的，而当时也很少遇到其他自由派俄罗斯经济学家的反对。议会发言人，后来成了叶利钦政策的主要反对者的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显然一开始时对休克疗法丝毫不存疑虑。1991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在莫斯科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双方讨论了俄罗斯经济政策。哈斯布拉托夫本人也是位职业经济学家，而且众所周知禀性耿



直，从不知道曲意奉承。他表态说，他坚决拥护康德苏的休克疗法方案，包括富有争议的强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14]后来，1994年，哈斯布拉托夫甚至还声称，他必须劝说一开始时挺不情愿的叶利钦去赞成私有化，因为这是休克疗法的关键环节。^[15]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盖达尔和俄罗斯政府其他领导人于1991年秋举行一系列会议时，他们发现俄罗斯人对休克疗法的支持热情高涨无比。在1991年11月初首次会见由西方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团时，盖达尔明确表示自己赞成快速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这种会议是意见的交流，并不是什么例行见面。^[16]

随后的几个月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俄罗斯领导层之间确实出现了分歧，但分歧在于实施休克疗法的细节，而不是政策本身。例如，1992年1月2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期望的相反，盖达尔拒绝把石油价格的自由化包括在内。据说，盖达尔也认为放开一切油类价格是可取的，但又警告说，一旦立刻放开油类价格，政治压力将会迫使政府为农业和城镇居民提供数额巨大的补贴，以便抵偿农机燃料和家庭燃料油的成本剧增，否则，休克疗法方案的稳定化目标就是一纸空文。^[17]

休克疗法的实施

休克疗法方案中最容易实施的部分是价格自由化。首次提出价格自由化是在1991年末，但一直推迟到苏联正式垮台后的第二天即1992年1月2日才付诸实施。这一天之前的圣诞节左右，俄罗斯经济部部长安德雷·涅恰耶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专家访问团表示，他担心在放开价格的第一个月里价格会上涨两倍甚至更多。美国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访问团成员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据说向他保证，元月份的物价只会上涨70%。^[18]

1月2日，俄罗斯在全国解除了80%的批发价格、90%的零售价



格的国家管制。^[19]随后的价格涨幅远远超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预计。一个月内，零售价格上涨了大约3.5倍，而出厂价格上涨了近5倍。^[20]

1992年2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协助下，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发布了一份名叫《经济政策备忘录》的政策声明，它是休克疗法方案的完整体现。它打算放开至今仍受管制的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到年底达到零预算赤字（后来被降到占GDP5%的赤字）^[21]，大幅度削减给企业的补贴，紧缩信贷，公司化已经私有化的国营企业，取消国家指令，实现卢布可兑换。第二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了该备忘录，紧接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宣布给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22]4月底，俄罗斯正式被接纳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至此，俄罗斯休克疗法计划正式启动。

当一项经济政策没能像它原来所说的那样有效时，有关这一政策是否曾被真正严格执行的争论就必然产生。鼓吹者往往会说，这项政策制定得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好，只是它从来没有被真正执行过。1992年1月之后的几年里，围绕休克疗法就产生了这样的争论。

尽管休克疗法并没有遵循经济学家笔下的纯粹形式发展，但俄罗斯政府还是决心把这一方案的基本纲要坚持到底。在1992年的上半年里，该方案执行得十分严厉。这招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对方案加以修改。修改虽然稍微偏离了原定的目标，但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大体上仍然照着1992年所制定的休克疗法方向发展，直到它正式成为法律（1995年末）。^[23]

尽管重新管制某些商品价格的呼声很强烈，但无人理会。相反，越来越多的管制被解除了，只有燃料价格除外。1992年，中央配置资源的最后一个重要手段——国家指令——被取消。

1992年第一季度，政府支出实际上削减了大约40%，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削减，是由于照一种标准预算，该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将有0.9%的盈余。^[24]如图9—1所示，从全年来看，政府支出从1991年所估算的占GDP的47.9%，掉落到了1992年的占GDP的38.7%。



1993—1994 年间，政府支出仍占 GDP 的 35%，1995 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 1993 年，俄罗斯的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例就已和美国该年 34.5% 的比例不相上下。^[25]

苏联的最后几年，税收收入急剧下降。如图 9—1 所示，俄罗斯政府也无力大幅度提高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例，甚至到 1993 年后还比 1991 年的水平下降了。这样一来，尽管政府实现了大幅度削减支出的目标，但它却无力在 1992 年第一季度之后完全消除预算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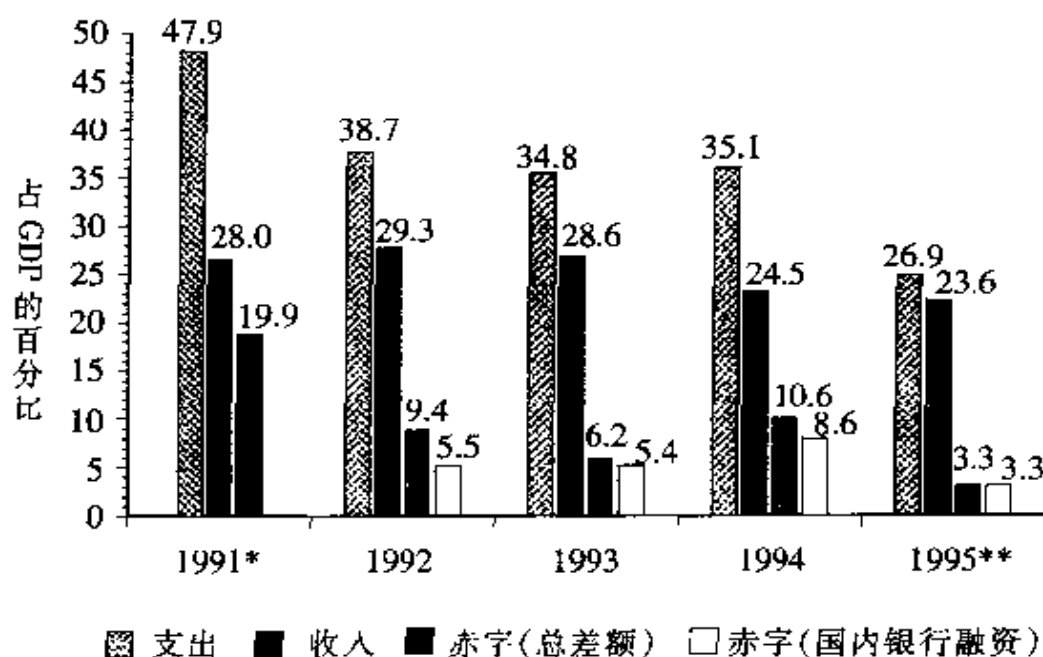


图 9—1 俄罗斯政府支出,收入和预算赤字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b，p.70；1995b，pp.5，21。

* 1991 年为估算值。

** 1995 年也为估算值，仅涉及该年的前六个月。

预算赤字的计算变通性很大。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标准，而每种标准依据的赤字概念也各不相同。根据总差额即总预算中支出和收入之差计算的赤字，并不是判断作为休克疗法战略一部分的减少赤字是否有效的最好尺度。应该说，在这方面最适合的尺度是根据国内银行



融资标准计算的赤字。这两个标准都在图 9—1 中表示了出来。作为休克疗法战略一部分的削减预算赤字的目的，旨在遏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而根据国内银行融资标准计算的赤字，恰恰能显示出预算赤字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1992—1993 年，正如图 9—1 所示，根据国内银行融资标准计算的赤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占 GDP5% 的目标是十分接近的。1994 年，赤字上升到占 GDP 的 8.6%，这与其说是支出增长的缘故，倒不如说是税收收入减少一手造成的。1995 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完全达到了。因而，俄罗斯政府确实执行了大幅度削减其支出的休克疗法方案，也在开始两年里多多少少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赤字目标。大概是由于 1994 年的失误，它在 1995 年又走回头路了。

达到这些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的目标所采用的方法之一，是拒绝支付合法的费用，甚至连执行部门自身造成的支出义务也不履行。国库蛮横地拒绝支付任何超出所得税收和额外收入的部分。这种政策——1993 年 12 月 21 日，一纸总统法令把它变成了法律条文——给那些从联邦国库中获取收入的俄罗斯企业和其他机构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6]

开始时，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极端严厉的。尽管消费品价格在 1992 年前三个月里上涨了 520%，但允许增加的货币供应只有 32%。^[27]货币的实际价值在三个月里下降了 79%。在第十章，我们将讨论这种典型的银根紧缩政策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造成了政治压力，迫使某些政策出现松动。1992 年下半年，货币比价格增加得更快了。然而，正如图 9—2 所表明的，1992 年所有的消费品价格以 31.2% 的速度上涨得还算平稳，虽然货币供应每月仅仅递增 17.7%。图 9—2 所涉及的每年里，货币供应都比价格增长慢。^[28]在俄罗斯所经历的通货膨胀迅猛的情况下，这是表明休克疗法方案所要求的货币紧缩政策的最好的指示器。^[29]

因而，在稳定化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两个方面，休克疗法的原定方案都是被严格地、合理地执行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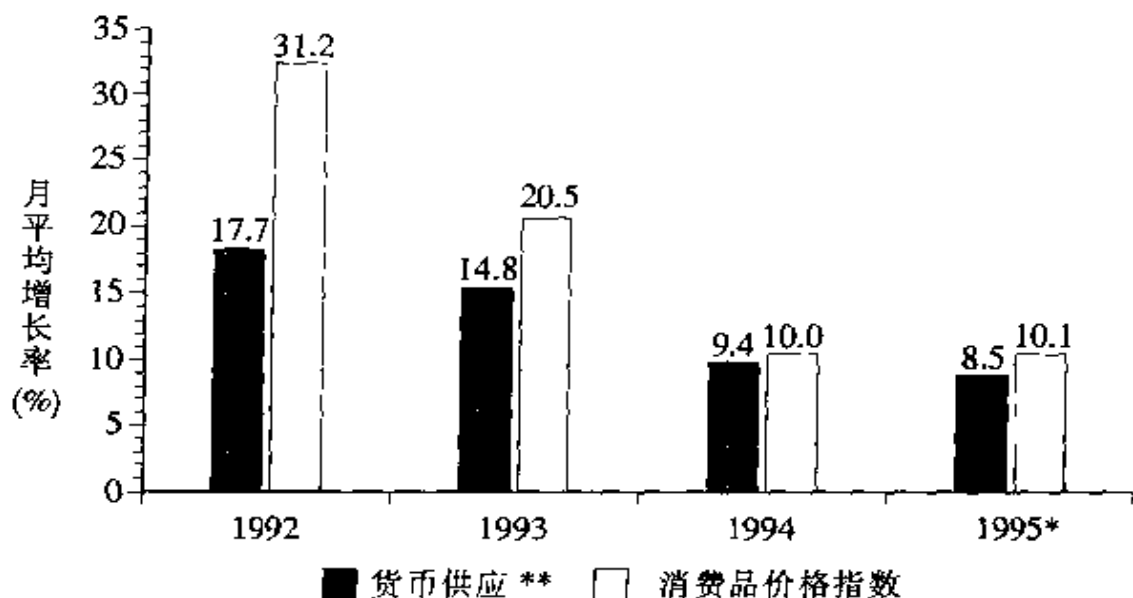


图 9—2 货币供应和消费品价格的增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88；1995a：73，98；1995b：8，26。

* 1995 年前六个月。

** 卢布，广义货币。

私有化进行得比预期的要快。许多小型国有企业在 1992 年期间就迅速地私有化了。1992 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把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该年末及翌年初，1.48 亿份私有化证券被分发到民众手中，用以购买新建公司的股票。然而，只有大约 18% 的公司股票通过证券股票公开拍卖会被卖出去了。^[30]到 1994 年 7 月 1 日，74% 的股份公司通过雇员购买实现了私有化。^[31]1994 年年中，大约 2/3 的国有和地方企业都以某种方法私有化了。^[32]

俄罗斯企业的法律形式因此很快从国有变成私有了。根据官方的统计，到 1994 年底，非国有企业占了工业总产出的 78.5%、工业总雇员的 69.9%。^[33]虽然政府还在向企业提供各种补贴，但补贴总数持续走低，从 1992 年的占 GDP23.9% 下降到 1993 年的占 GDP10%。^[34]

在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领域，俄罗斯都执行了休克疗法的要求。俄罗斯在 1992 年 1 月放开了它的进口制度，甚至暂时



取消了一切进口关税。该年的7月之后开始征收关税，但没有任何进口配额，也几乎没有进口许可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津津乐道地说，俄罗斯的“进口制度几乎完全没有限制”^[35]。俄罗斯政府尽力欢迎外国投资，尽管重大的障碍也不在少数。^[36]1992年7月，政府控制的卢布双汇率制让位于一个单一的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同年11月，现金结算的卢布自由兑换制最终形成。^[37]

俄罗斯的出口一直受到许可限制、配额和中央出口计划的限制。虽然休克疗法要求全方位的自由贸易，但对进口的强调超过出口。然而不管如何，出口限制对实际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的约束力弱小。甚至俄罗斯的资本出口也是这样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限制，资本还是大量外流了。

到本书写作时为止，独立后俄罗斯强行实施休克疗法已四年了。这是一段足够长的时期，使我们可以对它的实施过程加以逐一清理。现在，我们就转到这一问题。

[注释]

[1] “财政政策 (fiscal policy)” 一词源自于古词 “fisc (罗马皇帝手头的现款)”。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们用它来指某个国家政府规划其支出和税收政策，以便调控经济增长率和物价膨胀率。它和货币政策不同，后者指的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和利率的管理。当然，这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旨在影响经济的增长率和通胀率。

[2] 人们也承认，某些部分的转变花的时间要比其他部分长。例如，私有化必定比价格自由化花的时间长。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同时开始。

[3] 谚语的问题在于，对于每个谚语来说，人们往往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启示。休克疗法的反对者就指出，如果峡谷太宽了，虽然建一座桥通过它慢了些，但总比跳过它更为明智。

[4] 除了这里所列的五项特殊政策，人们也可以增加一项：取消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有工作、普遍的退休金、孩童看护津贴、自由的医疗保健、便宜的度假等），用一种更加有限的、很少针对最迫切需要的人的社会保障网络



来取代它。这一项休克疗法战略对普通人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对于休克疗法的经济逻辑来说，并没有上述五项政策那么关键。

[5] 假如真的有这么多的资金给俄罗斯政府来用，或许有可能满足休克疗法的要求，把这些资金用于减少卢布市场值的波动。然而，国际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资金。

[6] 在1985—1991年改革期间，苏联居民已积累了大约5 510亿卢布的储蓄，它们大多以现金的方式或在储蓄银行里存放着。这部分资金占了1991年国民总支出的6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a，p.55）。

[7] 货币主义理论的最杰出的发展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位芝加哥大学的退休教授。这种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中有影响的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直到现在也不减当年之势。在通货膨胀及其控制方面，同与它竞争的主要理论凯恩斯主义不同，它把货币过度扩张看成是通货膨胀的惟一可能的原因，把银根紧缩看成是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惟一可能的途径。而在凯恩斯看来，银根紧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明智的手段，这要取决于当时的环境。

[8] 长期以来，人们还希望自由贸易能使俄罗斯人按照其“竞争优势”来生产。这意味着俄罗斯将专门生产那些它相对生产得最好的产品，而进口其他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根据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这一过程将使所有国际贸易的参与者都受益。

[9] 11月7日，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在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一年，盖达尔是叶利钦政府中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人物。1992年3月2日他成为第一副总理，同年6月15日任总理（之前是叶利钦总统自兼总理一职）。1992年12月14日，盖达尔被解职，取代他的是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然而，盖达尔仍然是叶利钦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1993年夏叶利钦与议会的冲突白热化的时候。1994年1月，盖达尔和与他观点相近的经济学家鲍里斯·费奥多罗夫一道最终脱离了叶利钦政府。

[10] 这种说法有两个来源：伦敦《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翰·利奥德（John Lloyd）于1994年1月18日的采访录；我们于1995年6月13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莫斯科前代表约翰·佛格里佐（John Foglizzo）的采访录。

[11] 《纽约时报》，1991-10-29，1版、12版；Bush（1991，pp.1-6）。

[12] Bush（1991，p.2）。

[13] Bush（1991，p.1）。



[14] 这里提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与俄罗斯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来自于我们1995年6月13日对约翰·佛格里佐的采访录。佛格里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莫斯科的首任代表，任期是1991年10月至1995年春。他参加了上述所有的会议。

[15] 1994年6月17日对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采访录。

[16] 1995年6月13日对约翰·佛格里佐的采访录。

[17] 1995年6月13日对约翰·佛格里佐的采访录。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派往莫斯科的西方经济学家没必要强迫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但休克疗法所依据的各种观念均来自西方经济学思想。

[18] 1995年6月13日对约翰·佛格里佐的采访录。

[19] 被排除在价格自由化之外的商品包括某些日用必需品（例如面包、牛奶、婴儿食品、住房租金、电费）和某些关键的生产性商品（例如燃料、贵金属）。但这些商品的价格早已经上涨了三倍到四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b, p.9）。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 p.88）。

[21] 1992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到年底把预算赤字目标修改为占GDP的5%（《纽约时报》，1992-07-06, 47版）。

[22] 《纽约时报》，1991-04-03, 47版。这些援助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到达俄罗斯。

[23] 对原定目标的最重要的偏离，是拒绝允许燃料价格上涨到世界市场的水平，同意金融和预算政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要求随时变动。

[24] 这里所说的0.9%的GDP赢余，依据的是以现金计算的所谓总贸易差额的逆差标准。若照国内银行融资的标准，赢余是GDP的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 p.93）。

[25] 《总统经济报告》（1995, pp.274, 372）。

[2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a, p.18）。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 pp.88, 100）。

[28] 外币作为交换中介在俄罗斯被广泛使用。如果把外币存放算在货币供应之内，它对这里分析的结果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价格膨胀仍然遵循和图9—2所表明的线条十分接近的水平超出货币的增长。

[29] 在某个正在经历快速通货膨胀的经济中，要确定其货币政策的严格程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较好的指示器就是货币增加幅度和价格上涨幅度的比率。假如中央银行允许货币供应的增加和价格上涨——它本质上



就是实际货币供应的增加——一样快，甚至更快，这样的政策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说明中央银行能够完全容纳上涨中的价格水平，或者容纳有余。假如货币供应比价格上涨更慢些，这样的政策就是严格的货币政策，表明中央银行无力容纳膨胀率。在后一种情况下，总的消费需求没有足够的金融手段来购买既定的实际产出量，从而给价格水平带来一定的限制。

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中，人们将会把利率当作辅助性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严格程度。但在一个正经受快速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就很难从利率得出任何有关货币政策严格程度的结论了。例如在1992年期间，俄罗斯银行贷款给国营企业时收取的年利率就从32%逐渐上升到95%。这听起来好像特别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中简直就是十分严格的货币政策了。但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509%，这就意味着实际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利率并不高。低利率往往意味着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1993年，俄罗斯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到了204%，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率是840%，实际的利率还是较低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借钱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这种利率已经是高得不能再高了。对于投机者来说，这种利率却是特别诱人的。从快速通货膨胀期间的利率我们得不到什么结论，因为，在这种时候计算实际利率，我们都必须知道未来的通货膨胀率，而在快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是十分不确定的。

[3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5a, p.56)。这里的估计所指的日期显然是1994年中。

[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4, p.128)。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5a, pp.56, 128)。

[33] 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5, No.4, p.41)。然而，这些新建私营企业的股东一开始时是企业雇员和主管人员，而不是某些私有化鼓吹者所期望的外部投资者。

[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5a, p.130)。后来几年的数据找不到了。这里所引的补贴数字既包括中央银行贷款，也包括直接的政府补贴和贷款。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3, p.40)。

[36] 外国投资者面临的重大障碍，主要是法律和规章不清楚、甚至相互冲突，法律和合同的约束力不够。

[3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3, p.35)。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自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以来已历时四年，人们预期它将为俄罗斯经济带来快速的改观，建立起有效的、技术上进步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这四年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休克疗法是否按照其倡导者所预期的方式发生了作用？从中获利的是谁？倒霉的又是谁呢？

有人认为，自由的定价制度能够促进产出的增加，即预期的“供给效应”。1992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声称，在



莫斯科的街头小贩身上看到了自由价格的供给效应的迹象，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只得变卖家中财物。^[1]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货架上很快摆满了各种各样以供出售的商品，这一现象得到了西方媒体的认同和引证。然而，这种局面并不是经济好转的结果，惟一增加的供给源自于在此之前进口商品的流入。市场上这种突发性的盈余不是由于供给本身的增加，而是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不断增长的价格使广大家庭无力购买商品。^[2]

紧随价格自由化的并不是积极的供给效应，官方的经济产出数据表明，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在实施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历了长达四年严重的生产衰退，这场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没有结束。

图10—1显示了1990—1995年俄罗斯几项综合经济活动指标的衰退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数据由于有很多解释方面的困难而难以理解^[3]，然而，这些数据确实说明了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方向和程度。^[4]俄罗斯经济在1991年已经出现了衰退，而1992年1月实施休克疗法后这种衰退加速了，图10—1表明了这一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工业生产来衡量，1993年衰退速度有所放慢，在1994年衰退又加速了。1995年，以GDP和工业生产衡量的衰退仍在继续，虽然衰退程度大大地放慢了。在实施休克疗法以后的四年中，GDP下降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46%。与之相比，在美国，1929—1933年为期4年的将美国经济带入谷底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下降了30%。^[5]通过这种比较，自实施休克疗法以来的俄罗斯经济衰退已达到了40%，比美国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时期还要严重。

图10—1表明，农业产出也在不断下降，虽然总的来说没有GDP或工业生产下降得快。投资几乎全面崩溃，在1990—1994年间下降了2/3。这种情况预示着俄罗斯工业的前景黯淡。

总量产出数据只是给出了国民经济状况的粗略的近似值，因为单个的数字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有时候，这样一些总量数据在不同的部门潜藏着极不相同的发展趋势，因此，通过观察单个经济部门和单个产品的发展趋势从而对总量数据进行补充是有用

的。表 10—1、10—2 和图 10—2、10—3 表明，由图 10—1 的总量数据所描绘的严重的萧条并不是统计上的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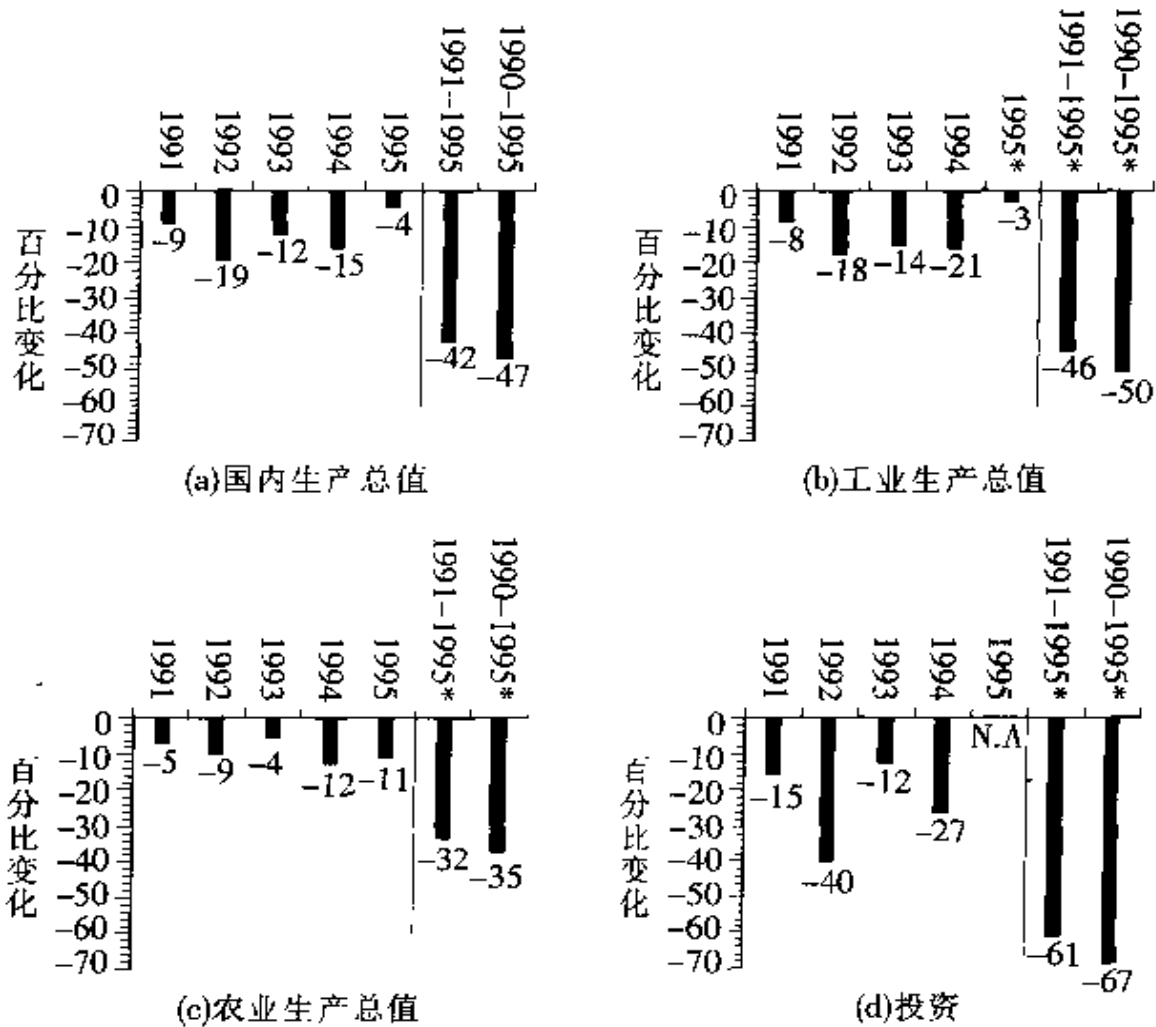


图 10—1 俄罗斯宏观经济指数百分比变化

* 截至 1995 年上半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5: No. 4, p.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3: 85, 1995 b: 1; OECD 1/1995: 94, 2/1995: 102; OMRI Daily Digest, NO. 12, Part 1, 17 January 1996.

表 10—1 和图 10—2 显示了俄罗斯 11 个工业生产部门的产出情况。如图 10—2 所示，在 1992—1995 年实施休克疗法期间，各部门的产量都大幅度地下降了^[6]，只有电力和燃料部门的下降幅度低于



1/3, 包括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在内的轻工业部门下降幅度最为严重^[7], 如表 10—1 所示, 在 1995 年, 四个金属和化工部门终于开始增长, 而燃料部门差不多也止住了衰退。

表 10—1 各部门实际工业总产值百分比变化

部门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电力	0.3	-4.7	-5.3	-8.8	-5.0
燃料	-6.0	-7.0	-15.0	-10.0	-0.6
炼铁	-7.4	-16.4	-16.6	-17.4	+12.0
金属冶炼	-8.7	-25.4	-18.1	-9.0	+0.8
化工	-8.3	-22.6	-19.9	-20.0	+8.0
石化	-3.0	-19.4	-24.9	-35.0	+13.0
机械	-10.0	-16.2	-16.6	-33.0	-4.0
木材	-9.0	-14.6	-18.7	-30.0	-7.0
建筑材料	-2.4	-20.4	-17.6	-27.0	-6.0
轻工业	-9.0	-30.0	-23.4	-46.0	-36.0
食品加工	-9.5	-16.4	-9.2	-17.0	-9.0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b, p.2).

* 表示 1995 年前六个月的数据。

表 10—2 所选产品投入量

产品(单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天然气(10亿立方米)	643.4	641.0	618.5	561.1	600.0
旅行车(千辆)	1 030	963	956	799	785
钢材(百万吨)	77.0	66.9	58.1	48.8	51.6
石油(百万吨)	462.3	399.3	353.5	312.7	306.8
矿物化肥(百万吨)	15.5	12.3	10.0	7.5	8.9
纸(千吨)	4 765	3 604	2 882	2 214	2 775
植物油(千吨)	1 615	994	1 137	793	678
面粉(百万吨)	20.5	20.4	17.2	12.7	11.6
水泥(百万吨)	77.5	61.7	52.2	37.2	36.9
冰箱、制冷机(千台)	3 710	3 184	3 485	2 626	1 764
化纤(千吨)	529	474	349	197	220
洗衣机(千台)	5 541	4 289	3 863	2 100	1 325
棉纺织品(百万平方米)	5 295	3 294	2 324	1 508	1 225
电视机(千台)	4 439	3 672	3 975	2 161	979
拖拉机(千台)	178	137	89	29	22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5a p.66), *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4, Nov. - Dec. pp.13-22; 1995, No.4, pp.22; 1995, No.12, pp.12-20).

* 基于1995年前11个月的估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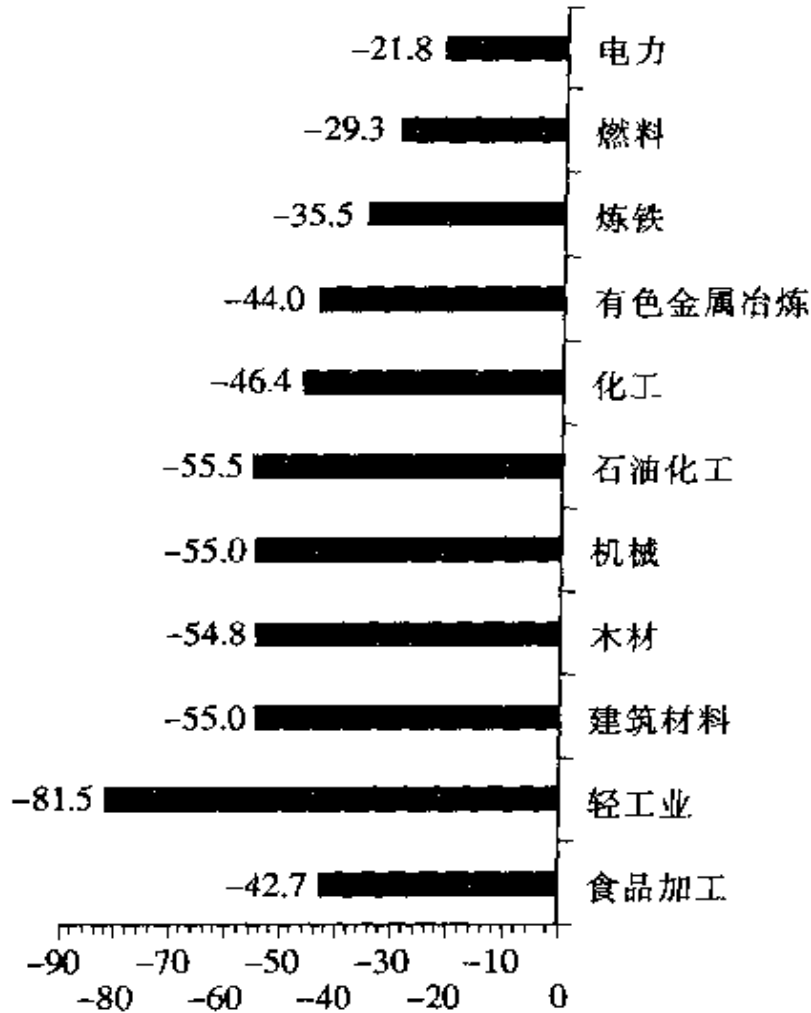


图 10—2 1990—1995 年 * 各行业实际工业总产出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b: 2).

* 截至1995年上半年。

可得到的单个工业品的数据表明,在1991—1995年期间,没有一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是增长的。^[8]图10—3列出了生产品和消费品实物产量下降的百分数,数据按四年间下降幅度从最小到最大顺序排列。注意,图10—3中作为消费必需品的两种食品——菜油和面粉的产量下降了40%。只有天然气的下降幅度不大,只下降了7%。表



10—2 表明，只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第四年，即 1995 年，部分样本产品产量才出现增长（包括天然气、钢铁、矿物肥料、纸张、化学纤维和尼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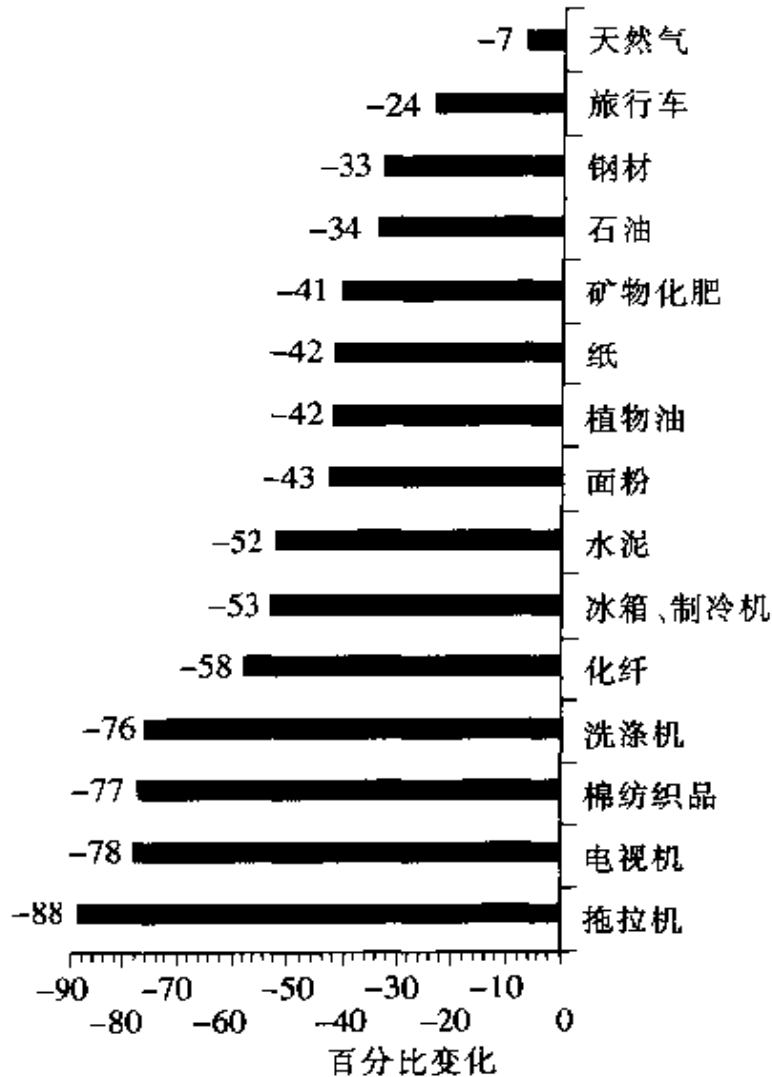


图 10—3 新选产品 1991—1995 年投入量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见表 10—2。

因休克疗法而引致的价格膨胀不仅是比预期的要快，而且遏制其恶化也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1991 年以前，苏联经济还只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消费品价格指数低于 2%，1990 年

为5.6%。^[9]图10—4表明了199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情况。^[10]由于1991年中央计划被废除，当年官方允许消费品价格总体上涨160%，或者每个月上涨8.3%；1992年1月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放开以后，当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500%（每个月上涨了31.2%）。在其后的三年中，通货膨胀逐渐下降，但是在1995年的最后三个月，消费品价格每月仍然上涨了4.1%，即每年上涨6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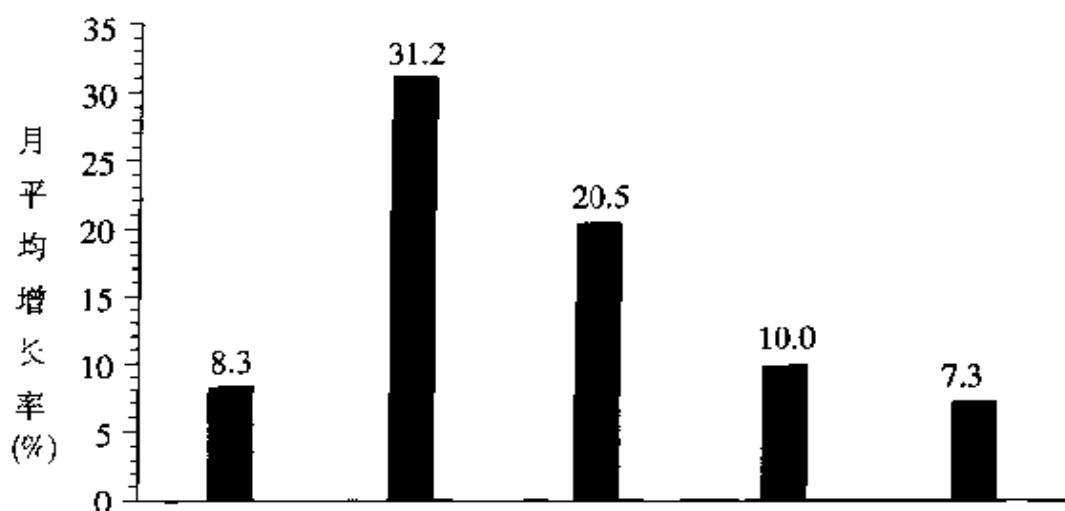


图10—4 199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情况

到1995年底，消费品价格与1991年底相比上涨了1411倍，与1990年底相比上涨了3668倍。1991年在莫斯科乘一次地铁只需花5戈比（0.05卢布），到1995年则涨到400卢布；在莫斯科商店，1千克啤酒从1991年1月的2卢布上涨到1994年6月的3187卢布。^[12]同时，除1992年1月外，俄罗斯月通货膨胀率持续处于50%这一过渡水平之上，正像我们下面所讨论的一样，这种持续快速的通货膨胀动摇了人们恢复经济的信心。

经济萧条与快速的通货膨胀相结合，急剧地降低了俄罗斯工薪阶层和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13]面对快速的价格上涨，支付给俄罗斯工人的工资也上涨了。俄罗斯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和薪水从1990年的297卢布上升到1995年10月的59.5万卢布。^[14]五年之中工资收



人增加了 2 000 倍，似乎给人以好印象，然而仍不足以赶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结果是，在此期间实际收入（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下降了。的确，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GDP 和工业生产的急剧下降是注定了的，因为实际产出的下降导致了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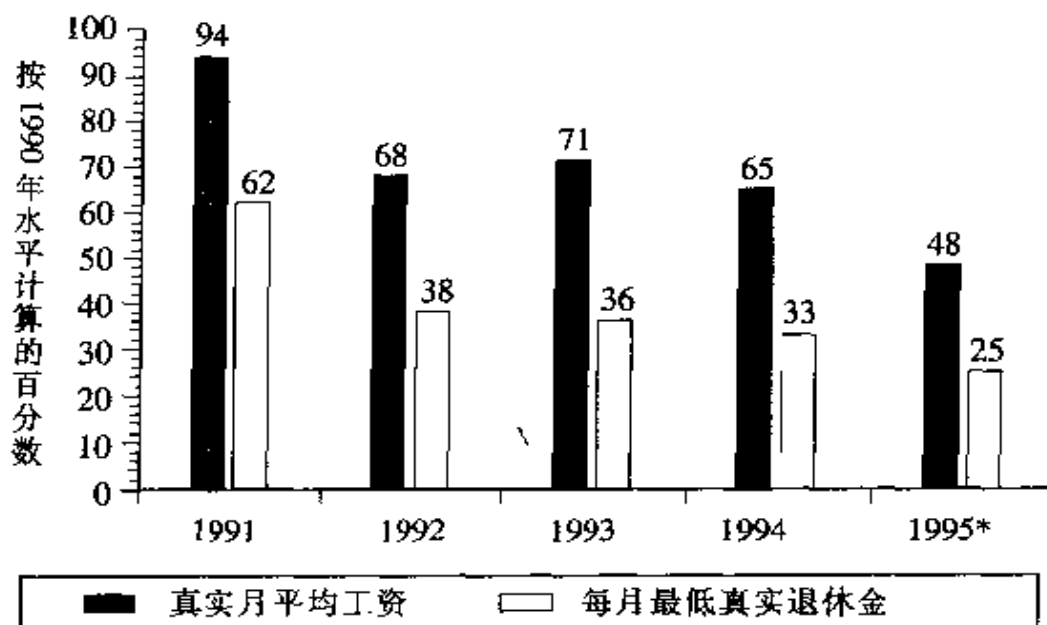


图 10—5 真实工资和退休金(1990 年为 10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3: 88, 91; 1995a. 73, 78; *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5; No 4. pp.45, 59, 61; 1995: No. 12, pp.44, 60, 62。

* 工资为 1995 年 1—10 月数据，退休金为 1995 年 1—9 月数据。

如图 10—5 所示，1992 年平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到了 1990 年的 68%，1993 年稍有上升，然后，到 1995 年又下降到了 1990 年的 48%。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可能比这些数字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在 1992—1995 年，大型企业和其他机构——包括国家机关，推迟支付工资已日益变得普遍。有时候推迟数月，或者只发正式工资的一部分。1995 年 3 月，据估计，仅工业、农业、建筑业拖欠工人的工资即高达 5.3 万亿卢布，大约是当月俄罗斯工资和薪金总额的



22%。^[15]

养老金领取者实际收入的下降比工薪阶层更甚。最低水平的养老金持续下降，1995年只有1990年的25%，实际平均养老金（不是图10—5所示的数值）也比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得更快，1995年前9个月的平均实际养老金下降到1990年的43%。^[16]

到1995年年初，俄罗斯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很多人节衣缩食来维持生计。很多俄罗斯城镇居民周末到他们郊外的小棚屋，种植土豆和蔬菜，以维持他们下降的货币收入。租金和公用设施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服装尽量推迟购买，对于普通俄罗斯家庭，新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有人也许会认为，生产的大幅下降将带来大量的失业，然而这并没有发生。1995年6月，只对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进行计算的官方失业率只占劳动力的3%；1995年，俄罗斯政府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宽口径的失业估计数，其中包括了那些已经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失业人数；按后面的口径计算，到1995年6月失业率估计达到7.7%。^[17]考虑到生产下降幅度之大，这个较高的失业率数据确实低得惊人。在美国，7.7%的失业率只标志着中等程度的衰退。人们曾预期，自1990年以来，GDP下降47%将导致就业率差不多相同规模的下降，即失业率达到30%~40%，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经历着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经历带来普遍恐惧的大规模失业，原因就是尽管俄罗斯企业大部分已经私有化，但并没有像传统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运行。虽然对产品的需求下降了，但企业主管几乎没有解雇工人。传统的做法不容易消失，家长式管理的长期传统使俄罗斯企业不愿意通过大规模裁员来降低费用。企业继续雇用这些员工，并继续发给他们工资（经常拖欠），尽管没有很多的工作给他们做。

在实施休克疗法第一年即1992年，很多俄罗斯企业对销售量的急剧下降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不是解雇员工，而是“为仓库储备而生

产”。很多观察家报道说，那年工厂的仓库中堆满了未出售的商品。国民产品账目证实了这种随意的观察：1992年增加的存货占到了GDP的16%^[18]，相反，在美国，所增加的存货只占GDP的1%。对于某些单个产品来说，这一现象尤显突出。例如，1992年，俄罗斯生产了100万辆客车，但只销售了40万辆；也是在同一年，工厂生产了320万台冰箱和冰柜，但只销售了110万台。^[19]

在新俄罗斯，并不是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很糟糕。由于在高涨的通货膨胀中的收入被重新分配，因此，有人得利，有人倒霉。1995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俄罗斯做的民意测验发现，有66%的被调查对象回答说：他们变得比苏联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更穷了，16%的人回答说比以前更富裕了^[20]，部分新俄罗斯银行的最顶层官员变得非常富有。一项研究报告说，在50%的最富有的人和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商业精英中，有25%的人是银行家。^[21]其他的人是通过取得原材料企业和汽车制造企业的私有业主身份、或者通过投资房地产建筑业而变得富有的。部分政治家，包括莫斯科市的前后两任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尤里·卢日科夫，都变得很富有。^[22]除了这些新贵，在主要的城市中还涌现出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在银行和外企中做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专业劳务的销售工作，如为俄罗斯企业和外企担任语言翻译和计算机咨询。

这些新贵好像主要是通过获取先前已经存在的资产并买卖外汇、股票、房地产、珠宝和原材料而赢得其地位的。除极少数人外，新俄罗斯银行主要从事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的交易，而不像西方银行那样充当资本和生产活动的中介。^[23]如图10—1所示，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几乎没有从事过生产性投资。

很多人相信，这些新贵为安全起见已将大量资金存放到国外。1992—1994年期间，这些外逃的资金估计在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宣称的500亿美元到高达1000亿美元之间^[24]，甚至在资金外逃最低的时期，外逃的资金也超过这几年由西方的直接投资和政府援助而流入的



资金之和，即 194 亿美元。^[25] 休克疗法产生的不是（如俄罗斯）所希望的资本流入，总体来说，它反而加速了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出。

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大多数人与从休克疗法得到好处的少数人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图 10—6 表明了 1995 年俄罗斯家庭收入分配情况，该图也列出了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以供比较。该图显示了由最穷的 20% 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到最富有的 20% 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百分比。苏联体制产生的是货币收入的相对平均主义分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建立之后的几年中，俄罗斯就大体上形成了与后里根时期相似的收入分配格局。^[26] 在俄罗斯，收入最高的 20% 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比美国收入最高的 20% 的家庭的占有总收入的份额还要高，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的收入情况也是如此；俄罗斯处于中间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比美国处于中间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份额要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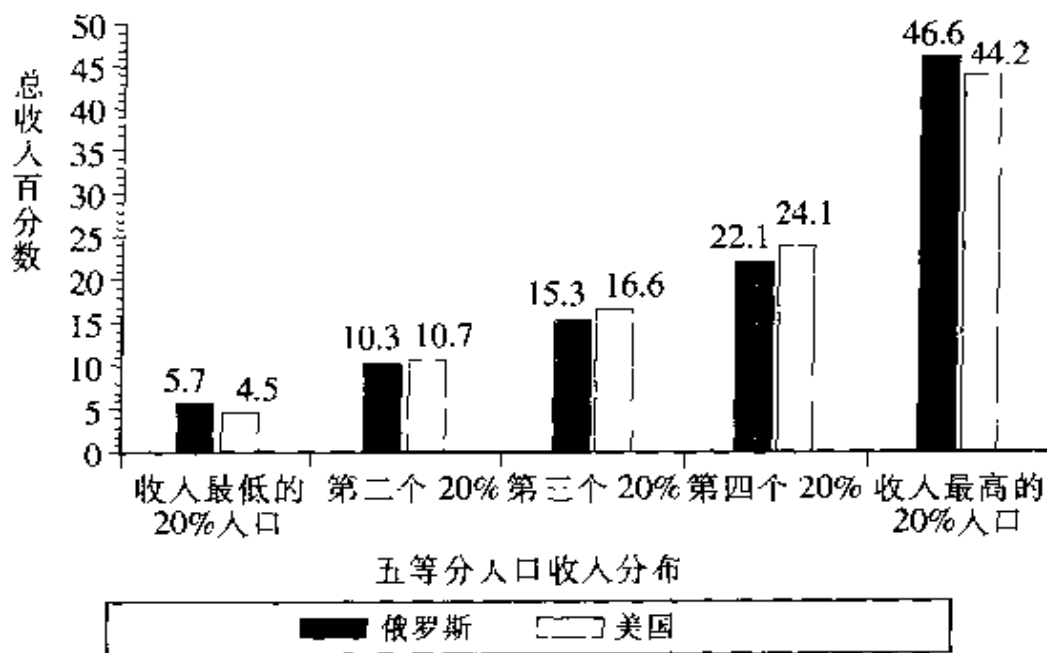


图 10—6 俄罗斯和美国家庭货币收入分布图

资料来源：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5: No. 12, p. 59; US Census Bureau 1993: p. 463. 有关俄罗斯的数据指的是 1995 年前 11 个月，有关美国的数据为 1991 年。



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方法是十分位数的比率，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之比。在第二章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67年前俄罗斯的这一比率为4.5:1，1995年俄罗斯这一比率已达到13.5:1。^[27]

某些工薪阶层的人比处于休克疗法政策之下的另外一些人过得好些。图10—7显示了在1989年到1994年经历了不平常的变化——上涨或下跌——的经济部门中，其工资相对于整个经济中的平均工资而言的变化情况。1989年科学家的工资高出整个经济中平均工资的20%，到1994年，其相对工资下降了1/3，而同期服务于金融部门的雇员的工资相对于平均水平翻了一番。现在俄罗斯有才干的年轻人梦想成为银行家，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家们的低工资难以满足他们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前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刚好低于平均水平，而现在只有平均工资的一半。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最低工资线下降了2/3，表明最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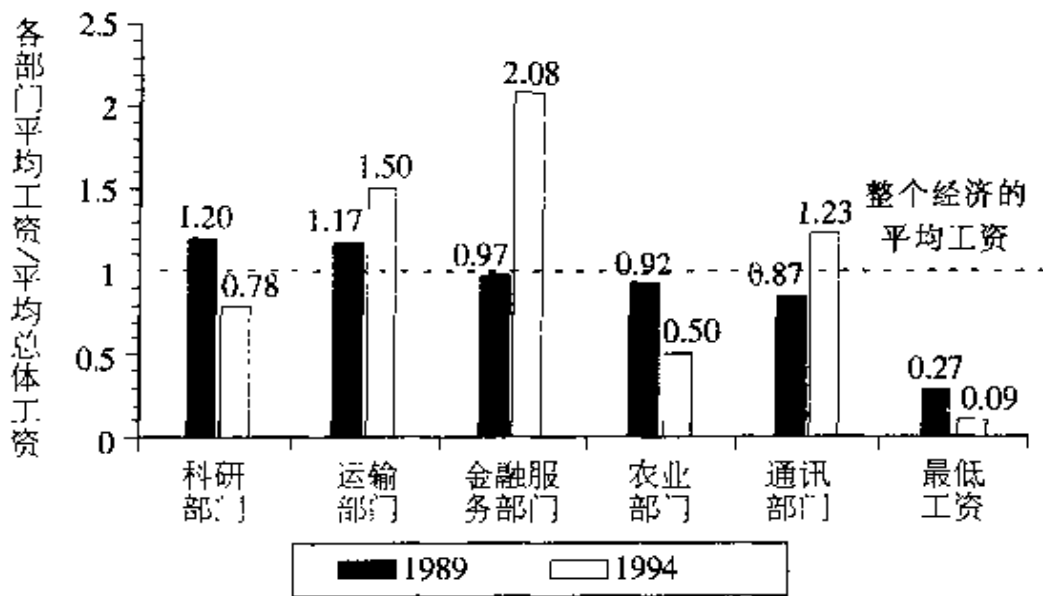


图10—7 所选各部门相对工资
(平均部门工资与整个经济部门平均工资之比)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5b; p.14).



在家庭平均私人收入急剧下降的同时，公共服务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在急剧下降。以前普通俄罗斯人能到消费得起的度假胜地和夏令营，现在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由于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医疗卫生补助，医疗卫生质量和数量极大地下降了，对此，很多诊所和医院重新配备人员，提供有偿医疗服务，同时，年轻的大夫又企图移民出国。公共卫生服务也下降了，其结果是，过去在俄罗斯很少见的疾病又流行了起来，1993年夏天一种叫霍乱的流行病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并且发现了15 210起白喉病患者。^[28]

作为苏联取得最大成就之一的俄罗斯科学也受到了经济状况的拖累。研究机构大幅度削减了预算，为了维持生存必须自己寻找项目。一些从事研究的世界级俄罗斯科学家不是将夏天的时间花在搞研究上，而是用来给美国高级中学的学生上课，以维持生活之必需；^[29]其他人则放弃科学到银行从事记账工作，这种情况与图10—7所表明的金融业的高收入激励相对应。从廉价的国外劳动力这种独特的观点来看，美国企业在俄罗斯雇用了顶尖级的俄罗斯科学家为他们工作，而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研究员工资的一小部分。^[30]

在俄罗斯，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话题。^[31]在苏联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但那时处于边缘状态，现在，它已作为一种主要的暴力出现在俄罗斯，尽管没有人确定它有多大的力量。^[32]1994年为叶利钦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说，大城市中70%~80%的私人银行和企业不得不支付其收入的10%~20%给有组织的犯罪团伙。^[33]俄罗斯内务部负责有组织犯罪的官员估计，俄罗斯银行贷款的20%实际上都付给了“黑手党”组织。^[34]

在俄罗斯，犯罪集团有目共睹，而且使用暴力。使用自动化武器或炸弹的有组织犯罪事件时有发生。1993年，犯罪集团的暴力行为使120位银行雇员致死，其中包括15位主管，而且在这一年，在银行办公楼发生了780起纵火爆炸案。^[35]这些事件促使俄罗斯银行协会主席瑟吉·叶戈罗夫写信给叶利钦总统，抱怨“社会的各个方面、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成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匪徒的袭击目标”^[36]。



1994—1995年至少有两名俄罗斯议会议员被谋杀，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被认为应对此负有责任。^[37]任何一个在莫斯科街道市场买东西的善于观察的人都能看到衣冠楚楚、外表粗犷、在商店里巡逻的“黑手党”成员，他们在砍价，并从商人手里取走货款。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在抢劫财物时肆无忌惮。据报道，一些居住在莫斯科良好地段公寓里的居民被旨在夺取近期私有化了的公寓的所有权的犯罪组织所谋杀。^[38]警察在执行公务逮捕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时要戴上面具，这表明了犯罪集团的实力之大。^[39]犯罪集团的老板觉得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倒是维持秩序和法律的警察心里害怕遭到报复。在一个警察而不是罪犯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的社会，肯定存在着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问题。

行贿受贿这一有组织犯罪的孪生兄弟在俄罗斯也一直很风行。俄罗斯原材料出口的很大的但又不为人知的部分被认为是非法的。这些人付钱给官员，而这些官员对他们无出口证也视而不见；“仁慈”的边境卫兵居然“忘记了”俄罗斯与拉脱维亚之间的边境线，结果是1992年拉脱维亚向俄罗斯出口了23.8万吨有色金属，尽管它什么也没有生产^[40]；有人发现军用飞机被用来运输矿物，仅仅是为了创收。1993年对莫斯科私营企业的一份学术研究发现，80%的企业声称其行贿是为了做生意。^[41]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莫斯科商人告诉作者，在1995年6月，通过行贿，他在与国有建筑材料供应商做贸易时得到了30%~40%的折扣。

休克疗法将俄罗斯从对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中带到同样是对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扭曲的漫画之中。这里有私营企业、银行、甚至股票市场，然而，迄今为止，曾经许诺过的新的有效的、成长的、技术上进步的经济还缈无踪影。

在俄罗斯，最麻烦的统计也许是人口的统计。表10—3列出了俄罗斯每千人中的出生、死亡以及自然增长率。一个国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出生率或死亡率的上升或下降，这些因素中有些是无害的，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拥有更好的控制生育的手段等，但在俄



罗斯，突发性的出生率或死亡率的变化明显地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化所致。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上升，到1988年就下降了。到1989年，即俄罗斯未来发展进程的性质突然变得不确定的第一年，出生率下降到了1980年的水平。在1989—1993年，出生率持续下降，下降了36%。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人对未来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因此，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对养育孩子负责任。

表 10—3 俄罗斯人口统计 单位：人

年	每千人出生数	每千人死亡数	自然增减数
1980	15.9	11.0	4.9
1985	16.6	11.3	5.3
1986	17.2	10.4	6.8
1987	17.2	10.5	6.7
1988	16.0	10.7	5.3
1989	14.6	10.7	3.9
1990	13.4	11.2	2.2
1991	12.1	11.4	0.7
1992	10.7	12.2	-1.5
1993	9.4	14.5	-5.1
1994	9.5	15.5	-6.0
1995*	9.5	15.0	-5.5

资料来源：Rossiiskii Statisticheskii Ezhegodnik (1994, p.43), Statisticheskoe Obozrenie (1995, No. 12, p.5).

* 截至1995年10月。

1986年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然后，到1991年又逐渐上升到大约1985年的水平。在1995年登记死亡率小幅下降以前，即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前三年1991—1994年间，死亡率快速上升，上升了36%。人口统计学家不同意用这种原因来解释1991—1994年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大多数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和给公共、私营医疗卫生事业拨款减少的时期里，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另外一个因素是由于俄罗斯人所熟悉世界的消失而产生的痛苦。

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降低了俄罗斯所经历的后苏联时期大规模的自然人口增长。1992年人口开始下降，到1994年，人口减少数几乎达到6%，正常情况下，这样一种人口降低速度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瘟疫和饥荒的结果。这种负的人口增长涉及的主要是男性，从1990—1994年，俄罗斯男性的寿命从65.5岁下降到了57.3岁。57.3岁的寿命比印度人、埃及人和波利维亚人的寿命还要短，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国家的人均寿命短。^[42]

为什么休克疗法没有起到预期作用

没有证据表明，采取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变成了有效的、技术上进步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其近期的效果却是生产的大幅回落、高速的通货膨胀、大部分人的贫穷、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公共服务的减少、犯罪和腐败的增加和人口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俄罗斯正处于非工业化的危险之中，正在变成一个依靠进口获得制成品的原材料出口国。

休克疗法并没有产生其提倡者所许诺的效果，这并不奇怪。事后看来，人们清楚地明白休克疗法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在实施休克疗法以前，对分析家来说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43]由于休克疗法的结果已尽人皆知，在东欧、中欧以及苏联产生了大量的批评休克疗法的著作。^[44]

在俄罗斯由实施休克疗法所产生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解释。下面，我们首先讨论休克疗法政策每个组成部分出乎意料的结果，指出这些政策是如何导致1992—1995年间俄罗斯所经历的经济困难的。然后，对“改造苏联体制的最好的方法是在政府发挥有限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快速转变”这一主张进行评价。最后，我们提供一个经济转型基本设想的案例，休克疗法即以这一基本设想为基础；这一经济转型的基本设想有很多缺陷，除了已经造成的短期问题外，从长期来看它也不能将俄罗斯带到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政策的问题最终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它忽视了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产生了与预期极不相同的结果；其次，休克疗法的经济理论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在后一条批评线索中，相对来说涉及经济学家之间有关技术的争论。接下来我们将强调第一方面的问题，即休克疗法与继承下来的制度框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尽管这也要参照休克疗法理论的问题。

休克疗法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第九章我们列举了休克疗法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价格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实际上，这些政策没有一项按照预期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迅速消除残留的中央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不是让市场力量接管资源配置功能，使经济一点也没有协调功能，结果是经济混乱和生产衰退。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关系尚未发展起来之前，1990—1991年间部分地废除中央配置资源是那几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992年对残留的中央配置资源方式的废除对已经衰退的经济产生了更为有害的冲击，在这期间，企业不得不在经济混乱之中努力创造新的供应和市场关系。

A. 价格自由化、通货膨胀、缺乏供给效应

价格自由化，这一休克疗法的主要问题，产生了比预期更为严重、时间更长的通货膨胀。最初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爆发是由商品相对于俄罗斯居民的巨额储蓄十分短缺造成的，它带来的副作用根植于俄罗斯的经济之中，难以根除。由于1992年1月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5倍，工人们为了获得增加工资以赶上飞涨的生活费用而行动起来。价格上涨使得最近价格放开的卢布的价值相对于外汇来说下降



了，从而迅速提高了进口货物的卢布成本。因此，价格上升不久，在劳动、非劳动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都变得更昂贵的时候，企业发现其成本急剧上升。^[45]成本高导致企业再一次抬高价格，从而使俄罗斯陷入成本—价格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之中。

通货膨胀因俄罗斯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高度垄断的经济而变得更恶劣。俄罗斯的大型企业几乎没有面对竞争，在近期的任何时间也不用害怕新的竞争对手进入他们的市场。因此，当价格突然放开后，俄罗斯垄断企业没有任何约束就抬高了他们的价格。

俄罗斯经历了价格自由化糟糕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价格自由化所产生的价格上涨对供给的刺激这一好的一面并没有成为现实。价格上涨被认为将导致生产的增加，只有那些不符合需要的、价格被认为将下降的产品的产量才有可能下降，但相反，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商品的实际产量都一起下降了。

休克疗法通过引发对俄罗斯生产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而引起了整个经济中生产的下降。像凯恩斯所教导的那样，总需求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主要是企业投资设厂和购买设备）和政府支出，^[46]休克疗法直接和间接地使总需求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都迅速地下降了。

按以前的传统，俄罗斯国民产出的将近一半被以消费品的形式出售给家庭消费。^[47]1992年1月价格突然放开以后使得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28%^[48]，大多数家庭只能消费一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49]

由价格自由化所产生的高速通货膨胀导致了投资环境的恶化，这也对正常的供给效应带来负作用。高速的通货膨胀使手头握有现金的个人和机构将其迅速贬值的卢布兑换成能保值的资产，特别是外汇、房地产和珠宝。由于这些人将资金投资于这些资产，因此，这些资产的价格也就迅速地上涨。这种情况提供了获取高额投机利润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相对来说价格迅速上涨时买入，然而再卖掉。那些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很快地发了财。相反，投资于普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



能获得如此高额快速回报。俄罗斯投资者对利润动机反应灵敏，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投资。与从事外汇和珠宝投机相比，生产性投资，也就是说，建造新的厂房和购买新的设备，似乎是不值得的投资。

因此，由价格的自由化所产生的高速通货膨胀使总需求的前两个部分即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都下降了，这使得严重的衰退不可避免，除非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私人支出的下降。

B. 宏观经济的稳定

休克疗法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是要求削减不断增长的政府支出。作为休克疗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支出必须大幅度削减，我们在第九章已看到，1992年政府支出确实也大幅度减少了。由于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已迅速减少，衰退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休克疗法的紧缩银根政策也在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它使企业获取资金以投资兴建厂房和购买设备变得困难。^[50]

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休克疗法的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并不能达到迅速阻止通货膨胀的预定目的。虽然这些政策长期内确有可能遏制通货膨胀，但是，要以紧缩银根这一货币政策来阻止1992年俄罗斯呼啸而上的通货膨胀是很困难的，当通货膨胀按照成本—价格螺旋式上涨并且伴有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51]在1992年第一季度实施非常严厉的货币政策（也包括严厉的财政政策）的三个月里，确实降低了通货膨胀，但它给俄罗斯的工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难。^[52]

如图9—2所示，在1992年，特别是年初，价格的上升远远超过货币量的发行。到1992年夏天，与大大提高了的价格相比，企业的营运资本已经远远降低到了维持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水平以下，也就是说，他们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工资和其他非劳动投入，而中央银行由于紧缩银根也使企业得不到所需要的资金。生产将慢慢停止下来。



人们普遍认为，那时候来自于绝望的企业主的政治压力在罢黜央行行长乔治·马图什金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992年7月中旬，马图什金被对俄罗斯工业的资金需求更富同情心的维克多·格拉申科所取代^[53]，格拉申科取代马图什金后，货币政策也放松了。

由于在实施休克疗法时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较松和更紧之间摇摆不定，通货膨胀率也随之时高时低。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趋势有所下降，但到1995年年底仍然没有被控制住。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说只要俄罗斯政府更严厉些，这些政策将控制住通货膨胀，这是真的，也是误导。如果肯定俄罗斯政府对紧随长期——也许是两年——的超紧缩政策而来的高速的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也不受其影响，那么，通货膨胀将会被控制住。但是，由此所产生的代价对任何一个对其公民和经济困境有所反应的现实政府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

休克疗法的紧缩公共支出政策和紧缩银根政策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长期的高额成本。信贷资金的紧缺和利息费用的高昂给迫切需要这一切的俄罗斯工业的现代化设置了障碍。如果俄罗斯企业能够获得资金以提高产品质量，并建立一个有效的营销系统，那么，很多俄罗斯企业就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取得这样的改善——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54]

削减政府支出也损害了长期的经济福利，俄罗斯需要提升其运输、通讯和电力系统。但是在这些领域的政府支出大幅度削减了。对科学的资助也削减了，从而逐渐削弱了俄罗斯未来技术发展的潜力。教育和保健支出的削减以及人口素质的下降正在降低俄罗斯劳动力的质量。

C. 私有化问题

俄罗斯政府在对大多数企业实行私有化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给经济带来预期的效益。在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几年间，



企业几乎不存在对理性经济行为的激励。休克疗法一经宣布，众所周知，构成俄罗斯经济主体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久就属于私人所有，但具体属于谁，却无人知道。这样就缺乏对企业的未来进行投资的激励，因为除了几乎不受影响的工人以外，无人知道谁将获取投资的收益。

迅速的私有化是否是确保企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还不是那么清楚。重建俄罗斯企业，而不是迅速私有化，将是明智的政策。^[55]在很多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国有，在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很多成功的国有企业中，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能够迅速有效地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

将企业交给私人所有并不能够保证它有效地运行。有很多因素决定经济的有效性。所有权形式的相对重要性被提倡休克疗法的人夸大了。一项对在俄罗斯环境下企业所有权形式对经济成功的影响所作的精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企业必须在其中运行的环境相比，企业所有权形式要次要得多。^[56]这不意味着在企业属于国家所有时，使俄罗斯国有企业对市场信息作出有效的反应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企业私有化并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企业行为合理化的主要障碍在于企业的经济环境，不在于所有权形式。

迅速的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在此之前，俄罗斯并不存在能够买下国有大型企业的合法的富有阶层，在这种环境下，想匆匆忙忙地将国有经济财富交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在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这些人与那些制定私有化决策的人有着最密切的关系。^[57]在人民眼中，这一过程剥夺了俄罗斯新的财产所有权结构的合法性。

私有化与休克疗法的其他部分一起发生作用，是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除旧有的上层集团成员外，社会上其他的掌握了最近私有化了的国有资产的居于有利职务的集团组成了犯罪团伙。所谓的“黑手党”有大量的资金进行投资，也有能力采取暴力措施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对企业的控制。价格的自由化使包括私有化以前



负责管理有价值的经济性资产的政府职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变得贫穷，他们中甚至最诚实的人也发现他们只有靠接受贿赂才能生存。政府支出大幅度削减也削弱了维持社会法治的警力，价格的自由化剥夺了他们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贿赂。在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发展成俄罗斯生活中如此重要的角色方面，休克疗法的各项政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D. 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有限影响

在新的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下，由于大型西方企业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和营销力量步步进逼，在主要的城市中外商品很快就取代了诸多国内商品。^[58]在自由贸易政策激励俄罗斯工业更有效地生产时，俄罗斯市场的独特性质限制了这种效果。俄罗斯新贵和新的中产阶级是突然增加的进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他们偏爱外国商品，不在乎昂贵的价格。大部分购买力有限的俄罗斯人能够购买一些进口商品和少量奢侈品，但他们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国内商品，因此，新的进口商品对产品质量的改进或价格上的限制所施加的竞争压力比预期的要小。

绝大部分俄罗斯企业仍然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产品竞争。在存在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对外实行相对的进口自由非明智之策。这当然也不是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其早期面对更强大的国外竞争时所实行的政策。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过贸易保护以支持国内工业，直到其没有这种保护也能有效地与国外商品竞争为止。^[59]

俄罗斯宣称欢迎外商投资，但并没有吸引多少外资。除了在石油和原材料方面的一些投资以及为在俄罗斯出售西方的消费品，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投资机会。^[60]外国投资者面对延续下来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的障碍毫无疑问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即使这些问题解决了，由休克疗法所创造的条件也不能使俄罗斯成为吸引所需要的外商投资的场所，高速的通货膨胀、产量的下降、实际收入的下降以及犯罪和



腐败的蔓延所造成的环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极不稳定的。外国投资者将不会在任何一个处于这种条件的国家中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能迅速产生利润的投资才具有吸引力。但是，俄罗斯所需要的是能使其经济长远发展的投资。

E. 迅速转型与自由放任

休克疗法不只由第九章所列举的五方面政策所组成，它也包括经济转型要迅速以及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限制国家的调控作用这样的处方。经济迅速转型的三个论点是：1) 旧体制和新体制不能同时运行；2) 历史表明渐进式改革行不通；3) 为了防止向旧体制倒退，迅速转型是必要的。以上三个论点都没有说服力。

向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渐进式改革确实意味着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新旧体制的同时并存。但是，不是混合经济体制不能运行，而是它是现实生活经济的原型。现实中不存在只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关系的纯粹经济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中也存在其他经济体制的主要成分。西欧和北美的大量经济活动，包括全国和地方政府、非盈利机构（医院、学校、研究机构、宗教组织）以及家庭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来完成的，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盈利。有着与苏联相似的经济体制的中国，现在已拥有在规模上与实行计划的国有经济相等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领域，不管它有什么问题，这种混合经济在过去 15 年中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中当属最快之列。

历史表明，渐进式经济改革确实行得通。资本主义是经过数个世纪才首先在英国逐步发展起来，在此之后，其他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经历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甚至在 20 世纪，像诸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也得历经几十年时间。建立如国家社会主义这样高度集中的体制不需要很长时间，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一种极其昂贵的体制转型办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



是有着多个独立的决策和行为中心的相对集中的体制，要建立它必将经历一个长得多的发展时期。

为防止以前的苏联上层集团重新组织起来并阻止转型进程而需要实行快速转变，这种信念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即党—国精英们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精英中的大部分人支持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休克疗法的代价和失败使得转向资本主义面临着夭折的威胁。

休克疗法改造经济体制所用的自由放任政策是不现实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几乎没有国家的帮助，尽管对此不乏争论，但是，此后的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力量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无可争议。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在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政府资助修建了运河与铁路，训练劳动力，保护制造业免受强大的国外竞争。^[61]

但是，与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成功的市场体制情况相比，那时候国家的作用相对地受到限制。在日本和后来的韩国，政府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鼓励发展技术上先进的工业，提供资金、投资指导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韩国，政府阻止资本出境，确保国内投资。^[62]最积极的政府指导并管理市场，控制信贷资金使其流向关键部门。这样一些方法不是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相反，反而似乎是今天成功地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基本条件。即使俄罗斯准备等待几个世纪（这是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面对着作为竞争者的强大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时，如果没有最积极的国家指导其发展，俄罗斯也不可能获得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F. 休克疗法的基本缺陷

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缺乏理解^[63]，他们也无视俄罗斯早已存在的尚待改造的经济体制的特点。^[64]结果是，他们凭着转型的构想来设计方案，但除了上面提到的特殊问题

外，这种构想基本上是有缺陷的。由于这些缺陷，即使能克服由休克疗法引起的严重的短期问题，这一战略也不可能达到在俄罗斯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长期目的。休克疗法的基本构想是选取俄罗斯经济中现存的生产性实体，通过把它们私有化并把它们从国家的控制和支持下解脱出来，把它们改造成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像这样的生产性企业并不是孤立的实体，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发展并发挥作用。相信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较快而轻松地转变成正常的资本主义企业，这种想法忽视了单个的生产企业和作为整体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共生关系。

除少数情况外，俄罗斯企业完全是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建立起来的^[65]，这些企业是靠着的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结构和一系列传统而发展起来的。苏联体制的诸多特征以及在该体制下的企业，使得将这些企业改造成正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休克疗法战略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第一，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从莫斯科到整个苏联，都严格地规定了企业的产出、投入和生产过程。在这种既定的协调体制下，建立起非常大型的企业是合乎逻辑的，这些企业只有一个或两个生产其每一种主要产品的原材料来源。典型的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比西方企业要大得多。如果这些企业是在市场环境下运行，它们将拥有巨大的垄断力量。^[66]

第二，这种体制建立在纵向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基础之上，每个企业年复一年地从相同的特别是单个的原材料供应商那里接受分配给它的投入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单个的企业并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是相互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实体，它们更像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的附属公司，只是苏联企业所拥有的来自于中央计划者的自主权比典型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附属公司所拥有的来自于母公司的自主权要小。稍微夸张地说，苏联实际上只有一个企业，它是一架巨型的、相互联系的综合性生产机器。

第三，在这种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公司城”模式与我们在资本主



义市场体制下看到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俄罗斯很多城镇都由一个或几个企业所支配，城市中的主要企业不但提供就业机会，还提供大部分的社会服务。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雇员、也常常是城镇居民的家长式的保护人。管理者的事业不是靠降低工资、裁减冗员、建议将企业迁到另一个地方来获得提升，苏联的管理人员不得不为了良好的表现而在来自上司的要求和保护雇员利益的需要之间进行权衡。

第五，由于这种体制实行的是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直接调配，该体制的金融方面仍停留在不发达和很被动的状态。资金被自动地提供给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在指导生产上不发挥独立的作用。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这五个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休克疗法转型战略不足以取得长期的成功。国家社会主义留下来的垄断经济结构在将企业转变为私有自主实体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一个非竞争性的市场而且具有垄断特性的体制中，竞争性市场的预期利益——费用的最小化、对消费者愿望的迅速反应以及新技术的迅速采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只能将其从国有企业转变成私有垄断企业，而不是多个公司复合的企业，因为经济的集中化主要是以垄断企业或企业联合体为基础，所以在将现存的生产性企业重组为竞争性企业中无捷径可走。

只有依靠减少提供给企业的廉价的信贷资金和国家资助，才有望通过市场力量把那些无效率的或生产品不符合市场需要的企业淘汰出局，同时奖赏那些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的企业。但是，从俄罗斯经济沿袭下来的纵向一体化和“工业城”式结构使这种办法在获取效率上行不通。^[67]如果一家没有效益的企业破产，将会连累很多其他在供应或市场上依赖于这家企业的有效益或无效益的企业。随着企业的破产，依赖于该企业的城镇就业、税收和公共服务也随之面临困难。

对于这种既定的经济结构，由市场来决定破产的方案是不合适



的。即使在信贷资金和资助减少的情况下，要求继续提供信贷资金和资助的压力也是很难抵制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直接资助和提供廉价的信贷资金以维持企业生存。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将企业转变成私有化方案所期望的自主的经济实体，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家长式角色在1992年对需求的衰退作出了出乎意料反应。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人员将要大幅度裁减劳动力的时候，俄罗斯企业管理人员不愿意裁减劳动力，甚至将生产维持在由需求所调整的水平以上。如果现已私有化的俄罗斯企业确实引进新的管理人员，准备大幅度裁减劳动力，并将工作节奏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水平，那么它将在厂里引发尖锐的冲突，俄罗斯工人已习惯了原有的家长式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待工作中以一种将影响经济恢复的斗争方式来对这样一种巨变作出反应。

在经济衰退中，企业管理人员忙于寻找办法使企业健康运行。大量的已不再符合需要的产品——不管是军用设备还是出口给以前的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重新找到了出路，其他的企业则生产持久性需求商品，但资本设备必须升级，市场容量必须扩大。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本，但欠发达的俄罗斯金融体制不能提供这些资本。^[68]然而，那些准备从军用产品转成民用产品的拖拉机厂或光学厂，虽然其未来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几乎得不到资金用于企业的重组。

通过休克疗法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基本构想与俄罗斯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体制不协调。这种转轨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而是从先前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开始。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出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惟一有效办法可能是模仿资本主义的原始发展过程，只能在以前已存在的经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并不是通过把大量的封建领地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而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形式逐渐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以前的形式的同时，封建主义的残余——农民和工匠的生产——一直在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商品。

这一过程适合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要模仿这一过程，将要求俄罗斯在促进新的非国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形成的同时，要以低的受到控制的价格将大型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将其置于中央控制之下。这样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双轨制战略”，即在原有的国有经济领域之外寻求发展新的私有市场经济领域，而不是将国有经济转变为私人市场经济。通过使国有企业生产出廉价的投入品，并为新设立的企业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从而为新设立的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69]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成功地采取过的战略。

除了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努力中不具有任何休克疗法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不存在私有化——国有企业仍然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没有突然的价格自由化——国有企业继续以受控制的价格销售产品；国有经济领域仍然实施中央计划；与大幅度削减国家支出相反，各级政府都把资金投入运输、通讯和能源领域，以改善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提供大量的资金使企业扩大规模和实现现代化。国家寻求用几十年的时间来逐渐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对这一过程也给予了指导。

在中国，始于 70 年代后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于国有经济领域之外，中国在提供稳定的和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的同时，也鼓励设立新的非国有企业。在 1978—1990 年，非国有经济以每年 17.6% 的不寻常速度增长^[70]，到 1994 年，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来自于非国有经济领域。^[71]

中国所经历的这——很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并不都是有益的，它已经产生了环境的破坏、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以及正在增长的收入不平等。

但是，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相反，中国模式产生了非常快的经济增长和大部分人口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72]很多俄罗斯人在了解到俄罗斯国民在去曾经比它更落后的中国旅行并能在那里的餐馆和夜总会找到就业机会时感到很懊恼。在建立市场体制的战略上，中国和俄罗

斯的主要区别是，中国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设计的，这些领导人不管其缺点怎样，都能密切关注其现存经济体制的特点，并懂得渐进的、由国家管理的经济转轨的优越性。^[73]

中国的战略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并没有相似的战略，这一点并不奇怪。渐进的、受国家指导的改革办法与新自由主义观点截然相反，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叶利钦的顾问中处于支配地位。中国的改革战略似乎与共产党的持续统治相联系，而俄罗斯废除了共产党的统治。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将会看到的，由休克疗法所产生的经济问题不久就使得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人开始考虑截然不同的中国改革战略是否对俄罗斯有所启示的问题。

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不同集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少数人变得富裕了，有些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大部分人变得比以前更贫穷了。甚至对于那些构成最初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团体来说，休克疗法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部分以前的党—国精英变得富裕了，其余的人则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工资缩水；一些原材料和金属加工部门的企业主管人员能获得有价值的企业的所有权，而在别的经济部门的经理人员则在为防止其企业破产而努力。知识阶层为其最近获得的知识自由而高兴，但是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水平遭到了大幅度的下降，并且被社会的商业化孤立起来。

如果休克疗法政策提供了其提倡者所许诺的全面的经济福利，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的总体成本是适度的，或者至少主要伴随着经济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那么，休克疗法的不均衡的影响将不至于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动荡。如果伴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和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也就不会迅速扩大。幸运的少数人和不幸的大多数人之间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再加上整个经济的迅速衰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休克疗法的巨大代价威胁着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整个进程。这种状况的讽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91年底，获得了胜利的亲资本主义联盟在俄罗斯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在总体上击败了它的对手；



它有着来自西方势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在俄罗斯重返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似乎没有什么障碍，近 75 年前它就迷失了这一资本主义方向——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除了经济政策变得无效以外，在经济政策生效 12 个月之后，政治气候也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久，在长期以来就是反共产主义笑话中心的莫斯科流传着这样一则新笑话，这个笑话是：共产主义用了 70 年不能完成而资本主义只用了一年就完成了的是什么？答案是：它使共产主义看起来正确（亦指好笑的）。对于成百上千万普通俄罗斯人来说，这则笑话中令人不快的事实使得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方向变得迷茫不定。

[注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b，10 页）。

[2]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减少人口整体的购买力。这一点我们后面要讨论到。

[3] 休克疗法的支持者常常认为官方的统计夸大了俄罗斯经济的衰退。这些数据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企业可能向官方少报产量以逃避税收（或者对非法产品起诉）。这可能低估年度产量的水平，但它不会使产量长期的增长率发生偏离。其二，批评家认为苏联国家统计局过低计算了正在成长的私营企业因素。如果是这样，就会导致对产量的水平和增长率两方面的低估，因为私营企业活动已经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支持者则宣称，从 1993 年开始，在私营企业成为全部经济产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官方机构就已经作出一系列的努力以精确估计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

[4] 俄罗斯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使我们很难对经济变量的“真正”（亦即，经过矫正的通货膨胀）价值的比率变化进行有意义的估计。这也可归因于不同产品的价格以明显不同的比率增长，使得真正的增长率体系对于使用的价格指数的类型和选择的基本年度十分敏感。1992 年 1 月这一个月内突然爆发的通货膨胀提出了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真正”价值。

[5]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美国经济学家用来计算全部经济产量的概念。最近，它被一个与之有细微差别的概念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

[6] 图 10—2 表明了从 1992 年到 1995 年的衰退情况，其中包括从 1992 年到 1995 年的休克疗法时期。

[7] 除了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工业面临的普遍问题，纺织工业还存在着持续的棉花短缺问题。从前棉花是来自现在已经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8] 有些俄罗斯的经济观察家建议大量报道的生产衰退，主要地甚至完全地表示军工企业产量的衰退。这些数据所揭示的普遍的产量衰退，是不可信的。

[9] 国际货币基金（1992a，58页）。有些专家认为价格控制产生了使官方的通货膨胀统计低估苏联价格通货膨胀的真实比率的效果。

[10] 图 10—4 使用的消费价格体系是建立在 1991 年的零售价格指数、1992 年的混合价格指数和其后的扩大的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上的。大多数专家使用在图 12—4 中表示的体系。对这些价格指数的讨论，见 Koen（1994）。除了另作说明，这本书中引用的月度通货膨胀率指一个月内的增长，年度通货膨胀率则指整个年度的通货膨胀。

[11] 生产价格的增长看起来比消费价格的增长要快，尽管俄罗斯的生产价格指数还存在许多问题（Koen，1994）。

[12] 加拿大出版公司，莫斯科处文件。

[13] 通货膨胀本身是重新分配实际收入，表示减少收入。工薪阶层和接受救济的人们作为整体的收入减少了，因为通货膨胀已经把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转移给其他集团了。

[14] 国际货币基金（1993，91页）；《统计观察》（1995，No.12，60页）。

[15] 该计算来自《统计观察》（1995，No.4，57—58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b，15页）。

[16] 对平均的实际抚恤金的计算来自《统计观察》（1995，No.4，61页；No.12，62页）。图 10—5 引用了上述材料。计算 1992—1993 年的平均实际抚恤金的数据是不可用的。

[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b，11页）。

[18] 《统计观察》（1995，No.4，11页）。

[19] Hough（1994，27页）。

[20] 据纽约美联社 1995 年 5 月 19 日报道。剩余的 18% 说他们的境况没有变化。

[21] 该研究由 Vox Populi 和经济新闻代理机构《独立报》所做，据《商业世界周刊》，1994 年 8 月 9 日报道。在名单开头的五个人中，有四个是银行家。

[22] 关于两位市长造币活动的报道可见《华尔街日报》，1994—02—13，

A1 版、A7 版。

[23] 也存在例外。莫斯科商业银行现在宣布把大部分资产投入生产性贷款。有些俄罗斯银行由制造业创建，其主要目的是为建立的公司提供信用；甚至此类型的银行典型地从资产推测中获取利润。在经济衰退和急剧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很难从对生产性企业的贷款中取得利润。

[24] 尤里·梅日尼科夫，俄罗斯国际警察组织的首长，估计到 1994 年底俄罗斯资金外流达 800 亿美元（OMRI 每日文摘，第一部分，No.122，1995 - 06 - 23）。

[25] 在 1992 年到 1994 年的二年里，俄罗斯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39 亿美元，而官方的赠予和信贷（不包括债务延期）总共为 155 亿美元（欧洲经济委员会，1995，148 页）。

[26] 美国的收入分配在 7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有明显不同。今天美国的收入分配比其他领先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均衡。

[27] 关于苏联，见 McAuley（1979，57 页）；关于俄罗斯，见《统计观察》（1995，No.12，58 页）

[28] 《纽约时报》，1994 - 10 - 02，9 版。

[29] 《纽约时报》，1995 - 07 - 25，A4 版，来自新泽西和长岛的参加威斯汀豪斯科学竞赛的中学生，可以在部分俄罗斯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蛋白质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保护下在俄罗斯的普希诺度过一个夏天。通常，只有他们的研究生才有这样的殊荣。

[30] 1992 年 5 月，贝尔实验室聘请了两位俄罗斯物理学家为其进行研究。这两位是在波和非线性光学领域领先的专家，他们每月得到 5 000 卢布，按当前的汇率折合 11 美元。同一个月，科林公司从俄罗斯的两个研究机构雇用了 115 名科学家和技师。太阳微系统公司也从俄罗斯雇用了大批计算机专家（《纽约时报》，1993 - 01 - 11，D1 版、D2 版）。

[31] 见 Hersh（1994）。

[32] 下文将讨论到 1991 年以来有组织的犯罪的上升与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策略是有联系的。

[33] 《纽约时报》，1994 - 01 - 30，1 版。

[34] 《波士顿全球报》，1994 - 05 - 09，6 版。俄罗斯用术语“黑手党”（mafia）表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35] 《波士顿全球报》，1994 - 05 - 09，1 版、6 版。

[36] 《纽约时报》，1993-08-16，A6版。

[37] 俄罗斯立法委员安德烈·阿伊兹德茨基在他的报纸上登了266名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的名字后不久在家中被枪杀（《纽约时报》，1994-04-28，A7版）。谢尔盖·索罗什金，一位商人和议员，在1995年2月1日被绑架并杀害。此前，索罗什金先生曾击毙了一个被他认出的黑手党分子。（《纽约时报》，1995-02-03，A11版）。

[38] 当莫斯科的公寓私有化的时候，大多给了它们当时的居住者。那些居住在理想位置的公寓中的居民要是同那些居住在相对较差位置的公寓的居民交换房子，不仅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可以获得一套新公寓。但他们不愿搬到新家。莫斯科警方报道，在1994年头三个月，在这种公寓中就有32个莫斯科人被谋杀，另外还有1750人未计算在内（《莫斯科时报》，1994-06-04，1版）。

[39] 《莫斯科时报》在1994年6月4日第2版上登了一幅照片，佩带自动武器的内务部警察带着面具在莫斯科美属拉狄森·斯拉夫斯卡娅饭店的大厅里逮捕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头目。

[40] 《莫斯科新闻周刊》，1992，No.50，9页。

[41] 与瓦季姆·拉达耶夫的会见，1995年6月13日。拉达耶夫是莫斯科经济学院经济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系主任，他指导着对277家莫斯科企业的样本研究。

[42] 《纽约时报》，1995-08-02，A1版。妇女受的影响少些，她们在1994年预期寿命为71.1岁（OMRI每日报道，第一部分，1995-08-23）。

[43] 一些不太教条的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休克疗法下的理论与苏联面临的现实制度同中东欧国家存在的差别，再次建议从头开始休克疗法，例如Galbraith（1990）。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

[44] 例子可见Amsden等人（1994），Goldman（1994），Millar（1994），Kregel和Matzner（1992），Weisskopf（1992a）以及Murrell（1993）。尽管休克疗法的引入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它仍然有许多支持者。最好的例子大概要算Åslund（1995）。Åslund认为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与它的成就相比还是较小的。

[45] 经济萎缩使成本压缩更为困难。在经济萎缩时，如果企业减少产量，固定成本的存在，例如厂房折旧和管理工资，就会使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增加。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会使处于生意低迷时期的公司十分痛苦。但在俄罗斯，尽管产量降低却不愿减少工人使得他们的工资转变为产品的固定成本。



[46] 净出口是总需求的第四个因素，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普通的净出口与其他三个因素相比要小得多。

[47] 在1989年到1991年间，住房消费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4.4%~46.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91页），

[48] 来自图10—5。

[49] 从价格自由化中获利的新富人，有很多可花费的钱，但他们把大量的钱花在购买进口货上，而不是花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上。

[50] 非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职业经济学家会推荐使经济萧条的政策。答案可以从那些设计了休克疗法的货币主义者所坚持的基本信仰中得到。这种信仰来源于凯恩斯革命之前的古典西方经济思想。这种观点认为总需求从来就不是问题——就如萨伊定律所说的那样：“供给产生需求。”根据这种学说，私营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必然产生足够的收入并要求卖出最终产品。这种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政府消费并不影响需求，因为税务和财政借贷会使私人消费减少同等的数量。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影响的是价格，而不是实际的产品。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认为，价格自由化会刺激生产，所以他们坚持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正如凯恩斯在60年前令人信服地论述的那样，现代经济活动实际并非如此。需求下降时，生产也会下降；公众消费也和私人消费和投资一样影响总需求。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花费巨大代价得来的教训，在80年代却被许多从事经济职业的人淡忘了。

[51] 在处于繁荣时期的经济中，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可以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策可以限制过度的总需求，使其控制在经济生产能力所能满足的范围之内。但即使是这样，也要冒使繁荣的经济转向后退的风险。

[52] 俄罗斯月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在1992年上半年基本稳定，在7月达到每月11%，8月为9%。但即使按照8月计算，年度通货膨胀率仍为181%。为防止通货膨胀，严厉的政策还要持续较长时间。

[53] 格拉申科在苏联时代曾经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他的父亲在斯大林时代曾经是中央银行的人员。

[54] 例如，汽车企业VAZ（伏尔加汽车联合企业）已经以其拉达型车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但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使它无法贷到需要的贷款以使其产品达到世界标准。一位公司官员激愤地说：“国际货币基金会对俄罗斯的汽车生产不



感兴趣。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生产的车都卖不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再坚持生产呢？”（《纽约时报》，1992-07-23，A10版）

[55] 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可见 Amsden 等（1994，第一、五章）和 Berliner（1992）。

[56] Weisskopf（1994）。

[57] 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常采取企业员工购买产权的形式，主要将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了上层的管理者，而不是劳动者整体。此外，许多苏联中央经济部门的官员也结束了作为新的更有价值的私有化了的企业主要官员的历史。

[58]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来源于俄罗斯消费者长期以来对西方商品狂热的拒斥。但它也部分归因于脆弱的市场和国内农民和制造业者有限的经济来源。

[59] 在19世纪，美国对较好的英国和德国的产品，特别是那些直接与美国国内重要的处于发展中的产品形成竞争的产品，课以重税。美国的第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工业——纺织业，就是在数十年的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

[60] 俄罗斯在1992年到1994年全部的外国投资达到39亿美元（欧洲经济委员会，1995，148页）。按俄罗斯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大约9美元。

[61] Cynthia Taft Morris 已经证明，在19世纪在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许多国家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列举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商业市场、运输、教育、反欺诈、公共医疗，以及在农村地区进行农业劳动力的间接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提高”等方面所担当的角色（Morris，1992，p.11）。她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荷兰、德国、奥地利、加拿大和新西兰。

[62] 对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高度干涉主义角色的论述，可见 Amsden（1989）。

[63] 支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那些高度抽象的理论类型，对于理解那些作为从一种经济体系转到其他经济体系的主要特征的复杂的制度变化和发展进程，没有多少帮助。

[64] 一些西方顾问对苏联的经济知之甚少，认为苏联时代经济体系的特征与设计转换策略没什么关系。一位俄罗斯官员，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彼得·阿文，曾经对此深有同感，并认为“按照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特殊的国家，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那么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经济稳定

计划都是同样的”（《独立报》，1992-02-27，5版，Goldman引用，1994，106页）。

[65] 从这个角度看，苏联的体系与华约其他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有所不同。那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掌权时已经有了工业化的经济。

[66] 有一项研究估计苏联制造工业产品的80%由垄断者生产。（亚夫林斯基等，1991，66页。）苏联国家物资局，即国家供应机构，估计在1991年“在机械制造业、冶金、化学、木材和建筑业中，在全部7664件制成品中，有77%，即5884件来自于垄断（Goldman，1994，13页）。

[67] 这个问题由Leijonhuvud进行过讨论（1993）。

[68]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新的私人银行主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而不是金融业务。那些想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少数银行，主要是前国家银行系统的继承者和一些工业企业创立和控制的新银行，它缺乏能产生许多影响的金融资源。

[69] 这种两段策略是基于一个主要假设：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下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只能在国家支持和控制下进行有效运作，向不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无论持续的国家补助和控制产生的效率多么低，也要比使企业脱离国家的支持和指导而导致崩溃好些。

[70] Berliner（1992）。

[71] 中国是如许多海外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发展了资本主义体系，还是发展了一种形式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现在还不清楚。中国的大多数非国有企业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但它们确实归村镇或者工人联合体所有。

[72] 从1980年到1993年，中国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6%速度增长，这是那个时期所有国家最快的增长率（世界银行，1995，164~165页；Botswana也得到了同样的比率）。尽管在中国经济中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长比国有经济成分快得多，尽管有许多问题困扰大型国有企业，但国有经济成分还是有了一定提高。在1980年到1989年间国有工业企业人均产量增长了52%（Berliner，1992）。

[73]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方专家曾经试图使中国实行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但他们失败了。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自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以来,6个月内它一直处于未得缓和的政治冲突之中,这种冲突直接或间接地是由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所造成的,而且特别是由于采用休克疗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造成的。前面第二章中对苏联崩溃的解释,特别是对党—国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有助于说明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的进程。本章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俄罗斯的一些重要进展:第一,所谓中间反对派的出现以及叶利钦政府对此的反应;第二,反对派中的

权力砝码日益从中间派转向共产党阵营；第三，俄罗斯正在增长的专制统治的趋向。也许这些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共产党重新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角逐者而出现。我们以对俄罗斯经济与政治发展可能的未来进程的思考来结束本章。

中间反对派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的导言所指出的那样，最初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方案并没有遇到强烈的反对。1991年11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的优势投票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政策并授予他立法权来实施这一政策。然而，在代总理盖达尔与其西方导向的自由经济学家小组开始实施放开价格并削减国家开支和信贷的具体方案时，许多官员开始不安起来。1991年11月，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年轻的、缺乏经验的盖达尔及其内阁成员发表尖锐批评，嘲笑他们是“穿粉短裤黄靴子的毛孩子”^[1]。

1992年1月2日，当价格放开之后，俄罗斯人为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和他们的购买力相应的下降大为震惊。两周之后，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批评政府“失控的、无政府状态的、失调的价格上涨”，还说最初实行改革的方法是“完全不明智的和脱离现实的”。但是哈斯布拉托夫的批评并没有超出休克疗法的范围，他只是抱怨政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价格自由。^[2]

除了早期的这些批评，休克疗法在1992年的头三个月中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3]但是到了4月份，俄罗斯许多企业的经理开始担忧休克疗法对他们的实业造成的长期影响。6月份，一个在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下的名为“公民联盟”的新组织产生了。^[4]

沃尔斯基与许多企业经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公民联盟则以代表企业经理对经济政策发展方向的关注而闻名。公民联盟在对政府经济政策实行温和的反对方面成为最有影响的组织，这样说是因为它将自身置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与受排斥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反对派之间。



中间反对派并不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他们反对的是把休克疗法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们认为休克疗法破坏了俄罗斯的工业并使其人民走向贫困。他们号召代之以渐进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国家的强大地位，指导转型过程的方向，并维护人民的生活水平。

公民联盟经济学家制定了一系列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相似的替代性经济方案。^[5]他们号召重新整顿国家秩序以扭转工业生产的崩溃；国家支持大型企业以帮助它们进行重组，使它们更具竞争性；渐进地而非迅速地私有化，重点使管理者和工人成为私有者；控制工资而非紧缩银根来制止通货膨胀。^[6]

1992年中间反对派吸引了俄罗斯和西方媒体大量的关注，由于在这一年俄罗斯经历了急剧的通货膨胀、生产衰退、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下降，所以议会中对中间派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在1992年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会议召开前夕，中间派成为议会中强有力的一个政党团体，拥有大约40%的代表的支持。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支持率也上升到了30%，而休克疗法的支持率则下降到了大约20%。^[7]到1992年末，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转到了中间派的立场上，他试图利用中间派和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两大反对派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占议会中的大多数）迫使叶利钦沿着中间派提出的方针改变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间反对派的兴起反映了先前联合起来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分化，当大多数党—国精英支持建立资本主义之时，他们从未确定什么是建立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方式，一旦休克疗法开始对俄罗斯的企业施加沉重的费用负担，先前团结起来的联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因工业衰退而极为担忧的企业经理们，开始反对建立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目标。

看来中间派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分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第七章曾说过的库尔伯格（Kullberg）对1991年6月莫斯科精英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超过3/4的人赞成资本主义。然而，她也发现亲资本主义

联盟的大多数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她称之为“西化者”与“中间改革者”。前者对迅速地建立资本主义和密切仿效具体的西方制度都表示赞成，后者虽然也愿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对过渡所采取的速度表达了更多的担心，而且相信在设计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应该对俄罗斯历史的具体特性予以更多的关注。^[8] 库尔伯格发现，在她的调查对象中只有 1/4 的亲资本主义者是西化者，剩下的 3/4 都是中间改革者。叶利钦政府由亲资本主义精英中的一个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团体所控制，所以，当迅速转型的政策开始导致高经济费用的时候，分化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9]

叶利钦总统对中间反对派的反应

叶利钦对中间派反对意见的增多所作出的反应有几个方面：首先，他和盖达尔指责新中间派的建议以及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中间派的特征是以恢复到过去的苏联为借口。这一观点很快为西方媒体所采用。他们把中间派与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归并在一起，认为他们为恢复到苏联而联合在一起。这是对中间派观点的严重歪曲。公民联盟计划支持继续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并不反对俄罗斯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他们与叶利钦和盖达尔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手段而非目标。

1992—1994 年期间，在指责中间派观点的同时，叶利钦将一批工业企业主和中间派的政治人物纳入了政府之中，1992 年 6 月上旬，叶利钦任命三位以前的工业企业主担任政府要职，他们是公民联盟圈子中非常看好的人物。弗拉基米尔·舒梅科是克拉斯诺达尔斯克一家大型测量仪器厂的前任厂长，现在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格奥尔吉·希扎被任命为副总理。1992 年 7 月，叶利钦任命维克多·格拉申科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似乎对中间派有关休克疗法的批评表示同情。同年 12 月，面对来自议会不断增长的压力，叶利钦解除了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代之以切尔诺梅尔金。

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任命得到了由中间派控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压



倒多数的同意，切尔诺梅尔金原先是一个经理，后来是苏联燃料动力部的部长而不是一个学究气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背景深得中间派的青睐。切尔诺梅尔金表示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能让人民遭受贫困……如果我们破坏了工业，任何改革都不会奏效……我们应当认真关注生产”^[10]。这些正是中间派所强调的主题。

1993年9月，盖达尔作为负责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回到了政府，其时叶利钦与议会的冲突正在向10月份的武装冲突升级。1994年1月，由于反对派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叶利钦只好再次改组政府，支持似乎同情中间派立场的旧工业企业主们。盖达尔与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再次离开了政府，后者曾是严格遵守休克疗法指导方针的主要支持者。^[11]苏联冶金部长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这样一来，留在高层职位的惟一一个休克疗法的坚定支持者就是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了，他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设计师。

自1992年12月开始任总理职务的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似乎拥有了极为强大的权力，1月20日，切尔诺梅尔金发表了一系列公开讲话，似乎表示他要在政策方面有急速的变革，宣称“市场浪漫主义的时期结束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声明说“俄罗斯不会回到过去”，也不会“偏离市场经济”，认为“把西方经济的方法机械地移植到俄罗斯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他保证实行积极的政策从而与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作斗争。^[12]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叶利钦转向了更为民族主义的态度，后者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显示了它的强大。叶利钦更为严厉地对待将北约组织扩展到东欧各国的建议，他更少主动地同意西方的政治要求。

就像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1992年年中之后，政府经济政策发生了些许调整^[13]，除了大幅度人事变动和对新政策的议论外，很明显，俄罗斯在1992—1995年期间并没有严重偏离休克疗法战略，不论是切尔诺梅尔金在1992年12月首次出任总理之后，还是在

1994年1月他的控制得到了显著的大力加强之后，休克疗法并没有发生重要的调整，更不用说被放弃了。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没有扩大对工业的公共投资和支持，也没有采取工资—物价调控措施。政府仍旧拒绝偿付它对企业的绝大部分欠款，也没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计划来帮助工人和依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1994年，尽管切尔诺梅尔金充满激情的讲话似乎对休克疗法有所批评，但与其说放慢了私有化进程，不如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完成。到1994年底，盖达尔和费奥多罗夫得出结论说：切尔诺梅尔金，这位曾被他们一度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死敌，毕竟还不太坏。

为什么俄罗斯继续采取休克疗法？

除开叶利钦政府的人事变动不说，为什么休克疗法保留了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叶利钦保留了实权。1992—1993年，议会在旧的体制下仍然拥有潜在的权力，叶利钦努力保留经济决策权。^[14]1993年10月议会解散之后，叶利钦没有任何挑战地执政了几个月，直到12月份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产生了新议会。就像下面所要说明的那样，新宪法几乎将所有的实权都交给了总统办公室。

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叶利钦在内阁中作了一些纯粹是表面的、言辞上的变化来应对公众要求改变经济政策的压力，以此掩护切尔诺梅尔金在经济政策上作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种解释或许有一定理由，但是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即为什么在面对休克疗法所引起的许多困难以及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叶利钦还要继续执行休克疗法？

第二个解释就是用由于不存在另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这种说法，来说明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的继续。当休克疗法的某些支持者如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斯·阿斯兰德（Anders Aslund）坚持认为它运转良好的时候，另外一些支持者承认它引起了许多问题，但是却坚持认为另



外的政策可能会更糟。所以，就如这一争论所示，尽管新内阁是务实的，但是除了继续执行休克疗法也别无选择。

但是中间派批评人士坚持认为另外的渐进过渡政策是可能的并且可能使社会代价大为降低，这样一种可能的政策已经在中国采用，尽管类似的政策在俄罗斯是否有效还无法确定。^[15] 不管人事变动和新政策的许诺如何，政府并没有努力推行过任何新政策，这样一个事实要求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要么确实不想作出改变，要么摆脱叶利钦的阻力而这样做。

尽管叶利钦自己似乎没有深刻的经济观点，但正是他早期采取了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战略，休克疗法的消极结果虽然影响了大多数俄罗斯人并对俄罗斯工业的未来造成了危险，但是休克疗法对一小部分但却实权在握的人大为有益，继续实行这一政策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银行家们从休克疗法造成的投机中获得了巨额财产，^[16] 原材料出口商也同样如此。身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环境中的合法与不合法的经营都担心，如果俄罗斯转向更加渐进的、国家管理的经济发展进程会使他们进一步致富的环境消失。而且，大多数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一直乐意忽视休克疗法的几乎所有缺陷，只要叶利钦顽固地坚持休克疗法的方法。

所以，尽管休克疗法引起了许多问题，叶利钦还是拒绝废除它就不奇怪了。废除休克疗法会疏离俄罗斯的新富和西方强国，而他们都是叶利钦的重要支持者。^[17] 但是，为什么与中间派结盟的、公开反对政府政策的工业企业主们同意留在政府中并为政府服务呢？

企业经理们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分裂，而他们以前对休克疗法的反对构成了中间派与政府对立的基础。但到了1992年期间，不论中间派领导人何时召集大规模的企业经理人会议，他们都发现在那些出席会议的人中存在非常不一致的意见。^[18] 正如在第十章中所说明的那样，休克疗法并不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影响了所有的企业经理。俄罗斯工业中的石油和天然气、矿业以及钢铁部门，尽管在短时期内受到了休克疗法的伤害，但仍然前途光明。而对那些前途未卜的工业



企业主们来说，迅速的私有化仍是他们乐意接受的。在1993年和1994年私有化推行期间，企业经理们发现，接收合并自己企业的人微乎其微，接替旧管理者的人正在变成新的独立的企业主，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反对意见看来越来越起不到什么作用。^[19]

当叶利钦把一些实业家纳入政府的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他从俄罗斯工业部门挑选了一些人，这些部门在休克疗法政策下经营得不是太糟。当俄罗斯工业主体严重衰退的时候，一些部门只有较低程度的衰退。^[20]1991—1995年期间，位于切尔诺梅尔金家乡的天然气产量只下跌了7%^[21]，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族也因对天然气的垄断大发横财而出名^[22]。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来自钢铁工业，相对而言，它的一些部门由于钢产品售价低廉、质量上乘，经营状况还算不错。^[23]

中间派反对意见的影响更多地是建立在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大型企业经理层中的实力派的立场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来自普通选民的广泛支持基础上。1993年12月和1995年12月的选举表明，中间派的票数一点都不占优势，叶利钦发现在政府的位置中给中间派提供一些安慰和权力来赢得某些中间派领导人是很有可能的，甚至连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后也进入了叶利钦政府。^[24]

变动的政治立场

俄罗斯政治产生了众多的政治党派、政治运动和政治联盟。它们的政治立场覆盖了所有可能想象到的观点。然而，大多数俄罗斯政治组织都比较小，它们中有一些刚出现不久就消失了。

1992年，三个主要的政治组织产生了，一个是叶利钦和盖达尔的支持者，这个组织经常被媒体称为“激进改革者”或“民主主义者”，前面提到的民主派是第二大主要组织，第三个主要组织是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

开始时，中间派好像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共产党人被广泛



认为由于旧统治的失败而声名狼藉，分析家们几乎都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参加他们的示威和集会的人大都是对苏联消亡感到愤怒的老人，由于共产党四分五裂，它们的势力更加弱小了。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组织被取缔，而某些不同的党派又在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衣钵而你争我夺^[25]，尽管某些民族主义组织和共产党一样日渐活跃，但他们仍被看作政治边缘力量。^[26]

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传统上被认为是敌对的，但在1992年，许多来自两个阵营的个人和团体开始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联盟。虽然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是他们在反对叶利钦政府的亲西方政策、在如何看待在休克疗法政策影响下工业基础的衰退、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等问题方面达成了一致。^[27]这一联盟，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被他们的对手称为“红—褐色”联盟。

1993年2月，随着俄罗斯对苏联共产党禁令的解除，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的名义下重新复活了，由根纳第·久加诺夫所领导。它迅速成为主要的左翼组织，在俄罗斯，这一组织受到那些愿意追随共产主义的大多数前苏共党员的拥戴。在1993年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从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中脱离出来，转向了更传统的左翼立场，带有俄罗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在一起的特点。^[28]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迅速成为在俄罗斯显然是最大的政党，拥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党员。

在休克疗法将中间派推向反对派怀抱的第一年，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无疑还是一个弱小的团体，但在休克疗法实行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或许是中间派不曾拥有分析家们所预测的那么多选民基础。看来，在经济迅速衰退的一年之后，人们开始看好更激进的反对派。1993年12月，在独立的俄罗斯举行的首届议会选举中，中间派被复活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挤到了一边，两年后，即在1995年12月17日，当共产党在议会中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出现的时候，中间派进一步衰落了。

1995年选举中出现了众多的党派，但在两次选举中只有五个主



要的组织，一个是亲政府党，他们支持休克疗法经济政策和叶利钦政府的亲西方外交政策，1993年选举中，只有一个重要的党派代表了这一立场，即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而在1995年的选举中，第二个亲政府政党——由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也列入了候选人名单；第二个组织代表了中间派的立场，在1993年的选举中，俄罗斯民主党和妇女党均有一个中间派的纲领；到1995年的选举时，俄罗斯社团大会作为最有影响的中间派政党出现了。

第三种立场介于亲政府派和中间派之间，由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领导，在两次选举中都有追随者，亚夫林斯基的“亚博卢”对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批评，但是比中间派完全替代的建议要谨慎得多^[29]，俄共是主要的共产党组织，但在两次选举中也有其他党派与之结盟，农民党被广泛视为共产党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人民权力党是由一些与俄共关系密切的名人在1995年成立的，包括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两次选举中，以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受人鄙弃的自由民主党向选民展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立场。

在两次选举中，新议会中的下院即杜马的225个席位由参选政党所占据^[30]，另外225个席位则分配给了各个单选区，政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都可以竞选这些席位。图11—1显示了各个党派在两次竞选中的情况，甲部分显示了政党选举的结果，乙部分显示了450个杜马席位在五个政党之间的分配情况。^[31]

1993年选举之前，媒体预测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会赢得胜利，然而，它才获得了15.4%的政党选票和16.9%的杜马席位，令人吃惊的胜利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他的自由民主党扰乱了人们的预测，获得了政党选举票数中的22.8%，日里诺夫斯基用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好斗言辞活跃了选举运动，而且赢得了最多的选票^[32]，俄共和它的农民党盟友成绩也不俗，在政党选举中分别赢得了12.4%和7.9%的选票，总得票率达到20.3%。中间派政党并没取得预先期望的结果，在政党选举中只获得了13.6%的选票和9.3%的杜马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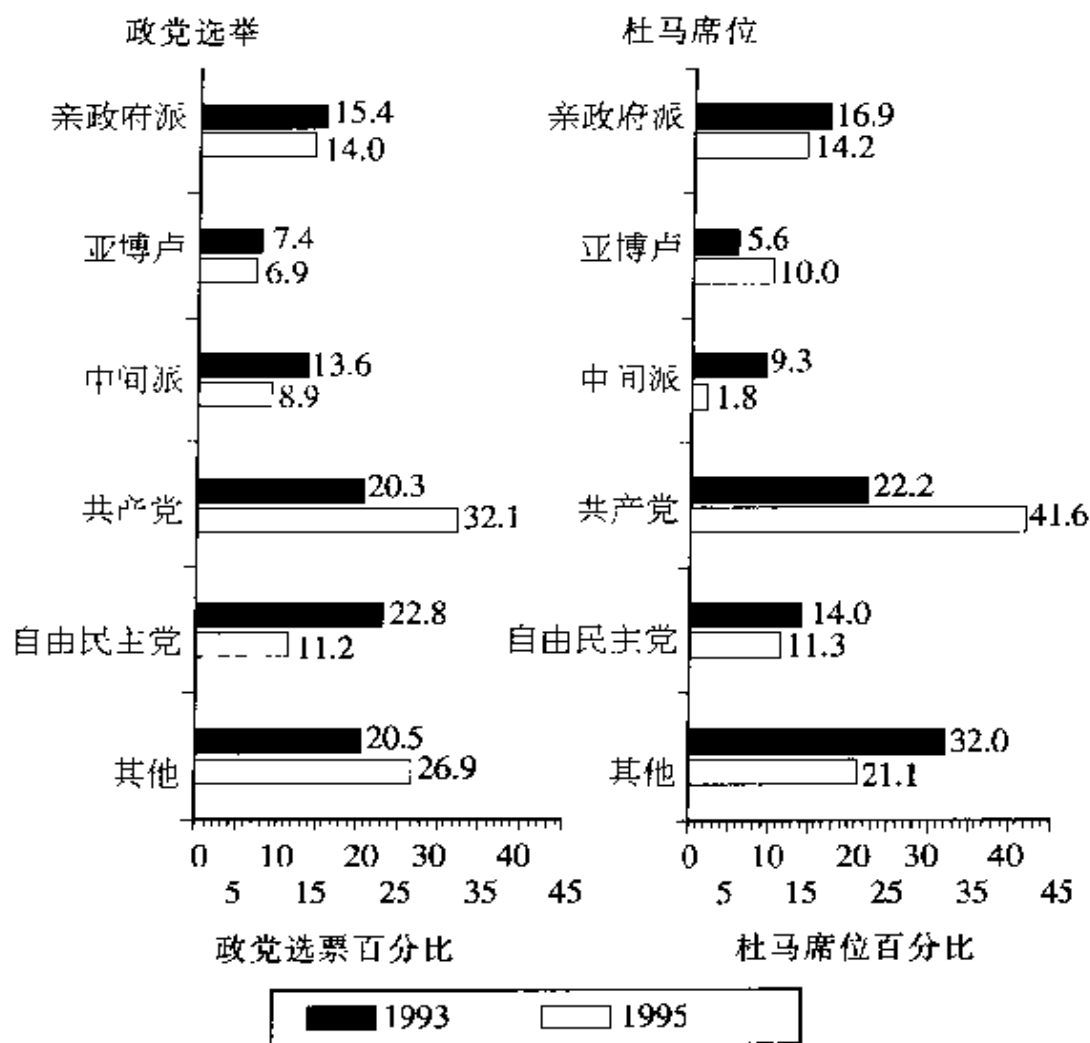


图 11—1 1993 年 12 月和 1995 年 12 月杜马选举结果*

资料来源: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or 1995, preliminary final report dated 29 December 1995).

*: “亲政府派”在 1993 年指“俄罗斯选择”党; 1995 年指“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和“俄罗斯民主选择”党。

“亚博卢”在 1993 年指亚夫林斯基—博尔杜列夫—卢金集团; 1995 年指“亚博卢”党。

“中间派”在 1993 年指民主党和俄罗斯妇女党; 1995 年指俄罗斯社团会议和俄罗斯妇女党。

“共产党”在 1993 年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农业党; 1995 年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农业党、共产主义者—俄罗斯劳动者党和人民权力党。

“自由民主党”在政党选举中指其他党派; 杜马席位中指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士。



亚夫林斯基的政党拥有一批人数虽少但却是令人尊敬的追随者。^[33]

新杜马由政府的反对者控制，但是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在反对者中是最有力的政治力量，这一联盟是复杂的、变动着的，尽管日里诺夫斯基的言辞夸夸其谈，但他的政党在预算问题是支持政府的，它也是杜马中支持叶利钦在 1994 年 12 月发动车臣战争的少数人之一。

1995 年，叶利钦总统指示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成立一个新亲政府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所以，在 1995 年 12 月的选举中，在盖达尔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和切尔诺梅尔金的新政党两个亲政府党之间，俄罗斯人有两个主要的亲政府政党可以选择^[34]，当选举临近时，由于叶利钦的声望受到经济衰退和车臣战争的损害，媒体这一次预料新中间派政党——由尤里·斯科科夫领导的俄罗斯社团大会会有强有力的表现，它赢得了颇受民众喜爱的俄罗斯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的支持，列别德一向是被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提到的。

在 1995 年 12 月的选举中，“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出巨资为其在电视上做广告，日里诺夫斯基提出了新的夸夸其谈的言辞，媒体则继续报道中间派的俄罗斯社团大会可能的强有力表现，共产党几乎没花什么钱，而主要依靠他们广泛的组织来散播他们的消息，结果，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政党选举中，仅他们自己就获得了 22.3% 的政党选票和 34.9% 的席位，正如表 11—1 所示，由于将其两个亲密同盟与更激进的共产党相联合，共产党赢得了近 1/3 的政党选票和超过 40% 的杜马席位。当选举之后官方杜马机构成立的时候，俄共与其由农民党和人民权力党联合组成的盟友一起，共有 221 位代表，正好比 450 个代表的多数差 5 个人。^[35]

表 11—1 1993 年 4 月 25 日的全民选举结果 (%)

问题	赞成比例	反对比例	弃权比例
1 对总统的信任	58.7	39.2	2.1
2 总统/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53.0	44.6	2.4

续表

问题	赞成比例	反对比例	弃权比例
3 提前选举总统	49.5	47.7	3.4
4 提前选举议会	67.2	30.1	2.7

资料来源：Sakwa (1993, p.428).

在 1995 年，为从政党选举中赢得杜马席位，只有四个政党获得了 5% 的基准票数——俄共 (22.3%)，自由民主党 (11.2%)，“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10.1%)，亚博卢 (6.9%)。盖达尔的民主选择党只赢得了 3.9% 的政党选票，中间派政党都没有通过 5% 这道门槛。

实际上，中间派政党在新杜马中已经消失了，他们只拥有少于 2% 的席位，如表 11—1 所显示的那样，两个亲政府政党一起赢得的政党选票和席位比俄罗斯选择在 1993 年单独赢得的选票和席位都要少。就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并没有消失，但是它的政党选票却比 1993 年的水平大为下降了，亚夫林斯基的政党严厉批评叶利钦对车臣地区采取的措施，它在杜马中的表现比以前有所加强。但是，共产党成了俄罗斯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对 1996 年的总统大选已是严阵以待。

休克疗法实行四年来使从前统一的俄罗斯掌权人物四分五裂，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以及在第十章中所论述的休克疗法的其他影响使共产党分享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选票，而仅在五年前这些选民还是明确地反对共产党的。

走向专制政府

在苏联的最后一年，新的民主机构的创建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1 年 8 月那场蓄谋的政变被叶利钦这位民选总统击败了。这些民主机构赋予了击败这场政变的政治合法权，对议会驻地俄罗斯白宫的防御，变成了新的领导人击败旧领导人的象征，它表明了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仅仅过了两年，1993年9月，还是同一个议会，还是两年前那些坐在席位上的代表们，却被政府命令解散，但这次是叶利钦下令解散的。这年10月坦克炮轰了白宫，这是由逮捕那些抵抗议会解散的代表所引起的。再次炮轰白宫成了政治方向改变的一个象征，但这次是象征着转向了专制政府。

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尽管有一些曲折，但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国家和各级地方的民主机构的作用日益弱小，政治权力转向克里姆林宫——在沙皇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是集中化权力的传统中心。一旦休克疗法的影响使得从前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掌权人物不再团结，并且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派运动，这一专制化过程就在1992年启动了。

到1992年年中，俄罗斯议会开始考虑公众日益增长的对休克疗法的关注——人们期待一个民选的立法机构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议会授予叶利钦总统有限的立法权，他曾依此制定了休克疗法。1991年俄罗斯全民大选中他成为总统，这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权力。^[36]但是，宪法也授予了议会重要的权力，根据宪法，议会的最大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甚至罢免总统，当然，它不太会突然取消1991年已授予叶利钦的有限立法权。

1992年上半年，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之后，冲突开始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叶利钦开始指责议会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绊脚石，他提出用全民投票的方法来决定谁拥有最高的权力，是总统还是人民代表大会。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争论成了1992年12月人民代表大会的头号问题，由于叶利钦的紧急状态权已到期，这个赌注是很高的。把重要的政府任命权力从总统手中转移到议会的方案经一次投票失败之后，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人民代表大会允许叶利钦暂时保留立法权，叶利钦所希望的对宪法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预定在1993年4月进行，作为交换，叶利钦同意用切尔诺梅尔金替代盖达尔。



但是，继内阁重新组合之后由于经济政策没有变化，也由于俄罗斯工业的继续衰退，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再度恶化。1993年3月叶利钦突然宣布“特殊管理办法”，似乎暗示着将解散议会，但很快就因面临广泛的批评以及不能确定军队会在总统与议会的冲突中如何行动而未能得逞。作为对叶利钦行动的回应，同月，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解除了叶利钦的一些权力，并以72票（在大约1000名代表中）对总统进行弹劾。在弹劾失败后，一位重要的民族主义代表瑟基·巴布林评论说，人民代表大会的行动只不过是“自杀”，这一看法六个月之后得到了验证。^[37]

1993年3月之后，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争论，除了经济政策，还包括外交政策和宪法问题。议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依据英国议会的形式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而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则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国。议会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在政策方面有所改变并寻求保卫它的宪法权力以在政府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叶利钦则认为议会的武断做法是不可容忍的。

1993年4月，叶利钦原希望用全民公决来解决宪法问题，结果导致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一场全面的权力斗争，投票人要回答四个关于候选人的问题：（1）是否信任总统；（2）是否赞成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3）是否愿意提前选举总统；（4）是否愿意提前选举议会。叶利钦似乎相信全民选举能够解决他和议会之间的问题。

叶利钦自信他能在全民公决中获得胜利，他拥有重要的媒体权力，他曾经咄咄逼人地发动过一场浩大的媒体运动，“da, da, nyet, da”^①一度在媒体中风行一时。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与经济转型有关的困难，其责任在于议会对他的方案的阻挠，如果僵局被打破，那么改革就会有成效。投票结果尽管比不上叶利钦最受欢迎的时候理想，但由于他在与俄共的斗争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1991年8月末遂政变的抵抗，此时他仍保持了相当的个人魅力。严重分裂无疑不太受民

^① 即“是，是，不，是”的意思，指的是对上述四个公决问题的回答——译者注

众欢迎。

表 11—1 表明了全民公决的结果，尽管投票数没有高到足够使第三个或第四个问题的投票具有约束力，但四个问题都获得了赞成票，总统的职位在三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只有第三个问题让他失望。

叶利钦认为公决结果是一个胜利，但也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明确。叶利钦发现，尽管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两个地方是大多数新秩序受益者的居住地，而在俄罗斯其他地区支持者就比较少。叶利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失去了俄罗斯半数以上地区的支持^[38]，全民公决表明，民众在对总统的看法和经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尖锐的分歧。

也许全民公决的结果使叶利钦相信有可能结束他与议会之间的僵持状态，尽管他没有符合宪法的手段摆脱议会或者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结束了惯常的 8 月份休假之后，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1993 年 9 月 2 日，他以腐败为借口将副总统鲁茨科伊停职，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指控鲁茨科伊。^[39]9 月 18 日，他任命盖达尔为负责经济工作的第一副总理。9 月 21 日他宣布解散议会，声称在 12 月 12 日将选举新的议会并正式批准了新宪法。

接下来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情况将在其他地方叙述^[40]，这次冲突以坦克于 1993 年 10 月 4 日炮轰议会所在地白宫，逮捕了那些拒不离开大楼的代表而结束。叶利钦胜利了。

当人们认为叶利钦的行动没有法律或宪法依据时，叶利钦不停地替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辩护，辩解说这是解决他与议会之间冲突的惟一办法，并最终击败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零星势力。西方政府，包括克林顿政府，都支持他这么做，都认为俄罗斯议会代表了旧的苏联统治的苟延残喘，而叶利钦则代表了民主和经济改革。

1992—1993 年中间派力量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使得一些事件的解释难以得到证实。“红—褐色联盟”得到的是各派少数代表的支持，议会对叶利钦的反对并没有提出要求回到旧的统治秩序，议会反映的是大多数人日益增多的对休克疗法结果的不满，议会反对派中的最大

集团在 1992—1993 年希望有一种不同的、更加渐进的办法来建设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叶利钦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改变政策。叶利钦则违反宪法第一次名副其实地镇压了俄罗斯以前不曾存在的民主议会，以清除对他的政策的批评，这种批评，正如 4 月份的全民公决所显示的那样，反映了相当多的人的意愿。^[41]

在解散议会的两个月内，叶利钦在俄罗斯获得了近乎独裁专制的权力：他解散了议会，使自己的权力在联邦政府一级成为政治权力的惟一来源；他剥夺了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他们中有许多人反对他解散议会；他开除了地方政府中反对他的政府官员，任命顺从自己的人代替他们；他强迫俄罗斯工会联合会领导人伊格·库罗希科夫辞职，而且他警告这个联合会，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不要参与政治。他还取缔了 18 个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组织，关闭了 15 家报纸。^[42]

在这种近乎专断的总统权力的气氛中，叶利钦放弃了以前通过广泛讨论、争吵和妥协的过程为俄罗斯制定一个新宪法的努力，相反的情况是，他的一小撮关系亲密的顾问为俄罗斯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公众的任何影响，这个宪法草案准备在 1993 年 12 月的选举中投票表决。

尽管以前叶利钦要求依据法国或英国模式产生出一个总统权力强大的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新的宪法草案与此迥然不同，它创造出了总统制，以及一个无力的、庞大的顾问性质的立法机构，这与在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中所看到的制度都不相同。新的立法机构的下院甚至称为“杜马”，它使人回想起革命之前在沙皇统治下的那个无权机构。

新宪法授予总统颁布必须遵守的法令的权力，只要这些法令不与宪法条文或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相冲突。^[43]但是新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发现它不可能轻易地通过任何法律，因为所要通过的这些法律不能只得到出席并投票的议会两院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行了（这是在民主的合法机构中的正常程序），还要得到两院全体成员的大多数的支持。这一新的转变取得了难以通过法律的效果，为总统法令的顺利颁

布留下了余地。

同样，推翻总统选举需要全体议员 2/3 的票数，而不只是出席和投票人数的 2/3，才能通过。这实际上使得推翻选举成为不可能的事，除非议会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新议会惟一重要的权力是通过预算。特别是一项新条文规定，如果下院两次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那么不是政府下台就是总统可以解散议会。

所以，叶利钦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成果在新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胜利是几乎不带民主色彩的专制总统制。为了符合叶利钦制定的规则，新宪法必须在 1993 年 12 月的投票中以大多数的票数批准，以至少 50% 的合法选民最后进行投票。要么是否定的投票，要么是较低的票数，这都会将新宪法置于通过与通不过的中间状态。

1993 年 12 月 25 日，政府宣布新宪法以投票人数的 58.4% 获得批准，拥有 54.8% 的赞成票数。^[44]然而，有较多的迹象表明投票是一个骗局，在投票结果逐渐汇集起来之后，中央选举委员会还在将官方人物变成合法的投票人^[45]，俄罗斯人普遍认为投票结果实际上低于 50%。

大多数反对党不论是中间派还是共产党，都宣称新宪法是非民主的，甚至许多温和的批评者和某些叶利钦的传统的支持者都表示担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投票期间，只有一个主要的反对党要求批准新宪法，即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完全支持专制总统制，意图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

甚至在 1993 年选举之前一个月，叶利钦的垄断权力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权力就已获得了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也能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如此压倒性的胜利。看来在 4 月份的全民公决与 12 月份的议会选举期间，公众对叶利钦和盖达尔政策的支持已大大下降了。但是，在新宪法的制约下，对那些政策的普遍反对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新议会很少有权利改变政府的政策。

1994 年 12 月，当叶利钦决定动用武力镇压车臣共和国从俄罗斯独立出去的要求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赞

同车臣脱离俄罗斯联邦，但也几乎没人支持叶利钦反对分裂共和国的军事行动。^[46]这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那里的反对意见不只来自中间派、共产党代表和许多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来自那些从前是叶利钦的核心支持者的人。前总理盖达尔强烈尖锐地谴责武力镇压，实际上断绝了和叶利钦的关系。^[47]但是议会的反对意见对这一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对比之下，1991年11月当叶利钦宣布车臣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来自议会的反对意见就迫使他尽快取消了这一决定。^[48]

叶利钦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不仅避开了议会，也避开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内阁。相反，叶利钦是通过总统掌管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所谓的“权力部长”（内部安全与对外情报领导人和国防部长）被认为对此施加了很大影响。^[49]有些人把这些机构比作新“政治局”，他们举行秘密会议，作出影响俄罗斯命运的重要决定。由于车臣战争时间延长，致使许多人丧生，毁坏了车臣的主要城市，民意测验中叶利钦的赞成率降到了一位数。^[50]叶利钦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51]

自俄罗斯独立以来，总统机构的权力稳固上升，更加强大。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是先前克格勃的成员，负责保卫总统安全，据广泛报道他已成为对叶利钦最具影响的顾问之一。^[52]1994年12月2日，一队总统卫士袭击了莫斯特金融组织的头目和莫斯特安全部队的头领。莫斯特组织控制着NTV（俄罗斯独立电视网，曾经制作过有关叶利钦政府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节目），俄罗斯媒体将这次袭击看作是对那些可能批评政府的人一种恫吓。^[53]

为什么民主在俄罗斯衰退

人们可能会用俄罗斯过去的影响来解释它走向专制政府的趋向。俄罗斯在沙皇和共产党的统治下有过上千年的专制统治，然而，俄罗斯人民似乎在1985—1991年坚定地拒绝了这一遗产，独立的俄罗斯在1992年以其年轻但显然是健康、充满希望的民主政体开始了它的



生命。作为一种解释，引证历史是不够的，因为历史并不是由连续性构成的。今天许多工业化的民主，如法国和德国，在过去也有过很长的专制统治。必须说明是什么特殊的压力迫使俄罗斯退回到了它1985年之前的政治传统。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确实，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历史上，现代议会制民主是与资本主义一起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你可以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自由选举的政治制度和个人公民权在西欧、北美和世界其他某些地区长期有效地联系在一起^[54]，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在某些专制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巴西和智利也获得了成功。现在的俄罗斯看来也会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国度。

在俄罗斯，民主化首次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来自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1989—1991年期间，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体制尽管不是很完善，但却真正是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中缺少民主，而民主的缺失阻碍了社会主义达到它的真正目的。他们追求民主化，不只是把它当一个目标，而是把它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从而社会主义最终能够实现多年来吸引众多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允诺，这个社会的允诺就是人们不仅能够在国家中实现自主，而且在经济中也能实现自主。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叶利钦获得统治地位标志着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建立资本主义的转折，这在经济日程中是一个急转弯，现在的目标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取消集体对个人的福利责任。生产性资产被迅速地从公共所有者那里转移到一个新的富裕资本家阶层。当叶利钦起而掌权之时，他是支持民主的，而一旦他得到了权力，民主就逐渐与他的建立资本主义的核心方案相抵触，尤其是与他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相冲突。

到1992年，这一冲突变得更加明显了，1990—1993年的俄罗斯



议会还拥有与总统相匹敌的权力，它反映了那些受休克疗法伤害的另外一群人的意见，而这成为迅速建设资本主义的障碍，而它最终被叶利钦清除掉了。任何使普通民众的权力得以表达的机构都成了领导层正努力使其生效的经济改革的障碍。民主将会赋予大多数人可能的权力来阻止他们被剥夺和贫困化的过程，尽管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与成熟的和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和谐共处，但在像俄罗斯这样一个从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正在快速建设资本主义的国家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叶利钦可能真想复制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被迫逐渐地限制新俄罗斯体制中的民主因素。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并对他们称为“皮诺切特”的选择给予支持，对他们来说，这表示使用一个不受阻碍的专制国家权力迅速把俄罗斯推向资本主义。^[55]俄罗斯目前的发展不能激发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民主的未来抱有希望。

俄罗斯朝什么方向发展？

预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未来总是出人意料。然而，这里提供的对发生于苏联和俄罗斯的社会进程的分析对俄罗斯可能的未来发展进程确实具有意义。从对我们的分析有利的 1995 年底的情况来看，在下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五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可以沿着它目前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而不管它正给国家的工业潜力所造成的破坏和它正在给大多数人所带来的痛苦。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目前进程的逻辑结果是，俄罗斯将主要变成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国，而制成品则主要依靠进口。俄罗斯的第三次世界化将产生一种与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一致的经济，这种经济将为少数人提供大量的财富，这一少部分是原材料企业以及其他为此提供资金、营销和其他服务的企业的所有者，或者在这些企

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其他的人则忙于为那些从国外进口制成品的公司而工作。

这样一种体制对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缺乏需求。它既不需要大量的受过科学和文化教育的人，也不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无能为大量的产业工人支付高工资。俄罗斯目前人口的减少将适应一种对劳动力的有限的需求的体制。很多人将要失业，为这种体制下不足的就业机会而竞争，大量的人将被迫移民出国。

在这种想象的未来的情形之中，可以预料，俄罗斯国家将沿着非民主和专制主义方向继续发展。自由选举，以及按照真正的权力进行立法，将会妨碍这样的发展道路。如果休克疗法或“新自由主义”道路继续发展，那么，被操纵的选举，或者选举的正式废除，可能取代几年以来俄罗斯经历过的相对开放的民主。^[56]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确实需要有人来扮演俄罗斯的“皮诺切特”。

另外三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每一种都需要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57]，它们是新法西斯主义发展方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新法西斯主义道路使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执掌政权成为可能。在那部分感到灰心丧气和贫穷的俄罗斯人中存在着这种发展的社会基础。人民由于突然失去了整个的生活方式而迷失方向，所有熟悉的事情都已成往事，他们所相信的全部事情都受到了怀疑；俄罗斯正在从一个大国沦落为西方的附庸。这样一种过程产生了一种始自于对自我产生憎恶的心理反应，这种现象在1992年的俄罗斯表现得极其明显，当时，大家似乎对所有外国的东西都崇拜，对俄罗斯的所有东西都瞧不上眼。但是对自我的憎恶有产生愤怒并为此寻找替罪羊的趋势。在俄罗斯，传统的替罪羊首先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其次是西方国家，1993年和1995年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就是这种反应的表现。日里诺夫斯基谴责外国的影响，为俄罗斯在印度洋要求一个温水港，他越是露骨地谴责世界，他在俄罗斯似乎也越受到欢迎。

新法西斯主义可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或者通过掌握军队执掌政



权，在 1993 年大选中，军队中的多数是投了日里诺夫斯基的票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在经济上缺乏清晰的方案。执政的新法西斯主义将可能寻求将俄罗斯边界扩展到至少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少数俄罗斯人高度集中的地区。它将可能投入资金，使俄罗斯经济重新军事化，这可能扭转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在纳粹德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允许新的私人企业主保留其财富的同时，它毫无疑问会对工业施以极大的国家控制。它将可能使俄罗斯经历一个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派团体受压迫的一个新的古拉格时期。果真如此，由于新法西斯主义的俄罗斯寻求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扬威并发泄其明显的不满，新的世界战争危险将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

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向是从休克疗法转变为通过对经济改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指导来达到资本主义的温和主义的改革道路。支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中那些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好处、但又希望俄罗斯变成一个技术上先进的制造业国家而不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的团体之中。大量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董事团体仍然可以从这种过程中得到好处。一些新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并着眼于俄罗斯未来的私人银行现在可以从这一过程中得到好处——因为在日本或德国做一个银行家比在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做一个银行家更具有吸引力。一些更不偏激的懂得新法西斯主义严重危害的军官与他们的军队一起会把这一改革方向作为重建强大的俄罗斯的最好方法予以支持，使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持其军事力量，并在全社会为军人重新赢得尊敬。

虽然拥护这一道路的主要的温和主义派别在过去没有得到选民的极大欢迎，但是可以相信，他们能够与显然更受欢迎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作为一种选择，只要叶利钦在其任上去世（他的健康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高层集团之间的政治交易和在精英集团间操纵产生一个新的致力于献身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政府，那么从休克疗法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就可能会出现。

甚至可以设想，在这种环境下，叶利钦的法定继承人、头脑敏锐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将在政策上领导这一转变，虽然他为了做出这种转变可能也要受休克疗法的约束；也能够想象，由温和的军官们所采取的军事上的意外而成功的行动将会导致一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

然而这样一种政权如果出现，它可能通过一个适度的专制主义体制进行统治，这种适度的专制主义体制也许与目前的宪法组织结构相似。支持这一道路的主要基础由社会的精英集团所组成，包括企业董事、银行家和军官，这些人不可能像重视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国家一样来重视民主。而承担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的重任，对普通人们来说将意味着继续做出牺牲（大规模的失业、工厂倒闭、低工资），而这将给俄罗斯民主进程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果手臂伸得更长些，这样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政体将可能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西方强国在经过对俄罗斯的批评和不满时期之后，可能也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来说，第四种可能性是返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几年以前，这样一种前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似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因苏联的经历及其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失败而受到彻底的怀疑，以致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从俄罗斯的政治日程中被排除掉了。但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这几年中，这种状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好几个东欧和中欧国家中，在1992年的立陶宛、1993年的波兰和1994年的匈牙利，休克疗法受到普遍的欢迎，并通过在选举中获胜促使改良后的共产党重新执掌政权。同样的力量也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恢复了前途。像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其同盟一起，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杜马40%的席位。在1996年6月的选举预测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第·久加诺夫被视为总统的主要竞争对手。

声明信仰社会主义的多党派联盟可能重新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广大的工农业工人和退休人员，这些人承受了休克疗法的主要冲击。多数



老一辈人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怀旧心理，当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时，他们并不很喜欢它，但现在他们特别想念社会主义。那些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党派的、从来没有失去对旧体制下官方社会主义思想信仰的人将支持这种改革方向。在军队中，军人在苏联社会时期被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最浓重、并且他们中没有人很自然地喜欢市场或私有财产，他们也支持返回到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在俄罗斯，共产党通过选举执掌政权是可能的。也许，新法西斯主义集团执政企图的失败，或者选举计划的取消，可能是共产党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

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意味着什么难以预测。如果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公布的方案和公开的声明真如其显示的那样，他们将设法阻止将资本主义带进俄罗斯，并重新回到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体制的道路上来。这将意味着建立这种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努力，这种经济体制建立在公有制以及经济计划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且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与政府的民主形式是相一致的。^[58]

然而，共产党重新执政并不必然排除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新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在波兰或匈牙利，尽管改良后的共产党执掌政权，但并未伴随经济战略的急剧转变。^[59]一些俄共领导人坚持他们不能追随非常温和的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改革模式。^[60]如果他们最真实的意图并不在乎俄罗斯的政治情绪是否保持自1992年以来的那种漠然和愤世嫉俗？人民也许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但是看来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准备积极地卷入到俄罗斯的政治事务之中。

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情的结果。在俄罗斯，即使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掌握了政权并且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它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61]来自俄罗斯掌权阶层的、允许他们拥有新的财产的压力也是难以抵抗的，尤其是自苏联时代以来在许多新贵和俄联邦共产党领导层之间就存在着源远流长的私人交情时，就



更是如此。西方工业国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毫无疑问将施加压力，使俄罗斯共产党政府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松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更多的是为工人和养老金领取者而不是为处于支配地位的温和主义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在俄罗斯的主要左派领导层内部，有一些人更是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可能欢迎这样一种发展方向。

西方对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作出的反应将依赖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如果它企图完全改变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那么来自西方的反应将可能会是非常敌视的，一场新的冷战将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俄联邦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按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改革，最终将会得到西方的认可。

尽管在俄罗斯有人对苏联时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前的稳定有着极强的怀旧心理，但返回到过去那种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不存在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够号召人民朝那个方向前进。^[62]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拒绝它，旧体制下掌权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为支持它而行动，并且，他们更没有理由在其灭亡之后再试图返回到这条道路上去。俄罗斯未来的唯一道路将通过新法西斯主义的选择而产生，这种法西斯主义的选择试图给苏联体制下的政治特征而不是它的中央经济特色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说法。

俄罗斯未来的第五种可能性将会使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逐渐瓦解。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土地和多种多样的区域，有些地区主要由非俄罗斯民族所居住。在苏联时期，这种多样化的社会由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维系在一起，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以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将之整合成一个国家。这种体制已经不存在了。

多民族的大国也可以通过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而联合在一起，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可以通过由市场关系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连结成一个国家。但是，如果在俄罗斯建立有效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努力还是不能成功，已经很强烈的区域自治的压力可能会增

长，这些区域不但包括俄罗斯的非俄罗斯民族区域，而且包括俄罗斯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这可能导致将俄罗斯国家瓦解成众多新的更小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过程中会表现出多样性。纯粹的绝对支配权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存在，而俄罗斯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体制，那么俄罗斯的未来将可能是分崩离析。

不管俄罗斯沿着哪条道路发展，在不远的将来，资本主义和民主在俄罗斯似乎都不能共存。无论是继续实施休克疗法还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可能让广大的公众参与政治生活。似乎只有从资本主义回到首先将真正的民主改革引入到俄罗斯生活之中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改革方案，俄罗斯才有可能重新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

[注释]

[1] 《金融时报》，1991-12-19，1版。

[2] 《纽约时报》，1992-01-14，A3版。

[3] 1992年2月鲁茨科伊逐渐扩大了对政府经济计划的批评，并在2月8日、9日在一次极端国家主义者的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非难政府的演说（Hahn, 1994, pp.314-315）。然而，这些攻击在当时除了孤立的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以外很难找到支持者。

[4] 沃尔斯基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1991年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他的经历在第七章已经谈过了。公民联盟由三个政党组成：由沃尔斯基领导的全俄罗斯联盟“复兴俄罗斯”；由特拉弗金领导的俄罗斯民主党；由副总统鲁茨柯伊和拉比茨基领导的自由俄罗斯国家党（Hahn, 1994, p.314）。

[5] 一些公民联盟的领导人，包括沃尔斯基，公开谈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在俄罗斯民主政治体制下得到实现。

[6] 对公民联盟的经济计划的讨论，见 Ellman (1993)。公民联盟没有正式采纳这个经济计划的任何方案，但它们在1992年经济政策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7] Weir (1993—1994, p.14)。



[8] 中间派的改革家“对迅速变化的可行性并不乐观，并强烈主张重视苏联背景下改革公式表述的特点”（Kullberg, 1994, p.943）。

[9] Kullberg (1994) 认为这是议会和总统分歧增加的主要原因。

[10] 《纽约时报》，1992 12-15, A16 版。

[11] 费奥多罗夫要求叶利钦解除中央银行行长格拉申科的职务以表示对休克疗法的承认，并说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辞职。叶利钦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却接受了他的辞呈。

[12] 《莫斯科时报》，1994-01-21, 1 版；《纽约时报》，1994-01-22, 4 版。西方经济学顾问安德斯·阿斯兰德认为“俄罗斯现在实际上抛弃了基本的改革程序”（《纽约时报》，同上）。

[13] 1992 年 7 月以后格拉申科对 1992 年上半年的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有了一些放宽，但正如我们在第九章谈过的一样，货币政策依然十分严厉。财政政策有时也有所放宽，但仍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的目标存在差距。

[14] 有一个例外是私有化，它没有议会的合作就不能完成。只有在议会解散之后私有化才全面完成。

[15] 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与中国都不同。对中间派议员的类似中国模式的呼吁的批评意见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国家和经济，其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数量大得多，它也没有大量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以推动新的工业。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尽管存在这些区别，但根据俄罗斯的条件制定的逐渐转变的方案是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

[16] 盖达尔得到了一些重要的银行家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一个是奥雷格·博伊柯，财政控股公司坎瑟因·奥尔比董事长，也是国民信贷银行的行长。博伊柯是盖达尔的主要支持者，担任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政党的副主席和首席财政长官。博伊柯后来在 1994 年 12 月与盖达尔绝交了（与博伊柯的谈话，《商业家日报》，1995 09-14；与根纳季·阿欣，一位俄罗斯政治学家的谈话，1995 年 6 月 7 日）。

[17] 1995 年，亚夫林斯基，一位自由经济学家和积极的总统竞争者，批评叶利钦政府“向少数在其经济政策中获利的商业精英投降”（《纽约时报》，Op Ed page, 1995-09-14, A27 版）。

[18] Teague (1992)。

[19] 在叶利钦 1992 年 6 月指定前公司董事舒梅科任第一副总理时，舒梅科评论说：“需要一个所有者阶层……现在所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人都被提名为这



个阶层的高级官员。”（Hahn, 1994, p.315, 引自《莫斯科新闻》，1992-06-15~22）工业家中盖达尔计划的反对者因此有根据担心，盖达尔要让新的资本家阶层全面排斥企业领导者。当公民联盟呼吁实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建设资本主义的策略时，许多企业领导者的支持可能基于他们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阶层，而不是完全反对休克疗法。

[20] 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米留柯夫，估计有10%的俄罗斯工业，已经在休克疗法时期做得“相当好”，找到了它们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出口市场。米留柯夫是1992—1993年间最高会议专家分析服务中心的领导，后来成为莫斯科商业银行的副主席（作者对他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

[21] 见图10—3。

[22] 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天然气工业公司“据报道持有大量的财政股票”（《纽约时报》，1995-09-09, 3版），切尔诺梅尔金创立了天然气工业公司，其主席雷姆·雅哈伊雷夫是“切尔诺梅尔金的门徒”（《华盛顿邮报》，1995-12-03, A1版）。天然气工业公司持有世界天然气储备20%~35%的份额，生产俄罗斯天然气的94%（《俄罗斯石油投资者情报报告》，1995）。据估计，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储备的价值约为4000亿美元~9000亿美元（《华盛顿邮报》，op.cit.）。即使切尔诺梅尔金在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份只占很小的比例，也足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23] 俄罗斯钢铁工业的“旗舰”企业，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工厂，已经可以（从德国）获得数以亿万计的国外投资以建立冷轧厂和电炉。直到1994年6月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仍和80年代俄罗斯工人的水平相似，比1994年俄罗斯其他工厂中工人的水平要高得多（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与企业管理者 and 工人的会谈，1994年6月）。

[24] 有人认为以前在政府中的工业家实际上比自由经济学家更能有效地贯彻休克疗法。俄罗斯经济学家、苏联前副总理阿巴尔金认为，实际上切尔诺梅尔金比费奥多罗夫更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学家（作者对他的访谈，1995年6月14日）。据说盖达尔和费奥多罗夫都措辞严厉而往往向工农业要求更多贷款的压力妥协，而切尔诺梅尔金在谈论需要支持工业的同时也坚决拒绝了起诉的要求。

[25] 最初两个最大的政党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一个列宁主义的组织）和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在改革时期结束时其改革计划和要求与苏联共产党相似。

[26] 两个最有影响的是巴布林的俄罗斯全体人民联盟和更激进的俄罗斯国

家议会（或者称为 Sobor）。

[27] 这个联盟的两方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有不同意见。共产党当然支持社会主义，而大部分国家主义则不然。许多共产党仍信仰国际主义。大概最重要的一致主题就是建立强有力的俄罗斯国家。

[28] 根据瓦尔塔洛娃的说法，一位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领导人的观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要有三个派别：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爱国者派、正统的共产主义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与瓦尔塔洛娃的会谈，1995年6月13日）。

[29] 亚夫林斯基批评叶利钦政府的不同政策，但他所在的组织强烈坚持走西方的道路，看起来与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只有细微差别。在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以后，亚夫林斯基对政府的批评更加严厉。

[30] 要想从政党选举中获得任何席位，一个政党至少必须得到投给党派总票数的5%。

[31] 每一个在政党投票中超过5%下限的政党都能得到相称的杜马席位。政党也可以通过参加225个地域竞选而取得杜马席位。图11—1的第二部分表明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杜马席位的总比例。

[32] 日里诺夫斯基在由国家控制的电视台频频出镜，使得一些分析家推测，可能是叶利钦希望日里诺夫斯基得到共产党的选票，从而分裂和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33]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最终结果刊登在《纽约时报》，1993-12-26，18版。

[34] 尽管民主选择党的领导人盖达尔猛烈抨击车臣战争，但在其他问题上他是政府的坚决支持者。

[35] 杜马出版中心报告，1996年2月。

[36] 通常人们认为叶利钦是惟一个由全俄罗斯选民选出的人，议会代表在个别选区选举。但严格说来这是不正确的。叶利钦是被选出的—对候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任总统，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鲁茨科伊任副总统。当鲁茨科伊支持议会领导人反对叶利钦的政策时，就削弱了叶利钦所谓总统高于民主合法性的要求。

[37] 评论由 Fred Weir 作出。

[38] Weir (1993, p.56).

[39] 参看一份总统反腐败委员会控诉鲁茨科伊将上百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存入一家瑞士银行的报道（《纽约时报》，1993-08-19，A15版）。莫斯科检察官

后来承认，这一指控是无根据的，是基于一个伪造的文件捏造的（OMRI《每日文摘》，第一部分，No.242，1995-12-14）。

[40] 例子见 Weir (1993—1994)。

[41] 西方媒体经常把议会视为“苏联时代的议会”，但没有比叶利钦的总统职位更符合苏联时期的体制的了。最早的俄罗斯议会是完全由在同等规模的选区中竞选而产生的。

[42] Weir (1993—1994, p.62)。

[43]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宪法的特征来自列维 (Levy) (1994a 和 1994b)。列维是莫斯科的一位律师。

[44] 《俄罗斯新闻》，1993-12-25，1版。

[45] 《纽约时报》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所报告的合法选民，在选举后的短短几天内，从 10 700 万到 10 630 万再到 10 528.4 万（《纽约时报》，1993-12-15，A18 版）。

[46] 《纽约时报》报道，在《消息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不支持对车臣的军事行动（1994-12-24，4版）。

[47] 盖达尔抱怨说，在他对军事行动提出批评之后，他甚至无法与叶利钦通电话（《纽约时报》，1994-12-16，A16 版）。

[48] Dawisha 和 Parrott (1994, 68 页)。

[49] 《纽约时报》，1994-12-10，4版报道，叶利钦总统以法令授权使用“国家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以结束车臣危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的形式化。

[50] 1995年4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对 1 035 人进行调查。只有 9% 的答卷认为叶利钦可以再次当选总统（联合出版社，华盛顿，1995-04-28）。

[51] 当车臣战争开始时，叶利钦住进医院，据说是进行鼻子的手术。他在那里与外界隔绝了几个星期。

[52] 《纽约时报》，1994-12-24，4版。前联邦检察官喀赞尼科（1989年为了给叶利钦让位而放弃了他在苏联最高议会的位子的那个人）评论说：“如果你想作出一个有疑问的决定或者签署一个不合法的法令，每个人就都知道你必须去科尔萨科夫。”据报道，来自科尔萨科夫的反对意见已经使一个世界银行支持的放开俄罗斯石油出口配额的计划流产了（联合出版社，莫斯科，1994）。

[53] 《纽约时报》，1994-12-20，A14 版。



[54] 然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国家之间也有冲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与必须作为真正民主基础的公民政治平等背道而驰。资本主义经济允许那些不是选举产生的大商业公司的领导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会影响大多数人，却不用对民主政治体制进行太大的投入。有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增加（Bowles 和 Gintis, 1987）。

[55] 这是指 1973 年发生在智利的奥古斯都·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推翻了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民选社会主义政府，推行由保守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货币主义者设计的经济计划。皮诺切特以暴力和镇压实现了他的政变；阿兰德政府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被军队杀害。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支持“皮诺切特”的选择，即支持智利发生的针对同族的无情镇压和暴力，或者采取更温和一点的专制主义做法，迅速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

[56] 据报道，日里诺夫斯基在战略导弹部队获得了 72% 的选票，在莫斯科军区获得了 46% 的选票，在空军获得了 40% 的选票，在康特米拉弗斯卡亚军区获得了 74% 的选票。后者被叶利钦在 10 月用来炮轰白宫（《莫斯科时报》，1993-12-18, 2 版）。

[57] 据说，领头的新的私人银行家之一梅纳特普银行总裁哈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在 1995 年 6 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呼吁俄罗斯国家在指导经济方面，特别是在鼓励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与伦敦《金融时报》前通讯记者约翰·利奥德的访谈，1995 年 6 月 12 日）。在同一个月，莫斯科商业银行的一位高层官员说大多数银行已经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促进更加富有活力的经济政策”（与莫斯科商业银行副主席米留科夫的会见，1995 年 6 月 16 日）。

[58] 1995 年 1 月 22 日出版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计划强烈呼吁在俄罗斯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最初他们关注于扭转正在崩溃的经济，此后，他们又呼吁把“违反公共利益占有”的财产所有权还给公众，“通过占优势的生产手段”形成“财产的社会形式”，并“以科学的计划和管理为基础”发展经济。他们号召劳动人民“以更主动、更广泛的方式，通过议会、商业联盟、工人自治组织和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其他体制，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从人对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他们还发表声明，以和平方式重新组成许多苏联的共和国愿意参加的联盟。但我们无法预见这个计划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实际奉行的政策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59] 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后的共产党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像他们竞选所承诺的那样发生太大变化。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甚至在当权之后仍继续休克疗法。

[60]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沃洛宁拒绝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后的共产党采取的温和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我们不会走那样的道路。我们要用新的机制发展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健康通道”（作者对他的访谈，1995年6月14日）。

[61] 另一个障碍是独裁的、自上而下的政党运作理论，该理论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可能来自苏联共产党，是从苏联共产党发展而来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功要求与传统的党派运作进行根本决裂，这种与苏联共产党的决裂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是不可能的。

[62] 有些俄罗斯人相信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能从坟墓里走出来，出现在总统选举投票中，他一定能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



Revolution from above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自几个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产生并成为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以来，对这一制度惟一全面的挑战来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信奉基督教的哲学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现代技术的反对者的批判，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家为当今时代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全面的、可供选择的的社会经济制度。

自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早期在欧洲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出现以来，它已发展成为



世界范围的运动，它的吸引力的源泉在于它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最成功的领域——人类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超越它，同时社会主义保证结束在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来它永远无法超越的不平等、无保障和剥削。建立在合作、社会公正、民主等原则基础上的在经济上有效的社会制度的思想，激发来自各民族和种族团体的千百万人的积极性来支持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改良，而且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保障所有人的物质享受，而且保证普通人成为社会的主人。

俄国革命和它所创造的苏联体制，首次产生了大规模建设这种新制度的企望。苏联体制建立在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悠久联系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这些社会制度包括公有企业、经济计划和供使用的产品。然而，如我们所见，实际上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先前所描绘的画面只有少许相像，它的一些特征与社会主义最初的观点是对立的，这些特征包括由一小撮特权精英统治的压制性的国家，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严厉控制，与资本主义企业几乎没有差别的命令主义的工作关系。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共产党改革派试图通过消除其强制性的和非社会主义的特征来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时，这一制度并没有转向它所许诺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反，它迅速走向了终结，而被当前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努力所取代。

苏联体制显然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初的思想，就算不管这一事实，单是苏联 75 年的经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有重要的教训值得吸取。然而，至于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就看一个人如何理解苏联的经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苏联体制达到它的目标的过程的理解。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西方，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大众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对苏联终结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我们相信这一解释依据来自历史记录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这一解释还有一个长处，即它能说明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如此突然而又相对平静。这一争论不只是与过去有关。对苏联解体占主导地



位的解释显示了对社会主义未来诸多教训之一，我们的解释表明了完全不同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流行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最后被埋葬了。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我们认为错误的，然后，我们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看来从苏联解体中应该吸取的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包括从苏联体制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中所要学习的东西。

社会主义被埋葬了？

许多分析家得出结论说，苏联体制的突然终结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能独立发展的，这一结论是从以下对苏联解体很有影响的观点得出来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苏联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瓦解”或“解体”，这一状况对于原苏联的人来说，除了寻求历史曾经证明是有效的一种制度——资本主义来替代它之外，别无选择。所以，这个世界应该忘记建立在平等和合作基础上的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照此观点，苏联解体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主张人人平等来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利用苏联解体作为一个证据，试图说明不仅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能切实可行地替代资本主义，而且，经济发展中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现在都已证明是导致经济崩溃的一条死路。借助重新焕发的活力，他们攻击国家调控市场行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计划。所有这些都看作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活力的威胁。

传统上那些对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积极的、干预主义作用的支持者——工会、中间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穷人的组织、环境保护运动等等，仍在继续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进行斗争。然而，苏联的解体有助于增强这场争论中那些主张国家对市场不予调控的支持者

的信心。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苏联解体说明国家干预经济的危险使得国家干预的辩护人更加处于防御地位，它也表明，一旦苏联体制的终结解除了社会底层的人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危险，西方的有产阶级也就更少对福利国家计划表示宽容了。

然而，苏联解体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独立发展这一结论所依据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观点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其内在的社会矛盾。证据表明，正如第五章所表明的那样，苏联经济开始紧缩是在1990—1991年，即在废除了当时还在运行的主要的社会制度这一过程之后。尽管1975—1989年间苏联经济运行状况不佳，但是这期间经济产出并没有下降，甚至一直到这段时间结束都在缓慢地增长。正是1990—1991年中央计划的废除、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连同上面一章中所讨论的另外一些因素，引起了苏联经济的首次紧缩。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崩溃”，它只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被废除了。

关于“社会主义被埋葬”的另一种观点宣称，不是说苏联解体证明社会主义是完全无效的，而是说它表明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逊于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这一结论依据的是有关历史的具有选择性的解释。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证据显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不管它有多少缺陷，自1928年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即在近50年的时间里它创造了快速经济发展的记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体制在世界上创造了最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之一，在工业化完成后的几十年间，它继续带来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这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当然，1975年之后，苏联经济发展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确实落后于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在总体上优越于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明苏联在1928—1975年间较高的经济增长记录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也许正是由于历史记载对“社会主义被埋葬”的结论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激发了重写苏联经济增长记录的努力，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三章讨论过了。谁要使“社会主义被埋葬”这一说法真实可信，只看苏联体制的消失是不够的，还得否认苏联几十年的快速经济



增长。

“社会主义被埋葬”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说法仍然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即苏联经济陷入了它难以恢复的停滞，因为苏联经济未经改革。显然，为了在苏联重新恢复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就要求彻底革新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经济在1985—1987这头三年的改革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法》，这一首次重建经济的法律只是到了1988年月1月才生效。

正如第五章所显示的，采用《国有企业法》之后的两年中，苏联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中央几十年事无巨细的控制中获得自由的国有企业迅速提高了人们的收入，而这反过来由于供不应求又产生了严重的短缺，靠税养活的国家权力由于经济的变化而受到极大削弱，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通胀压力尽管受到抑制，但是仍在增长。抛开这些严重的问题不管，总量产出甚至总体消费仍在持续增长，尽管速度较低。

1988年，由戈尔巴乔夫重建经济的努力所引发的经济困境显示了其经济政策的严重缺陷。人们预计，努力地彻底改革一个具有60年历史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不会是平稳的，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也不能确定那些政策的调整是否能够达到领导层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另外一些发展很快便打乱了这一切。到1990年6月，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共和国已经宣告行使它的主权，并随后于9月宣布了它的“500天计划”。苏联经济废除了还在运行的中央计划，国有企业私有化已势在必行。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日程已把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撇在一边。将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彻底重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实际上只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太短，不可能确定经济重建是否能够成功，也不可能确定经济重建能否使政治环境允许它继续下去。^[1]

考虑到1991年之后将俄罗斯经济改造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我们在第十章看到这种努力除了伴随着快速的通货膨胀，还伴随着四年的生产迅速下降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一结论并不



令这一观点感到满意：一系列体现为休克疗法的特殊政策可以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础。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的话，它也不证明在俄罗斯过渡到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就像戈尔巴乔夫努力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那样，政治因素将决定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是否在俄罗斯继续下去。

最后，有的人认为苏联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然而，要说这种认识建立在吸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的基础上，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苏联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努力刚开始就终止了。民主社会主义潜在的成功可能性并不能由于最近的历史事件而最终得以确定，也许苏联解体有一些教训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表特征这一问题相关，尽管它不能解决这样一种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苏联的教训

苏联体制有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缺陷：第一，与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要求相反，苏联是由一个特权精英阶层来统治的；第二，通过精英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专制国家，否定公民权和人们的自由；第三，政治和经济机构都是中央集权化的，等级森严，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处在中心的少数高级官员作出的，而其他的人只是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命令。

苏联经济一些为时甚久的问题大部分是由于苏联体制的这些特征所造成的，在一个人口超过2亿人的国家中，经济决策集中在这一体制的核心，使得这一体制失去了弹性和效率，导致资源运用的浪费。企业忽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因为消费者在这种体制中没有权力，企业经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悦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上级。工作激励作用有限，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的生产体制中，工人既不用担心失业，也感受不到利害关系。抛开来自上层领导对加快技术改革的要求不说，由这样一种体制所滋养出来的谨慎和守旧性产生了对这一体制



漠不关心的风气。环境恶化的可怕记录是人们权力被剥夺的更严重的后果之一，他们没有办法敦促领导者考虑环境的影响。总的说来，苏联体制缺少这样一种机构，人们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社会成员的角色来参与有关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苏联体制具有经济计划的形式，但是它缺少关键的实质性的东西。

不管这些缺陷如何，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努力做到了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然而，尽管一直到最后，它连续创造了某些经济增长，但在其最后 15 年，这一体制在经济发展上严重退化。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了这一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效率的下降和以工作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体制。

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而是因为一种政治联盟的兴起，它致力于用资本主义代替它。上面提到的苏联体制的三个特征——由少数精英统治、专制国家和集权化、等级制——最终导致“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和成功。党一国精英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这一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压制性，许多公民转而反对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阶层的人遭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压制最严重。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一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苏联体制集权化的、等级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让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作无效的反抗。

对苏联历程的这样一种解释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效的，或者没有资本主义优越。苏联历程的真正教训是与社会主义在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相联系的，如果它要解决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带来的难题的话。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吸取苏联体制的如下教训：历时甚久的经济衰弱，1975 年之后严重的停滞和它走向终结的方式。

从我们以上所确认的苏联体制的三个主要缺陷中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教训：第一，一个必须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民主的政体，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第二，集权化和等级制必须由可供选择的



体制所替代；第三，社会主义必须拥有预防特权和统治精英滋生的体制。

对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一要求不再有任何疑义，如果人民不是国家的主宰，对他们来说成为经济上的主宰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样。这只是上述三个目标之一，对此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期间取得了重大进展。戈尔巴乔夫最终试图通过政党和候选人之间进行竞争的自由选举方法捍卫一个民主的国家，试图做到根据法律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并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强制执行。苏联这些新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所能找到的那些制度。然而，这些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所特有的，准确地说，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会证明最适合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预先得知。

设计社会主义经济是分权和非等级制为最佳方式是有争议的，对此，在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中存在两派思想。一派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体现分权和非等级制的最好方式是对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委以重任，他们否认竞争性市场体制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挥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不是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批判，如市场关系或中央计划，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公平、团结一致和民主应该纳入到新制度的建设之中。^[2]由于资本主义存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和由拥有巨大财富的政治力量造成的对真正民主的威胁，这些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然而，它们通过市场社会主义是可以达到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体制的终结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观点的兴趣。^[3]目前坚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代人提出的体制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但是企业的所有权要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形式。企业所有权可以授予一个政府实体，也可以授予企业雇员，或者通过一种保证大体相等的股权分配形式将企业所有权分配给公众。^[4]这些观点都是说典型的企业不能享受国家津贴，而必须依靠赢得消费者的支持而生存下去。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将会取得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效率和科技进步，却避免了资本主义的问题。通过废除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制，对工人的剥削也将被废除，同时也废除了造成资本主义财富和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源。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支持没有监督的市场体制，而是意识到需要大量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他们反对自由市场理论家得出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完全由不受监管的市场进行资源分配将会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的安居乐业。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重新分配社会收入，以减少市场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给那些通过市场行为不能获得充足收入的人提供社会保障^[5]，国家要对市场行为进行调控以避免垄断、环境破坏、危险工作或产品，它将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避免高失业和通胀。在某些观点中，国家还起着引导投资和长远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由于没有富裕的资本家阶层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国家干预比资本主义更成功也更持久。

市场社会主义也被视为苏联模式所产生的过度集权和等级关系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它将以分权代替集权，经济决策将由许多具有竞争性的企业的经理来制定，而不是由中央的计划者来制定，在市场社会主义最通行的观点中，工人管理将取代企业内部的等级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6]

第二派支持以民主或参与性的计划而著称的观点。^[7]在这种观点中，苏联模式的集权化和等级制形式将被分权、参与性计划形式所取代，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将在最分散的权力水平上作出，这一权力水平与其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地方的和地区性的计划主体在经济计划中起着主导作用，留给中央计划主体的只是那些绝对需要在中央进行协调的经济活动。^[8]所有的计划实体都是以民主的形式组成的，其代表是由所有受到这一决策影响的相关选区居民选举出来的。

与苏联体制的等级制的计划形式不同，民主的计划依靠协商与和解来制定和推行经济计划，并以此解决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利益冲突。在一个计划主体中，协商与和解的过程也适用于不同选区居民代表之



间的相互关系，这同样也是存在于中央、地区和地方的计划主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企业也将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的决策中为受企业活动影响的所有群体提供发言权。工人在企业内部拥有作决策的基本权力，在企业的董事会中，除了雇员代表，也有消费者和地方社区的代表。

民主计划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观点可以避免竞争性市场所产生的问题，如商业周期、失业、不平等以及破坏自然环境的倾向。他们还强调人们在这样一个计划体制内的积极参与授予普通人一些权力，还认为这是民众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最好体现。如我们已看到的，戈尔巴乔夫转变苏联经济的计划包含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内容。确实，想象一个大规模的、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既没有公众监管又没有市场力量的作用，如何完全令人满意地发挥功能是很困难的。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协调两种体制，这些棘手的难题与如何联合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以达到一个民主的、非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形态直接相关。

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个要求是它不能走向产生一个特权阶层和统治精英的趋势。除了集权化的、等级制的计划的废除，统治苏联的寡头政治精英也将被一个民主的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出现，不能自动地确保不会产生一种统治这一制度的不同类型的特权精英。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生产手段的阶级拥有大量的经济权力。它的经济权力会转变成政治权力，使资本主义变成由经济精英统治的一种制度。生产手段高度集中的私人所有权的排除将阻止精英统治的来源。如果资本主义所有权只是由某些国家代理机构和企业雇员的联合所把持，就不会存在独立的所有者阶级。那些允许市民拥有资本间接所有权的市场社会主义计划通常包括这样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会阻止少数私人所有者拥有资本间接所有权带来的资本增益。

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否是民主的政体或某些民主计划与市场力量的结合体，都能避免精英统治，但是不能确定无疑地预见这一



点。苏联的主要教训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制度容许少数人积聚特权和权力，所以，统治精英能够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在苏联，少数理想主义革命者的兴起导致了一个特权统治精英的产生。

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两个产生新的统治精英的渠道。市场力量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不平等，那些有特殊才能和偏好在市场体制中最大限度地得到回报的人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胜任高级的职位。他们有可能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经济精英而出现，而他们最终会主宰这一体制，他们在某些时候甚至寻求消除个人积累生产财富的障碍。

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计划的框架包含第二个形成有特权、有权力的精英阶层的潜在源头。但是，并不是每个有特殊技能和兴趣的人在参与性的计划和管理部门中都有成功的表现。有些人非常擅长并热爱这种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对这一类活动则缺少技能和兴趣。经理和计划者阶层将会发展起来，并有可能控制这一体制的管理和计划部门。如果他们找到了确保其在这一体制的位置的方法，并利用这一方法积聚特权和权力，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变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精英那样的人。

在一个大范围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没有一种制度能够绝对地保证不滋生有特权的统治精英。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中，预防这样一种结果出现的主要保障看来是所有权和收入的广泛分布以及参与管理和计划过程的普遍的民众参与。只有全体人民中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参与意识的高度发展，才能最终阻止新的精英的出现，防止出现少数精英统治大多数人的新形式。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具有更大的优势，后两者的基本制度是通过有特权的精英来保障统治的。

这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吗？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欠缺的领域民主社会主义将如何运行？它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吗？它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吗？它能提供有效的工作激励吗？它能促进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快速发展吗？



它能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吗？它的集体决策过程符合个人自由吗？在这些方面，它能与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匹敌并胜过它吗？

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克服有缺陷的而且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所存在的问题的潜力，对上述有关民主社会主义潜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为了提出有利于这一立场的理由，将会使我们远离苏联经历的教训，而这才是本书的重点。

苏联经验表明，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体制是能够运行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它会带来不稳定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历程的主要教训是负面的，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哪些方面的错误是应避免的。因为，这些方面除了违背了社会主义当初的理想之外，最终它们只是帮助削弱了经济的运行和这一制度的政治可行性。现在我们知道的要比1917年多得多，而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但是，我们也没留下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任何正面的历史模式。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最初激发人们寻求替代它的条件大体上来说仍未消失。在最近几十年来，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前为千百万人带来无可争辩的物质上的改善过程看来逆转了。在大多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中的少数国家仍然迅速地增加了财富，但多数国家都受收入减少、就业无保障势头增长、社会安全网消失、城市贫困和暴力上升、公共服务减少、越来越多的生活范围被商业准则所主宰、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等问题的困扰。在新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些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情形甚至更坏，就像那些身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习惯上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可能推进这些国家努力迈向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这样一种条件继续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成功的正面历史模式的缺乏，都不可能阻止未来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缺乏，总比1917年首次建立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缺乏要少，那时连任何一种过去的历史模式都没见过。



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理解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失败是草率的。苏联体制只是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平等的、合作的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首次尝试。这样一个首次尝试，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产生了许多缺陷之后，它最终走向了灭亡，这并不令人吃惊。失败的是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毕竟，资本主义首次在14世纪的意大利几个北部城邦出现的时候，也被证明是早产的。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但当时未能生存下来，只是几个世纪之后，这一新制度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坚定地确立下来。^[9]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注释]

[1] 比较而言，美国新政的改革者，在1933年就开始他们的努力，用了大约15年时间才成功地完成对美国资本主义重建。

[2] Weisskopf (1992b, p.1).

[3] Langer [1938 (1936—1937)] 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也是对南斯拉夫采取这一模式的某些因素的反应。例如 Ward (1967) 和 Horvat (1982)。Nove (1983, 1991) 在讨论苏联经济计划问题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地位作了影响极大的论述。作为对苏联灭亡的反思，又出现了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浪潮，主要包括 Bardhan 和 Roemer (1992)、Weisskopf (1992b) Schweickart (1992) 以及 Roemer (1994)。

[4] 正如 Roemer (1994) 所广泛讨论的，由互助基金所有的企业，由市民持有股份的形式实现所有权。股份不能换成货币，也不能继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同等数量的只能用来购买互助基金的股份的特殊单据。

[5] 然而，报酬的有意义的的不平等必须允许保留以提供一种激励，这种激励是市场体系提高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

[6]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同意工人控制企业。有些人，如 Roemer (1994)，就主张传统的由高层管理者控制企业的做法。



[7] Devine (1988、1992)、Albert 和 Hahnel (1991a、1991b、1992)。对一些不同的民主计划社会主义概念也可见 Laibman (1992)。

[8] Devine (1988, 第 12 章)。

[9] 见 Dobb (1963, pp.157~161)、Postan 和 Rich (1952, pp.289~354)。根据 Dobb 的观点, 在 1338 年佛罗伦萨有 200 家作坊, 雇用了 3 万工人织布。但这种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终并未生存下来。